



南侨机工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黄尧 黄蕙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南侨机工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黄尧 黄蕙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侨机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 黄尧，黄蕙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222-13599-4

I. ①南… II. ①黄… ②黄… III. ①华侨—抗日战争史—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8291 号

南侨机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黄尧 黄蕙 著

责任编辑：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刘 焰

责任印制：洪中丽

出版：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发行：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邮编：650034

网址：<http://ynpress.yunshow.com> // E-mail: ynrm@sina.com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 印张：19.5 // 字数：200 千

版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222-13599-4

// 定价：45.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出版部电话：0871-64191534

前面的话

2014年12月，得知定居于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30名南洋华侨机工中的最后一位辞世，^{【1】}我的心顿时茫然而悲哀。还是在10年前，州委、州政府及南侨机工联谊会德宏分会召开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时，对抗战老战士——南洋华侨机工（简称：南侨机工）进行表彰慰问，存世者尚有九位，他们精神矍铄、神采焕然、披红挂彩、谈笑风生。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电纷至沓来，南侨机工的第二代、第三代环绕左右，有的自海外踏浪而来，有的自紧邻缅甸赶来叩拜，会场上弥散着浓浓亲情。依照中国特有的祝祈传统，为他们披挂绶带，有的上书“抗战英雄”，有的镌字“赤子功勋”，有的献上寿桃，有的捧上鲜花……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经走过20余年，先前的“拨乱反正”渐次为被历史尘沙淹没的英雄们洗去冤垢，但那一份“迟而又迟”的悔意仍不时让人们的心挛缩而痛苦。六七十年了，3200名南侨机工中近1800名死难者，魂归何处？乡关夕阳，青山春草，可曾讣闻那些年轻的生命？带我一指垂首之处？我们唯愿存世者长寿健康。留下他们，留下历史的遗温。

但不到数年，先后有南侨机工老人辞世的消息传来，国内，连同人数相对集中的海南省老机工仅存11位，又数年，接踵而仙去，至笔者悬管之时，

【1】据“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德宏分会”2014年3月所制表册登记，截至此时曾定居德宏州芒市、遮放、畹町三地的原南侨机工共30人，现眷属475人（不含登记前已迁徙人员及眷属）。南侨机工是：陈生、梁阿来、李成、陈亚明、钟均祥、蔡文兴、周全、邱照发、刘南昌、吴以泰、刘传授、符国霖、陈家佩、黄自由、刘成、谢川周、陈巧、汤仁文、沈治平、涂英杰、刘钜科、欧文华、黄锦波、王亚文、林福来、姚向葵、陈团圆、谢金标、何纪良、黄会卿。

定居于德宏（芒市、畹町）的机工老者尽数别去了。这是否意味着一段由他们代表的难以尽书的历史落下了帷幕？当然不是。但是，当你细检历史末屑，你会发现，在所有抗战史记中，“南侨机工”这四个字，尽管可以用辉煌的金属来铸就，却如同他们曾经倾洒的殷殷鲜血，渗透于大山的肌理中，你难以辨别哪一线岩层叠压着那牺牲，如同他们辄下的道路；你难以分袂哪一粒尘沙曾飞扬着他们的精神。是山之重！是海之深！

《论语》，“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历史答复：南侨机工是以“礼敬”祖国的仪态而坦坦然献生的，他们继后的“死、葬”却托庇青山，无处无不处。那么，剩下我辈可做的事，却唯有“祭”了！

往昔，广州黄花岗，面南而祭。

今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面南而祭。
德宏畹町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面南而祭。

举山为樽，悬海为酒，祭南洋！

由于不必赘述的原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壮举与历史记录文字是极其不匹配的。大凡涉足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著述者莫不唏嘘，竟至扼腕悲叹。其实，1943年，在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岛著述回忆录时，已经哀痛此一史实国人知者甚少，且言日后必罹湮没无闻。这是由我国家、民族之体认“人之价值”的蒙昧未开首要决定的。再而次之因由，则留给后人深省。幸得中国改革开放到来，又有南侨机工第二代诸贤奋力挽救，海外南侨机工后人数次返国，驱驰万里，重踏前人足迹，方得开启连接海内外的历史记忆抢救工程。

已经得以见诸文字的出版物，是功德在焉，没有他们的努力，历史重门不可开启。但细索所有，相参互照，仍觉细节缺失、难以连贯，而成一通观长卷者。这是不得已的事，相信诉诸文字的作者在当时已经尽力而倾情，但资料奇缺，为难之大端。尤在南侨机工回国抗日之精神渊源、理想端起、其理智之革命传统、接续传承，甚少探索，而这是必不容忽略的，以及这一重

大事件相关国际、国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背景，南洋机工大略分为两段的“服务”经历、个人自述史之细节佐证，等等，仍散断而稍欠凿实。笔者建议，后续著作，当不避艰难，多从上述方向以实证充实历史，而不可中辍，而这也正是我们吮笔试行的原因。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南侨机工回国抗日（1939—1945年）76周年纪念之年。“祭以礼”，最重要的是铭记历史、不忘前人。

中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辖地，即今芒市—畹町，是滇缅公路最重要的下段枢纽，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担任抗战物资运输的主要基地。1942年5月初，日军进占怒江以西后，为数不少的机工因归路阻隔滞留在此。德宏各族人民爱护机工、保卫机工，留下血脉印记，斑斑可数。受德宏州委宣传部委托，我们担负这一笔录的任务。其所幸者，我们与德宏山川大地、各族人民其源远矣，而步南侨机工先烈足迹，是为人生之再振奋。

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是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不可分割、悲壮激烈又焕发着炫目光彩的一部分。

南侨机工崇高的伟大爱国情怀、敢于担当的勇毅气概，始终是我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发奋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中央及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德宏州委、州政府及有关各方努力运筹，坐落于畹町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馆”已于2014年9月3日奠基，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正式开馆。

此当为这一千秋工程重要献礼。

作者

2014年12月24日于昆明



目 录

1 前面的话

001 第一章 南洋，碧海潮起

050 第二章 “华侨是革命之母”

070 第三章 “机工统统有！”

092 第四章 机工生活：“可胜感哉！”

132 第五章 “罕丽！罕丽！”

140 第六章 腊戍抢运·搏杀大轰炸

168 第七章 抢运抢运！真正的“殿军”

217 第八章 流浪再归·西进反攻

261 第九章 抗战胜利·归去来兮

282 第十章 经历坎坷·碑指蓝天

第一章
南洋，碧海潮起

1

1937年7月7日，夜，窒闷。

宛平城外，连环的枪响和继之而来的炮声，在沉沉的夜海中忽而掀起惊澜。

驻扎北平西南宛平城外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拼死抵抗。

此时的北平，北、东、南三面已被日军控制，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果日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将直接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华北一旦沦陷，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就有可能变为现实。

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日军的公然挑衅意味着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已全面启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而惯于“忍辱”，已在苦海中浮沉了百年的中华民族终于也开始了低沉的怒吼……

一时间，全国舆论沸腾，群情激愤！“如果再不抵抗，势必亡族灭种！”生死关头，民族的共识异常清醒。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蒋介石提出“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电令

宋哲元、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受邀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第二天，庐山会议上周恩来与蒋介石握手的照片发表在各大报纸头版。新闻记者们更乐于去捕捉这位英俊的中共领导人音容笑貌中那种陌生、新鲜而可亲近的气息。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辱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各界和大众企盼多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终于到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全面抗战拉开帷幕。

东方，夜黑如铅。

太阳的升起，是可以期许的吗？

日本的侵华野心从来不曾“包藏”，而晚清至民国主政者的一味“绥靖”、退让、卖国，竟让一个赤裸裸的“阳谋”在光天化日之下步步变为现实。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强大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为此，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进而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

世界，实现所谓“八纮一字”的疯狂梦想。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策略来达到其扩张野心的目的。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伺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终而演进为1937年的“七七”事变。

日本，按照筹谋百年，预先设计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2

南洋，七月的海风格外腥咸，烈日下苍白的浪花撞击着炽热的礁滩，发出嘶嘶的沉吟。

南洋，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泛指中国大陆以南的广阔海域与岛屿，是中国历史“坐北”而“南向”的深深瞩望……

明清开始的移民高潮——“下南洋”，悲情壮怀、充满开拓精神，同时又饱受辛酸屈辱，是中华民族一段面向大海的“求生”历史。

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前，南洋华侨的人数已达800万之众。

求生！他们的祖辈曾因“求生”而系命于万顷海波，“十出九不还”；求生！在南洋300年的殖民史中，忍辱求生！流血求生！拼死求生！死而复生！

南洋人懂得：生，不拼不得！生，有赖祖土；民族，有赖国家！国家亡，则民族亡！

而此刻，中国民族已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南洋人心中再次本能地唤起民族“求生”的呐喊……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日战局急转变化的新闻经由南洋各地的华文报纸传遍了南洋各岛。报纸被抢购一空，人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悲云压城，日月无光。

人们愤懑的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国民政府仍一味“绥靖”，“攘外必先安内”，致使贼寇得陇望蜀、精密备战，以致今日之民族惨祸！

人们更切切的是：如果人人此时再不起来救民族于危难，更待何时！

自“九一八”以来，南洋华侨从未停止对祖国的关切，成立抗日团体、声援抗战、输财救国、抵制日货，一浪高过一浪。

1931年11月26日，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危急到这步田地，专赖着几个佣兵自卫者，或几个常持着弱国无外交的外交官去挽救那么危急的狂澜，那是梦想的……我们人民须得起来自救，须得起来自拔。”^{〔1〕}

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发生后的第四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便召开紧急会议，定9月23日为“国耻日”，停止娱乐活动，华侨商店下半旗，华侨佩戴黑纱致哀。

新加坡侨民大会更直接通电欧洲日内瓦国际联盟并美国总统，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线自此发生，将造成将来世界纷乱……”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明知开会发电虽无丝毫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励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

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华侨迅速组织了越南经济联合后援会，

〔1〕王新华、沈强主编：《华侨与抗日战争》，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

他们直接从财力、物力上支持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并开展了长期的抵制日货运动。

泰国，曼谷中华总商会召集了同业公会大会，抵制日货，募集捐款，华侨米商禁止对日出口大米。

印度尼西亚，仅雅加达一地就成立了 50 多个华侨团体参加的救国后援会。这些华侨组织不顾荷兰殖民当局的阻止、破坏、镇压，组织罢市和群众游行。

1932 年“一·二八”事件爆发，驻防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拼死抗战。华侨民心振奋、欢欣鼓舞。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迅速成立了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几个月内就为十九路军筹捐经费 10 万坡币，约合当时“国币”100 万银圆。

当得知国军缺少空军，无力应对空战时，整个华侨世界又开始了捐献飞机的热潮。仅菲律宾华侨就先后捐献了 15 架飞机。在捐助的飞机中，甚至有“妇女号”和“学生号”，是华侨妇女和中小學生捐献的。

在筹款箱前，前来“献金”的妇女们排成长队，她们摘下耳朵上的金耳环，取下颈上的金项链，褪下金手镯，平静地放进募捐箱……这些首饰带着她们的体温和芳香。对于女人来说，首饰不仅是财富，而且是岁月与记忆，舍此，舍之甚多……

在小学校内，身穿白衬衫的小学生们簇拥着募捐箱，虽然战争阴云重重，但孩子们总是阳光灿烂。募捐箱上赫然写着：“捐糖果钱，助战飞机。”孩子们把衣服口袋翻个底朝天，举着全部的零用钱，靠近募捐箱，尤其喜欢听钢镚落底的响声，甜甜的、糖果味的响声……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战事急转直下。转瞬间中国半壁江山竟已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8 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11 月，日军占领上海，在南市放火连烧 9 天，军民死伤无数，上海 5255 家中国工厂被侵占、圯毁，损失超过 8 亿元。

12 月 13 日，日军攻下首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 6 周内烧

杀淫掠，杀死 30 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烧毁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造成了城内几乎无中国人的悚人局面。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全面爆发，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经在世界战争史之开首页面上，涂写了第一件惨绝人寰的反人类“大屠杀”事件！

1938 年 5 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其中有数名五岁小女孩被奸杀、掏心生吃，令人骇然。

6 月，日军攻占开封。蒋介石命令花园口决堤放水，以阻挡敌人的攻势。豫、皖境内 17 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 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死人无数。

9 月，日军汇集五万余兵力，分 25 路进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续烧杀淫掠两个月。

10 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

.....

然而，此时战云密布的欧



↑ 华侨为声援祖国抗日劝募献金的场面

➡ 越南华侨献金救国

◀ 荷印华侨小学生义卖冰激凌筹款支援祖国抗战和救济难民

洲，尚处于张皇自顾之中。德国法西斯步步鹰攫狼吞，其并灭西欧、进而进攻苏联的战争只在一瞬燃爆。具备充分战争准备的希特勒有着与日本法西斯同样地在数月之内实现其侵略野心的张狂妄言。而被侵略战争“圈定”的各国，均自分心，枕于和谈空想。一个对于欧洲、美国尚属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图霸东亚，意图与德国法西斯联手将对未来世界命运产生何许影响？中国独此一国抵挡日军的全面侵略战争，乃至“中国战局”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在一片波云诡谲、乱云笼罩中，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更遑论战略的判别！一个弱国濒死的呻吟、血光的照射，不过如残阳惨愁一缕！

但南洋，这万顷海浪却被染红了！唯此碧波汹涌。

新加坡华侨大会通电国际日内瓦国际联盟，并向美国总统吁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索自此发生，将造成世界纷乱……”含陈嘉庚及各南洋华侨团体呼吁英、荷当局遏制日本侵略行径的电言、舆论纷纷，如浪叠千层，但继后的事实说明，这些努力被迅速湮灭。

身处英、荷殖民统治中的南洋中国人，有着孤苦飘零、弱国无依的痛苦经历，故其特别关注祖国的命运。抗战初始，南洋华侨面向全世界联合御制法西斯的呼吁，揭窠本质，明锐透彻，深具洞察之眼光，是二战史册和世界和平事业不能湮灭和应当载入的！

3

国难！国难当头！

汉语中有一个古老、美好而沉重的词语——“共赴国难”。大抵因为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国难”不时而临。“民”既受国之恩惠，国难势所必来之时，无数的微“民”以一躯一命终汇成大流，蹈于劫波，即便不可拒澜回挽，却终究壮哉慨慷！中国人自古革命乐观！

此时，在南洋的华文报纸上，在学校、医院、公共场所举行的数不清的

募捐大会、抗日演说和对殉难军人、民众的祭奠大会上，到处可见“共赴国难”四个字！一首首旋律单纯、用闽粤方言唱出，却铿锵有力的歌谣在民间传唱：

海波呀！你为什么这么长？

游子的心时时追着你，回到那沉沦的大陆！

游子的身敢蹈那万里海疆，奔赴横尸的战场！

清末至民国，自有所谓“侨政”“侨务”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相应颁布法令，承认与中华民族“血缘”相连的海外侨民的中国国籍和“华侨”身份，并保护华侨在海内外的合法权益。（清朝政府1909年颁布第一部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孙中山执政时期，1912年重新制定颁布了“中华民国国籍法”。）^{〔1〕}因此，侨民从来都以中国人自识，这种认同感数百年相续。

血不断，根不断。

一大批能够代表和号召更多侨民的华侨团体相继成立，它们在整个抗日战争和南洋沦陷后的敌后战争中发挥着领导和纽带作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加坡队、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菲律宾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越南华侨救国总会……

以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丘元荣、吴敬业、杨启泰等为代表的爱国华侨领袖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他们成为抗日时期重要华侨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团结和领导南洋人民，无私支援祖国抗战。南洋沦陷后，坚持敌后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坚决地站在维护民族团结的立场上，反对内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爱国侨领、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纸被南洋侨界称为“南洋三宝”。盖由于几百年来南洋华人以血缘、族缘、地缘而结成的特殊社会形态，使族群社团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中的优秀华人、华商对于当地华人圈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殖民统治之下，华人社区由于相对集中，殖民政府除极力控制压制华人之外，华人族群内的事务往往多由华人推举会馆、社团的领导人负责组织、协调和管理。遂“侨领”一直扮演着南洋华侨社会的重要角色。这些“侨领”往往全凭道义与责任，为侨民在殖民统治下的微小生存空间内争取着生存权、民权。他们与殖民政府周旋，积极争取来自中国政府的承认、保护。他们谙熟资本主义的商业规律，又坚守“信、义、礼”的中国商业道德。他们取之社会又回馈社会，将辛苦经营得来的财富捐助家乡和祖国的各项事业或促进当地华侨社会的发展。他们被评价为“爱国、爱乡、爱民”“民族精英”“赤子丹心”“肝胆昆仑”……

他们像许多南洋人那样，以“赤子”起家，卧薪尝胆，千折百回，事业有成而担当道义，负荷沧桑，砥砺前行，直道衷肠。以“赤子”而复归于“赤子”，用一生诠释着中国文化对于经天纬地之“人”的至高而朴素的本意。

华侨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了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日长年累月的经济援助。

1937年8月15日，马来西亚、新加坡即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陈嘉庚对于此次的募捐救济十分慎重：“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期间亦必延长多年。”

在大会决议后他宣布：“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然要希望好成绩，必须有人首捐巨款提倡，此为进行程序所必然。昨经叶玉堆先生自动认义捐国币十万元，余则承认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两千元。”^{【1】}而在抗战一开始，陈嘉庚已认购救国公债十万元。

至1939年，仅新加坡筹赈会便在三十多个分区建立了两百多个支部。它们像一条条毛细血管，深入南洋广大的民众中，将人民对于祖国的点滴“反哺”汇集起来，再输送向那危在旦夕的祖国母亲。

【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华侨郑潮炯是南洋北婆罗洲山打根卖瓜子的小贩，他长年游走于街巷里弄，为抗战义卖瓜子，他全部的家当无非不分冬夏的一身单衣和一担瓜子。

可知？多少“下南洋”的人仅为南洋无寒冬之逼而去淘生：无须置备冬衣，亦无须“避寒”之处所；天气炎热，“少食而可饱”。

此时，郑潮炯又多了一件轻之又轻，又重之千钧的家当——他尽其所能端正地写了“义卖”两个字的一个方木牌。

他挑起他的全部，也挑起了一个人所能负荷的历史与民族的全部，终日行游在人流中。那“叮——叮——当”的敲击声，是他的独奏，是他的流浪者之歌……



↑ 1938年1月，新加坡
华侨举行反日示威游行
↓ 女侨胞卖花筹款救国

人们终为他寂寞而悠远的音乐所感动，即便连“嗑瓜子”也觉奢侈的人们，还是舍出了重重的“瓜子钱”……

国民政府曾专门颁发给他奖状，奖励一个“伶仃”者在洪流逆殇中的独唱！

南洋街头，更到处可见为抗日助捐的“卖花女”，她们将鲜花簪在头上，在铁流滚滚的世界，手捧鲜花，自若地笑着……

愿这历史的一瞬成为永恒，愿后来者将此一花一笑永寄存于心中，或可傲然于一切的堪忍、难忍、不忍、再忍的世界。

据统计，抗战期间华侨捐款达 13 余亿元国币，认购公债 11 亿元国币，占国民政府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侨汇 95 亿元国币。

对于华侨汇款和义捐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陈嘉庚曾这样分析：“1939 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为 18 亿元国币，而同年侨汇收入（含捐款）即折合 11 亿元国币。可使国民政府按世界银行惯例发行纸币 44 亿元。可以说，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之巨额逆差，而且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支撑战时经济的作用。”

国民政府看到华侨对抗战的重要性，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就发电呼吁全世界华侨紧急行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随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侨务工作，建立健全了侨务机构，制定和颁布了许多侨务条例、法规和法令。侧重发动华侨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祖国抗战，其工作力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1931 年，国民政府主办的《侨务月报》在南京创刊。随后，官方所办的《华侨动员》《现代华侨》《华侨先锋》等相继创刊。这些刊物主要刊登中国政府的华侨事务、移民政策、国际贸易和华侨生活等内容。由此，海外华侨社会与大陆的联系空前繁密，在民族危难之时，中华民族显示出空前的凝聚力。

虽远隔重洋，又在殖民当局的严酷统治下，南洋华侨却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当地华文报纸了解战况，与祖国音声相连，心息相通。

南洋华文报刊的优秀传统，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从 19 世纪末，进步人士、爱国侨商倾资兴办华文报纸，唤起民众、开启民智就成为传统。白纸铅

字，春风化雨，一个“人心向内”，有着民族与文化共识的“华人社会”已然形成。

陈嘉庚于192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南洋商报》，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暗流涌动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动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当时，《南洋商报》对这两个事件的报道占据了大量版面。1929年11月2日，怒于日本毁弃“济南惨案”解决条款，陈嘉庚在当天的《南洋商报》上发布致中国外长的电文：“……日兵未退，先许言和，让步已极。乃日本无厌反复，损失不赔，事关国体，万万不可迁就。况民气初盛、抵制正剧，乘兹国货振兴，愈迟愈效，厉害关短，欲速不达，务希毅力坚持，铭感不尽。”

“九一八”之后，《南洋商报》更密切跟踪战争变化和国内政局，推出了《星期增刊》。甚至一天出报三次，即早版、午版和晚报。《南洋商报》还迅速在中国各地聘请特约记者，又派出张楚琨、杨立达、胡守愚等战地记者奔赴抗日前线，采回了大量现场真实的报道和图片，使南洋民众感同身受，虽远隔重洋，却无时无刻不忆之念之。

此时，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巡查日货，举行抵制日货大游行，“不买卖日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用日货，不为日本人工作”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南洋华侨在当地经济实力雄厚，日商受到严重冲击。

新加坡港口外的日本渔船由于华侨的抵制不能靠岸，日本于新加坡的渔业几乎全部破产。1938年，马来亚最大规模的龙运日本铁矿矿山的华工听说铁矿运回日本国内是用于制造武器屠杀中国人，2700多名华工毅然停工离开矿山。

全国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南洋华侨青年告别父母、妻子回国参军参战。他们像北归的候鸟，羽翼初成，便义无反顾，携着南洋的暖风，披着海天朝霞，直飞向那悲云重锁的祖国。

据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华侨回国的就有四万多人。许多青年报考军

校，肄业后在军中任职。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华侨就举办各种航校，培养优秀青年回国服务。华侨还组织了各种服务团体回国效力，或在战场救死扶伤，或参加战时生产和服务工作。

年仅15岁的缅甸华侨颜生跟家人不辞而别，回到祖国西南参加抗战，他只给母亲留下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妈妈，真对不起您，因为您是那样疼我，但是我竟然离开了您，投入祖国的怀抱，做组织民众、宣传抗战的工作去了。恳望您不要伤心，不要流泪，要高兴，要为您有一个孩子能够回国效力、杀敌救亡而高兴……”

一首《华侨坚持团结抗战歌》或许最深刻地道出南洋华侨救国心切的衷肠：

我们在海外流浪，我们在海外苦难，
谁体贴我们的辛酸，谁同情我们的凄凉，
在海外，更了解家乡的可贵，
在海外，更痛感弱者的悲伤。
我们会回国参战，
我们会踊跃擒将，
我们会拒运仇货，
我们会努力宣传。
日本强盗正在步步前进，
整个南洋都将遭到灾殃，
我们要反对投降到底，
打倒破坏和平的魔王……【1】

【1】王兴华、沈强主编：《华侨与抗日战争》，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

4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称为陪都）。

1938年10月，广州、汉口相继沦陷。

国难日深，一发危秋之时，欧洲路透社竟发出电传：“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此时的中国，言和即卖国。陈嘉庚闻讯，即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发电质问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的汪精卫：“路透社电传是否事实？和平绝不可能，盼复以慰侨众！”汪精卫复电大意云：“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乃主张和平乃救亡图存上策。”

陈嘉庚旋即复长电极陈其错误：“武力虽弱，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绝不亡我，英美苏亦绝不坐视，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务希惠鉴鄙言，抗日到底！”^{【1】}

然重庆与各省此时竟寂寂无声，态度不明。陈嘉庚便将致汪精卫的两份电文请重庆某报登载，未果。此时，正值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10月27日，陈嘉庚即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出电报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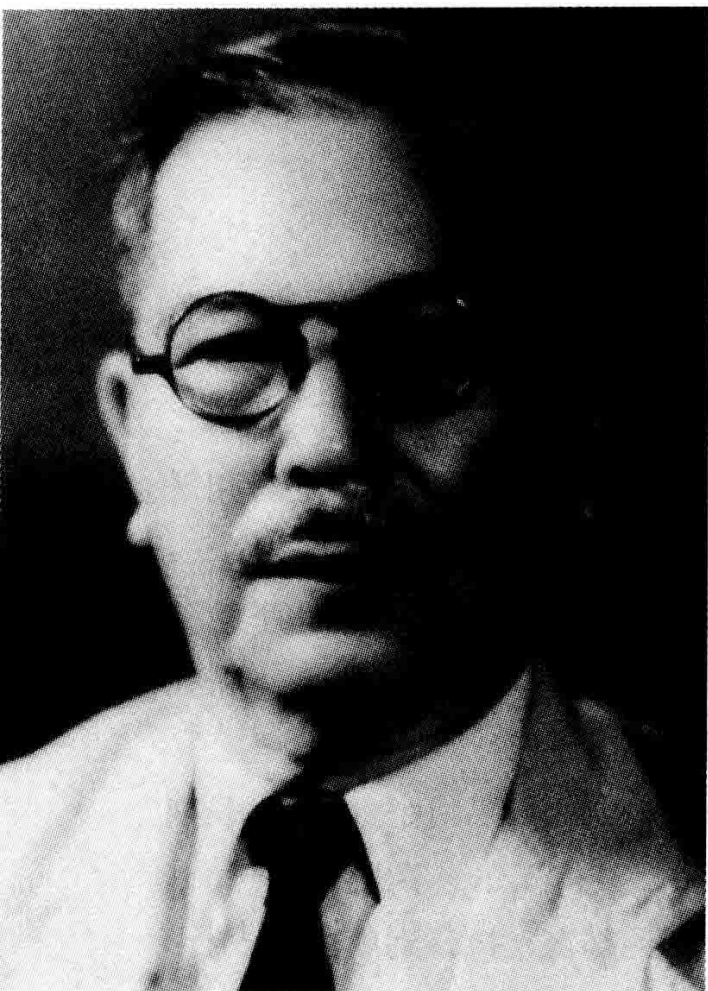
虽然电文提案被五次删改，抹去棱角，然而最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十一字提案”仍以大多数赞同而通过。

著名记者邹韬奋曾评论：“这寥寥的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90年3月31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陈嘉庚星”。它象征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精神将与日月同辉，宇宙同寿。这，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对于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与礼遇。或许永存不灭的人类精神只有寄存于星空才不致堕失。当后人仰望天空时，或可一次次重新领受作为“人”本来的意义。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毛泽东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赞誉其：“为民族解放

【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日受无限艰辛，诤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陈嘉庚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美德。他的人生亦是可歌可泣、不可忘失的一部近现代“南洋华侨史”的缩影。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的一个华侨世家。祖父陈簪聚一生中并未出洋，仅在集美社“俭朴自守，勤谨克家，处于海泻，耕渔自给”。陈簪聚育有三子，长子名纓忠，次子名为纓斟，三子名为杞柏（即陈嘉庚的父亲，字纓如松）。兄弟三人都曾到南洋星洲经商。

陈杞柏幼年来叻（新加坡），在其兄长的米店工作，从勤俭中点滴积累资金，在19世纪70年代创立顺安米店，后兼营地产、黄梨厂。1900年陈杞柏经营的实业达到顶峰，资产达40余万元（叻币）。

陈嘉庚17岁（1891年）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在他父亲的顺安米店服务了13年。陈杞柏晚年实业失败，顺安米店于1904年停业，欠债权人20万元。此时的陈嘉庚已在积累了几代人的商业经验中逐渐成熟，能够独立创业了。他接手衰败的家业后，大胆开拓，先后创办了“新利川黄梨厂”、“日春黄梨厂”、谦益米店等企业。1906年，陈嘉庚入股恒美熟米厂，

并开始种植橡胶。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企业渐有起色。

新加坡当时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但陈嘉庚却坚持“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他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到1907年，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此事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的佳话。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绝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的“一诺万金”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创业10年，陈嘉庚已拥资百万。

橡胶，南洋习称“树胶”，陈嘉庚对此情有独钟。橡胶产业刚刚兴起，他就以敏锐的眼光看到橡胶作为现代工业原料，乃至战略物资的不可替代性，预测到该产业的无量前景。在橡胶最早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时，他即用2000元购买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随后，大幅扩大了种植面积。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他开办的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一百多处。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三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至今，橡胶产业仍然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支柱产业，而华侨是这个巨大产业的最早开拓者。

被称为“橡胶大王”的陈嘉庚，首创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等制成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后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加上日本橡胶制品在东南亚的削价倾销，他的企业开始随着当地民族工业的衰败而走向困境。他此时早已意识到，实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的主权独立。

1906年，是陈嘉庚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此时的南洋，已在清末“维新”“立宪”“革命”的思潮中濡染多年。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统治的封建王朝的根基开始崩坏，这种震动早已传到了南洋。是年6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此时，陈嘉庚经同盟会会员林义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炯炯有神的目光、入情入理的演说深深吸引了他。虽然此时正在艰难创业，但陈嘉庚已立定实业救国、追随革命的志向。他还曾参加新加坡同盟会的秘密会议，与孙中山共商制订了党旗方案。

1910年春，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双双剪掉发辫，同一批有志之士宣布脱离与清廷的关系，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以唤醒、团结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为一生的追求。

“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

以发展实业而全力办教育，救民族于根本，才是陈嘉庚真正“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终其一生的“大业”。

据统计，他一生捐助办学的款项，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几乎是个人资产的全部。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两银圆，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立，陈嘉庚欢欣鼓舞，经营只稍有得利，即立志在家乡兴办集美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及各类专业院校，学校规模之大、师生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昔时荒凉的渔村，竟成为书声琅琅，风气一新的“集美学村”。同时，陈嘉庚在新加坡又先后积极资助与创办六所华侨华文学校，开创了华侨在海外办学新风。

1919年，陈嘉庚实业进一步发展，企业资产总值约达400万元，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家侨办大学——厦门大学。为做表率，他带头认



“国父”孙中山与陈嘉庚（左）

捐 400 万银圆。其认捐数额正好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5 院 17 个系，是当时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于 1921 年 4 月 6 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 16 年。后来企业面临困境，陈嘉庚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之后，他变卖了企业的三座大厦，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他在 1918 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言：“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撓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庠序，懿欤休哉，有厚望焉。”

在陈嘉庚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广厦千万间”，而陈嘉庚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小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他却怡然自得。他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都古老陈旧。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了补丁。他晚年为自己规定的伙食标准只每天五角钱：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和咸鱼。

他在个人自传中写道：“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

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

“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

以发展实业而全力办教育，救民族于根本，才是陈嘉庚真正“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终其一生的“大业”。

据统计，他一生捐助办学的款项，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几乎是个人资产的全部。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5

南洋，似乎永远是晴暖的。

随着战事日紧，南洋分散的爱国力量亟待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进行领导。

1938年，印度尼西亚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合致函陈嘉庚，倡议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并将此设想函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同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电请陈嘉庚负责组织总机关。陈嘉庚即登报邀请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南婆罗洲、西里伯、菲律宾、越南以及泰国等45个商埠的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派出代表到新加坡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

南洋各地纷纷响应，除泰国由于亲日派主政，代表无法选派外，南洋各埠代表于1938年10月齐聚新加坡。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捐资兴建）气氛热烈，164名华侨代表纷至沓来，他们彼此寒暄，虽口音有异，却交流无碍。他们为了共同的使命而来，代表南洋八百万侨胞发出共同的声音，去呼应那祖国四万万民众的呼声，这，在整个南洋华侨史上是第一次！

华侨中学大门上，赫然楷书“报仇雪耻”四个大字，会场经过精心布置，堂皇肃穆。中心是巨幅孙中山像和青天白日旗，上书“天下为公”，左右分别是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主席台上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等主席团成员端然就坐。

会议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各埠会承认常月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

大会所形成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宣言》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是南洋发出的“中国声音”，是中国的“南洋声音”。它将永远真实地再现一段不应忘却的“南侨史”。

陈嘉庚的声音平缓低沉，一字一句，现场静若深海，海与大陆，同此深沉……

中国立国五千年，夙以和平正义昭天下，不幸邻邦日本，军阀专横，妄图吞并中国以为征服世界之准备。……乃侵略者野心未戢，变本加厉，转鹰瞬为虎瞰，舍蚕食而鲸吞。去岁卢沟桥炮声，盖世界和平与国际盟约之丧钟，中华民族与人类公理生死存亡之警号也。……故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

华侨素有“革命之母”之令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南洋方面，占十之八。此在道德的义务上，可谓已尽；而在国民天职上，究有未完。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

【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大会发出的《南侨总会通告第一号》提出要坚持“焦土抗战、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向全体侨胞陈述了三大策略的意义，号召侨胞坚定“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成仁而死，不忍辱而生；宁以焦土葬敌，不以净土资敌”，“精诚团结，举国动员，使处处抗战，人人抗战”，“一时之胜败，一地之得失，岂足转移我同胞之心乎！愿相与共勉淬励，以加速民族解放之日之来临！”

南侨总会迅即在各地建分支机构达85处。此后华侨筹赈工作在全南洋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陈嘉庚带头认常月捐2000元，南洋各地华侨积极响应。据统计，仅1938—1939年南侨总会捐款达1.4亿元。

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东南亚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各界华侨组成“抗敌救国会”，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到处张贴“制裁奸商



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发言

办法”的告示。日本工厂的华工“情愿受失业之苦”，纷纷举行罢工，迫使厂家停业减产。罢工后华工生活困难，统由南侨总会募捐解决。

6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企图“速决”，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即投入 70 万兵力。1938 年在华侵略军已达 23 个师团。处于装备弱势的中国军队虽经“淞沪”（1937 年秋）、“台儿庄”（1938 年 3~4 月）等役，予敌重创，亦代价惨烈。但日军依其向中国腹地推进，打通津浦、京汉内陆补给线的“南进”战略而疯狂推进，国军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败退。

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相继沦陷，中国 95% 的工业、50% 的人口已处在日军控制之下。

1939 年 2~6 月，日军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11 月，日军攻陷南宁。

陪都重庆也陷于危情之中。

此时，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厦门、汕头等中国沿海主要城市全部沦陷，海上交通线完全中断，唯一的国际通道只剩下云南省境内的滇越铁路和 1938 年 12 月正式全线通车的滇缅公路。

由于战争双方从一开始就实力悬殊，中国国力之贫弱，不仅仅是支持战时工业的基础早已沦落敌手，且在敌进我退之情势下，原分布于江汉一带的造枪、船泊、机器制造，乃至造币等工厂仓皇南撤，一时无以复原。仅就弱小的飞机制造而言，中国幼稚的航空业尚处于初诞阶段，在杭州湾第一次中日空战中，当时的敌我战机投入比例为 500 : 2000，中国的 500 架各式战机仅有不到 200 架可以起飞，尽管英勇而年轻的中国空军以零代价击落 5 架日机，但战损无以补充，中国很快彻底失去制空权，偌大神州空域任日机蜂聚、疯狂轰炸，中国不得不将杭州笕桥的唯一飞机制造厂迁往云南省瑞丽县，以避绝灭。因此，抗战初期中国要维持正面抵御，只能高度依赖进口和国际援

华的战略物资。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相持阶段。战争开始变成消耗战。在西方观察者眼中，此时，中日打的是“供给线”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此时，在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原有的广州港口担负80%的军援物资进口，1939年10月，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宣布中国全部海岸线封锁，恰恰在两个月后，滇缅公路开通，成为中国抗战唯一陆上年供给线，即中国浴血于火的唯一动脉！^{【1】}

在滇越铁路被切断后，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战争供给线。作为大后方的云南，此时的战略地位空前重要。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战神降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积聚的巨大能量似乎只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才能倾泻，第一次世界大战余痛未消，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骤然启幕。希腊神话认为战争是人类永恒的命题，但这一命题的最终诠释者却是无以计数的微小的血肉个体。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德军的军队闪击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给予纳粹德国48小时限期撤出波兰领土。德国完全不予理会，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3日向德国宣战，二战宣告爆发。

云南滇越铁路在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德国，日本趁机向法国施压，切断了滇越铁路运输。为阻止日军北犯，我军炸毁河口铁路桥，拆除河口至碧色寨的铁路。当面一线由曾在台儿庄予日军重创的滇军两个军严密防守。9月，日军已进占海防、河内等地，进逼中越边境，与中国军队对峙。同时，日军轻型轰炸机已经得到了离云南——滇缅公路最近的空中距离，改变了原从我国海南岛起飞轰炸的路径，而是在“咫尺”之

【1】[美]约翰·D·普雷廷：《驼峰空运》，张兵一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在切断中国沿海交通线后，日本立即将下一个打击目标锁定为越南海防港。1937年9月，日本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施压未果，即迅速发动对滇越铁路重要中转站南宁的攻占。12月，日军开始实施对滇越铁路的轰炸。6月，巴黎沦陷于德国法西斯。法国遂妥协，允许日军第五师团进占红河越境内地区。滇越铁路由此被截断。

距，对重庆、昆明乃至云南全境实施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企图在精神上压垮中国。然而其重要战略目标仍然是唯一陆上补给线。

自此，滇缅公路（1938年9月—1942年5月）——这条穿越五座大山、六条大江，将整个横断山脉再来一个“横断”的伟大公路，成为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运输通道。

自通车开始，这条“血线”就车轮滚滚，昼夜不息。因为在晴天扬尘万丈，以至日后日机轰炸时“目标明显”。每天，这条路上都抢运着几百万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维持战时经济运转的各类物资、无数内迁到大后方的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总之，当时维持整个抗战所需的、中国不能生产的所有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滇缅公路同时改变着战争的进程。

由于后援持续不断，中国军队得以坚持战斗，甚至军力比战争初期有所增强，迫使日本从正面直接打败中国的战略发生变化，不得不从越南、缅甸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这给整个抗日战争带来了日后的转机。据统计，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止，滇缅公路运输军用物资共计45万多吨。“日本的军事策略认为，打败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所有物资供给线，一旦失去外援，中国政府就会投降。于是，接下来的战争就是一场后勤之战，日本人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切断每一条供给线，而且其速度必须要比中国人开辟新供给线的速度更快。”^{【1】}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紧急召开国防会议，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前往参会，途经西安时，同时受邀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搭乘龙云的专机同往南京。

龙云与朱德是故交，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等问题。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必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国土广大，以日本小国，战力毕竟有限。在未来的战局中，只要日军的战线一拉长，

【1】[美]约翰·D·普雷廷：《驼峰空运》，张兵一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首尾难顾，故日久必败，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于抗战的精辟见解使龙云诚服，且信心大振。此后，龙云还向朱德要了密电码，以便联系延安。^{【1】}

国防会议期间，龙云与蒋介石会谈时提出：国际交通应预做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可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助；铁路由中央负责，地方协助。蒋介石听后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叫他们和你商量，早日着手。”正是这一次谈话，催生了后来对战争起决定意义的大动脉——滇缅公路。

公路的修筑方案，经国民政府交通部与云南省政府会同缅美当局商定，滇缅公路由昆明至大理下关的原滇西公路向西延伸，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芒市至畹町进入缅甸边境小镇帮赛，再至缅北腊戍，与曼德勒—仰光铁路衔接，即可利用仰光港接驳印度洋舶来物资。滇缅公路全长 959.4 千米，其中昆明至下关 411.6 千米，已于 1935 年开通，由下关至畹町段 547.8 千米，全部新建，要越过滇西横断山脉之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要跨越漾濞江、胜备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等湍流急水、绝渊深谷，工程之艰巨、险难，世无所匹，被当时西方记者叹为“东方直布罗陀”！

自 1937 年 12 月，云南省政府进行了全民动员，滇缅公路沿线近 30 个县的不少于 100 万民工组成了劳动大军。云南省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行政命令方式极为特别。“特难”路段龙陵县的县长王锡光就收到了省政府的鸡毛信和装有手铐的木匣子，意思等同于“不能完工，提头来见”！王锡光为此急瞎了左眼。

龙陵县段公路所以如悬剑于颅顶，是因为滇缅公路在此要翻越海拔 2100 米的怒江以东大山后迅速沉降至怒江谷底，过惠通桥，复又盘转迂回，迅速抬升至海拔 800~1200 米的松山（腊勐）垭口，其战略位置：一桥扼怒江东西，一线屏滇地南北，果如“直布罗陀”！

这也为日后战争所证明。

谷地有千余户村民，多赖西岸松山下丘陵缓坡耕耘为生。瓦舍毗连，炊

【1】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滇西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烟接云，然公路要“村舍”让道。

听说修公路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村民自动拆毁橡梁，掘起祖坟上的墓碑，默默向山外流徙而去。王锡光呼号不及，唯有蹴地垂泪。

每天，同时有二十多万民工日夜不停地在滇缅公路沿线开挖公路，他们包括汉、彝、白、傣、苗、傈僳、景颇、阿昌、德昂、回等十一个民族，组成了世界上最奇特的劳动大军。由于壮年男子多征兵入伍，劳动队伍里女人、老人和孩子占多数。没有大型机械，这条路几乎全凭手工挖掘。路，伴随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史。现在，他们要用双手和血肉在大山的肌理中刻画不可磨灭的人类印记，他们要将一条“生路”奉献给未来。

那些古老驿道和平时隐匿不现的山道上，走来了身着不同色彩民族服装的人们，沉默的滇马驮来他们自备的简单工具和以公路为家必需的“家当”：毛毡、蓑衣、被盖、土锅、陶碗、粮食、干菜等，孩子们甚至带来他们的伙伴：小狗、猴子、鹦鹉。各种色彩、语言、歌声，汇成了滇缅公路的彩流。

滇缅公路施工沿线本来已极尽自然之鬼斧神工，此时人类还要刻画属于自己的一笔。这，必然意味着巨大的代价。山顶，极寒难耐；河谷，酷热煎熬。多少悬崖绝壁，急弯陡坡，全无立足之处，稍有不慎，就可能葬身河谷，无处寻尸。资料记载，沿路民工死于“极疲、事故、爆破、塌方、工伤、坠崖、疾病”的难以计数。还有，多数民工都在半饥饿中坚持强力劳动，劳动中因体力透支而晕厥是经常之事，醒来了，又接着干，醒不来，则沿路就地埋葬。山为坟，路为标。

日军不间断的袭扰轰炸，造成筑路人员大量死伤。由于征召的民夫并没有躲避轰炸的训练，许多民工在飞机呼啸而来时，避往江边石罅或稍微能藏身的石头下，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遂连人带石推往江底，因此死亡者，尸骨无存。

据当年的民工回忆，死人的事太多，尸首与土石血泥相混，往往多至“浑不见红黑”，“是个人形的，喊喊不醒，翻开眼皮看看，就找顺坡处将就刮路沙石埋了。有人家的，拿三块石头搭一个‘庙’，里面再竖块石头当菩萨帮念着；没人家没名姓的……莫法了。”

在龙陵县怒江西岸腊勐乡（松山）路段，曾有一块为修路“死亡民夫”所立的纪念碑：“我县奉命在此抢筑公路。参加人员五万余，死者两千余……”这在959.4千米的滇缅公路中国境内路段上是唯一一块“死亡民夫”纪念碑。而此碑唯一的存照发现于收复松山时缴获的日军资料中。松山战役后，此碑随日本阵地一同永远消失。

至今，没有十分确切的数据记录死于修筑滇缅公路的民工数量。或许，我们所惯常的历史叙事中，“民夫”的生与死，都是“集体事件”，“个体”并无凸显的必要，甚至群体也必消亡于历史的烟尘。然而，公路却是由一双又一双具体的“手”直接“刨”出来的。每一块无情、有情的石头都是由一双血肉的手搬动的。最终，这些手一掌劈断了大自然所塑造的地质奇迹——横断山，人类文明的奇迹——滇缅公路，9个月就脱胎出世！

没有纪念碑，但大山记得9个月不绝的劳动号子！记得延绵一千千米同时唱响的大歌。



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

一千千米的对阵，人，开始了与大山、与江河的对唱……

今天的人们，恐怕早已忘记劳动——集体劳动——人作为共体与天地、自然，相搏又相融的“史前时代”了。

听！嘿——哈！嘿——哈！……

大山欢腾，激流回旋！

洪荒记忆，人类史诗复活了！

每一个“个体”都消失在“共体”的巨流中，欢畅无比，回归生命的源头……

这，史诗！并不需要“文字史”“正史”的记录。

1938年9月2日，《云南日报》发表报道和社论，题目是《滇缅公路修完了》《伟大的滇缅公路》。当时，国统区几乎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它也震惊了全世界。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奉罗斯福之命考察滇缅公路，回国后发表谈话：“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是陆地上的巴拿马运河！”“全靠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泰晤士报》称：“只有中国才能在这样的时间内做到。”

然而，这条公路所要承载的远非当时的人们所能料到。

7

谁又能想到，这条血色高原上的血路竟会与万里海波外的南洋相连，同样的骨肉与血将抛洒在这里。

路，还需多少钢铁的骨骼来支撑？

路，还需多少新鲜的血液来交织？

然而，这却是承载中华民族命运的路啊！

1939年初，香港沦陷之前，囤积于香港的大批进口和援华物资已转移到

缅甸和越南等待运输，缅甸仰光、腊戍有几千辆待抢运的各式车辆。国民政府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汽车，在当时的中国极其罕有，熟练的司机和汽修工更难寻觅。滇缅公路虽抢修通了，但没有一支“机工”大军，路，将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情急之下，国民政府想到了南洋。南洋，“机工”的从业队伍广大，比起临时在国内培训机工，向南洋直接招募恐怕更能解燃眉之急。此时，负责战时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在新加坡已设立分处，总机关设在昆明，宋子良任西南运输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致电陈嘉庚，商请陈嘉庚在南洋代为招募华侨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宋子良携函谒见了陈嘉庚。

西南运输处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此时的广州港和香港是重要的供给线，80%的军援从这里运进。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广州港失去战略意义。西南运输处遂迁往昆明，以昆明为中心全盘运筹战争运输供给。此时，西南运输处已在缅甸仰光、新加坡、中缅边境畹町等设立分处，缅甸腊戍、八莫建立支处，并成立了一系列附属机构：运输人员训练所、运输事



↑修筑滇缅公路全凭民工“手工”开挖，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机械



务所、滇缅路医院、遮放诊疗所、汽车修造总厂、各汽车大队、电台、仓库等。^{【1】}

围绕滇缅公路，保障战争供给的机构、设施已基本就绪。但奇缺“机工”，只欠“南风”。

陈嘉庚认为此事重大，义不容辞，即于1939年2月7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汽修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当日的南洋

【1】《战时西南运输处档案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5期，第17页。

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修路大军

各大报纸刊载了这个通告：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第六号通告
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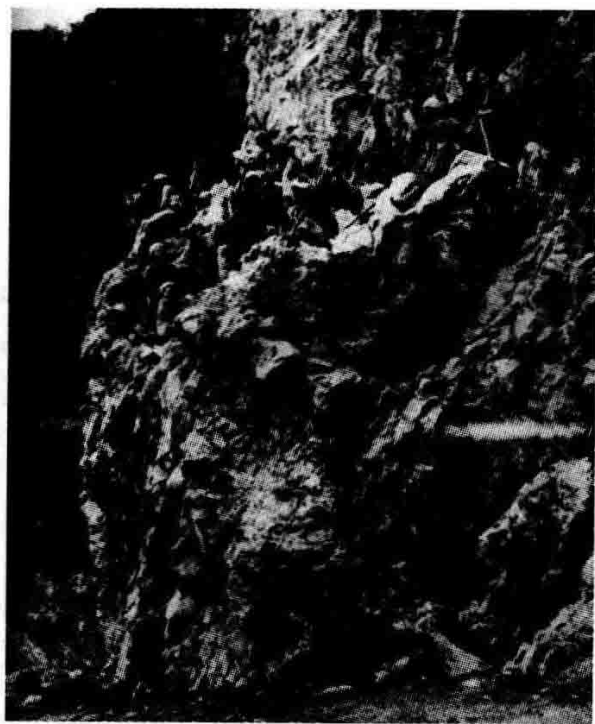
为通告事，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修机人员和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会或分支各会接洽，并注意下列各条方可。

一、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粗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年龄在四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者。

二、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驶机及修机兼长者，可以酌加，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三、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处，概由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四、凡应征者，须有该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者方合。



↑滇缅公路许多路段都是在陡峭的山壁上开凿出来的

➡滇缅公路贵州段的晴隆“24拐”





滇西各民族民众赶修滇缅公路

.....

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是要，此布。

中国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

一石投入，浪起千层。

南洋各大报纸即刻刊发了这个通告，消息很快传遍南洋。在南洋，机修工和司机的从业队伍广大，可以想见，这则通告在华侨中掀起了波澜。国币30元的薪金，低于南洋机工的普遍收入很多。大陆，对于很多生于南洋的“侨生”遥远陌生。回国服务，实际上等于投身战争，伤与亡在所难免。

祖国，一个诱人而光明的指向。“没有国何有家？”简单昭然的“公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每一个热血男儿都会直面的召唤……

面对报纸，面对几行简约的铅字，无数人开始了内心的拷问，开始了艰难的抉择。没有见证者，只有天涯共此一轮的明月，照见这个不眠之夜。多少人辗转反侧，多少人踌躇难断，多少人决又未决……

结果，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报名者五六千人，南洋各埠筹赈会和报名点竟排起长龙，人们争先恐后，生怕“有所差池”，就“报国无门”。南洋社会，亲族关系根深蒂固，一人报名，往往一起长大、同甘共苦的“兄弟”“伙伴”“乡亲”就“坐不住”而势必同往，“相约报名”“一呼众应”者甚多。忍别双亲、抛妻弃子，毁家纾难不只小家之痛，血脉牵连，守望相助中，“痛”既深且长，深埋于整个亲族的血乳中了。

“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三千二百余人”，3200人，深深牵动整个南侨社会。据史料记载，经过筛选，最终，3192名机工总共分15批在1939上半年回国服务。其中，9批2654人经由越南回国，6批538人经由缅甸回国。如果加上前往国内各地的服务人数，总共是3913人。^{【1】}

“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中关于机工回国服务部分首篇就特别提到一位名为王文松的机工。

《南侨回忆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1941年，南洋沦陷后，日本军队悬赏通缉陈嘉庚。陈嘉庚避难爪哇玛郎。每日怀揣砒霜，以备被抓时自绝，全凭记忆写出《南侨回忆录》。他在弁言中写道：“此回忆录盖原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战而作。我国此次国难，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如何，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而此后必更消声匿迹矣。”

王文松不应当被忘记，可什么是历史的记忆呢？

在本书成书之时，在世的机工已不足14名，年龄平均95岁，意识清晰，能自如表达者寥寥数人。对于过去，他们平淡或抿嘴一笑。“历史”在这些老人童贞的“一笑”中，顿时苍白！顿时“失语”！或许，这，就是一个必

【1】秦钦峙、汤家麟著：《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然“消声匿迹”的普通人回归的“历史”，与滚滚向前的“大历史”的无语“对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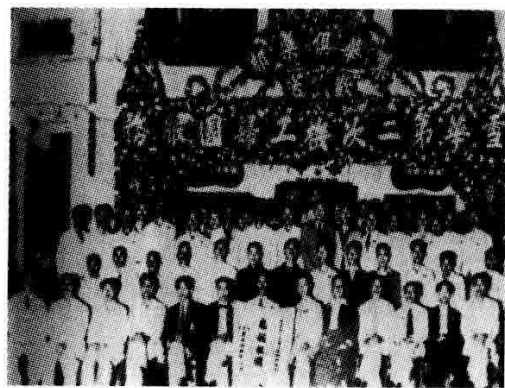
机工的历史往往是由他们自己“互证”的，他们将死难的战友牢牢记住，不敢相忘，让他们在自己有生的记忆中存在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在过去十分有限的对存世机工的采访中，依稀得到一些“不该忘记”的王文松的线索。

王文松，原籍海南万宁县（现为万宁市），早年在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任工程师，英文极好，技术精湛，是公司十分器重的高级技术人员，待遇优厚，月薪二百坡币（折合国币七百多元）。他“家庭美满”，有一妻三子，和老母亲相伴生活。【1】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最终抉择的，他选择告别他所有的一切！去“奔赴一线的光明”。

他带走的只有他的全副工具，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讲，应手的工具与他磨合多年，是他终身相随的“伙伴”，此时，则是他矢志报国的全副家当。许多位工友、徒弟要与他同去报名，他或许劝阻了一番，但最终，随他同去的仍有十余位。

据后来对当年和他同行的工友韩利丰的采访，1939年3月，王文松参加第二批机工团回国，全队207人，他任副总务。当



↑应征回国的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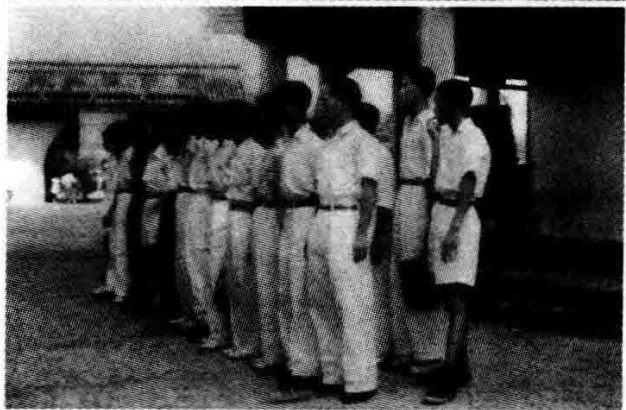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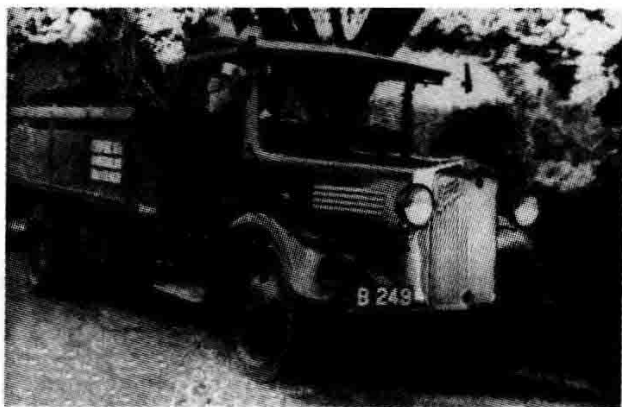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给回国服务机工的护照

↓马来亚雪兰莪集华俱乐部欢送机工回国服务

【1】林少川著：《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他们搭乘丰祥轮由新加坡启程时，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来送行，那必是一位温婉而晓大义的女子，她支持丈夫的选择，那同时也是她的选择，她选择默默承担起历史沉重的另一半，她选择在离乱中独立支撑一个如危卵的家，用女性全部的温暖去孵化未来。

当轮船驶离码头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文松异常沉静，注视着越来越远的妻儿的身影，直至最后消失。不论生死，他都要将他们永远牵在



↑志愿回国抗日的南洋青年正在加紧训练卡
车驾驶

→报名回国机工正在进行集训

↓准备应征回国的南洋青年

自己的视线中，须臾不离。

王文松的故事很短，短得让人不忍卒读。

王文松一行抵达昆明不久，便奉西南运输处之命，率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主要为海南籍南侨机工），前往西南运输处设在缅甸仰光修理厂担任厂长。那时，仰光积压了大量的进口和援华的卡车等待装配（中国那时并无批量生产卡车的生产能力，用于运输的卡车基本依赖进口和援华物资），而已经建成通车的滇缅公路正急迫等待着仰光口岸的卡车能投入使用。

王文松开始了极度紧张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汽车。因英国当局迫于日本外交压力，关闭滇缅公路的“限时令”已经下达。现场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原计划以每组五天装配好一辆为顶限，此时已经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严重后果，装配不及的车辆将搁置在仰光，王文松带领他的团队昼夜相继，每组一天就可以装配一辆，全队每天可以装配十辆以上，装配好一辆就即刻上路。只听王文松急迫的喊声：“快！快！快！”——这种惊人的速度折服了美国工程师，他们连声赞叹“OK!OK!”他们绝没有想到，中国工程师对机械的把握居然如此出神入化，中国人的技术



↑ 1939年5月，马来亚柔佛自由车商会欢送两名机工回国

↓ 1939年6月，马来亚彭亨劳勿欢送机工回国服务，所赠锦旗上题写着：“献身救国”

团队协作能力如此之强。当然他没有领会的还有，中国机工为救国于水火，是舍命而来的。为此，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曾特地前往仰光，表彰了这个英雄的团队。

在仰光的工作任务完成之后，王文松被调往下关第八修理厂任厂长。

“1943年的一天，王文松因车祸殉职。”

.....

再无一字一句的记录！

他还曾如何于运输战场辗转？他死于怎样的情境？葬于何处？他远在南洋的家如何，孩子们长大了吗？那个因“毁家纾难”而飘零无依的小家是否支撑到了光明到来……

历史的空白，如云散烟消，再无一缕可追！对于一个普通人何其残忍！

这段多由存世机工“互证”的历史经常是点滴的、片言的、碎断的、模糊的，难以在文字史中查证。在经历了战后、国内战争、“文革”的大浪淘沙之后，当我们能够去回望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存世的机工已经不多了，且年逾古稀，垂垂老矣。在采访时，这些老人往往从不提及自己，而是拼命地在记忆中搜索着战友们的的事迹，嘴角颤动，十分急迫！他们年轻时抢救物资、抢救中国，现在，他们用最后的可能性去抢救死难战友们的历史：他们存在过！我证明！

这恐怕就是这段历史的美丽之处，她是普通人的历史，是普通人彼此“互证”的历史，是生命记忆的历史，是微茫的个体生命创造的历史，立于天地之间，却无须“被证明”的历史。

机工韩利丰当年随王文松回国，他是王文松事迹的“孤证”，这位老人后在昆明安度晚年。他也同王文松一样，告别妻女，出发时他不能回首，生怕自己动摇，只能一路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他同样带了全套机修工具。这套工具在半个多世纪中陆续散失，唯剩一把螺丝刀，“钢水极好”，泛着一种时光所赐予的青灰色……是唯一的“物证”。当厦门华侨博物馆举办“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专题展览”时，向老人征集此文物。老人摩挲再三，最终捐出了这把无言地记录了他和他们，力与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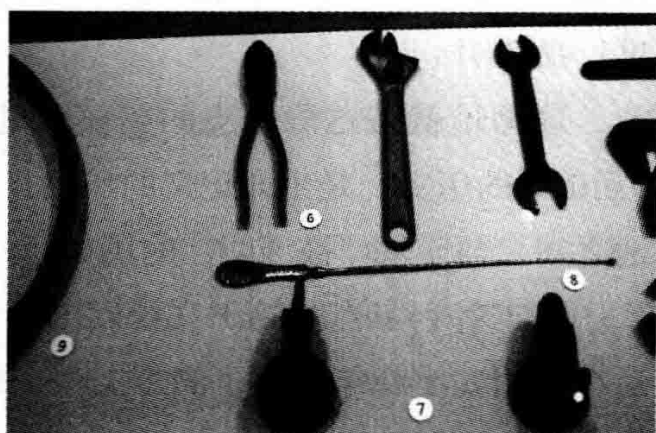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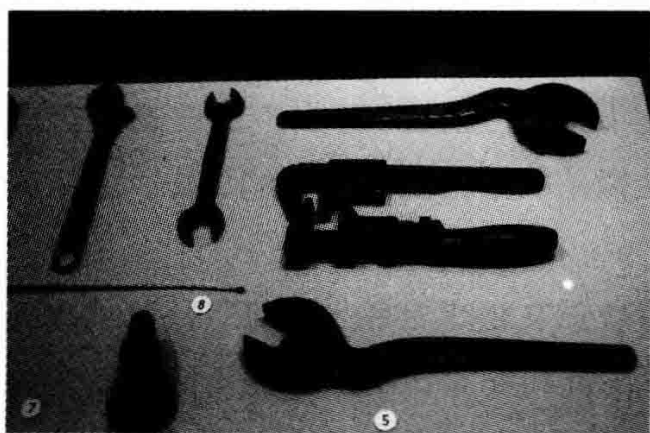
与血与生死的，全部历史的螺丝刀。

当时报名回国的机工中很多人并未得到家人的同意，他们瞒着家人，改名换姓，星夜离家。有的年龄不足或超出，则瞒报年龄；有的并非“机工”，而临时学习以满足条件。开始几批的报名管理甚严，需家属和介绍人签字，然而在“救国”的强大氛围下，报名者的热诚感染着整个社会，报名审核在中后期更侧重于对个人资质的判别。因此，档案中的某某可能有两个甚至多个名字，年龄、家庭关系也非完全属实。很多机工回国殉难之后，抚恤金在南洋常常找不到人领取，而又复捐献于赈济战争难民，而南洋的亲属很多自机工“弃家”之后，便永绝联系，同一世界，两地飘零，望洋寄思，哀情潮起。

此种情况，也给后来的档案研究带来重重困难。

刘瑞齐，福建永春留安村人。1914年生。留安村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五代清源节度使、晋江王留从效，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留正，都出自“留”姓大族。后为避政治迫害，而改“留”为“刘”。村民出洋“过番”的历史悠久，族谱所载，明永乐年间，该村族人刘孟福即随郑和下西洋，后卒于印尼苏门答腊。刘瑞齐3岁丧母，12岁丧父，堂兄遂将他带往马来西亚谋生。

刘瑞齐先在胶园割胶，后在一位永春籍颜姓华侨商店做学徒，因为敦厚耐劳，深得老板信任。老板便让他学习开车，为店里运橡胶和其他货物。有



珍藏于博物馆的南侨机工全套机修工具

一次，街邻失火，殃及商店。刘瑞齐闯入火海，冒死抢出一箱箱账簿和货物，自己却被烧得遍体鳞伤。店主颜先生深感这位来自著名侨乡的年轻人根正德厚，便将次女许配于他，并赠予商店一间、卡车一辆、胶树千棵，由他独立经营。

然而战争势必打破千万人并无奢望的宁静生活。刘瑞齐此时正值新婚，他少年伶仃来到南洋，此时，竟已有家有业，妻子贤惠可人，他正在体会着“幸福”和“拥有”。但是，他看到了报上刊载的“通告”。

他默默地把报纸折起来，方方正正，放进胸口的衣兜。然后开车漫无目的地走了很远……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一程……他，曾一无所有，他，已有家有爱，他，或将，再次抛舍吗？再次，只衣襟带风，一无所有，唯有一颗赤裸裸的心！捧给谁呢？或许，曾一无所有的人才能舍，再舍，再再舍而成仁！

最终，他托人告知家人有事无法回家，悄悄开车到离家很远的另一埠头——芙蓉镇报了名，办理好一切手续，并和其他机工一起剃了光头。据说，那时机工们不知道该以怎样的“造型”回国，只是看到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是光头，便以为这是大陆时尚，剃头也有明志之意，于是，很多都剃了光头。只要是回国机工剃头，理发店分文不收。

刘瑞齐“志在必走”，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他直到启程前夜才回家。因为“光头”是回国志士的标志，不能暴露，他进家前临时买了顶毡帽带上。新婚妻子哪里见得在屋里戴帽，一手掀了去，露出刘瑞齐发亮的光头，岳父母和小姨子们哄堂大笑。刘瑞齐忙敷衍解释，说是头痛生病，让番仔医生敷药时剃掉的。但，妻子已有所察觉。临睡前，妻子悄声问道：“莫非你想回国？”刘瑞琪只矢口否认。妻子摩挲了一下他的光头，入睡了。

他，回味着妻子的指尖在头顶留下的温暖，又静静地倾听她平缓的呼吸，借着月色，他凝视着她脸颊的轮廓……这些，是他能带走的……

半夜，他起身将结婚金戒指、给妻子的告别信放进衣柜，只带走一身衣服，便出发了。他在门槛处低头顿了顿，然后，一步踏进满天星光……

与刘瑞齐同行的还有侨乡永春的林广怀（第八批机工领队）、颜世国等

人。他们在新加坡被编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由芙蓉埠启程。

在昆明接受完集训之后，刘瑞齐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44中队，开赴广西前线。队部驻扎镇南关，负责到越南抢运汽油等军用物资到南宁。1939年11月底，南宁失陷，一片混乱，刘瑞齐随车队退至安南高平。虽则已在“敌后”，但抢运物资一刻未中断，他辗转于海防至广西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直至越南海防失陷。刘瑞齐再次被编入“华侨先锋大队”，投入滇缅公路的运输。

在一刻不暇的运输中，他曾收到岳父的一封信，这封信漂洋过海，穿越重重烽火来到他的面前时，已破损不堪……

他，回到了他的卡车里，司机，以车为家。关上车门，才将信封慢慢拆开。信中，岳父对他的不辞而别并无指责，只说其妻“日夜思念，积郁成疾，已卧病不起”，只望他能“回南洋相聚，以尽夫妻之情”，信中，虽未明言，但已预示妻子的不祥。

泪水，直流而下，无声的。

此时，他，已接受了战争最残酷的炼铸，他亲眼所见，深重苦难中的万万千大众，在尸海血浪沉浮中，却都向着“生”而苦搏，伸着手！救谁呢？

“抗战未胜，使命未完，恕不能回……”他写了回信，信中劝慰妻子宽心保重，抗战必胜，胜必归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刘瑞齐受命运送远征军入缅，复又转战南北，戎马劳顿，暇不及思……

我们只知道，后来，刘瑞齐才得知，妻子病危，爱女心切的老丈人遂关掉商店，只身回国寻找他，无果。此时，南洋沦陷，天海阻隔，回不了南洋，亦无家中消息，老人几经颠沛，回到老家永春栖身，战后才得重返马来西亚，此时，女儿早已去世。只有坟冢上的萋萋青草、碑上苔花……

而刘瑞齐的故事也再无续篇，后来的后来呢？

只有，那一夜的，满天星光……

在机工的报名队伍中还有四位女性尤让人瞩目：陈娇珍、白雪娇、朱雪

珍、李月美。

李月美，祖籍广东台山，191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李荣基，是一位华侨商人，正直豪爽。母亲梁凤蝉，温柔贤良。兄妹九人，李月美排行第四。这是一个在当地有名的和谐之家。

李月美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中文成绩“特优”。虽生在海边，从小就向往“关山万里，大漠孤烟”的祖国。待到“出落”之时，竟一“拔”而为一米七十多的高个子，眉宇间透着英武之气，像个帅气小伙。她能歌善舞，骑马、打球、游泳、自行车无所不能。汽车，居然也是上手就会，操控自如。

“七七”事变，让那时的女孩子有着不同的青春梦。她们走上大街，宣讲义演，抵制日货，卖花义捐。可是，“卖花”对于假小子的李月美实在不“够劲”，她，在暗自筹谋一个“壮举”。

她跟在了机工报名队伍的后面。虽然小伙子们讥诮不止，她还是神情自若地来到了报名点登记处。工作人员抬抬眼镜，大惑不解：“不招女机工，知道吗？”

“我会开车，身体好，国语好！”

“那也不行！规定！”

工作人员并无太多耐性：“下一位！”

……

这逼急了李月美，她非成功不可。她想起了幼年即能背诵的《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她，年轻的她，真要扮一次“花木兰”！去实践一个民族最美的远古之梦！去做一个民族所“塑造”的典范，完美的“女性”？

饱受世苦的年长者或会拉住她：“且住，慢行，三思……保重，保重，保重！去吧，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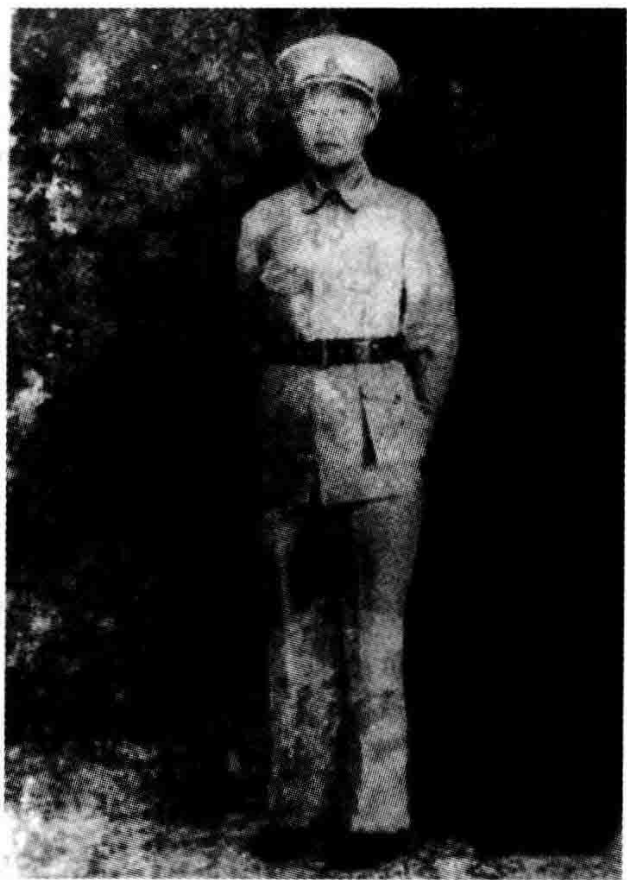
她剃了光头，借来弟弟李锦容的衣服，一番“打扮”之后，出现在离家很远的一个报名点，化名“李月眉”，这一次，她，顺利过关。

李月美，终以“男儿”之身，奔赴祖国。同行的，还有弟弟李锦容，“一门两英杰”。直到1940年在滇缅公路翻车，身负重伤，她竟从未暴露性别秘密。她真的将一曲几千年养育中国心灵的《木兰辞》演成现实，古风乐府，千年同和。

但，故事，还有未尽……

白雪娇，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白家是当地望族，父亲是陈嘉庚在槟城产业的首席代理人，叔叔白仰峰亦是当地侨领。“七七”事变前，白雪娇正在国内厦门大学读中文系。回到槟城后，成为南洋筹赈抗日的骨干。当时厦门有位叫蒲风的诗友，常与她书信往来。蒲风的信总让她无法平静，她下定决心：与其隔岸观火，不如直接上战场。

她化名施夏圭报名参加了机工回国服务团。出发前，她写了一封家书，嘱咐同事在她出发后寄给父母。但还没等家书到达父母手中，就在当地华文报纸《光华日报》上全文登载，南洋，满城雨泪。这封信，是3200名机工共同的临别家书，共同的“别南洋父老书”，它永远成为这段历史的“铁证”。



↑李月美（1940年）

↓男扮女装、身着戎装的李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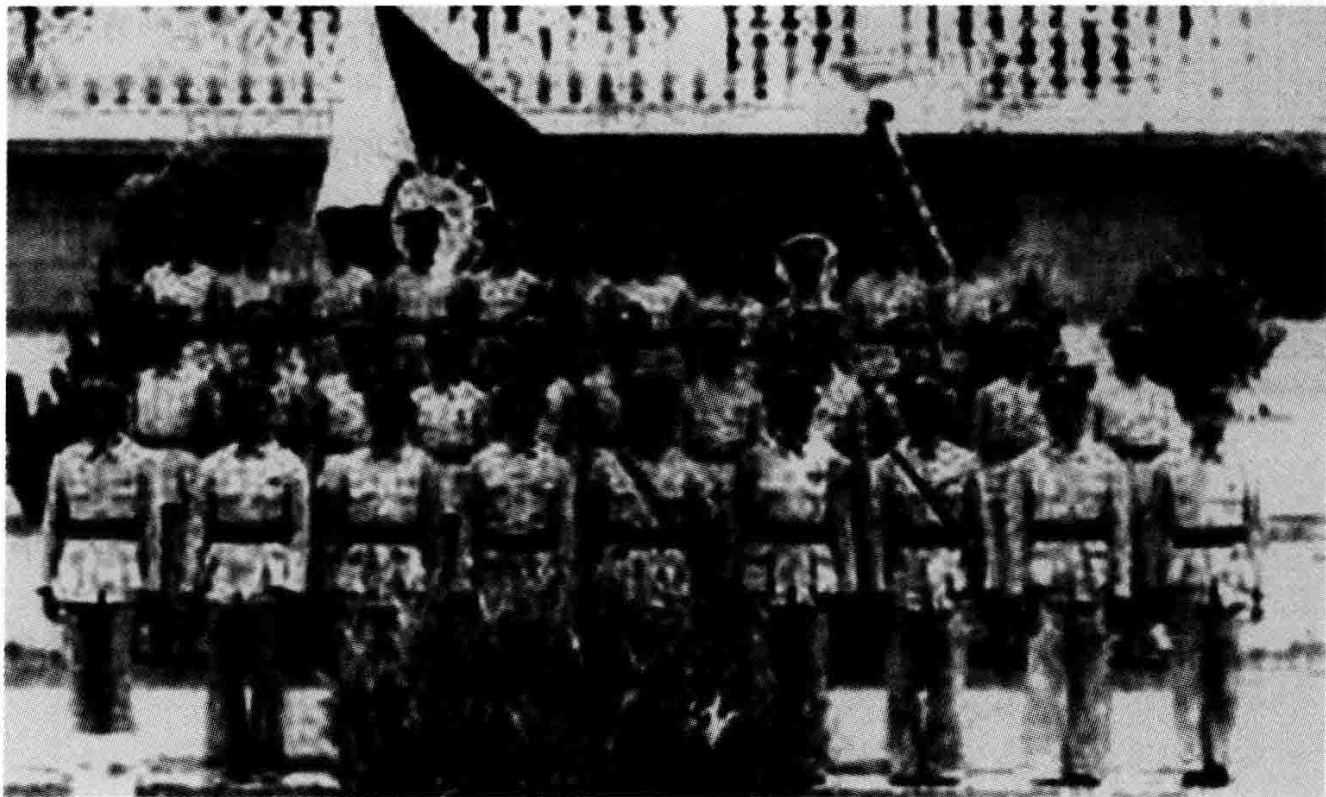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里起着数次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不值得注意的虫，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但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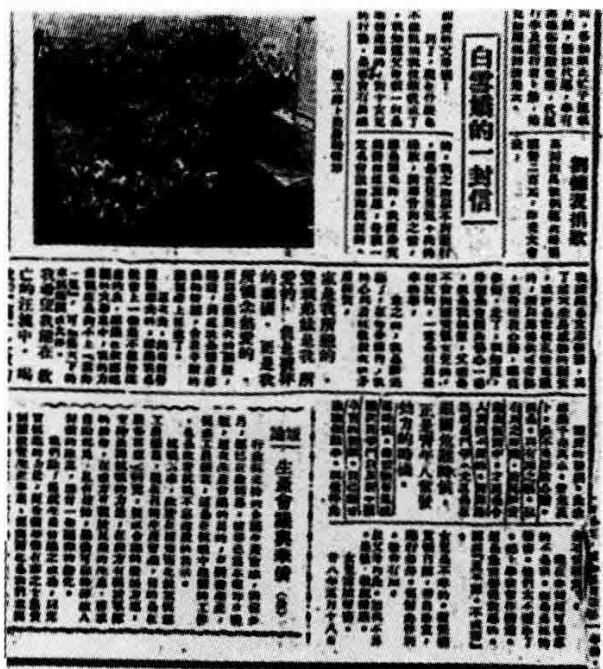
8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

新加坡，快乐世界游艺场。



李月美（第二排左6）男扮女装报名参加槟城机器行回国服务机工队回国参战（1939年2月）



↑白雪娇
 ↓当年南洋报纸上刊载的白雪娇临别前留给家人的一封信

“热烈欢送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大会”在这里召开。

为什么选择这一天，除夕！

离合，离，而后合。

第一批 80 名机工将启程回国，他们被称为“八十先锋”。领队白清泉率领机工整齐地步入会场，他们身着“中山装”，头戴军帽，胸前佩戴着“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英姿勃发。

台下掌声雷动，女学生们一边摇着鲜花欢呼，一边流泪，他们，是南洋最英俊的子弟，是南洋的英雄。

陈嘉庚致辞，他低沉的声音微有波澜：“国难当头，华侨机工放弃海外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更辛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西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而无愧……”【1】

授旗完毕，机工队伍举着“华

【1】陈共存、何良泽编：《南侨魂》，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旗帜向码头进发。全城的人都出动了，人们簇拥在道路两侧，为英雄送别。人群中，不断有人呼喊着重工们的乳名，再侧耳听一听吧！然后，就可以一直向前，不回头！领队白清泉——一个清秀耿直的年轻人，他走在最前面，他的眼泪硬硬地滴落在马路上——这条留下他从小到大脚印的路，现在，他要经由它一直走进大海……

多少泪抛洒在这一天？眼泪，是否也能汇入海洋，回归它的咸、它的涩，它的滚烫、透明与蔚蓝……

码头上，人山人海，当“八十先锋”踏上法国邮轮“安达拉文号”的甲板，岸，已成彼岸……

海岸上，人群中忽而响起潮水般的呼喊，无数人同时高声诵背《临别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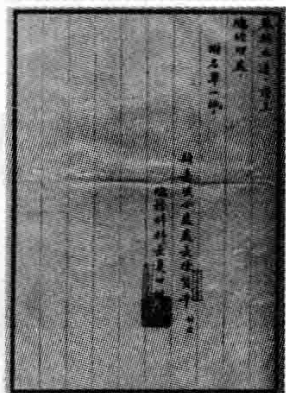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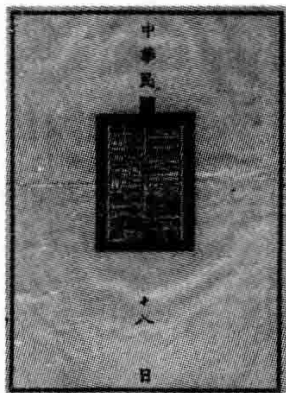
1939年2月18日，南侨机工第一批回国“八十先锋”领队白清泉（前中）离别前与友人合影

诗》，声浪相覆，只听到天宇间回环着：司机！司机！

司机！司机！
你们有勇气，
炎黄子孙的后裔。
司机！司机！
你们是华侨的好子弟，
为了振兴中华，
辞父兄离子别妻。
回国去杀敌，
真是了不起。
司机！司机！
我们翘首等待你们的胜利消息！

一声鸣笛之后，船启动了。“八十先锋”向着海岸，齐唱《告别南洋》，这首国歌“搭档”——聂耳谱曲，田汉作词——创作的歌曲，是南洋的《义勇军进行曲》。它被一次次抄写在后来发现的，机工们的日记、书信、照片、赠言、藏书扉页中，回荡在海与岸，永无止息的“吻”与“别”中……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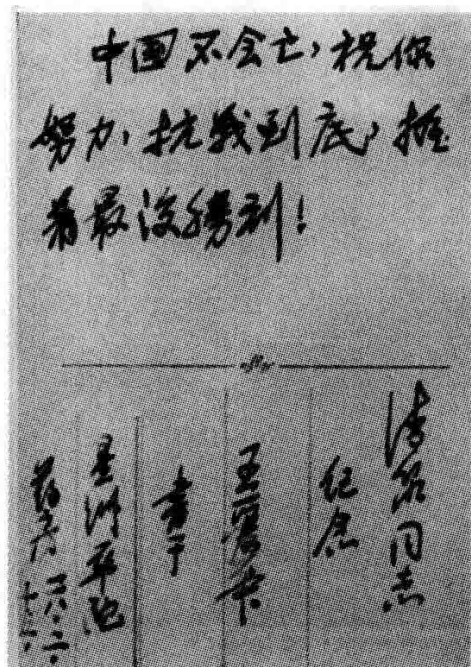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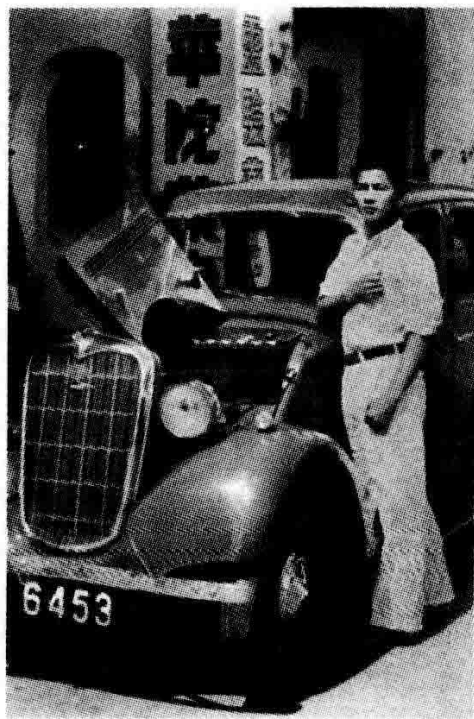
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处长陈质平为第一批八十名机工回国报到事至西南运输处主任的电函（1934年2月18日）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松花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的希望！

至今，为国殉难机工的数字仍不确切。在以往相关著述中，多从一个模糊的“三分之一说”：3200人中，三分之一殉难，三分之一战后返回南洋，三分之一留在大陆。实际上，战后回南洋的一千多人是包含家眷的。据新的研究，为国殉难机工人数当在1800人以上。

南洋，一去而成永诀。



↑ 1939年2月15日，白清泉在即将离职的星洲华佗药房前留影

↓ 白清泉的友人在赠予他的照片后题字：“中国不会亡，祝你努力，抗战到底，握着最后的胜利！”

第二章 “华侨是革命之母”

1

历史，只需回眸 28 年。

28 年前，南洋华侨机工的父辈们，同样告别南洋，抱定“必死”之决心，走上不归路。

1911 年 4 月 27 日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有 29 人是南洋华侨。

陈文褒，广东大埔人，南洋商人。

罗仲霍，广东惠阳人，南洋教员。

李雁南，广东开平人，南洋华侨。

李炳辉，广东封川人，南洋教士。

李文楷，广东清远人，星洲《晨报》印刷工人。

李 晚，广东云浮人，南洋华侨。

郭继枚，广东增城人，南洋华侨。

黄鹤鸣，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杜凤书，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徐培添，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

这些烈士中有商人、教士、教员、职员、工人（10 余名），甚至有多位“机工”！据统计，当时离开南洋，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死士”不少于 500 人（整个黄花岗起义共征募 800 “先锋”），他们来自南洋华侨社会各个阶层。

黄花岗起义因其“甚为”惨烈，孙中山毕生都耿耿于怀。他亲为七十二烈士撰写祭文：“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他在很多重要文献中对黄花岗起义的重大意义给予历史定位。《〈黄花岗烈士事

〔1〕引自 1912 年 5 月 15 日孙中山发表的《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

略》序》中言：“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黄花岗起义虽告失败，然而，不到半年，武昌起义成功，风卷残云，势如雷霆，中国历史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共和肇造”“民国初诞”！“黄花岗”实为大革命到来起“催生化育”之作用。正如《与妻书》作者林觉民烈士所言：“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

当五百“死士”踏着南洋的海波而去的时候，只想用一腔热血去换一线的微光，以“死”，生命所能发出的最强音，唤醒昏睡中的人们。“先觉者”除了“觉”还有什么呢？一个愚弱蒙昧的民族将永堕黑暗。醒来！醒来！不醒则亡！醒而死，幸哉！不醒而死，哀哉！

东方，太阳期许从海上升起！

没有多少人知道，黄花岗起义亦是在南洋“孵化孕育”的。1910年，第九次武装起义即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疲惫沉重地来到南洋。同盟会所发起的九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他虽永不言弃，但此时他需要重新振作的一点点时间。南洋的暖风吹透他的心脾，海，是他熟悉的，他是海的儿子，他无数次地向着坚硬的大陆进发，又无数次回归海的拥抱。檀香山，是太平洋中一座孤独美丽的小岛，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天与海是他世界的分野，他要以海天的名义去重塑“铁”的大陆。

11月14日，孙中山召集同志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秘密会议，决策新的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这个会议历史称为“庇能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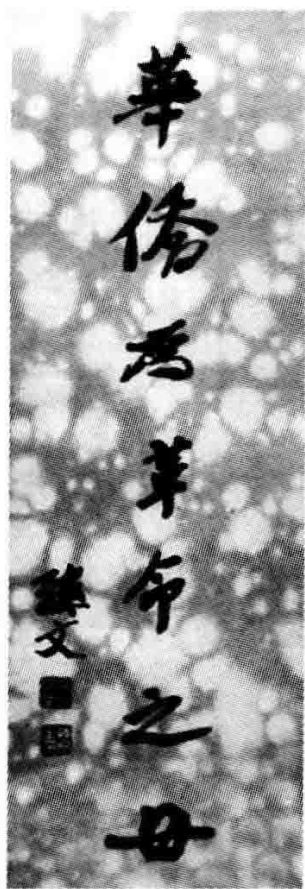
.....

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

【1】引自1921年12月孙中山发表的《〈黄花岗烈士事略〉序》。



1910年11月14日，孙中山在南洋同盟会总机关打铜仔街120号召开了“庇能会议”，决策发动黄花岗起义。此历史遗址现为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华侨为革命之母

孙中山本人即是檀香山华侨，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而言是外部力量，反复催动内生变化而最终造成“结果”的革命。“母”与“子”的譬喻对于辛亥革命中海外力量和内生力量的关系十分贴切。只是当历史远去，本来清晰的面目会变得模糊。当我们回望“南侨机工”的历史，再进而回望“黄花岗”的时候，或可一探历史逝去已久的脉动。

据研究，1911年6月15日，美洲洪门筹饷局正式成立当天，孙中山亲自到会祝贺，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陈嘉庚曾回忆：“孙先生看到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动，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且说了不止一次。”据考，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最早见诸其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1922年，孙中山为菲律宾中国国民党分部落成题词，亦称：“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1923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恳亲大会上明确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

直到今天，东南亚华人社会仍然将“华侨为革命之母”作为其最重要的、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我们或可从一部“血泪”南洋史中去寻找“革命”的基因。南洋史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本体”的映照，深远广阔的“南洋镜”中映现着大国兴衰、世界风云和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蓝色文明”……

2

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为时应甚古，然文字所载可引证者可以上溯至《汉书·地理志》：“……其洲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三国时，孙权曾数次遣使往海外，“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晋汉佛法盛行，其通道不外西域、南海两道，“沙门多由海道至中国”。东晋法显“去也遵路，归也循海”，所撰《佛国记》是今天研究古代东南亚、南亚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隋炀帝“甘心远夷，师出于琉球（今台湾），兵加于林邑（安南中圻）”。^{【1】}

及至唐代，海上交通大盛，官府开辟“广州通海夷道”，在广州、泉州设立市舶司。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海上贸易繁荣。这时，很多商人到东南亚经商、定居，当地人称之为“唐人”。唐末黄巢起义攻陷广州，一些广东人逃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

南宋失去半壁江山，岁入大减，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中国商人定居东南亚者甚多。元灭南宋，大量文臣武将和南宋遗民流亡占城、交趾。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国威显扬，“朝贡贸易”频繁，华人经商而居者甚多，在马六甲、三宝垄、巨港、苏门答腊、爪哇等港口城市形成较大规模的华人社区。明末解除海禁后，破产农民向南洋谋生者甚众。

清代，明朝遗民多流亡南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会众流散南洋者亦多。清代后期，社会动荡，因动乱、贫穷而“下南洋”者较前代更成“大流”。^{【2】}

历史研究中把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分为三类：宗教文化交流与通商；王朝更迭，亡命避难；背井离乡，寻求出路。中国素以“天朝上国”自居，“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对于南洋诸夷，中央王朝始终贯之以“宣慰抚定”的“和平外交”姿态，这在“郑和七下西洋”中达到最高点。郑和的航海壮举早于西方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个多世纪，然明朝皇帝宣明：“内安

【1】冯承均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对地理上本属“襟带”，文化上又“归属”的南洋，并不似西方殖民者那样，所到之处统视为“囊中之物”，极尽掠夺残杀，造成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这种不以征服、占有、掠夺为目的，而纯以文化感召、道德感化，使“番国自归”的“大国外交”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曾有，独树一帜，是中国“内则守中守正，外则处处逢缘”的独特文化所孕育的“蓝色文明”。以西方为主体所造就的现代文明是否敢于正视这种与“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反其道而行之”的“弱肉不强食”，“万物竞生，天道葆育”的古老文明，而有所启示呢？

时至今日，西方对“中华文明”本质的理解力，仍不得其真髓，令人担忧。反倒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奸利”而用之，打出“大东亚共荣”的虚伪旗号，遮蔽其与德、意同“轴”，倾轧图霸世界野蛮侵略的本质。战后，日本侵略战争发动祸首、特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居然辩称日军对东南亚的杀戮侵占“造成了英法殖民地的解放”，其间讽意，令人深思。这是后话。

中国下南洋之“移民”，自古以“客”自认，从不反客为主，以一种必“北归”的“候鸟心态”克勤克俭、辛劳耕耘，期盼终有一日重归故里。因此，他们从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权争，自守自持，尊重当地人民的历史与风俗。但“土地”永远感动着这些广袤大陆的子民，南洋丰沃的自然馈赠让中国人动情，在几百年的移民史中，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文明，与当地入一起将这些热带荒凉的小岛变成人间“乐园”，既受恩于土地，中国人便“认他乡为故乡”，正如《再会吧！南洋》歌词中所写的：“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其蕴意之深广，譬如大海蔚蓝。亦是上下文字浪漫的参证。

中国文化绝不向自然索取更多，他们向大海只讨一个“生”。中国海疆广阔，海是大陆的延伸，“路”并未消亡，海路就是生路，我们的先民们自古就懂得向大海“讨生活”。他们对于大海心存敬畏，对于海的馈赠顶礼谨受，在几百年中，他们以“十出九不还”的勇气“下南洋”“讨生”，因为一个微小的“生”是广阔的大海期许万物的。“下南洋”，在中国的语汇中凄美豪壮，代表了大陆民族对“厚土博海，载育万物”的理解和“虔诚自微”

向着海洋的迁徙，是有着更为深刻内涵的“蓝色文明”。并非如西方文化所解释的那般：“中国文化保守内向，缺乏开拓精神。”只不过，我们的先民并非像西方登上的新大陆的移民那样，要么“征服拥有”，要么“探险猎奇”，要么做着“淘金梦”。

正因为如此，中国对南洋的移民与开发史是自然而和平的，是中华文化对海洋的自然辐射。明清以前，华人在南洋地位较高，当地妇女多以嫁与“唐人”为荣。南洋诸国，“唐人”往往享有特权，如真腊规定，当地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当地人，则只需交纳罚金。在渤泥，当地人“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在泰国，华人受邀在朝廷中做官，成为泰国派往中国“朝贡使团”的成员。许多华商在泰国、菲律宾等国与贵族通婚，成为当地望族。

这一切，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发生巨变。从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为掠夺在欧洲市场等价于黄金的“热带香料”，相继来到南洋，开始长达三四百年的血腥殖民统治史。西方殖民者十分忌惮华人在当地的影响力，一方面加强对政治上“无权”的华人的统治，另一方面离间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华人处于完全无权益、无保护的险境中。甚至只要当地华人的人口规模一扩大，就要遭受屠杀。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对华人进行大规模屠杀。据《明史》记载，死难同胞为25000人，而福建巡抚的估计为30000人。华人的财产36000比索，悉被掠夺，充为西班牙“皇家金库”。大屠杀导致马尼拉粮食紧缺、生活停滞，没有裁缝，没有理发师。而随着明朝“闭关锁国”，统治者昏庸无能，封建专制走向没落，竟完全漠视同胞的受难。西班牙文献记载，明廷认为吕宋华人多是“不良之徒”，“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屠杀华人一节，绝不兴师问罪”。这助长着西班牙的暴行，他们先后在1639年、1662年、1762年对华人进行屠杀，每次不少于20000人。河中“堆尸阻流”，以致“河里的鱼是吃人肉长肥的，人们再不敢吃鱼”。他们将十多人的辫子拴在一起，绑上石头，坠入大海。

荷兰殖民者为巩固在爪哇的地位，大量流放华人至锡兰岛做苦工，船一到港，华人就被扔进海里，葬身鱼腹。荷兰总督曾借口华人攻击巴达维亚

(今印度尼西亚)，屠杀华人，赶尽杀绝。发出布告：凡在城外杀死一个中国人给赏银两“杜卡特”，最终一万多华人横尸街头，妇孺亦不能幸免。^{【1】}

殖民者看到中国人勤劳能干，便袭扰中国沿海，掠夺中国人口去做苦力。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邦特库在《东印度航海记》中记载，荷兰曾在闽南沿海抓 1400 人去修筑城堡，大多“苦力”都被折磨致死。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作为母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摇摇欲坠，而“下南洋”也开始了最黑暗的一页。19 世纪初，当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继废除非洲黑奴贸易之后，深感缺乏廉价劳动力，他们看到中国人耐劳刻苦，物质需求极低，遂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允许外国“来华招工”的 1860 年中英和中法的《北京条约》、1863 年中荷《天津条约》及 1866 年的《外国招工章程条约》。结果，成千上万“契约华工”被当作“猪仔”运到东南亚等地，“苦力贸易”大行其道，中国人成了这个世界最后的“奴隶”！据不完全统计，延续半个多世纪的“苦力贸易”掠夺了近千万华工前往以南洋为主的世界各地，仅 1851 年至 1875 年被掳贩的华工就达 128 万人。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中国人。《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曾是南洋的流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岂虚言哉！中国人，中国人代代之后世子孙，谨记！谨记！

3

明清社会动荡，封建小农经济破产所带来的“下南洋”移民潮，和因“苦力贸易”而来的劳工，使南洋华侨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和家乡血缘关系紧密，“祖籍”“祖土”观念浓重，他们在异乡飘零，备受种族歧视与压迫，一个民族被残酷践踏和蹂躏的痛苦深埋在几辈人的记忆中，他们深知个人的生存与民族息息相关，民族不强大，则个人也无以栖生。他们虽身在南洋，却“北望家山”，几代人所追求的都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他们在异

【1】沈健：《下南洋》，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乡“以穷帮穷”“守望相助”，形成了一个与当地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表现出封闭性和独立性，并对祖国充满情感、文化、政治、种族、经济的忠诚。孙中山说：“华侨是最先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

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使南洋华侨即便在殖民经济的狭小缝隙中也“争”得了生存空间。摆脱了封建桎梏，中国人勃发出无限创造力与商业智慧，他们从“帮派社会”向“会馆”时代过渡，各种以血缘、地缘、业缘结成的“会馆”在商业中发挥着信用保障、资金融通、信息沟通、行业管理的作用。华人社会逐步在南洋形成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的巨大商业网和经济体系，在中国本土之外，在千难万苦中创造了经济和商业奇迹。

南洋华侨大小商人和实业家，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成为当地中产阶级的主体。大富商层出不穷，有的垄断零售业，有的经营船舶业、地产业，有的成为大种植园主和锡矿主。华侨经济还进一步向出口作物加工业、制造业、运输业、金融业延伸。虽然在殖民经济的围困下，但华侨经济已成为东南亚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连殖民政府也不得不有所倚仗。中国人，可辱可杀，中国人，辱不没，杀不绝！

南洋华侨社会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每一步都紧密结合。他们迫切希望祖国能革新强大，对祖国的每一次呼唤，都报以海潮般的回应。

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猪仔”的惨境大白于天下，清朝政府无法坐视无睹，决心保护“苦力”。1877年1月，在英国伦敦设立第一个中国驻外使馆，同年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驻外领事馆。1893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臣的推动下，清廷废除“海禁”，保护侨民。^{〔1〕}中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侨务”。

1889年，“百日维新”虽只百日寿命就被围剿失败，但那个秉承正脉又质弱短命的光绪帝，却让南洋人“大感奋”！

“维新”虽惨败，光绪帝仍然在1899年10月12日，颁布了保护中国移

〔1〕《大清法规大全》卷二。

民法令，视海外华人为华侨，要求中国驻外使馆尽其所能在驻在国帮助和保护中国人。这是“维新”仅存的未被铲除，甚至还得以延续的遗产之一。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实行“授爵制”，授予为中国赈灾筹款、为海防和工业建设捐款和投资的海外华侨体现特权的“爵位”。在华侨社会成立“中华商会”，争取华商对清廷的支持。

1909年，距离大清灭亡仅两年，清廷颁布了第一部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明确了华侨的国籍与身份。此摘引：

第一章 固有籍

第一条 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 一、 生而父为中国人者；
- 二、 生于父死以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
- 三、 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

这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虽大清朝未几而亡，但“血统主义”的国籍法一直为民国继承。1912年，孙中山执政期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对中国公民身份的认同仍以“血统”为原则。

同时，清政府在华侨密集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增设领事馆，“遇事保护侨民”，使其“不见凌于外国”“不失祖国主权”。同时广设侨民学堂，“教以国文，晓以国释”，在南洋掀起声势浩大的“大兴华文教育”热潮。^{【1】}

这些政策并未随清朝灭亡而消退，而是在民国大大振兴。民国禁贩“猪仔”，允许国民自由出入国境或到国外谋生，保护华侨在国内外的正当权益，

【1】毛起雄等编：《中国侨务政策概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9页。

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和公益事业。

这些，得到南洋华侨社会的热烈回应。历史，终于正视他们，不再视他们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承认他们的历史，还他们以公平、尊严、权利！虽然，近代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危难中，一个难以“自保”的祖国其实无从谈真正保护华侨的“权益”，但，“名至”已经够了，中国人一生一世常常只为一个“正名”。这一时期，南洋侨民空前以“中国人”自识自信而自居。华文教育蔚然成风，书声琅琅，海浪相和，海，侧耳倾听着这美妙的人类声音。新一代“侨生”追逐海浪长大，却“想望唐山”“寄梦神州”。众多侨商倾家荡产、一掷万金，回报祖国。马来西亚“锡矿大王”姚德胜仅赈济黄河灾民，就捐资白银六万两，光绪皇帝赐予“乐善好施”牌匾，特派黄遵宪亲送至南洋。后来，他又捐巨资赞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获一级嘉禾勋章。（南洋侨领多远见卓识，看到晚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不能救国，便义无反顾地转向“革命”。）他一生以兴办教育为己任，离世时，唯念还未完工的“平远中学”校舍。印尼巨贾张弼士在清末热心实业救国，1894年应盛宣怀之邀，到烟台讨论兴办铁路事宜。他凭实业家的敏感，顺便考察烟台，便投资300万银圆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后孙中山曾为张裕题词：“品重醴泉”。1900年，黄河决口，张弼士捐资200万银圆，清政府赐“急公好义”牌匾。张弼士先后兴办八所华文学校，1905年光绪帝赐匾：“声教南暨”。“药业大王”胡文虎是“万金油之父”，斥巨资兴办“开启民智”“提高国人知识”的报业，他说：“舆论界是社会喉舌，负指导天职，地位多么庄严，责任多么重大。”他先后创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一个“星报系统”，为南洋华侨社会启蒙做出巨大贡献。

4

这一切，都为孙中山发动和领导华侨在内的进步力量，进行一场“由外而内”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孙中山说：“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

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当华侨“最先”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之后，又“最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最先”具有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他们亲见清政府无能救国，于是，便“最先”接受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政治理念：民主、民权、民生；还权于民，创立民国。在中国建立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顺应世界潮流。于是，华侨又“最早”认同并捍卫现代“国家”理念，此时，“爱乡”已升华为“爱民族”“爱国家”。正如前文所及白雪娇机工所言：“祖父老时一定要回国，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心切，究竟什么是对‘乡土’的爱，现在明白了，对于我们来说，‘爱乡’就是‘爱国’。”

因此，从一身之死、一群之死来唤醒民众，呼唤“共和”与“民国”的黄花岗烈士，到拯救民族与国家危亡的南侨机工，其精神特质一脉相承，父子相传，两代喋血，因果相承，势所必然。

1926年8月14日，海外华侨实业团写给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信中说：“我国自前清外交失败以来，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凡我国同胞莫不受人奴隶，受人牛马，尤以我海外华侨，亲尝苦况为最。故孙总理在海外提倡革命，我侨胞牺牲以赴、毁家以从，斯亦冀吾国之国际地位得以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使吾同胞得享平等自由。”^{【1】}

其情之恳实，催人泪下。

被压迫、被奴役最深的人，或许能够最彻底的革命，期待生命迸发的光华能够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华侨对辛亥革命投入了最大热忱。

1894年11月，兴中会在檀香山华侨何宽的住宅宣告成立，第一批20多名成员都是华侨。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兴中会有姓名可查的会员共有325人，其中华侨占70%以上，他们包括工人、中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

1905年同盟会成立，1906年即在新加坡“晚晴园”创立分会，接纳500多人入盟；1908年秋，南洋支部移至槟榔屿。此时，仅南洋英荷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通讯处100多个。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总会和分会近80个，会员3000余人。“凡有华侨所到之地，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2】}

【1】温广益等编：《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

【2】冯自由：《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兴中会和同盟会，对海外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社会的思想启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洋一度“保皇派”势力很大，“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南洋以“帝师”自居，在华侨社会中宣扬保皇主张。1900年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流亡新加坡，向侨众宣传革命：“语以民族之大齐，国民之大义。”同盟会会员新加坡富商张永福、陈楚南把邹容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翻印两万多册，广为发布。1906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孙中山亲自创办机关报《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孙中山署名“南洋小学生”，亲领笔阵：“革命为救中国唯一的途径，原为革命党一贯不变的主张……人心之所归，则时势之可为……除一二汉奸外，断无归心于满清者，今即以南洋证之……”南洋论战，“笔枪墨炮，此来彼往，杀声四起，把南洋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或赞成革命的，多要争读《中兴日报》”。^{【1】}

人们开始期盼一个允诺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民国”。南洋对祖国热情捐助在辛亥革命达到高潮。据研究，整个辛亥革命的经费基本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总捐款额达700万~800万港元，孙中山曾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多数经费都来自华侨的捐献。仅1907—1908年的几次起义就共得到义捐20万元。黄花岗之役共筹18万



1906年4月6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成立。此后三年，晚晴园成为辛亥革命的海外主要革命基地。现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1】陈楚楠：《晚晴园与革命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余元，南洋筹得8万余元，美洲筹得7万余元。西贡华侨商人李卓峰捐助革命，倾尽家财，孙中山给他10万元的国债，他却付之一炬。华侨资本家林受之为革命捐出全部家产，儿女“佣工维生”。华侨肖竹琦为支持黄花岗起义，变卖全部田产。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华侨底层民众有着强烈共鸣，为革命倾家荡产或挺身举义者甚多。

越南堤岸卖豆芽的华侨小贩黄景南，每天把赚到的钱投入“扑满”，作为革命“储蓄”，最后将毕生几千元财产全部捐献。越南挑水工关唐，挑一担水只得一分钱，他把一分一分相加而得的全部3000元捐献革命。

黄花岗起义，南洋恻哀，对革命和孙中山新政权的捐助更具有广泛性。“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1〕}

华侨一直是武装革命的骨干力量。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189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的16年中，孙中山直接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中，会党、新军和华侨是主要力量。

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是孙中山最早策划的两次武装起义，参加者就有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等人。

1907年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起义，分别是以新加坡华侨许雪秋和邓子瑜所领导的华侨为骨干的武装起义。1908年广西钦廉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越南、缅甸等地的华侨起到中坚作用。1908年3月，黄兴以旅越华侨两百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南军，开入钦州发动起义，后因弹尽援绝，退至越南。这些起义虽遭失败，却使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南各省深入人心，撼动着大清王朝的统治。

及至黄花岗起义，已是黎明前的黑暗，历史为什么会将这样的使命赋予南洋？五百死士，五百赤子，必将携着这片暖洋的全部“暖”，去刺破黑暗的“坚壁”，血泊中，一个婴儿在镇痛中降生——共和肇造！

〔1〕陈宗山：《南洋华侨革命史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1910年11月14日，马来西亚槟城打铜仔街120号的一幢两层楼房里（槟城阅书报社），会议正在紧张地召开。在接连九次失败后，孙中山决心举全部之力，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和槟城代表吴世荣、黄金庆等参加了会议，秘密策划举义的一切细节。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有所不同，孙中山情绪激奋：“革命不是没有办法，只怕没有勇气……倘或能生存，唯有赖诸同志一肩担起，无论遇到何种险阻，亦破釜沉舟，成败实在此一举！……”据史料记载，孙中山说到此时声泪俱下，会场寂静无声，与会者无不泪下。

屡举屡败，以至黄兴都戏称自己为“常败将军”，这使得同盟会中出现消极情绪。可是，革命，如果不在最困难的时候咬定牙关，已经付出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孙中山感到，这是一个最艰难的时刻——“成败实在此一举！”成，则革命已到收获果实的时候；败，则革命将陷入低潮，有何颜面对赴死出潮、鲜血引路的先烈。最终，会议达成高度一致，决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一举而亡大清帝国。会议为举义进行了现场募捐，与会者无不倾囊而出，共募得8000元。

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本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一）从南洋、日本及内地党员中，征选骨干（后称“选锋”）800人，分为八路，首先发难，作为领导先锋，并配合新军占领广州；（二）联络番禺、南海、顺德、惠州等地民军，同时起义；（三）派员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西（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运动军队反正，及时响应；（四）占领广州后，即由黄兴统一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攻南京。正如孙中山所说：“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1】}

但，此时，残喘中的清政府还牢据最后的黑暗，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根基并未最后动摇。而以同盟会为组织核心的革命力量又有着“先天不足”，广州起义——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所不同的是，绝死者的呐

【1】《孙中山文选》，第八章有志竟成，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
革命志士

喊，在“铁桶”中的呐喊，终而唤醒神州沉睡千年的风雷，这个古老而苦难的民族在甘如春雨的“鲜血”中，终于开始挣扎着渴求新生。大地，在春雨中新生，民族，在“血”中新生。

起义原定于1911年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从广州发难。4月8日（农历三月十日），临近起义前，温生才（马来西亚华侨）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情势突变，清政府顿时警觉，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致使联络起义的部分革命组织被破坏，加上部分枪械因有人背叛而未能到位，起义被迫延期至4月27日。

顿时，人心动摇、士气低落。黄兴见状，怒形于色，立即向起义人员做了四条宣告：

（一）吾党荟萃全力而谋此举，稍存畏惧何以起事？

（二）一部分军火历经艰难险阻已运抵城南，不但不能运返，倘一不慎，足以殃及无辜。

（三）华侨捐献，寄希望于广州发难，如有始无终，形同欺骗，不能见谅。

（四）一切作战计划业已完成，时间迫急，不战而退，何以立威信于将来？对革命影响至大且巨！

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在“广州起义失败检讨会”上说：“吾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悲痛不能自己。……此役明知不可为而为者，迫于革命存亡绝续之交，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国魂光辉照耀古今……”

“明知不可为而为”，顺昌逆亡，天理乎？可知，人类历史，大逆流无数，若无万千不惜粉碎肉身而砥柱转流者，人类又何复结束逆浊之世而迎来清平之顺境呢？

直至起义前一天，赵声等在香港、广州待命的“选锋队”，因未及时获知起义时间而未能赶到广州。黄兴被迫临时将原计划十路进攻改为四路进攻。发难时其余三路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借故逃避，三路选锋队无人领导，没有武器，未能参加战斗。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毅然率领选锋队120人，臂缠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脚穿黑色橡胶鞋，从小东营指挥部出发，一路猛攻、无所畏惧，直入两广总督署。莲塘街吴公馆，同样装束的选锋队30多人在喻培伦、饶国梁等率领下同时奔袭总督署。原计划活捉总督张鸣岐后，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但张鸣岐闻风躲到水师行台，革命党遂放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此后黄兴和喻培伦所率领的选锋队分成几路，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因敌我悬殊，义军旋即陷入孤境，弹尽援绝，以命相搏。而原来准备响应起义清政府部分新军，因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武器，或因联络中断而没有参加起义。最终，起义失败。

清军将战斗中牺牲和被捕就义的烈士悬首城头、陈尸街市，他们或血肉模糊、肢体破碎，或身首分离、死不瞑目……那些睁着的眼睛如此纯净，如此安宁，在血的下面，或泛着青蓝，依旧注视着这个世界，这个诅咒和热爱的世界！在这样的注视中，我们或不孤独，或可大胆前行，直向生命的蔚蓝……

南洋流泪了，海，就是泪海吧！从洪荒到如今，有情的物类究竟倾尽多少情？多少泪？一万朵海浪追着那些从这里出发的脚印，直拥上岸头……海，向着大地低声讨还：勇士，勇士，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直到今天，南洋还记着这些勇士的事迹，追索着能够追索到的一切细节，把他们讲给孩子，讲给未来……

马来西亚传教士李炳辉，回国参加起义的那天正是他的20岁生日。这

位年轻人写给母亲一封信，附诗一首。诗云：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华侨烈士方声洞，起义前写给父亲的绝笔书中言：“是以满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满始……儿虽死亦乐也。”

战斗中，李炳辉追随黄兴进攻两广督署，踊跃争先，与敌力战，中弹殉难。

南洋华侨工人杜玉兴，随黄兴进攻督署，击毙清军防营十余人，后与两广总督张鸣岐左翼金邦振交战，金被击毙，杜身中数弹殉难。

南洋侨商陈文褒负责在城外发难，当听到城内枪声，带领众人冲入城内，猛攻督署，不幸殉难。

新加坡华侨李文楷率领众人与清军展开巷战，击毙敌人数十人，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仍奋力直前，后伤重倒地殉难。

河内华侨罗联，在战斗中担任先锋，转战至小北门时被捕，在狱中，他对前去探视的族弟表示：“吾必舍生取义，望弟能继吾志。”临刑时他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

印尼苏门答腊南洋中学校长罗仲霍，在攻打总督署时受伤，在广州旗人街被抓。清警审讯时，他侃侃而谈，向狱警宣讲革命。临刑前，他面不改色，自若含笑。重宣自己的誓言：“愿将铁血造世界！”

……

1911年5月3日，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挺身而出，不顾清朝当局“不准收尸”的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邀聚了100余人，把散落、腐烂的72位烈士遗骸，身首拼合，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后陆续又发现14人尸骸，黄花岗烈士人数为86人）。

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红花”易名“黄花”，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即潘达微爱着黄花，寄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山南麓先烈中路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寓黄花凌寒独放，傲然不群的英雄本色，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黄”为中央正色，自古号轩辕为中华祖丘，黄羲为祖源，其隐喻“黄羲之规可踵，以之革乱，则玄古之风可绍”。（《晋书》）——矢志继承先烈遗志，以革命鼎成中华复兴事业，恐怕更近乎其本意。

死寂千年的地火，非到直贯地心的最后一震不足以喷发；笼盖四野的黑暗，非到黎明前最后一记钟磬不足以鸦散；集薪之下的坚冰，非到投向最后一枝不足以崩裂；积蓄革命的锐意，非到最后骨锥的一刺不足以成功——果然，夏初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仅至秋深的黄花时节，武昌起义成功，帝制瓦解。

“何草不黄”，《诗经·小雅》一句似成预言，黄花开向中原大地西南群山，开向江南、开向南洋……

第三章

“机工统统有！”

1

1939年春，昆明。

街头不时出现三五成群衣装整洁、把头发梳理得极光亮的年轻人，他们操着昆明人听不懂的口音，对一切都好奇、热情，他们身上透着的“时髦”气息吸引着昆明百姓。9批南侨机工共3200余人，自1939年2月18日至8月14日的短短半年内，经由安南（越南）或缅甸入滇，来到昆明——这个素称“高原明珠”的古城。

自抗战成为“大后方”以来，昆明不再宁静，来自沦陷区的大量机关、学校、工厂迁滇，加上入滇驻军，云南人口激增100多万，省会昆明人口从战前的14万增加至30多万。她以高原的胸怀接纳着带着战争伤痛的人们，高原的阳光温暖、明亮，消融着人们心头的坚冰，昆明也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色彩，沉重中竟不失欢乐的氛围。

机工们兴奋又内心急迫，他们蹈海而来，现在，大陆将他们一举而起，天，触手可及——高原，红土地！从广西丘陵进入贵州，曾以为那些黛色的山影幢幢奔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未见过那么多连绵起伏的大山的人，愕然惊异，但当被告知这才是云贵高原的“二台坡”时，未来生命的历程如何与“山”联结？竟然有些许错愕感——从贵州盘县进入云南，譬如天梯，这时他们脚下是海拔1974米的昆明，四围群山，飞龙翔凤，壮美无比！原来，山，也可以像海一样壮阔，是海最激情时刻的定格。很多“侨生”是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们不知道，原来祖国西南的土地有那么多的激情——红得炫目，原来大地是雄舞欢腾的——生命之歌必在最高处唱响。他们在行程中完成一次从海平面到直接蓝天的飞升，这似乎暗喻，未来的起伏跌宕、曲折难行，而他们，势必将与这片土地深深结缘。

虽然西南运输处并未组织专门的欢迎会，这与一路华侨的热烈欢送形成

一九三九年马来西亚槟榔屿回
国南侨机工照片

54-50-944-11-198



○ 梁达安，广东番禺，
30岁



○ 林水成，福建同安，
31岁



○ 林振川，广东琼州，
30岁



○ 周瑞松，福建同安，
33岁



○ 谢朝美，福建海澄，
26岁，已婚



○ 符瑞瑞，广东琼州，
32岁，已婚



○ 陈发元，福建惠安，
29岁



○ 曾发成，福建安溪，
25岁，已婚



○ 陈范亭，福建同安，
24岁



○ 谢高升，福建永安，
22岁



○ 黄文达，广东中山，
30岁，已婚



○ 柯天和，福建同安，
36岁，已婚



○ 吴其泰，广东嘉应，
34岁



○ 陈光华，广东万宁，
29岁，已婚



○ 陈协祥，广东潮阳，
34岁，已婚



○ 李益三，福建同安，
23岁



○ 薛定邦，广东惠阳，
26岁，已婚



○ 张泽美，福建泉州，
24岁



○ 纪志范，广东普宁，
22岁，已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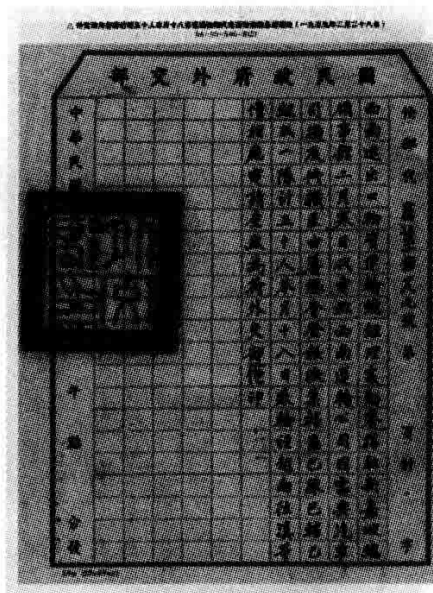


○ 陈振发，福建同安，
24岁，已婚

1939年马来西亚槟榔屿回
国南侨机工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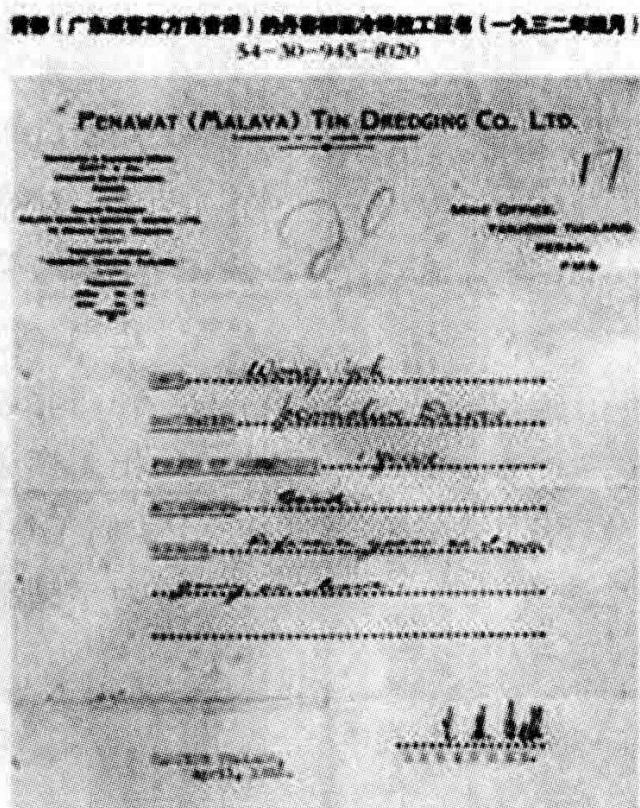
反差，但昆明醇厚朴实的百姓让他们深深欣慰——同胞，现在成了多么真实的词语——就是——同样的血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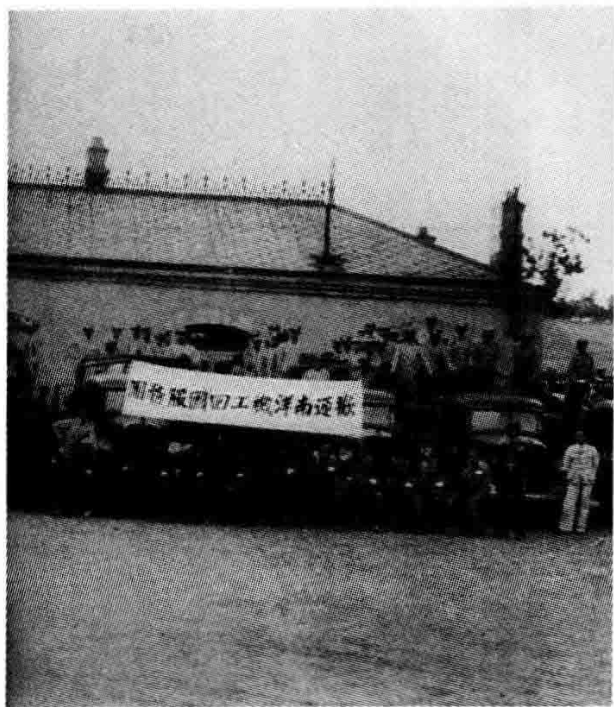
机工们被迅速集中于西南运输处设在昆明西门外的潘家湾训练所。这里旧名虹山，有劈山拓出的大片红土地作为场地，临近则是农家的桑麻园和小片的菜畦。机工们在这里进行短期军事训练。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两排旧楼房临时改为训练场所驻地。训练项目除准军事训练外，主要包括如何在不同路况进行山地驾驶、如何躲避敌机扫射轰炸、如何运载不同军用物资（汽油、枪械、弹药等）、如何防止汉奸破坏等。训练枯燥、严格，极其艰苦，训练所条件简陋，机工们睡地铺草席，5点钟起床，只能在河沟里洗漱，



↑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机工 50 人经越南往滇快邮代电西南运输总经理处（1939 年 2 月 28 日）

↓南侨机工辜水扬的技术证书（左）和黄郁的技工证书（右）





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整训所欢迎
抵达昆明的南侨机工

吃掺着沙子、石头的米饭。初春的昆明，有时寒气逼人，没有暖衣暖被，不少人感冒发烧，但从未有人因病请假。因为训练所的一间“血屋”已经将机工带进了战争。

发表于1939年9月28日《南洋商报》的新闻报道《华侨机工在滇缅路——西南各省实地视察记》中写道：“训练所有一间涂满血迹的房间，最能激起华侨复仇的情绪。那是去年（1938年）的事了，敌机狂炸昆明，一百多个广西学生，正在进行司机训练，住在训练所的一个宿舍里，两三颗炸弹把这些热血的学生的生命毁灭了。他们的眼睛多半没有闭，他们的血溅在墙壁上、溅在木桩上，老洗不掉，华侨机工每一次看到这些殉身者的血，他们仇恨敌人的心便更加强了一分。”每一批机工都会来到这间血屋默哀，用手轻轻触摸那些好像还有余温的血迹，如果不是壁满墙的血，人们或许不会相信，在春城明媚的阳光下，人间竟极尽残酷。

那是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军首次对昆明进行惨绝人寰的轰炸，几乎同时，重庆、桂林亦遭频繁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昆明遭受轰炸最惨烈的地区为城北圆通街、平正街、绥靖路及城西黄土坡一带（训练所恰在西北边缘），日军使用的凝固汽油弹使繁华街衢顿成火海。《南洋商报》的这篇报道是为“周年祭”而发的。那间“血屋”仅是战争针对平民酷虐暴行的一个角落，随后，机工们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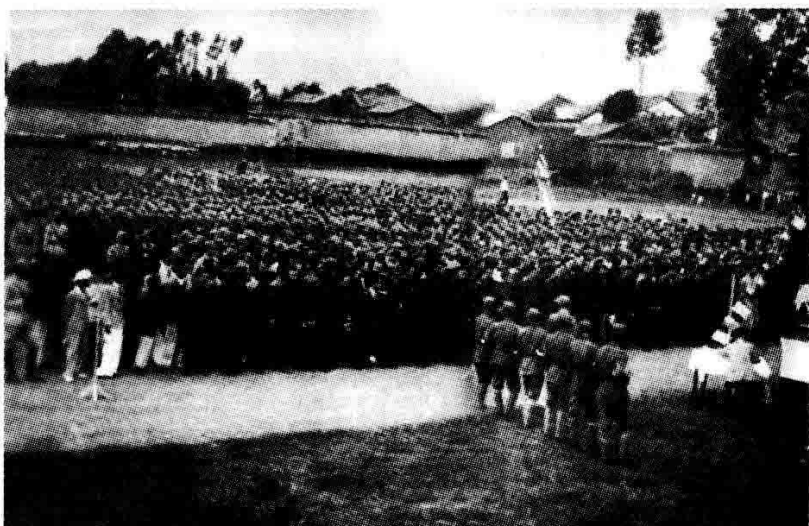
看到，“周年祭”当天，昆明街头举行“苦主”抗议大会，会场环绕一排电灯杆，受难当日上面曾挂着中国人残断的肢体……

他们瞬间就放弃了南洋“多少带一点自由主义的猜想”，没有抱怨，直面现实，将身心迅速凝成钢铁，锻炼投入战争的决心。

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腐败，“封建军阀”的做派常常令机工们瞠目结舌、无以对应。军官可以任意打骂士兵和学员。南侨机工素爱整洁，即便没有条件，他们也会想办法打整得干净利落，特别是头发必须一丝不乱，再加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国语只是半通，交流有很大障碍，这使得很多军官和教员“眼气”，看不惯，经常无故找茬。一次，三名机工正在练习合力装配一辆卡车，劳动中用方言开了几句玩笑，

↑南侨机工在昆明潘家湾整训所进行集训的场景

↓南侨机工走出整训所会场





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改为西南运输处
“运输人员整训所”

竟引来教官辱骂：“懒汉！配当什么军人？娘娘腔儿，粉头样儿，不想干，都他妈滚回去……”三名机工不服，与教官争执，教官即令卫兵将其关押，双方发生推搡，卫兵群起而围，机工们也闻讯赶来，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机工们一直愤愤的是，中国人受外人奴役羞辱已甚，几于灭亡，为什么国人即便在这样的时刻还要变本加厉奴役羞辱自己人，“不愿做奴隶的人”，究竟有几重奴隶！最终，“群殴”事件得以平息。训练所以对整训南侨机工持一定区别的态度，而南侨机工也变得更加团结而特立独行。

一份珍贵的档案史料《西南运输处之华侨机工》^{【1】}中写道：“华侨机工皆系闽粤人氏……驾驶或修车等技术，十九有相当经验，言其性情，则爽直而热烈，言其举动，则活跃和放浪……性情习惯言语生活，皆与国内不同，以视国内近日曾受本党及新生活等严格整齐之训练，更相枘凿。一旦归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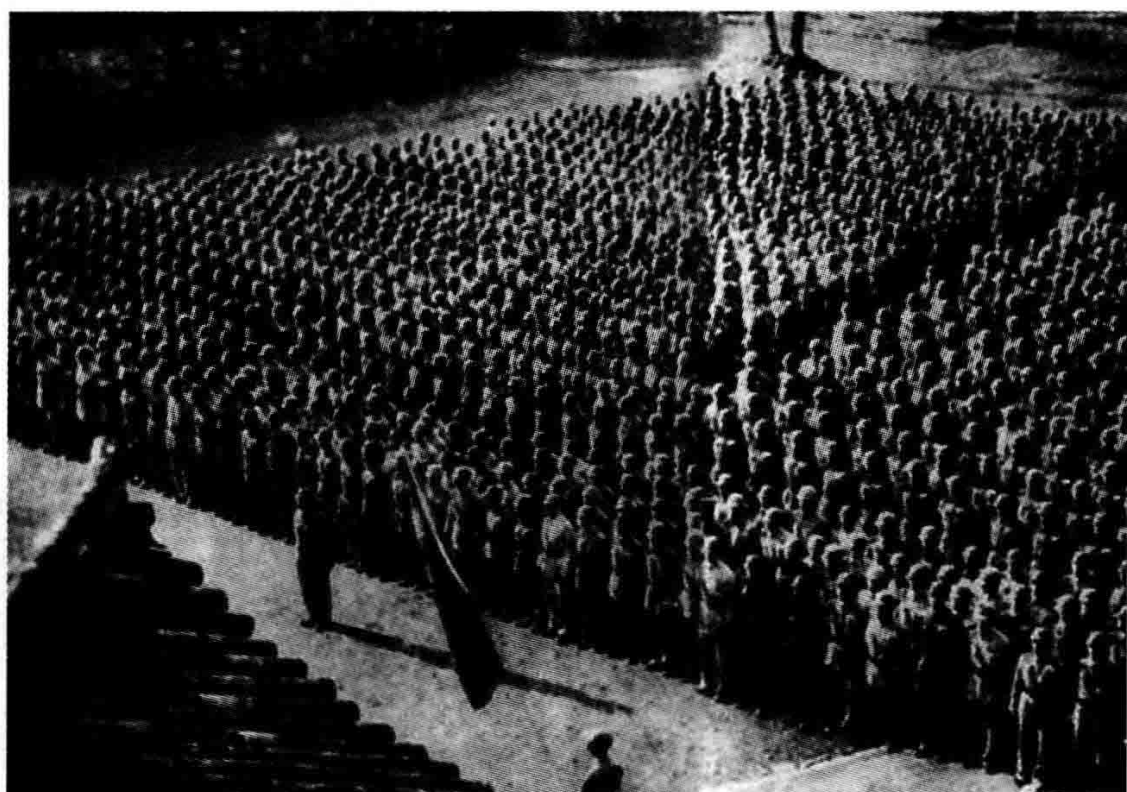
【1】引自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



南侨机工在进行队列训练

↑南侨机工在昆明潘家湾整训所进行集训的场景（一）

↓南侨机工在昆明潘家湾整训所进行集训的场景（二）



为国服务，与内地军警人事自不免发生龃龉，互相摩擦。但彼辈回国初衷，确为激于卫国抗敌之情，牺牲其职业，离别其家庭，万里归来，为国效力，其热情其堪嘉尚。各队长官，倘能知其习性，略迹原情，赏罚严明，甘苦与共，言行以身作则，使其心悦诚服，则一旦有事，激发其忠勇之天性，信能慷慨赴义，视死如归，诚可用之才也。”但彼时之中国，为官僚封建军阀所治，其翳目昏聩，哪里能透视这内敛的光明？

短期培训后，多数南侨机工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1、12、13、14运输大队，少数混编入第1、5、9、15大队，迅速投入滇缅公路运输。修理工部分随队维修外，其余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修理厂。^{〔1〕}1940年专门组建“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分第一、第二大队），200多名成员为清一色南侨机工，200多辆各式车辆均由海外华侨捐赠。大队长麻埠华侨机工刘贝锦（永春籍），华侨先锋大队被誉为“抗战建国运输战线上的神行太保”。^{〔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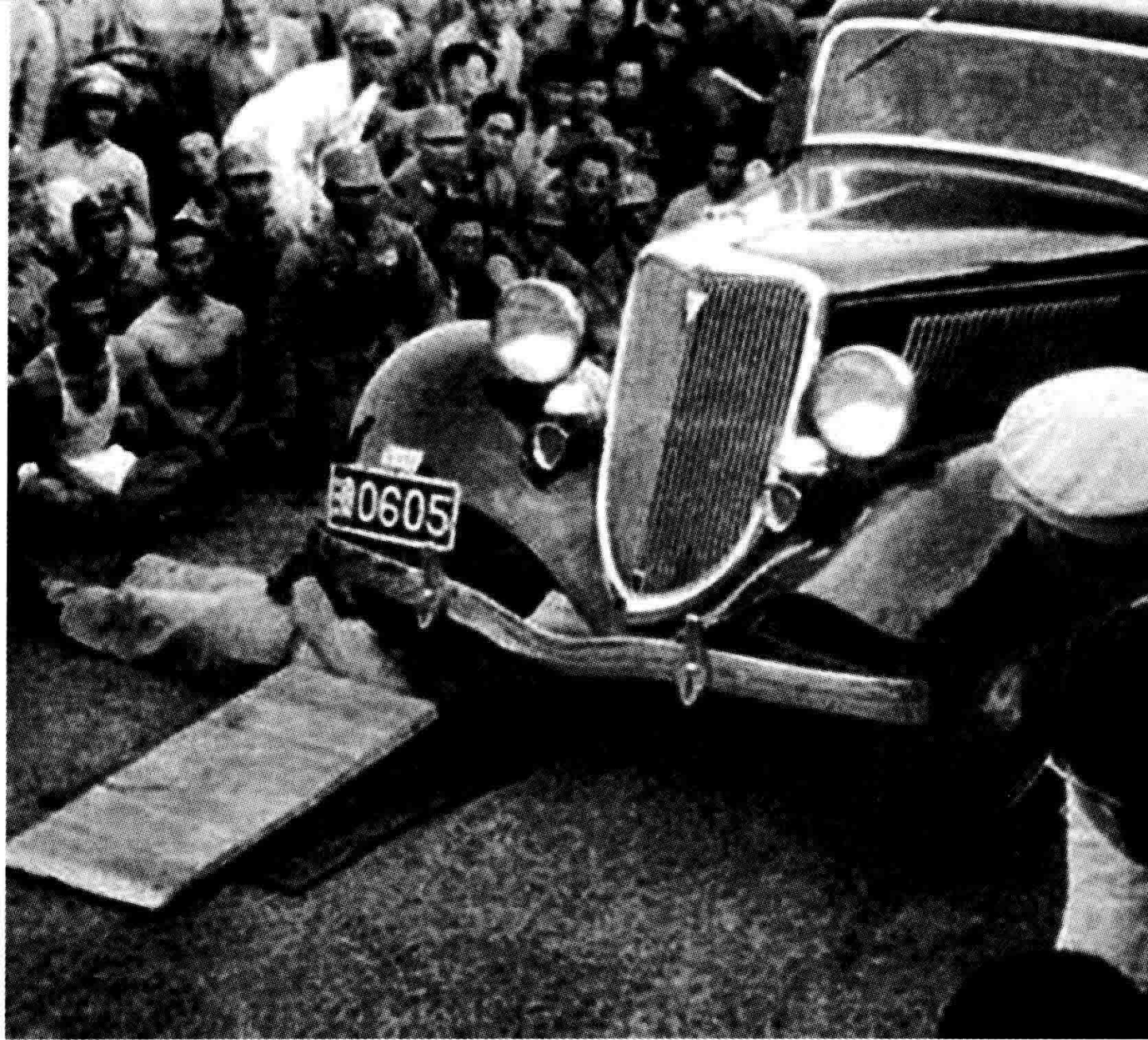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西南运输处共设21个汽车运输大队，至1941年初，还有16个大队。昆明运输人员训练所主要培养熟练机工，车队、车站、仓库管理



【1】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2】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南侨机工在进行军事训练



南侨机工在整训所观摩气功表演

人员，无线电报服务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共招收 9000 余人。运输主要以车队、修理厂、仓库的“一体式”管理为主。^{〔1〕}南侨总会《大战与南侨》一书记载：“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几种史料参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结论：南侨机工占西南运输处熟练机工的一半以上，滇缅公路所实现的战时运输一半以上是南侨机工完成的。可是，这“一半以上”的巨大贡献在国民政府和西南运输处的文献档案中却从来没有直接记录。究竟是不能“直面历史”，还是历史“不能直面”？

1939 年春天，也就是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初期，日军“南进”战略已经加速向中国南海推进，并占领了海南岛。1939 年 10 月，日军攻占广州。广州作为接受外援和进口物资的作用完全丧失。接着，战争的目标迅速指向距

〔1〕《战时西南运输处档案史料》，见《档案与史学》，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 页。

离广州500英里的越南海防港。12月，日军对中国境内滇越铁路实施轰炸——滇越铁路战时运输的猝断，显然将全部战时运输的巨大压力倾向了刚刚开通的滇缅公路——最后，也是中国唯一的战时运输管道，供应中国抗战血液的最后一根大动脉！

在某种意义上，南侨机工回来得正是时候。祖国非止危难，且是血脉贲张却又即将猝断的时刻！

而此时，滇缅公路物资运输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无疑将通过这些过境物资收取关税和过路费而获利。援华物资首先由海船运抵仰光港口，卸下来再装上驳船沿伊洛瓦底江而上，转运至八莫卸船，经陆路运至腊戍，最后沿滇缅公路运抵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昆明市。”这样看来，滇缅公路这个“货真价实的合作项目”具有超高的危险度，抑或是先天绝症——它的首端操纵在英国人的殖民利益机构里，而“滇缅公路的整体条件取决于官僚机构的控制程度”。

也可以这样说，滇缅公路一头是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所在，一头则有中国战时当局官僚把控——退出历史的距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且而后的事实将证明，唯有在这条路上跑动的机车和人、人民，给予了路生命，是他们

南侨机工与他们驾驶的运输卡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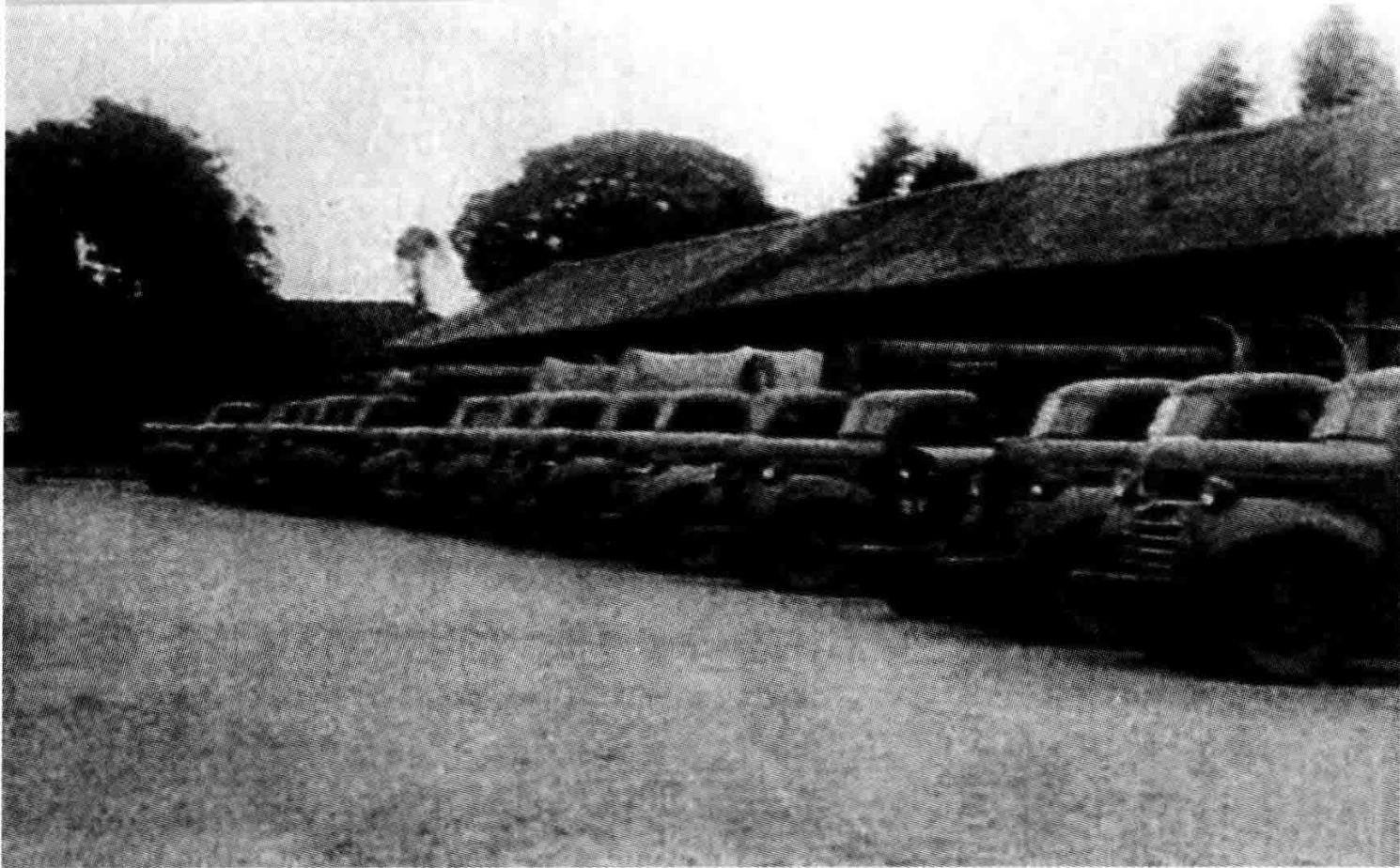
用血肉在润滑那具开初就在朽坏的战轮！

从缅甸八莫转运至腊戍的物资，据 1941 年 8 月，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称，仰光港每月可吞吐 4 万吨中国过境物资，而腊戍则每月吞吐 3 万吨。也有报告称实际交由滇缅公路自腊戍起运的物资要少得多，部分物资则被沿途“打点”“截留”，但自始国民党当局没有一个确切的哪怕接近事实的说明。无论如何，每个月，经 1153 千米（含腊戍至中国边境畹町路段，国内路段为 959.4 千米），数万吨的物资，包括战时运输车辆均由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抗战前线，否则，何以日军继后的战略无论怎样调整，始终将摧毁滇缅运输线作为其倚重的核心？

滇缅运输线在组织初期，就将南侨机工各运输大队放在最关键的生死攸关的路段上，即由缅甸腊戍至中国境内（现今德宏州畹町—遮放—芒市）的“跨境”运输线上。由缅甸进入中国德宏的这一地区，为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的世居土地，高山与平坝穿连，纵谷横竖切割，受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多雨闷热，多发瘴疔。北出龙陵县，海拔陡升，即直跌怒江河谷，复由盘旋直上海拔 2300 米群山，再经保山、下关至省会昆明。滇缅公路在此跨越三个地带，即热带亚热带至温带、山地高寒气候带；低海拔 800 米至 2300 米的低地河谷到横断山、云岭的纵谷高山地带；以山地汉族为主的地带到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世居地带。

无论当初出于国民政府当局主动招邀，还是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事件本身影响所及，抑或为实际主事者的筹谋，只有素质优异、训练有素、整体性良好，且勇毅刚强、纯粹以赴死救国为己任的南侨机工方能承起中国肢端那根最粗隆的动脉！当初，首批应召回国，为陈嘉庚先生亲自选荐而蜚声国内的“八十先锋”队八十勇士被先遣而入驻德宏首府芒市——就是最好的证明。

由此，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是一支相对独立、效率极高、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的队伍。完成了大量艰险的抢运任务。所存西南运输处档案记载：“三千华侨机工服务本处，三年以来，不独平时能够忠于职务，对于历次抢运，如广东、广西、同登、滇越、滇缅诸役，尤忠勇分发，不畏艰难。在敌弹射击轰炸之下，冒险工作，间有身受重伤，仍不退缩，终能达成其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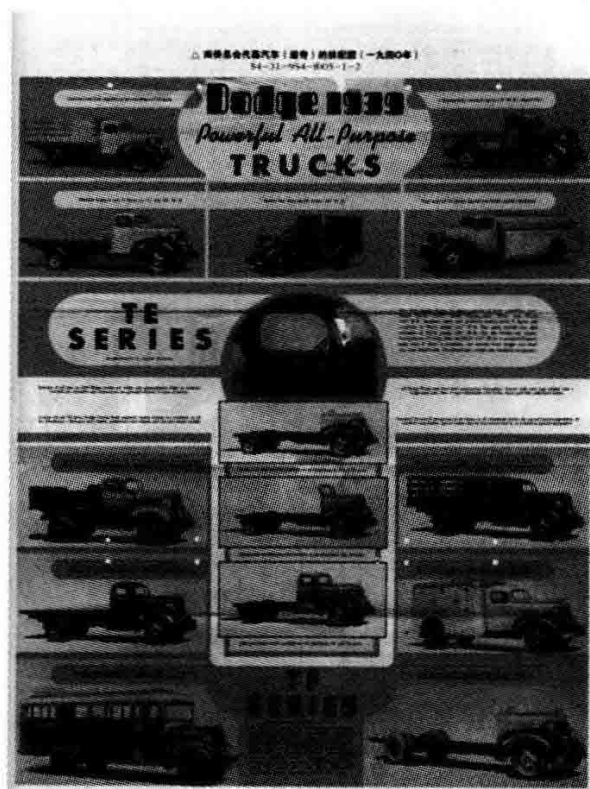


者。”^{〔1〕} 南侨机工恪守“公约”，绝不侵扰百姓，本来“见兵就躲”的老百姓却十分信任和喜爱他们：“隔着一两百米就知道是南侨机工，他们人干净，车也干净，只要停车时能找到水，都要洗车，头发总是梳得光溜溜的。”

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樁接，是尤其应当注视的——即上文提及的“广东、广西、同登、滇越、滇缅诸役”，即在南侨机工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几乎不暇喘息，就投入抗战正面战场，直面牺牲。日军实施“南进”战略，投入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兵力，在占领广州后，“进驻越南作为向南扩张的

↑南侨机工运输车队排放整齐的卡车

↓南侨总会代募汽车(道奇)的装配图(一)



〔1〕引自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

第一步”，其切断中国战时供应线的意图更加明显，由于轰炸滇越铁路（曾炸毁一列满载法国平民的列车，使日法关系骤然紧张），日军需要一段外交“斡旋”，但在这个短暂的间隙，突破广西，进而彻底切断由河口—昆明—贵阳（分道重庆）—南宁的南方供应线，而直逼陪都重庆的战略得以迅速推进。随着此后长沙、衡阳战事失利，广西诸役更一败涂地，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中国西南。

于是，南侨机工的足迹、车辙随着战势的变化遍及整个敌后运输线，甚至敌前，如一个疯狂旋转的陀螺，其轴心正是滇缅公路！战争物资在1939年8月至1942年5月，将近三年内，从这条“血线”输送往昆明，再以此为辐射中心，向贵州、四川、两广、湖南转运，机工甚至参与了新疆苏联援华物资运输和支援延安物资的运输。只要有路、有军需物资运输，就有南侨机工。机工许海星回忆：“那时，觉得中国好大好大，路，永远也走不完……”南洋，路的尽头是海，中国，路，似乎没有尽头。大地究竟有多广大，路究竟有多长，为什么路的可及之处都是苦难。机工，车是移动的家，路，直向前走下去，走下去，就是他们的生命。

滇缅公路，就像汽车博物馆，行进着各式各样不同国家生产的、装载量不同的卡车。机工所接手的卡车多为美国生产的道奇（分为载重量2.5吨的小道奇及4吨大道奇、载重量3吨的雪佛兰和载重量3吨带绞盘悬挂的10轮“JMC”等）轻



↑南侨机工使用的手压式千斤顶
↓道奇车方向盘

型卡车。因为运输军火，如炮弹、汽油等都需要特殊安全技术和防盗，机工必须身不离车。长达一周甚至十几天的运输时间，机工吃住都在车上。占总数一半以上的美式“道奇”，车身短，驱动力一般，却有长长的“车鼻子”，驾驶室依美国人的偏嗜而相对宽敞，他们就把这车称作“道奇旅馆”，随身的证件、照片、信件、简单的生活用品，都会放置在车上。每天清晨，南侨机工对着汽车后视镜的“梳妆”是滇缅公路的一景，无论条件多么艰难，他们总要想办法洗干净脸，头发梳理整齐，甚至有人在驾驶室里睡觉时还要带上发网，不弄乱发型。无数次的清晨上路之前，机工都要对着镜子最后“认可”自己，然后就可以自尊和自信地面对一切。“道奇旅馆”——在战争中移动在生死边缘的“单身之家”，却承载了这些年轻人的全部浪漫。他们说：“我们一路都‘风花雪月’！”上关风，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是滇西至美的风景。或许，前进，不管前路如何，风花雪月，千山万水，一任随风飘去，本身，就是最大的浪漫。

南侨总会代募汽车（道奇）的装配图（二）



2

南侨机工曾多次被派往战争前线执行运输任务。1939年10月至12月，一批南侨机工参加了桂南会战和昆仑关战役（如前文所述刘瑞齐）。从现存机工采访资料来看，当时调往前线的机工人数应在几百人。但现存史料中没有确切的参加战斗和牺牲机工的数字和名单。

桂南会战是正面战场为保护国际运输通道而进行的一场会战，昆仑关战役是其中投入战力最强的抗日战争大型战役之一，地点位于中国广西战略要点昆仑关，起始时间为1939年12月18日至1940年1月11日。

1939年11月15日，日本军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攻占钦州、防城后，以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于24日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12月4日进占昆仑关，桂南会战打响。国民政府调集四个战区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参加桂南会战，以确保桂越国际交通线的安全。

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央军第五军奉命主攻昆仑关，12月18日凌晨战斗开始打响。12月30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第21旅团5000余人，21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士官死亡达85%以上，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但日本非但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反而遭遇到更顽强的抵抗。日本军部“南进”派即认定：必须切断中国对外最后的交通线，以期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军部《情况判断》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日本决心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抵抗其侵略的最主要补给路线。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00吨中的12500吨即经此路线，达85%。

蔡汉良服务于第15大队45中队，1939年10月，南宁战役告急，他和一些华侨司机同伴被抽调编入第16兵站，到南宁前线运输，南宁11月24日

失陷后，又投入昆仑关战役。昆仑关是南宁的东北屏障，是桂南公路交通的咽喉，日军在攻陷南宁后，企图打通昆仑关而北上直取柳州、桂林，切断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白天战火激烈，机工只能在夜间运输，运输线路紧贴前线，完全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为了争取时间，一夜常要往返三四次，直到天亮才又隐蔽待命。很快，昆仑关失陷，蔡汉良和部队一同退入武鸣，被日军围困三天三夜。“那时，已做好和日军同归于尽的打算，想到的，只有还在老家福建南安的老母。”最后，援军到来，打开一条血路，蔡汉良得以退入柳州。后又马不停蹄被派往西南运输处安南分处，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类物资回国，直到1940年日军占领安南，蔡汉良才回到昆明转战滇缅公路。

机工殷华生被派往桂南会战（为夺回昆仑关，正面战场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组织10万兵力发动了桂南会战，伤亡惨重）前线宾阳抢运伤员。在临时战地救护所，混乱中根本来不及处理源源送来的伤员，伤员直接被排放在地上，到处都是肢体残断的战士，血污成片，一个个年轻战士因失血过度死亡。殷华生忘不了那些冰冷的或者还温暖的尸体，其中一具尤其瘦小，显然还是个孩子，他睁着眼睛，脸上带着稚气。他来不及思考，抬起担架飞跑，再驾驶满载伤员的车一路赶往柳州的医院，在一次往返中车身常多次中弹，可他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或许，可以抢回正在逝去的生命。在采访中，当问到殷华生究竟运送了多少趟时，老人只摆摆手，不记得了，那时来不及想这些。

1940年初，谢耀南奉命带领第11大队33中队（谢耀南任分队长）从保山赶赴广西前线，抢运安南境内的军用物资回国。在广西经过整编，成立了“红牌车”大队，进驻平马。车队往返于安南的海防、谅山等地。安南境内公路十分狭窄，桥梁仅容一辆车擦着车身通过。进入中国境内，随时会遭到日机空袭。一有空袭警报，车队就必须分散隐蔽。一次，才听到警报，飞机已飞临上空，爆炸声四起，在超低空扫射时，连日本飞行员的模样都看得清楚，两名南侨机工来不及隐蔽，中弹身亡。

日本情报部门此时已经侦测到平马驻扎着车队，再次派飞机来轰炸，整

个平马镇一片废墟。所幸车队隐蔽点没有被发现，得以保存。经过数月的突击运输，车队完成了转运安南物资的任务，返回滇缅公路服务。

1940年6月，欧洲战场局势陡转，德军占领巴黎。法国失去与日本谈判的筹码，遂对日军攻占法国殖民地的越南采取卑躬屈节的让步态度。9月，日军第5师团火速抵进红河以北——中国军队桂南守军腹背受敌，顿失依托，弃阵亡命，溃不成军。而作为担任军资运输的车队，则首尾碎断，失去联系，运送军火的南侨司机因职责在身，宁舍身亦不能丢弃车辆物资，其处境险恶自然倍于败军。

邝振声服务于第6大队18中队，驻扎于贵州关岭场。南宁战役时受命抢运浮石兵工厂全部机器到柳州。任务完成时，南宁已失陷，车队又奉命穿过敌占区驻扎东兰，入安南境内转运物资回国。占领南宁的日军，每天都对运输线进行密集轰炸。桂南属喀斯特地貌，锥山立水，河网密布，道路曲折。碍于此种地形，日机白天出没，夜晚遁形，运输队便在夜间启行。但战事日紧，运输任务空前繁重，白天也必须抢运。一次，日本飞机直追车队，好在桂西南石山密集，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山洞，机工们早把路线上能够提供隐蔽的山洞摸清楚了，邝振声带领大家转进一个天然山洞躲避，飞机差点撞上山壁，愤恨地丢下几个炸弹飞走了。炸弹在山洞前爆炸，山洞中发出巨大的回音，几乎要把耳膜震破。

在安南边界，张着一块巨大的白布，上面用英文写着“安南地界”，日本飞机看到白布，恐发生误炸，就折头，机工经常利用这块白布与敌机周旋。一次邝振声刚刚运载物资出安南，听到敌机飞来的声音，连忙掉头往回开，只听身后一阵追一阵的扫射声，邝振声加足马力冲过白布，敌机只得升到高空，盘旋一圈往回飞走了。

1941年，邝振声编入第10大队156中队。156中队是清一色的华侨，中队长林君凯，副中队长白清泉。此时，长沙告急，156中队奉命到湖南转运晨溪兵工厂物资至四川东溪，穿梭于战场近一年，兵工厂才全部搬迁完。此时，邝振声又加入西南运输处中印大队服务滇缅公路，开赴腊戍。中印大队大队长是印籍华侨王亚能。他母亲为印度人，父亲是南洋华侨，父亲死后，

母亲返回印度，王亚能被马来西亚华侨陈家庆收养，待之若己出。陈嘉庚号召南洋机工回国服务时，王亚能为报生父与养父之恩，报名回国，曾因国籍受阻，得到陈嘉庚特批，并特地致函西南运输处言明情况：“印籍王亚能，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自幼即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故此次亦愿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

在桂西、湘南，究竟有多少南侨机工死于战场，像中国千万死于正面战场的士兵一样，横尸荒野。在那样一种仓促起应，混乱不堪，且多以溃败为终局的战争中是没有任何记录的。下面一份档案，侥幸存入西南运输处后沉淀于云南省档案馆，它像一枚海相沉积的贝壳，能使你从岁月洗磨中依稀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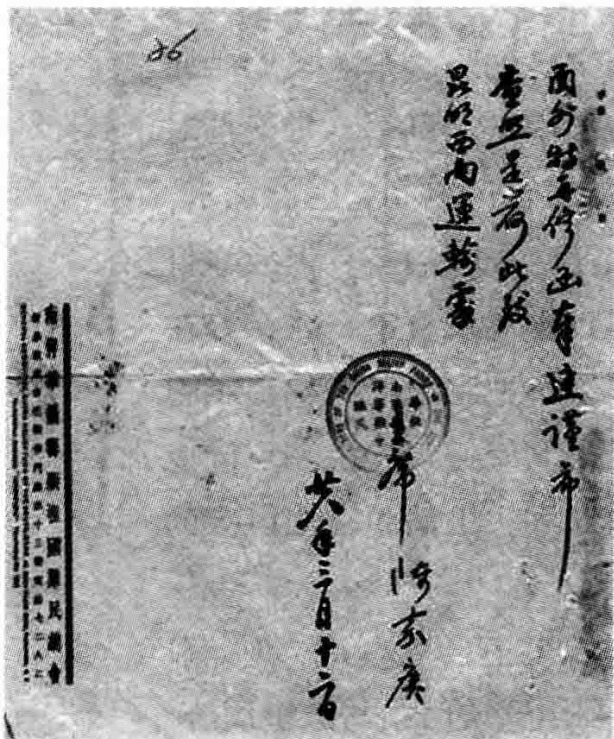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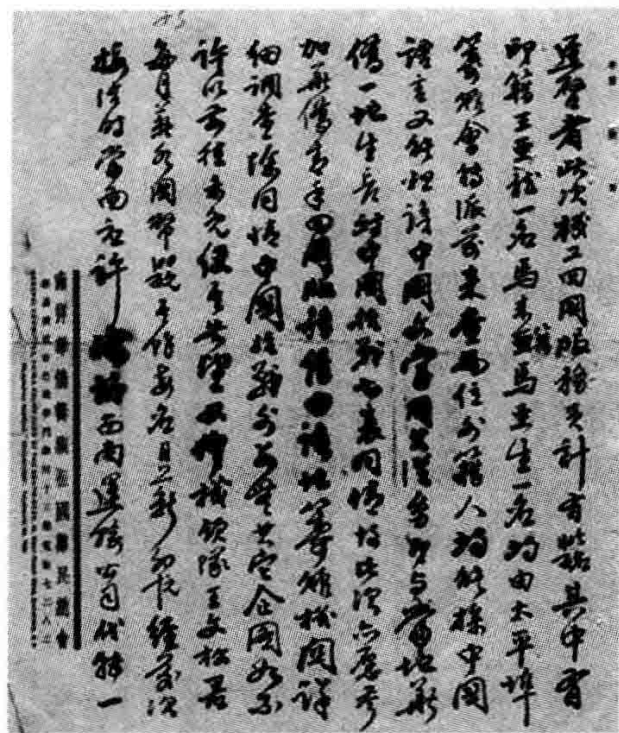
病故机工符晟之兄符轩昂致陈文松函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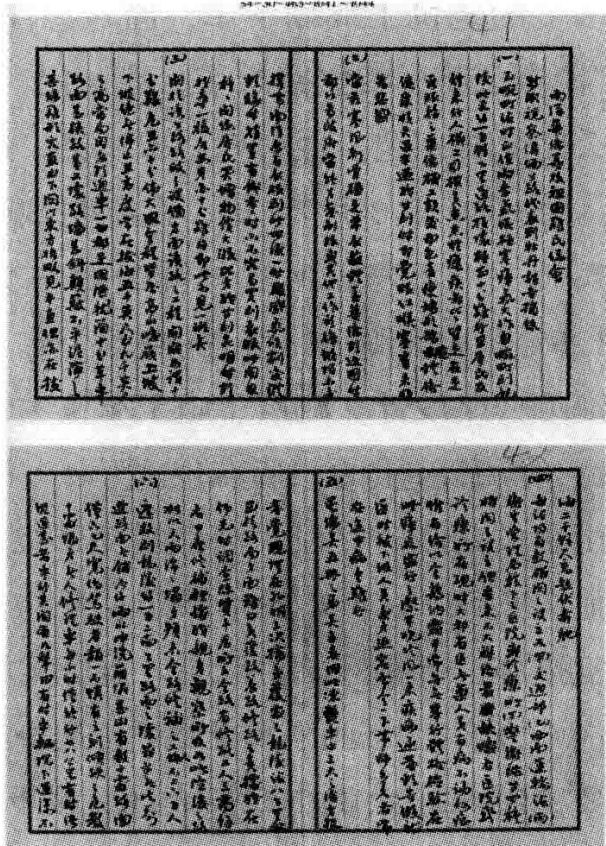
（前略）他日有缘……找寻我的三弟，于丘草之中。呜！国土未复，三弟已为牺牲，痛恨何穷！

原来，符轩昂先生在三个月中迭次所寄书信及汇款，均不得回复，后经辗转信息略知“三弟”符晟已病故下关，故复次来函寻讯。

幸在半年之后，即1941年3月12日，得到陈松年确讯：“符晟……抵滇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1大队第31中队当驾驶兵。一向勤奋，中经奉调广西服务。南宁失守，再归……原



陈嘉庚为印籍王亚能、马来西亚籍马亚生参加机工服务团致西南运输总经理处涵（1939年3月12日）



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
报告摘录（1939年9月8日）

职，途中奔驰，风雨侵袭……直至5月间病殁于下关。”

也就是说，符晟是奉命奔赴前线的南侨运输兵一员，在南宁失守、战事溃败之后，仍奋力归队，整整三个月，他没有一刻停歇地奔驰在战线上，直至倒下，病殁——他是活活累死的！是战争无形之洞穿！

仅仅由于他的二兄苦苦查询，才有了这一纸噩耗，那么，更多的机工呢？那些直接死于炮火、身首分离的机工呢？也许符晟的终结是前线机工最具代表性的遭际。

3

滇缅公路，她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她，活在每一个南侨机工的生命中。他们曾用生，去咬合她每一处临界死亡的急弯、陡坡、悬崖、深谷，这

像一场用生命做注的苦恋，最终，她与他们融为一体，从“死亡之路”化为“生之路”。

2000年，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当到达惠通桥附近，几位八十多岁的老机工蹒跚下车，面对怒江水老泪横流，他们对着山、对着水喊道：“滇缅公路，我们回来了，战友们，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山水呼应，滇缅公路曼舞相迎，生与死，魂与灵，这是他们的归处。

1938年8月31日，在昆明城西，这里有一座翠屏似的小山，是滇西自碧鸡关而下与城区黑林铺公郊的交汇点，也是滇缅公路“零”千米处，即1153千米滇缅公路全程的起始点。这天，国民政府要员，云南省军政主官，滇缅公路设计、测绘、施工单位主管，中外记者及1000多市民、学生在这个路口举行隆重的“通车仪式”——仅仅九个月，这条国际公路宣布在滇西群山中“刻画”完成，消息震动了世界。甚至记者们将其比喻为“中国的又一血肉长城”。日本侵华梦想似乎将被这一奇迹穿破，仅仅一个月后，作为报复措施，日军开始对昆明、重庆实施不间断轰炸。

九个月抢通的滇缅公路，是一条等外公路，在下关至畹町的547千米中，要穿越六座大山、五条大江，横断山自北向南贯通，高山深谷，江流奔泻。横跨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的惠通桥、功果桥、金涂桥“天堑通途”，凌空孤悬。从谷底至山巅，山巅再至谷底，落差常在2000米以上，坡陡弯急；3000多米的最高处天子庙坡触手及天，红岩、定西岭、级山坡、羊老哨等极险路段危悬于绝壁之上，粗略统计，这些路段在筑路时就牺牲民工3000人以上。

由于地质情况极其复杂，从正式运营开始，滇缅公路就是边通车边抢修，危险路段不停地稳固路基、拓宽路面。按中国公路当时的标准，山区公路坡度最大值为9%，但滇缅公路整体坡度竟达14%，最高达20%，有的路段5千米内的沉降达700余米。通车当月，滇西雨季尚有余威，降雨如悬瀑，护坡顿成纵壑，路面为冲沟切割垮塌，常一日三毁。常年雨季为6月至10月，一年两分，所谓“雨旱分明”，旱天道路为烈日炙烤，泥尘厚积，而雨季来临，道路在重车的反复碾压下坑坑洼洼，瞬成泥淖，到处是可以陷车的深坑，

大小塌方随处可遇。天稍晴，太阳一晒，又成了“搓板路”，颠簸难行。其损毁程度，相当于在滇缅公路上要覆盖无数次的“滇缅公路”！

如此路况，对车辆也是极限考验。1935—1938年间，美制轻型卡车，对滇缅公路只有最低限度的适应能力，由于动力有限，在通常会遇到的10千米以上长坡行驶中，只能一档行进，下坡漫长，依赖水冷扎片的水箱则如沸锅，往往不得已停机等待自然冷却或寻觅“补水”。而并不鲜见的则是发动机烧毁、刹片烧坏、机械失灵，其结果自然是车毁人亡。在现存档案只有寥寥可数的南侨机工“牺牲”名单，其简单记录统为“覆车”二字，完全没有附带的事后分析，乃至机械事故应有的研判！

何故有这样多的南侨机工在上路之初死于“车覆”？予人印象似乎是“不慎”所至。管理当局竟然无视起码要素，草率勾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冤案”？

在通车3个月后，即1938年12月，美国驻华武官詹姆斯·M. 麦克休，似乎为揭开“滇缅公路现状”这个谜题，做了一次“探险”考察，他亲自驾驶一辆1935年产的福特V—8轿车走完滇缅公路全程，竟然用时10天。他在报告中宣称：由于这条路的绝大部分路段是由碎石和片石修筑的，“就像是一条在一座砂糖山的山坡上挖出的一条路，路基不断地融化、坍塌”。虽然他的形容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个只制作成微缩胶片而从未公开发表的“报告”真正耸人听闻的是“滇缅公路官僚痼疾”——这也许才是作为他的“个人信函”被封存的根本原因。

但情况还在延续，甚至恶化。

第四章

机工生活：“可胜感哉！”

1

关于滇缅公路路况、路政和机工工作状态的史料十分匮乏，由于上述情况无丝毫应对、改善，工作条件恶劣和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队的苛律与腐败，有个别机工逃回南洋，备述在国内的不堪境遇，引起机工家属和部分侨众的不安。陈嘉庚遂派巡视员刘牡丹于1939年8月前往考察滇缅公路运输状况和机工生活，《南洋商报》记者张楚琨、陈戈丁随行。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余闻悉滇缅公路办理及待遇司机不善事，难免寝食不安，乃举派代表由仰光入口往昆明，沿滇缅路视察。且所传不虚，或由路南开浚未暇设备，或陷于经济困陋就简。若限于经济，南侨总会可以代筹。

一个月后，刘牡丹一行考察归来。向南侨总会递交了考察报告，报告中详述了滇缅公路运输的各种问题和机工的悲惨处境，南侨总会代表南洋侨众迅速对问题进行研讨，几经斟酌，提出了十分具有建设性的《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的建议书》，九月末即呈送西南运输处，请其速参考并改善相关问题，以使“千钧一线”之战时西南运输能提高效能、增强运力。但西南运输处和重庆当局的反应却十分冷淡，陈嘉庚备感无奈忧愤。《南侨回忆录》写道：

迨至昆明急向龚（学遂）主任提议，将余计划条件呈交，请其赞同从速兴工，并交涉改善他事，该主任答伊无权主张，待备文往重庆请命。代表不能久待归来，余函电昆明均未得确实消息，并电



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

重庆军事委员会，告以滇缅路车站设备不周、办理不善，请速改妥，虽屡蒙复电嘉奖，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1】}

《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报告》与《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的建议书》是研究滇缅公路与南侨机工的重要史料，如两相对照，我们或可得以把握：唯一战时国际运输补给线——滇缅公路与主要承担运输职责的南侨机工的历史真相。引录如下：

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摘录

（1939年9月8日）^{【2】}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特派视察滇缅公路代表刘牡丹报告摘录

（一）至畹町站时，正值雨季，气候极寒，瘴气大作。自畹町至龙陵，此段约一百公里，道路损害极甚，十分难行，且居民及往来行人机工司机员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段服务之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遇职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

（二）当兹寒风刺骨犹是单衣蔽体，盖华侨请返国时都以为政府当能另发制服和其他工作衫裤，故今未多带南洋原有衣服。到此

【1】陈嘉庚：引自《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2】引自《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报告》《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205页。

地后，一时骤感气候巨变，纵顷临时购置，有钱者一时亦不容易买到衣服。此间及种种关系居民突增物价大涨，比方职等到昆明时顷找寻一旅店安身亦十分难得。即此可见一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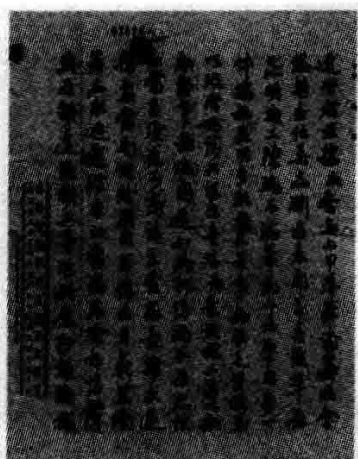
（三）关于该公路路政之设备方面，该路之工程开阙十分艰危，且亦十分伟大，因全程皆属高山峻岭，上坡下坡绝无停止，且高度常在海拔五千英尺至九千英尺之高，当局因急顷通车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十分草率，路边甚狭，路基又坏，路墙甚斜，颠簸不平，泥泞之甚，殊难形容，直至下关以东，方始略见平直，但亦在海拔二千余尺高起伏奔驰。

（四）每站均有数机关设立，如（甲）交通部（乙）西南运输站（丙）卫生管理局辖下之医院或诊疗所（丁）警卫队等四种机关之设立，但看来不大联络，最感缺憾者，医院和诊疗所在现时大都有医无药，人员有病，不论何症，唯有给予金鸡纳霜。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以来，疾病遂发，顷告假就医时被下级人员多方延宕，命令一下，带病出差者，常在途中病重难行。

（五）星侨吴再兴之弟吴再春因此冻毙车中，三天之后方始发觉。现埋在孔明三次擒孟获处之龙陵站八公里处。至于路局方面虽曰负护路养路修路之责，据职在仰光时调查，陈质平君所云，全路有修路工人三万余名日夜修补，但据职亲身观察所及，如此险峻之路，加以大雨绵绵，塌方频来，全路修补之工人不上六百人。

（六）遮放到龙陵约一百二十四公里，路面之坏，几乎无法前进，路面无铺石子，雨水冲洗，崩塌甚凶，有数十处路面仅六七尺宽，倘驾驶者稍一不慎，有立刻倾跌之危，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七八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有如犁田，有时车辆沉下过深，不能前进，得待救济车救起方能继续开进。倘遇两车相遇，因在路面最狭处无法让过者，必待一方慢慢后退，方得让过，常需费时数小时之久，或静置一二日尚不能解决者亦常有之，因此，每车军火在目前雨季时候，由遮放到昆明有延至一月方能运到者。

（七）此路之最困难点在于山峰太高，路壁太斜，随修随塌，如顷



陈嘉庚为机工生活苦寒无衣以致潜逃事致陈质平函（1939年6月3日）

根本改修一时大非易事，如不根本改修，机工穿行此段殊多危险，山峰之高处，在惠通桥一段（即由龙陵至保山之中间，海拔九千余尺），其他如保山以西，沿途均在五六千尺，高山奔驰，上坡下坡并无停止。上坡翻完又告下坡（以前日私逃之林某所云，沿途只要三小时高山者，绝非事实），汽车在此路穿行真似入雾穿云。在山上可以俯瞰半山腰祥云机场练习飞机之飞行，危崖峭壁，单身行走尚且战栗。

（八）此路苟非华侨机工之熟练技术，运输殊成问题，滇缅公路工程之艰险及其设备状况大体如此。在本会未派员前来视察之前，所拟定之计划中如建筑货栈及医院似可不必要，因全路已建立货栈医院数处。

（九）遮放居民稀少，食物缺乏，物价昂贵，气候甚冷，疾病流行，跳蚤甚盛，机工均不顷卧宿舍，宁愿在车中露宿。盖恐跳蚤之纷搅耳。由遮放到芒市四十九公里，此段尤为难行。

廿八年九月八日即

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的建议书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1】}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对西南运输总

【1】《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结构建议书》，引自《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209页。

处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建议书

本总会在本年春初承昆明西南运输总处招募机工回国服务，数月之间先后遣发越三千人，近迭承各方报告，当局对运输设备及机工待遇未尽完善诸待改进。本总会以该路运输关于抗战大，而回国机工原多海外热血青年激于爱国大义弃职业舍妻子不辞为国牺牲，安忍令其颠连无告？因特派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前往实地视察，该员由仰光入已抵昆明，费时一月沿途考察深觉该路办理状况确有改进必要。经在昆明西南运输总处向吴副主任琢之，张训、陈组长炎元面提改进意见，并以书面留交。吴张二君表示全部接受照行办理。该员回报经过情况如此，合将所提改进各点由本总会正式建议于运输当局冀能督促所属切实改进。此建议仍分为“运输设备”“机工待遇”两部分谨为列述如次：

（甲）运输设备部分

（一）应加派司机

滇缅全路计长九百七十四公里。各段设站分司接运。每站距离有长至二百零七公里者。全路多高山峻岭崎岖难行，路面新阙敷设未固，且属偏鄙（僻）之地，气候恶劣山岚瘴气易生疾病。现查每架卡车只用司机一人苟有不测，则全车弃置道左，无人过问危险孰甚，建议每车加派司机一人，逢途中发生意外以互相照应。

（二）应发检修车器具

查各卡车于购入时均附有修车器具一副，因当局恐被机工遗失全数截收不发。故车行无随修器具，半途抛锚无法前进，且在路面狭窄之处更阻后至之车，终日坐困山野以待救济车来临，而救济车又未经常巡视，失时废事莫此为甚。建议当着令车务稽查组于各车派出时发给全副修具，万万不可与车分离，返站则照额收回，未出之前，更宜检验车身机件有无健全，如是，则中途自免机件损坏之虞，且有随修随行之便。

（三）应派救济车经常川走巡视

现例，救济车停放站中，必于获得出事报告后始行派出。但中途出事之车传递报告极不容易。有枯候数日忍冻受寒方得援应者。以于机工体魄健康大有妨害。建议各站救济车应经常川行巡视如遇出事汽车俾便亟行修复。

（四）应派养车工役

查各站对于卡车概未雇佣洗涤工役。全路千余架新车使用仅仅数月车身车翼即已剥落不堪，望之如久年陈废之物。建议各站须另雇养车工役数人，每车临站应经常洗涤擦净借以保护车身之新鲜容貌免受耗损。

（五）其他

此外如各站冗杂人员宜加裁汰。全线七天路程而往往中途停顿，经月始达，晚间卡车不入宿站，机件易致损坏。各点皆宜设此改良。又华侨机工队之队长、队附（副）各职应统行选拔华侨充任，俾其言语相通气质相近情感融洽，工作便利。此乃求其臂指相使之效，非欲使其另成一部落也。

（乙）机工待遇部分

（一）衣

查由南洋募回之全路机工除第一批八十名及其后各批修机二百余名曾各发给工作衣一套外自第一批以下所有司机二千余名至今概不发给，且已发给者亦仅工作服一套而已，滇缅公路在夏季亦寒风刺骨不可当，致病机工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未病者亦面黄肌瘦憔悴不堪，状甚可怜。建议在昆明训练所中者每人应发给制服两套，出差工作服务者加发工作衣及御寒卫生衣或棉衣等类。俾不致寒冻为度。

（二）食

滇缅公路龙陵以西一带全属不毛之地人烟稀少食物缺乏。机工到站惟艰。其他各站因居民对机工之异视，高提物价，购买亦甚不便，建议应由各站设立合作社以司膳食供应，例如由甲站出发若干

机工将至乙站，则乙站须于事前准备膳食，机工抵时给予就食。自免迁延时间许多不便。该路如芒市保山等站原有合作社者设备未周亦宜改善。

（三）宿

查各站机工宿舍设床板者殊少。更无床席，大都睡卧地下，藉草为茵，土气潮湿，秽恶刺鼻，跳蚤木虱，遍地皆是。机工昼时长途驱驰工作疲劳晚间宜得适当之休憩，乃因宿舍不洁未敢入寝，相率外就来车中露宿，中宵风雨，感冒致病，身体健康无法保证。建议每站宿舍应加设床帐床板，另置专役以司宿舍打扫而除蚤虱之患。

（四）医药

查各站虽设有诊疗所或问诊处医院等，惟药料奇缺，大有有医无药之慨，机工无论何病经常只有金鸡纳霜一药或竟全无者，万病一药，何以能济？建议各诊疗所或医院等应即多方购备药物以资治疗之便。

（五）教育与训练

查各站多因陋就简，绝无书报置备。南洋回去机工多为热情青年对国家抗战深切注意，自到各站服务，因无书报阅读莫从获知抗战情形及国际大势，因之深感苦闷。工作之余难免趋入歧途，如酗酒打架赌博转入其他不正当消遣遂时有所闻。在昆明训练所中所施军事训练及惩戒采用旧式笞刑各办法。华侨机工生长海外习俗殊致尤觉痛苦。彼等回国初意全欲以驾驶技术贡献祖国，未尝预计及此，乃一身入国门，所有遭遇与其理想全非！遂不禁废然兴叹！意志薄弱者乃潜逃矣！建议各站应设置阅报室逐日由昆明递送报章杂志或各站张贴临时壁报遇有重要新闻则用播音机传递。至昆明训练所应军训形式注重精神教育，主管长官采用人格感化不宜偏重威令行事。如是，则机工生活行动可减免越轨。军事训练自更昌收实效。

（六）机工通讯问题



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报告摘录
(1939年9月8日)

机工之家属戚友，多在南洋。其回国后情形如何，当为彼等家属戚友关注。查有许多机工对南洋家属来往通讯恒四五月尚未递到，俱在南洋家属稍丰胆者寄往昆明银信，昆明机工亦绝无接到。更有数位机工与本总会刘代表有交谊连寄数次挂号信，刘代表亦始终未接。似此内外隔绝，音响沉寂，必非无因。建议应由各站设立递信箱分集国内昆明与仰光腊戍等地转寄，而主管长对机工信件亦不宜有所偏忽致有中途遗失之弊。

以上各节均为刘代表在实地视察时认为目前亟应改进者。我政府以短促时间关阙此高山峻岭长途崎岖之公路，欧美列邦莫不致赞叹称为伟绩。窃以为路之实际精神全在于运输。运输之效率则在乎主管人员有无办事精神与实际经验，若管班失职虽有老练机工亦无法效命。甚至寒病伤生如置于死地，然现际，华侨机工都已闻风战栗，无人敢往。若不切实及早补救则此路军运必大阻碍，盖此险峻之路殊非国内新训学员可胜驾驶之任也。事关抗战运输深盼主管当局迅即予以实际改进。本总会以荷负统筹海外服务而回国机工又为受托征募职责所关，虽每缄默率直陈词，罔迂回讳，惟贤者谅之。

中华民国廿八年九月廿四日

陈嘉庚致陈质平函请发刘牡丹视察滇

缅公路建议书

敬启者兹寄上本会代表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建议书九份请烦台瑞代为发送 贵路各处长各站长各一份藉供浏览相应函请查照旋行为荷 此致西南运输公司

刘质平 先生

计附建议书九份

主席 陈嘉庚

廿八年九月廿七日

似乎石沉大海的《滇缅公路建议书》由于“事关重大”还是得到了蒋介石的回应，蒋介石发给西南运输处的两封电报措辞严厉，似有雷厉风行责成办理之势，然而，直到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两次考察滇缅公路时，半年前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路政反而更加腐坏，机工境遇更加难以忍受。南侨总会为改善机工生活而在1939年底送达昆明的一批物资，也因重重截留而未能到达机工手中（包括奎宁、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等）。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唯有频频以“可胜叹哉！可胜叹哉！”结语无言。

蒋中正改善机工待遇委号侍秘渝电（抄）（一九三九年）^{【1】}

该路关系抗战运输，乃驰援若此，全为管理失当，非可诿。……为雨季特殊关系，若不迅行改善，机工病死相继，继后无往者。……自抗战后，华侨无限兴奋，万无为此路污点所累……据此，察华侨机工一片热诚，回国工作关系抗战交通，及侨胞对祖国之观感，今甚重大。据电前情，滇缅公路之管理实太腐败……交公路交通指挥部切实调整改进。

【1】《蒋中正改善机工待遇委号侍秘渝电（抄）》（一九三九年），引自《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蒋中正改善滇缅运输及机工待遇宥侍秘渝电（抄）（一九三九年）^{【1】}

……据刘代表与新闻记者称西南交通管理无方，人多事废，积弊已深，若非根本改革，恐难收效，尤其隔绝机工音讯……南洋有数位家属寄出银信全未收到，当局处心舞弊，及此可知……西南运输如此管理无方，实在堪痛叹……关于华侨家属汇出银信全未收到一节，必须严格彻查究竟，勿将舞弊人员加重严惩，不得稍有瞻徇。……

由蒋介石两函过问（也惊动了蒋夫人），应当说前所未有的，足见蒋本人的重视。前一函斥“滇缅公路管理实太腐败”——“太腐败”实在是国民政府的全体衣冠貌相，只要一出场，世人皆能指认，说说没什么痛痒。第二函，才是蒋所忧虑的，即“侨汇”被侵吞！陈嘉庚曾在南洋发表若干演说，也在与国民政府官方过往中，不断提及“侨汇”问题，即3200名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加之不断回国者超过这个数字），因务工工资的微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远在南洋的眷属亲友均会以汇款接济在国子弟。即使仅一半人不断接到汇款，那么，对于国内（以国币兑出）将是一大笔可观的外汇，对抗战将大大增益。远在“建国”（辛亥革命）之前，南洋华侨以大量筹款、外汇支持革命，蒋不会不知道内中分量，况重庆政府依赖外援已成固癖，还捉襟见肘呢？

但蒋介石声称要“彻查”“加重严惩”的人是谁呢？

宋子良（宋子文、宋美龄之弟），时任西南运输处主任，总揽一切，尚要追责，首当其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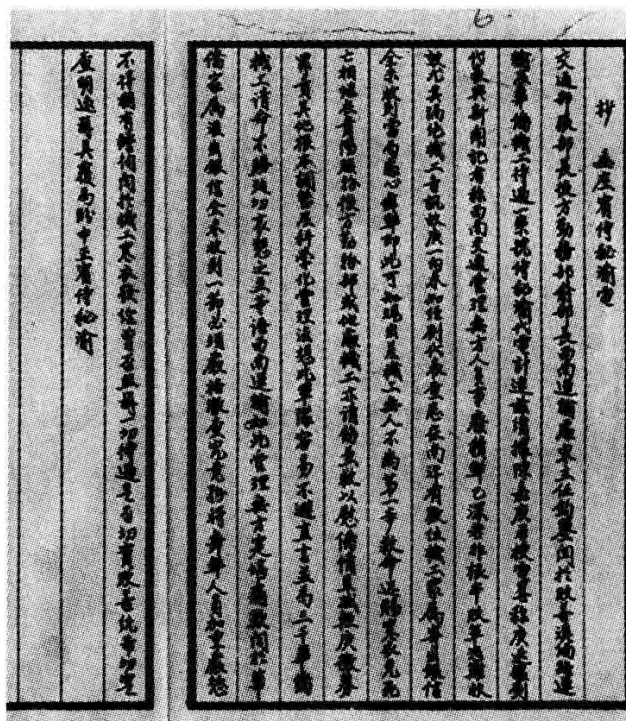
宋子良的回应出人意料地迅捷，10月（档案抄件无日），宋以“代电”形式回复陈嘉庚，对刘牡丹沿途考察报告情况及“建议”各节统统推倒、

【1】《蒋中正改善滇缅运输及机工待遇宥侍秘渝电（抄）》（一九三九年），引自《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一一驳回。称“显与事实不符”，按他的描述“沿途共设……12 管理站每日行车照规定行程行驶时间亦不超过 8 小时，各汽车大队部驻地设有俱乐部以调剂员司精神……抗战及国内外要闻由各队政训员逐日在壁报内公布”，已然乐土天堂！关于机工车辆无配置检修工具、常于僻野苦守待援，“尤非事实”。至于南侨机工国外汇款查收无处一事，宋子良的辩言令人啼笑皆非，他的证据是“侨胞家属汇出银信”是为“各级队长恐其外出滥用曾有暂收代为保管”而产生之“误会”。他要求，若要彻查，“拟请将收款人姓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汇款数目查明并向邮局查领款人收信人所盖图章详细示知以凭彻究”。不说所谓“各级队长”代收代管银钱防止滥用于事于情不通，单一个“代管”究竟是自愿还是强制？不是大有侵权和贪污的嫌疑？宋子良以主管官僚强势摆出“公堂对簿”的架势，而他的结论是“少数意志薄弱心理动摇分子特乘刘代表来华视察之际故散布流言，刘代表未加详察俱信为实良可惋惜”。

作为宋子良的佐证，其后有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吴琢之、龚子遂二人转蒋夫人的二函、称已“逐项呈复”，事由皆因“少数意志薄弱之机工过甚其词即信以为实”——如出一辙！

蒋宋美龄在 11 月 13 日致宋子良函中即



蒋中正改善滇缅运输及机工待遇
宥待秘渝电（抄）（1939 年）

刻回应：大有指斥之意，称南侨机工虽“忠诚贡献，遂亦忘其避忌，然事实胜于雄辩。三千机工耳目昭昭亦不能一手遮蔽也！”反观陈嘉庚上达《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的建议书》（下文简称《建议》），情辞隐忍，谦让守礼。而“夫人”之齿牙，则血口狂张，何曾“避忌”？按蒋、宋的行为习惯，在骂完之后，尚要体现优抚体恤，即特别提及“寒衣”问题“惟望俯赐”等语。

其实，宋子良在他“天堂”描述式的辩言中曾称：“机工服装已各发给工作服两套军毯二条现正赶制冬季服装计每人呢质军服一套布棉大衣一件”等等。

没有人知道这些“寒衣”在哪里？抑或仅仅停留在宋氏的文字里。此外无非两种可能，确有（哪怕是部分）分发，并无允诺的数目，或为人截留侵吞。

1940年1月1日，传来消息，南侨机工吴再春在驾车离开芒市进入龙陵路段时，机车故障脱队，又忽遇奇寒天气，吴再春不忍抛弃车辆及军用物资，昼夜蜷缩看守，因衣单不胜寒侵，竟然被活活冻死！

侨务委员会关于他的死亡并要求以烈士优抚的报告完全不隐讳其中致事因素：“查吴君特长驾驶汽车技术，在英属本有相当职业，因激于爱国热诚弃却优适生活毅然归来……此次由某处载运军品车至龙陵地方，机件忽生障碍，车上缺乏修理器具，又值大雨气候剧寒。彼时，吴君如为个人生命，本可徒步行至他处暂避，但因爱护公物不忍离开车辆卒致冻死。”

就连西南运输处拟的文字也不避讳其死亡原因是：“衣被单薄，体力弗胜……竟守候以待救济之至，卒以内伏寒湿、外感风侵遂至身殉。”

吴再春如若免死，仍有三途：弃车，所谓“龙陵地方”指滇缅公路管段，能遭遇高寒的，只有海拔2000米的腊勐垭口的南北坡面，这里至龙陵县城约30千米，至腊勐垭口则不足20千米，只要步行一日可达。第二，修理汽车持续前行，但“缺乏修理器具”；末了便是坚守待援，因为车上是军用物资抑或正是前方急需的枪支弹药，人在车在物资在，乃职责所系。他选择了后者！结果，衣单不胜严寒，等援车到达，他已经被冻死了。我们无法想

象，也无法还原最后的情景：在失去最后的热量时，人往往有一种嗜睡的假象，梦幻接踵而来，车窗为冰雪覆盖，他结满霜花的睫毛在扇动吗？他看见了什么，那槟城的椰树、暖海？还是队部前那株伞荫如盖的大青树？

宋子良等“驳斥”南洋筹赈会关于改善机工待遇，尤其是增发衣物、医药、修理工具等的《建议》，仅此惨烈的一例，不知当局有如何辩词？

事隔半年，即6月6日前后，蒋介石有了答复，“交通员工非常时期特恤办法其适用范围仅以在战区医院工作被敌伤害致死为限，该司机殉职情节即有不符似亦未便援引”为由，推至“原服务机关特予优恤”了事。

稍前，南侨机工第五队队长韩定华的一纸信函曾经霹雳筹赈会于次年即1940年1月9日转至西南运输处。这是一个普通机工的号寒之声：“弟等之寒衣一事……倘能恤不使弟等受此严寒之苦者，望就将寒衣惠下。若寒衣一时不便，可寄来每人国币一百元在此缝造。现今南宁已失，广西之国际路线被阻。弟等将来或要派往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运输，在那方面比之昆明、广西、贵阳一带更为严寒数倍。”注意，这是一个机工向南洋的求援，倘使如宋子良等承诺，何至机工面海号寒？

“事实胜于雄辩，三千机工耳目昭昭亦不能一手遮蔽也！”唯此一语，蒋宋美龄说对了。

而“缅甸西南运输公司”对韩队长的请求，则以“物件不敷分配”一语搪塞。

至此，陈嘉庚委派代表刘牡丹前往滇缅公路沿线考察，获悉南侨机工诸种艰难处境、生活困厄、疫病侵害、饥寒交迫、运输因管理败坏而迟滞等等关系滇缅公路成败要节，从而以“建言”上达，蒋中正及夫人频次复示，关涉宋子良责任的“公案”纠结数月后，竟如烟尘散去。

2

1938年8月31日全程通车的滇缅公路，是世界上里程最长、跨越地带最复杂，却唯一没有通过“试运行”就投入使用的国际战略公路。因为此时的中国，这个“血泵”的启动，每一分每一秒对挽救危厄都至关重要。

“抢运”！这个词语，最多见机工眼目，耿耿地纠结人心，没有哪一个机工不明白这是战争的动员令，而这个“命令”是他们在告别南洋时就以誓死决心认定的。

没有经过充分的自然沉降和构造稳定，是“路”就冲锋！这相似于，遣使南侨机工这支专业运输队伍充当“决死先锋”。于是，以奇险、多变、漫长而著称的滇缅公路，与机工纽结成一对“生死相搏”的关系。在机车驾驶这一行，习惯将刚刚开凿的道路称为“生路”，其含义明白，由于当时公路勘测技术设备的落后及多种原因，地质状况往往在公路启用后才显现它的复杂，甚至灾难性变化，而不仅仅是路基松软，弯急、坡陡的问题。“生路”意味着一切人为因素之外的莫测险象。在南洋只开过柏油公路的多数机工，尽管接受了短期训练，一开始仍难以适应如此艰险的路况。“初一翻车，十五到底”，在很多危险地段，尤其是“伴江”路段，稍一不慎，即车毁人亡，粉身碎骨，落入滔滔浊浪，连尸首也无法寻觅。机工们常常亲眼所见前后行车的战友一个小小差池便连车带人滚入万丈深谷，这种时候，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咬定眼泪，沿着战友未走完的路继续前进。他们会在回程的时候，采一把野花，放在战友殉难的地方，急劲的山风将野花瞬间旋入山谷，几点花瓣在空谷飘荡，将生与死系于微茫。

这个地点会因战友的死成为滇缅公路上无形的危险警示，避免后来人再次出险。机工们就是在这样一条“死亡走廊”上走出生路。没有确切的数据记录死于路险翻车的机工人数（西南运输处统计每年损失700辆以上的汽车），只有一个模糊的“每千米三人”说，1146千米究竟掩埋了多少忠骨，究竟有多少无名烈士归于山水的寂寞，究竟有多少山花因骨血而烂漫？他们，

和筑路死亡的民夫同化为路魂，千里无坟冢，但千里之路，处处有阴灵护卫，冥冥中有无数双流萤星辰般的眼睛永远注视着来路与去路。

符气簪，原籍海南文昌，肄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后在新加坡育英中学任教。他随第四批回国抗日服务团归国，任服务团秘书。滇缅公路服务期间任第13大队分队长。在队友们心中，这个“投笔从戎”的年轻人文静豁达、乐于助人。1939年11月的一天，他从畹町出发，运送军用物资至下关，驶入永平县境内，这里是著名的“沧浪古道”，汉代古道栈桥，在澜沧江绝壁间时隐时现，滇缅公路不过是将那2000年前刻画的古道稍稍添写得更加明显一点而已，车窗之外，不可逼睨，下临万仞，江水浊浪排空，令人目眩。那千万漩涡，大有眷恋牺牲、将你诱惑、一口吸入的魅态。而在“生路”开凿时，急弯断头处往往缺少“挡墙”和警示标志，路边丛生的矮灌，遮挡视线，埋藏凶险。在一处下坡急弯处，他的汽车冲出公路，滚下几百米的山崖，符气簪当场身亡。此时，距离他踏上祖国的国土还不到半年。

永平县百姓深深惋惜这位“出师身死”的年轻人，1940年“五九”国耻纪念日，云南永平县筹赈会、各侨团侨胞和当地百姓，为符气簪烈士举行追悼会。符气簪73岁高龄的老父亲符振弟从南洋赶到现场致辞。直到后来，参加过追悼会的人都还记得当年的情形，符老须发苍苍，痛不能已：“余生二子，俱为国牺牲，老夫残生无靠，民族危在旦夕，余深望各位侨胞以国家为重，精诚团结，誓将日寇逐出我神州，使我同胞永享太平自由。则余深慰也，不负白发送黑发也……”

机工林树容，海南文昌人。1940年夏天，一个燠热的傍晚，他刚完成任务，准备回下关，途经永平加油站，突然接到队部的一个特殊任务：去接运一位翻车殉难队友吴世光的尸体回队部。

吴世光？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久前会车时相遇还开过几句玩笑……

林树容与吴世光是同乡，他比自己年长十岁，两人一起编入第五批机工团回国。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吴世光的音容笑貌，又忽而想到：吴世光在海南家乡还有妻子儿女，他看过她们的照片……

他驱车来到出事地点：永平一千米处的陡崖。一位修路工亲眼所见汽车滚入悬崖，司机被抛出车外十数米，砸在岩石上，当场死亡。尽管乱石壁立，根本无下脚处，修路工仍不忍尸体暴露于天光之下，他奋力到达尸体处，用绳子绑牢，再回到公路上一点点往上吊，在吊运过程中，尸体又多处碰伤。当林树容看到躺在路边血污残破的尸体时，仅从面部依稀可见死者生前的轮廓。

“吴世光！”林树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着死者的脸喊出他的名字，明明知道他已经死了。泪水直流而下，滴落在战友血迹斑斑的衣襟上。他握了握他的手，继续说道：“好，我们走吧！”他拿出自己睡觉的毛毯，小心地将尸体裹好，不忍心再让死者受颠簸，他将他固定在副驾驶座上，安置稳妥，驱车上路，此时，天已经黑了。

刚开出几十千米，爬上海拔三千多米的一座高山，汽车抛锚了。刚才一阵忙乱，林树容忘记加水，此时水箱烫得冒烟，继续开下去，有汽缸爆裂的危险。可是在一面是绝壁，一面是深渊的路段，到哪里加水呢？三千米下，漾濞江在轻声呜咽。唯一的办法，只有停车等水箱自然冷却，可以坚持再开一段，然后再停车冷却，直到找到加水处。这一夜，势必停停走走，只有在深山中与身边的“鬼友”为伴了。凄清的月光洒满山谷，松涛声从远方一浪浪传来，又从车后逝去。不时传来猫头鹰凄厉的叫声。林树容从小怕黑怕鬼，有一阵他心头发毛，想到身边的尸体便毛骨悚然。可是，他很快后悔自己生出这样的念头：“战友是为国捐躯的，鬼是雄鬼，魂是忠魂，他会保佑我们的！”他看看月光下战友的脸，铅色，坚定，安宁，嘴角似乎还有笑意。死，不可捉摸，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让生者敬畏，它不仅不会毁败一个人，反而，成全了坚定者的坚定，无畏者的无畏。

年轻的林树容不再害怕了，死，对于每一个机工，可能都会是来不及思索的一瞬，生，大无畏的生，完全可以蔑视这样的结果。他觉得身边的战友并没有死，不会死。红色的月亮沉入河谷，河谷中蒸腾的热气在半山腰凝成云雾。满天星斗，夜色如此华丽。

他边流泪，边对着身边的战友大声说：“老兄，你看，倒霉事总是成双，

你知道前面多少千米才能加水吗？”

“今天的北斗星多大呀，和南洋的不一样，是吗？”

“这边的傣族女孩真漂亮，对吗？你说，是我们家乡的女孩好，还是这边的好？”

“你，你放心，等仗打完了，我就接你回海南……”他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光明，这，似乎足以逼退全部的黑与冷。他，曾经成为孤儿，他曾经只身漂流到南洋，他曾经上街卖花义捐，他曾经带领同伴们喊道：“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他曾经毫不迟疑地报名回国。他知道人间的悲凉与血沸腾的温度，但，今夜，生与死相守的长夜，他发现，生命的光华，不论生死，永不泯灭。

“我们机工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死不怕！”

“你死过了，活过了，你说，你不怕！”

……

他点上车灯，灯光如炬，熔烧着黑夜，他向前方开去。

直到下半夜，林树容才回到车队。第14大队为死者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会，按照西南运输处“就地安葬”的不成文规定，殉难者安葬于下关董家湾。战后，林树容曾去寻找吴世光的墓冢，可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全无痕迹，唯留下战友传递给他的心中的光明。

前文所述及以“男儿身”回国服务的“花木兰”李月美被分配到“红十字会”当司机。她在长达一年多的服务中从未暴露性别秘密。这个充满活力、胆大心细的“小伙子”着实招人喜爱，从前线抢救伤病员，到开着重卡运输医药、武器，“他”从来都争先踊跃。红十字会的同事都熟悉他，因为他有些“特别”，总是风风火火，却又少言寡语；单纯可爱，让人一望即知，却又不愿与人深交，难以接近。他的“神秘”更加增添了吸引力，年轻的护士都普遍对这个秀气的机工有好感。

1940年某日，她在滇缅公路翻车，身负重伤，脑部震荡。另一位南侨机

工海南籍杨维铨正好路过，他急忙施救，将“他”从压扁的驾驶室中拖出，又送往医院急救。由于伤势过重，医院要求留人照看，杨维铨获得队部批准后，留下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在救治过程中，医生发现“他”竟是女性，大家大受感动，都不忍戳破这个秘密。杨维铨贴身照料，也早已知情。他心中暗自敬佩这个了不起的机工战友，同时，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欣赏这个“高大”的姑娘。

虽然这个秘密已不宣而明，但李月美还是觉得应该向照料她的杨维铨正式“告知”。她把他叫到身边，很严肃地说：“我是女性，因为不让女司机报名回国，我隐瞒了性别，一直到现在，我认为女性有同等的权利报国，希望你不要报告队部，医院我也争取他们能保守秘密，因为，我还想当司机，我是个很好的司机，你能理解吗？”杨维铨觉得她的严肃有些好笑，又可爱，虽然他比眼前的这个姑娘还矮半个头，但他忽然觉得在自己广大的心胸中她只是一只体型稍大的小鸟……

他也假装严肃地说：“我能理解，我向你保证，不报告队部。”

“谢谢！我很感谢你抢救和照顾我，但我们之间不太方便，你还是回去吧，就向队部说，我已经可以生活自理了。”李月美说。

杨维铨迟疑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心中一个以前不曾察觉的地方被刺痛了：“……你……你现在还不能自如下地，我再照顾你几天，然后就走……”他，在等待着她拒绝，可是，她没有。

自小到大，除了受父母呵护，她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照顾，她就像一棵茁壮的树，每一片树叶都在阳光下，她总是希望能给别人遮风挡雨，过去的女伴们都有些依赖她。眼前这个个子不高、精壮有力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打动了她。其实，他早已知道自己是女性，可是他从未说破，从未表现出任何的不同，他依旧说话不多，依旧像对待战友那样对待自己。他在知道“花木兰”的底本时，仍然静静地陪伴和欣赏乔装的和真实的自己。他，让李月美想起了大海，她在苦苦坚守一个钢铁男儿的角色和岗位时，时常想起大海，她自小枕着波涛而眠，她的一个“孤独”游戏就是到海边逐浪，似乎只有海才能承载她的光与热。那么，他会是她的海吗？

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拒绝他的照顾。她觉得自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一开始她并不喜欢这样：她因为战争而攥得像铁拳一样的心，张开了，就像在寒冬中催破的梅花。他不在的时候，她找到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的脸，甚至有一次，拿一枚别针侧别着前额短短的头发，打量着自己。冰冻的河流隐约可听见破冰声和汨汨的水流声，它在流向春天。战争，永远不能冰封大地，只一记春雷，万物就将苏醒。

一个月之后，当他们手牵手出现在队部的时候，李月美一身姊妹装，她的身形健壮又不失婀娜，头发已稍稍留长，一双眼睛不再只是目光炯炯，而是流连有情，身旁的杨维铨精神抖擞，他是一棵不高的树，却引来了“大鸟”栖息。队友们啧啧赞叹、真心祝福。这是滇缅公路成就的爱情，它被传颂到今天。

此后，李月美继续在红十字会服务，她变身为“白衣天使”，经她救护的人都忘不了她有力而温柔的大手，她坚定而含情的目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曾亲赠她题写着“巾帼英雄”的红绸锦旗。

更多被记录为“覆车”而殒命的南侨机工，没有遇难细节记载，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位于德宏芒市与遮放之间的三台山，全长30余千米，最高海拔2100米，山脉



李月美夫妻

为多级南北纵向，东西为河谷丛林，是卡在芒市、遮放两坝中突然隆起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滇缅公路非经此地不可延伸，为避开无数纵谷，公路全部在山脊上筑成，全长仅31千米（现为29.2千米），却是著名的艰险路段。1941年7月，即在抢运抗战物资整整两年后，因“覆车”事故的多发和日机轰炸造成的阻断，顾文彬（因档案史料未记载其身份，据笔者考证顾文彬应为西南运输处特派技术考察人员）等工程技术人员奉命对滇缅公路，惠通、功果两桥进行全程考察。发现敌机轰炸外竟然有“地震毁坏”的因素，这无疑又增添一层危险，他们在芒市集体会商后，提出急需改造的措施，包括敷设从畹町到芒市，再至龙陵的柏油路面，并特别提出“三台山的改线”问题。这显然并不符合战事紧急的实际情况。最具毁灭性的恰恰是“工人死亡疾病逃奔者均在开工时原有工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原因竟然是路局发包的承包商开费太低，以致路工“每日工资不能维持生活”！^{【1】}于是一切改进终成泡影——这还是两年后的状况——南侨机工似乎自始直面这样毫无希冀的局面，但车轮却一往无前！

是年6月，机工车队进入三台山最危险的路段，即“914”千米处“U”形大急弯。这是由短促的30度下坡在折冲处突然又30度仰上的奇险路段。一旦冲出路面，下临200米的深箐，绝无生还可能！360°的回旋如同一个封闭的死亡圆周！这里却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地名——孔明炮台洼。相传孔明南征曾在此架设炮台，但可凭史载却是清军扼守的隘口。机工车辆经由此处极为谨慎，但一天傍晚，一台后勤车在下坡时突然刹车失控，径直冲出路面，在将近三十秒后，才听到了爆炸声。山洼里，浓荫深处甚至看不到火光，唯有青烟和惊飞的白鹇鸟，猎猎翼声凄厉地掠过头顶，在黛色的山影画出一个圈又一个圈。机工们流泪了，后续车辆止行，他们下车，站在路沿上，足足有几分钟，没有声响。不知谁仰头长叹：“鸦雀也要回家啊！”这像是一声召唤，十来个机工用绳子牵着，从崖头下到洼底，收拾到两名战友不忍目睹的残骸，将他们葬在崖头一块斜坡上。暮色里，车队全部掀亮车灯，齐鸣长号

【1】《顾文彬视察功果、惠通桥修复及柏油路面和塌方报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引自《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

致哀，又前行。

2011年6月，即70年后，由马来西亚隆雪中华大会堂主推，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和柔佛和同乡会青年团联合举办，“四轮驱动重走南侨机工抗日滇缅公路”活动启动——这是一次继往开来、衔接史脉、英勇而富于创想的活动。20余台越野车，80余人，历时36天，行程万里，重走滇缅公路全程。7月13日到达德宏州首府芒市。留居遮放的南侨机工欧文华（已故）之子欧云林一路自愿引导，离开遮放镇芒市河喇叭状开放的河口，可见大山横亘，这便是三台山了，在坝托寨路口，舍弃了高速路，这个一身傣族装束的青年几乎不由分说地将他们导入了一条近似废弃、荒草夹道、陡然升沉、坑洼不平的山路。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三台山了！29.2千米，山脊梁上的崎岖狭窄路面，是中国国内作为“纪念地—战斗遗址”唯一保留原态的非残断的“滇缅公路”路段。依稀可辨的柏油呈现着斑驳的黑色，龟裂的纹理叙说着当年故事。在原“914”千米碑前，欧云林呼喊停车，这就是著名的“炮台洼”了，U形大急弯在70年后，经无数次的“养护”，路面沉降了大约15度，不及当年的一半，但山树依然。左下方4千米处是帮滇寨，而U形的底部则正对林木深暗，森森郁郁的深箐，70年前，两名机工正是在这里覆车遇难的，他们的坟墓没有原形，弱草哀哀。这个团体听着机工第二代叙说当年的情景，“阿爸要我永远记得这个地方……”死难机工中只有一个人留下“飞机师”的雅号，“他车技太好了，常常行车如飞……也许任务急迫，他……他太急了”。没有细节，没有姓名。但那粗略的诠释是道出了精神的——这个寂寞的山隅哽咽了，团体中呜咽声骤起，洒泪如雨。是啊，急！急国难当头！急前线危厄！车轮为路梗塞，心却在飞，他要飞！他果真纵身一飞……

“万里四驱”将南洋——家乡的顾念之心安顿在这里，因为当年草草理就的坟头是远望南洋的。整理坟茔，覆上马来西亚国旗时，果有白鹇鸟在苍茫如幕的林野高山上空飞来……

70年后的祭奠者并不知道，“飞机师”继后的故事并没有完，他们是在书写一段寓言，与孔明洼不时隐现的灵异对话，秘而不宣！此后，在日军占领怒江以西，以三台山作为扼守两坝平川的要塞，驻军一个连队，在帮外、

拱别等海拔 2000 米的山地筑造永固工事、地下武库和密如蛛网的战壕时，不可思议的事件接踵发生，日军车辆每过“孔明洼”U 形大急弯，总有车辆随带军火径直冲下洼底，轰然爆炸起火，无可回挽！这里有一段魔咒，令侵略军魂飞魄散！于是，当地百姓将“孔明洼”易名为“翻车洼”，流传至今。

究竟有多少日军车辆在这里失控坠洼，没有确实的统计，但“翻车洼”底堆积的日军战车、机车竟成了一个历史堆积层。1942 年 7 月至 1944 年“滇西反攻”，敌后游击队曾在这里秘密收集各式武器。拱别、帮外景颇族用收集到的武器在芒市河边袭击洗澡的鬼子兵，甚至用日军“歪把子”机枪的枪管、散件改造、组装威力巨大的“火铳”来对抗日军，零星战斗从未停止。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三台山汉族、景颇族居民仍然从这个“露天仓库”里收集、挖掘日本军车的弹簧钢板，打制他们随身的佩刀、长刀——战利品的炫耀长达 30 年！驻守日军每遭惊悚，不得安宁，视三台山为魔域。1944 年中国军队“反攻”光复龙陵，日军用飞机轰炸自己的阵地，以改变地下武库附近的地貌、山形。后来部分守军被歼，部分弃阵，最后一个逃散的鬼子被帮滇寨民围困，排枪击毙在“青树脚”。此地距离机工坟茔仅箭地，复仇枪声清晰可闻。

滇缅公路上的多数恶性事故都发生在雨天和雨季。滇西路段所经过的地区，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雨旱分明，每年“清明”后雨季陆续到来，至 7、8、9 月，到达高峰，旬日不绝，是为常态，届时，暴雨狂泼，周天雨鞭，山树悚然，譬如天漏，毫无晴明。这时，民间称为“龙吐水”的季节到了，即地表水上涌，而山岳、丘陵因“吸饱”了水，开始外吐，于是，天水、地水合股而来，山洪暴发了，所有山路瞬成悬河，更不用说像滇缅公路这样的人工建筑，被坡、挡墙被摧毁，道路一次塌方千万立方米极为寻常，有的路段，一次大塌方就使路重新“回归”了山体。1941 年 7 月，顾文彬一行奉命考察滇缅公路路况，尚在雨季之初，他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4、6、7 三总段（坍方）较为严重……一次塌方达三千公方（立方米）之多曾阻碍通车前后三天”，更为严重的是，敌机乘此监视气候，在暴雨之前加大轰炸频次，“功果旧桥东岸因前遭敌机轰炸受震，雨季时山上大块石头崩塌……三台山坍方较



南侨机工覆车殉难处：三台山炮台洼

为严重，已断绝通车多次，三台山至遮放长约二十千米路面损坏情形为全路最严重”^{【1】}。大自然以这种方式吞噬着滇缅公路，让人类的痕迹消弭于无形。但运输不能停，滇缅公路必须永远清晰地指向它的目标。机工从来没有因自然原因停止过工作，车辙复车辙，层层碾压，道路抢通了，继续前进，他们以这种方式从自然那里夺回一条清晰的滇缅公路。在战后缴获的日军情报中可以看到，滇缅公路从来都目标显著，旱季，尘土万丈，雨季，一条黄泥路轮廓清晰，在青黑的山体中蜿蜒如游龙，时腾时潜。

机工谢川周是 3200 名机工中年龄最小的，回国时仅 17 岁，他发明了一种雨季陷车自救的方法。在车厢里装两块厚木板，每当路面冲坏和陷入泥潭时，就把木板垫在上面，让车轮从木板上通过。这种方法后来被机工广泛使用，随车都带上木板。快速自救，保持了道路通畅，使运输任务不致延误。

【1】《顾文彬视察功果、惠通桥修复及柏油路面工程和坍方报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引自《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4 页。



殉难的两名南侨机工用石块堆垒的坟墓

机工周开定，是华侨先锋大队司机。一天深夜，他与两位同伴驱车从遮放赶往芒市运送军火，经由三台山路段，这时，雷暴雨来了，夹杂雷鸣电闪，仿佛投入蓝焰地狱，从坝托上山近二十千米（即前引路毁最严重地段），他已然没有退路，况随车要赶往芒市以应紧急公务的还有两个机工！他只想冲过泥水横流的三台山！刚开到允欠至拱别路段，忽然狂风大作，横扫而来的风几乎要将车掀翻，风中卷携的砂石敲击在车窗上噼啪作响。密密层层树林在风的威势下不时伏倒。周开定知道，雷暴威势不会减弱，他正在寻思如何选择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停车。忽然，漆黑的天幕上几条雪亮的闪电如惊龙现身，大地在一瞬间亮如白昼，一阵巨响把天地都崩裂了……周开定车边的一棵大榕树突然通体明亮，继而发出树体被撕裂的声音，它正被闪电击中……周开定还来不及反应，巨大的树身轰然劈下，正好砸在卡车的驾驶室上……闷雷滚滚，雨幕垂天……

没有人知道周开定是如何在最后一刻，回望自己已经完全变形的驾驶室，他无法动弹，一根刺入车

窗的树干，在他的颈下横着，以千钧之力压迫着他的胸腹，那黏黏糊糊的便是他的鲜血了，那么多的血！他也许有短暂的昏迷，在他惊醒时，似乎听到了左侧两个同伴的呻吟，有一秒，他庆幸他们还活着，只是他感到自己可以喘息的时刻不多了，他试了试，仅有左手小臂可以稍稍抬动。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用最后的力量，几乎折断臂膀，将血流如注的左手拧亮车前灯后，紧紧压在方向盘上，按响了喇叭，响亮的喇叭声直穿雨幕，直刺夜空，长鸣不停……这是一个人，天地间一个微小的个体发出的最后声音，天，不得不战栗，雨，淫暴的雨，不得不转为悲咽……这是一个三条小路的交叉口，山的后背是拱别景颇寨，距离公路约一千米，先是狗的狂吠，满寨子的猎狗都向公路方向发出哀号，景颇人听到了，听到这不间断的汽车喇叭声，他们与机工相伴，同样守护着这条抗战通道，他们中最优秀的子弟已经早些时候告别乡亲，加盟英军“克钦独立营”，正在缅甸（继后是太平洋诸岛）对日作战——因此，他们是警醒的一族，誓死抗战的一族，在这个骁勇崇武而特别善战的民族中，不乏果决勇毅之人。于是，刀姓山官号令，上百青年、妇孺

在滇缅公路艰险路段行车的运输车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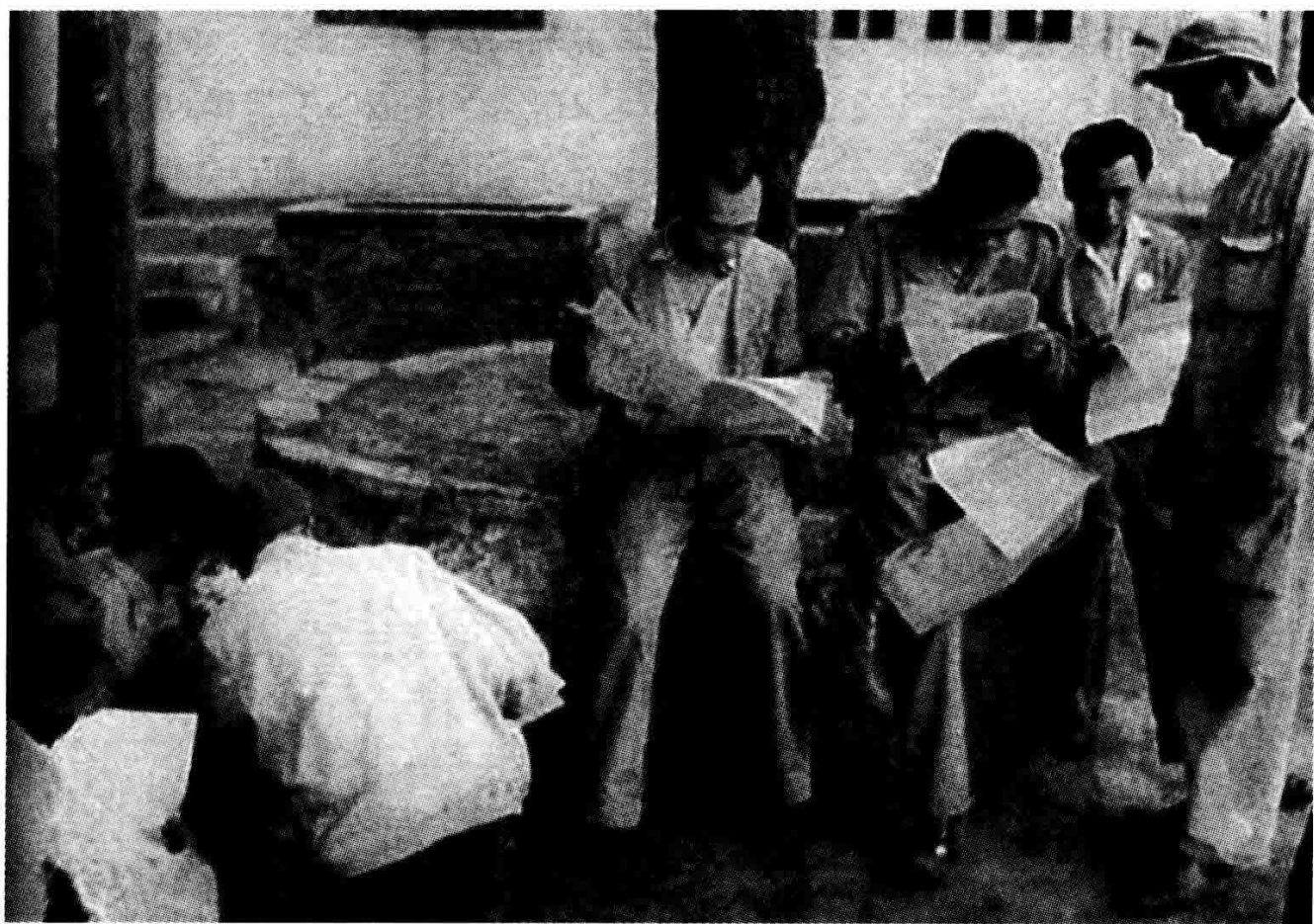
遮放一带的滇缅公路景象

擎火，以最快的速度循声狂奔，有人看见了在暴雨中，灯柱在密林雨丝中透出的光栅，有人听到了渐次衰微的喇叭声，他们来了！用长刀砍断树杈，奋力撕扯变形的铁棚，从压扁的驾驶室救出重伤的两人。而此时，喇叭声戛然而止，周开定因颈部、颅部重伤，血流殆尽，已经停止呼吸。直到现在，景颇人代代相传那雨夜不绝的喇叭声，他们将他以特有的方式融入民族记忆，记住了司机周开定最后的发言。

李伟庆，原籍广东梅县，祖父因参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逃亡印尼。他出生于苏门答腊明古犚。1938年，他就告别老母亲，参加由著名医学博士柯全寿等侨领组织的“荷属华侨救护队”回国服务。他跟随医疗队转战南北，经历了武汉、广州、南宁的失陷。当他服务于滇缅公路时，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1939年雨季，他带领车队在运送一批药品由畹町到达贵阳后，又奉命再运送桐油至畹町出口。于是车队不顾疲劳，五辆车子，每辆分别装载18桶桐油出发。李伟庆领队，开车殿后。由于敌机轰炸，横跨怒江的惠通桥接到军事委员会命令，只能在下午3时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能通车。惠通桥桥面只能单车通过，桥东岸排起长长的车队。通车后，队友们相约在勐腊车站集

合。李伟庆由于要办理公文手续，与前面四辆车拉开了距离。当他开过惠通桥，爬上一段陡坡，由于雨季冲刷、路基松动，车突然倾覆，连车带人翻下山坡。李伟庆被甩出车外，正好被压在汽车大梁下，汽车底盘一颗5寸长的螺丝穿入左大腿，螺钉顶在一块石头上，使李伟庆动弹不得，他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那样被“钉”在了山坡上。等他从昏迷中醒来，被“钉”住的伤口撕心裂肺地疼痛，血滴答不止，染红了一大片，他这才知道翻车了。毒蚊成阵飞来，叮咬着伤口，他只挥打了几下，就感到体力不支。他心想：一定要挺住，过不了几个小时，同事们就会回来寻找他。但翻车处有灌木阻挡，如果他不能爬到路边求救，有可能救援的人找不到他。一次次，因为流血过度，他觉得自己意识开始模糊，连剧烈的疼痛感似乎都不能抓住他了，他感



南侨机工在队部利用休息时间阅读家书和《南侨通讯》



▲在滇缅公路陡岩边留影的南侨机工

▼华侨大队第五队悼念一名殉难机工暨恳切彭亨筹赈会踊跃捐助其家属生活

到自己可能会死，从回国抗战到现在，救护队转战半个中国，抢回无数生命，他想到，现在应该抢回自己：我不能死，不能向死神低头，一定要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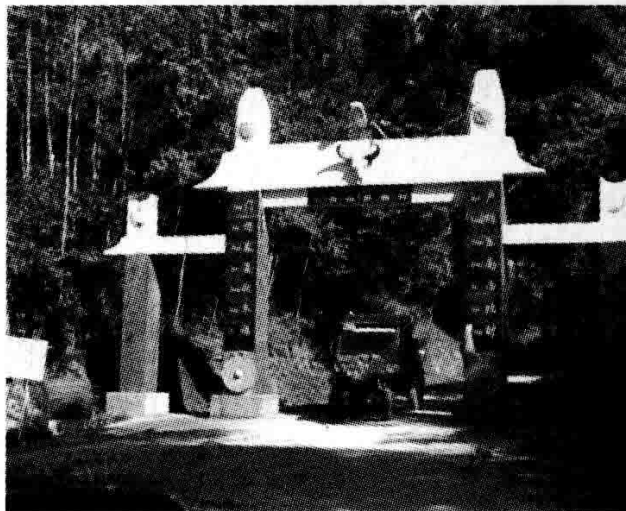
不知过了多久，下雨了。“龙陵雨”——绞杀的代名词。龙陵属山地小气候，在芒市坝子尽头，造地天工突显其能，一个仰冲，将大地挺拔天际，猛然上升的绝壁高崖直入海拔2000米，成为绝地通天的雨屏，这一绵延数十里的山屏挡住季风雨，是典型的“峰面”。于是，有多少雨，就接多少雨，顺势而下，一任它造天设地。山间雾气蒸腾，气象氤氲，如龙潜蛟藏，雨，不时而来。一滴、两滴，清凉的雨滴落在已经昏迷的李伟庆脸上，他又醒来了，他舔着甘甜的雨，知道自己还活着。他知道，雨，会越下越大，果然，雨声如擂鼓，冲刷着山坡上因汽车翻滚而留下的沟槽，尽然在抵住螺丝钉的石头旁，形成了两道小冲沟。水流越来越急，石头开始松动了，李伟庆燃起一线希望，祈盼雨下得大些，再大些。果然，瓢泼大雨骤然而至，石头明显动摇了，他使出全身力量，扒开石头周围的稀泥，搬动了石头，终于脱困了！“钉”在山壁上的苦刑终告结束。他拖着伤腿爬出灌丛，爬到能看到公路的地方，等待救援。雨，把他浇得透湿，他感到自己不会死了，不知

道从脸上流下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他心底涌起新生的欢欣。平时，行车人诅咒的雨，现在竟那么可爱，雨后，总是一个新的世界。

不久，同事们提着马灯赶来了，李伟庆大声呼喊，终于获救，被送往龙陵县医院。当他在医院急救后醒来时，床边竟坐着一位素不相识，头围青蓝头帕的老大娘，怀里抱着一篮鸡蛋。她念念叨叨地说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生您长命，老天会保佑抗日将士的！”滇缅公路，是用公路沿线人民血肉筑成的，是血的纽带。年轻的机工，这些可以易如反掌操纵大机器，又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老百姓总是用欣喜的目光看不够，视同自己的孩子，凡有翻车获救的，当地百姓都会来探望，带来家里珍藏的鸡蛋。鸡蛋，已经是贫瘠的土地最丰盛的供养了。

3

滇缅公路西段的很长一段范围内，都属于古代所称的瘴疠之区。在现代医学未揭开其秘密时，瘴气，通常被误为热带或亚热带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所形成的有毒气体。实际上，对人更具致病和致命性的是在雨湿环境中滋生流行的为疟蚊所传播的疟疾。汉



↑滇缅公路德宏境内三台山遗址，此为国内唯一保留的滇缅公路非残断遗址，全长 29.2 千米

↓周开定殉难处——三台山拱别景颇寨附近



滇缅公路沿途修路工人及群众抢救陷入泥泞的车辆

武帝为“开滇”在保山、永平开凿的“博南山道”穿越毒瘴区，筑路人因瘴气损失惨重，武帝听闻大惊。明代，流放者远徙云南瘴区，九死一生。“要下芒市坝，先把老婆嫁”，其凶险可想而知。

疟疾流行，南北皆有，它是一种由疟蚊叮咬，将携带在雌蚊胃内的疟原虫幼虫经由唾液腺传入人体导致的传染病。然而，滇缅公路下段，即今德宏地区广有河泽莽林，疟蚊滋生繁盛，疫情自古肆虐，且该地区的疟疾不仅有“间日”、“三日”、恶性疟各型，也不仅雨季高发，且全年流行。致死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南洋机工，在服务初期，死于“瘴气”的应不在少数。仍然没有准确数据，据粗略统计，仅华侨先锋两个大队，每月就要死亡七八人。然而机工对

多次调集物资回国支援机工，主要包括奎宁、蚊帐、毛毯、衣裤、鞋袜等。但都被层层截留，多数机工都没有领到支援物品。奎宁奇缺，绝无按人配发。跑滇西路段的机工，都信守一条法则，看到战友染疾，如果自己有奎宁（往往是自治后谨慎留用的），一定要先救战友。南侨机工与沿途质朴的少数民族百姓天然融合，少数民族教会了他们如何用土法对付毒瘴。此后，人员损失大大减少。

送走因致命疟疾遽然而逝的战友是机工最痛苦的事。杨保华在接受采访时，总忘不了讲述欧天福短短的故事。老人总希望这则太过简单又无法补充细节的故事能流传下去。因为这个世界上欧天福只活在杨保华的记忆中，杨保华不愿最后因自己的逝去，战友，也消失于无迹。

欧天福，回国服务时已四十多岁，谎报年龄报名自己都不好意思，脸上的皱纹挡不住年龄的痕迹，好在工作人员并未深究。四十不惑，此时他有家有业，妻子儿女，其乐融融。他热血上涌，不假思索而报了名，而他也知道，如果犹豫，他或许永远也走不出这一步，走不出家的温暖。

可是怎么向妻子说呢？他，不可能不辞而别。二十年夫妻，她真真实实是他的另一半，他之所以敢于走，是因为一个男人的软肋处，永远有一个女人在支撑。他觉得，她会同意的。

果然，在将“结果”告知妻子之后，她只是仍然忙家务，只是放慢了速度，默默地。挨晚，她把一件衣服披在正在抽烟的欧天福身上，平静地说：“你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欧天福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流泪了，一股暖流从心中涌起，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当杨保华在保山医院见到欧天福时，他几经被疟疾折磨得奄奄一息。从腊戍运往重庆的炮弹不能中途停留，欧天福带病坚持了十几天时间的连续运输，沿途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和药物。当他被战友抬进医院时，实际上已没有治疗的希望了，这时，他回国服务只半年。

……或许躺在病床上的他正在等待一个熟人，当他看到杨保华便一把拉住他，他微喘着迫切地告诉他一些南洋的家事，特别提到妻子对他的支持，最后他说：“小杨，我隐瞒年龄回到祖国，可没做多少事，就不行了，对不起

妻子，对不起一家老小，对不起大家，只能拜托你们，多替我做些事吧……”说完，他拉住杨保华的手松开了。杨保华替他合上眼睛，他还记得，他的眼角挂着一滴还没有坠落的眼泪。

杨保华一直握着欧天福手上最后的温度走到战后，他的嘱托那么重，他一生都在尽力“多做事”。在“九一八”、“七七”、清明的纪念日，他都会念念叨叨地和那些早逝的，但在他心念中是和他一起老去的战友说说话。

蔡世隆随第五批机工回国服务，他出生于南洋华侨富商家庭。服务于滇缅公路时，他26岁，担任领队。战友们很喜欢这位年轻的领队，他总是有条不紊、沉着干练，一起出车时，无论遭遇什么险境，有他在，大家心里就踏实。他喜欢在上路时，带领大家握起拳头喊：“机工统统有！”“机工统统有！”就是机工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克服的意思，以闽粤方言喊出来，十分振奋。后来，就成了南侨机工的“上路仪式”，只要有一队机工又上路了，都可以听到“机工统统有！”的口号。

在一次带领队伍运送军火时，蔡世隆在芒市患上恶性疟疾。疟疾症状，机工人人都能体察。蔡世隆先感到周身寒彻，那寒冷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由骨节而骨髓，再至每一个骨关节，它甚至不像沉入冰窟，而是整个肌体被冰刀一点点穿刺。他的牙关不由自主地剧烈磕碰，声响不断，有如机械操动。他将所有衣物裹缠起来，仍不能止住周身颤抖。他已经不能把持方向盘，全凭他熟练的驾驶技术，保持车辆的领队位置。但随后而来的剧烈头痛和高烧，两穴狂张，似乎就要爆裂，伴随呼吸困难，令他眼前一片模糊。他打开“双闪”尾灯，示意后车他要减速停靠。后续车辆似乎完全明白缘由，因为，同时发病的尚有多名机工，只是领队危急了。他们急速下车，跑到他跟前，他却示意“过一阵就好了”，让战友绕过他前行。但机工们不忍留他独自留下，细心人发现，蔡世隆的两臂、颈部出现环状的青瘀，两颊、颌面赤红，已经出现红色斑点，他已进入间歇昏迷。而他们都不知道，他得的并非“间日”、“三日”疟，即间天发作，或每三日发作的疟疾——通常，机工在“摆子”发作时，骤然间失去自控，将车停下来，等“摆子”打过再驾车行驶已成常态。有人递上两粒奎宁，掰开牙关，喂了进去，但包括蔡世隆本人都不知道他得

的是“脑疟”——致命性的恶性疟疾！此时，几粒奎宁已经无济于事。

运输刻不容缓，队友只有伴随他且行且歇，将他放在芒市医院，就匆匆上路了。待到车队折回芒市，队友们带上点心、水果去看望蔡世隆，没想到，面对他们的竟是一个红土垄，只稍高于地面，没有墓碑……

他们无法将几天前那个生机勃勃的青年与眼前的一垄红土相对应，他真的死了吗？车队离开芒市前，他还细心地交代出关、入关的一切事宜，稳妥地安排完自己那一辆车的司机才放心，他对事事都有把握，他也一定能够抓住自己，死神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却步……可是，医院的死亡登记上分明是他的名字。不，绝不可能，一层薄土下面不会是他，他的卡车就在不远处等着他，大家等着他一起上路，等他喊出：“机工统统有！”……队友们来不及悲伤，他们要先求证……

他们合力掘开土垄，直到看见还依稀能辨认的蔡世隆的脸……被新鲜的红土染得鲜红……

他们捶着土地痛哭，殷殷的红土地，你为什么埋人，新土不埋人，懂吗？懂吗？？懂吗？？？你为什么埋他，你不够丰泽、不够厚吗？你寂寞吗？你冷了吗？你还不够红，不够红吗？看哪，漫山的红杜鹃跟太阳一起开放，红山茶，鞠着大地的鲜血捧给天空……你还要，还要他的一腔血、他的一副骨、一颗心，为什么，他能让流血的大地孕育出新的太阳吗？（芒市，在傣语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队友们将蔡世隆的遗体掘出，火化，骨灰寄回了新加坡。家中，还有他年老的父母，队友们有责任给望眼欲穿的老人一个“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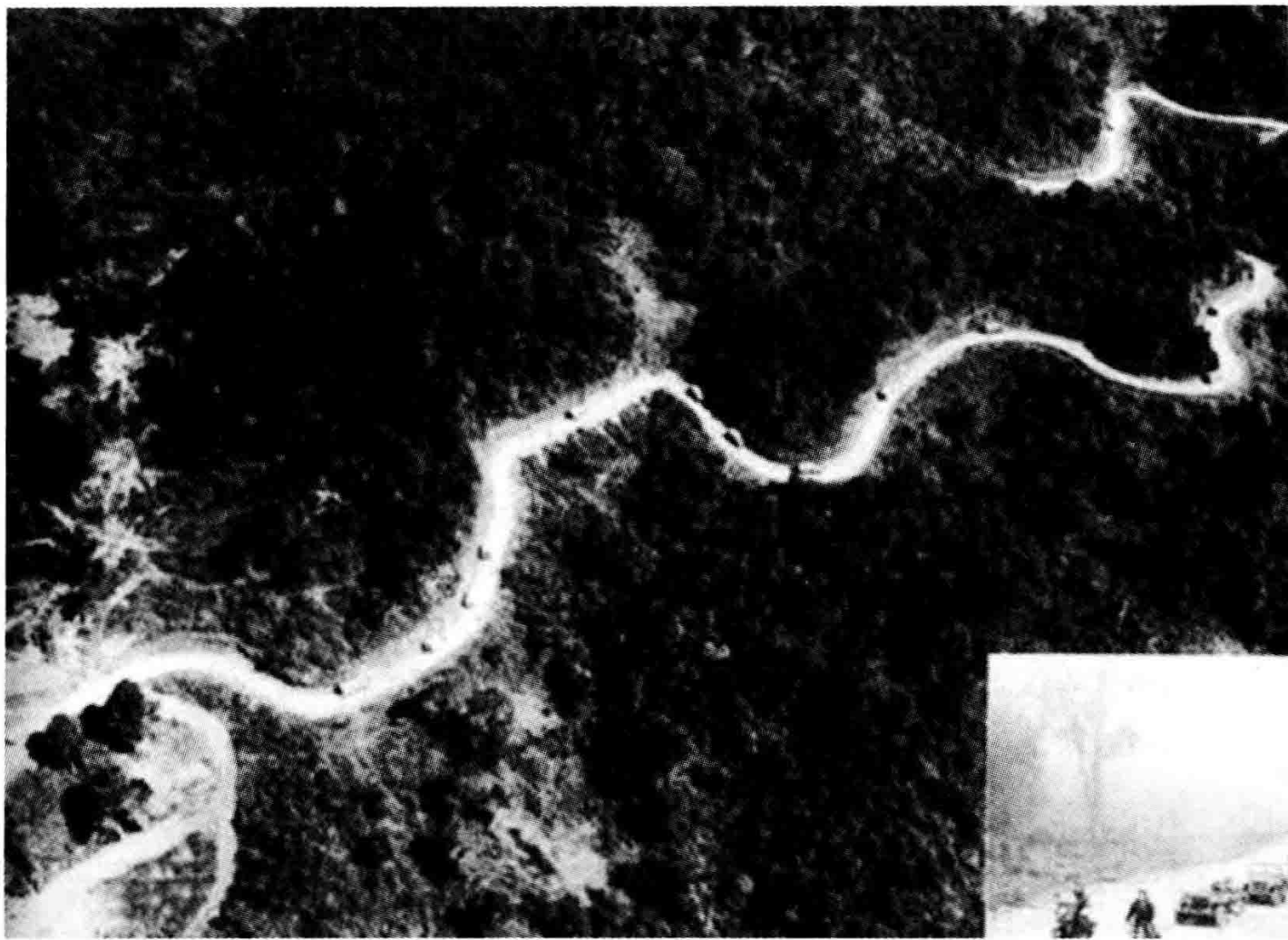
他们在处理完后事之后，依旧驾驶着十几辆卡车出发了，蔡世隆的那一辆有了新的继任者。他们喊道：“机工统统有！”

只要稍许改善机工的医疗条件，只要稍多配置专业医务人员，只要将奎宁这种古老而在当时唯一有效的药品配发给机工做预防自救——就能挽回数以百计的生命！这丝毫不能称其“为难”啊！只要垂下一指，就能给他们祖国的温暖！他们头顶日机的炸弹，他们度过无数危难，他们筑起 1153 千米的“血线”，为抗战输送血氧，然而，当他们的血液里渗透“疟原叛军”时，却

饬令他们自我抵抗，或者承担自我陨灭！相似于一任纵容敌人另一绞杀队潜伏灭杀机工于道途，这比敌人残杀来得无形而隐蔽！难道这比喻不恰当？重庆当局尽可搪塞推托、虚与委蛇，层层之当局尽可轻轻一笔以“病歿”而将鲜活、年轻的机工从名册里注销，但这并不难揭穿的历史罪恶是能轻易抹杀的吗？

1939年9月，雨季中期。杨保华和队友驾驶着共17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好不容易翻越了三台山，行驶至山脚菲红寨附近的滇缅公路上。这里看似地形平坦，但隐伏巨大险情，这个狭长的山地坝子，呈喇叭状开口，帮滇河、帕底河两条河流在一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只见浑黄的河水咆哮奔

俯瞰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
车队车辆雾中行进



腾，刹那间漫过了固堤的哩喇竹篷，向着距离仅仅百米的路基扑来，从车窗往外看，似乎水面浪头高过了半个车身，前面有一个缓坡，地面稍稍隆起。杨保华指挥车队迅速通过，原本他的想法是突破洪水地段，但意外发生，车队行驶至户育地段，前面路段的路基遭遇泥石流冲击垮塌。17辆卡车不得不停驶。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雨势却渐渐大起来，此时，队友惊呼，更凶猛的洪水来了，转眼，前方路面一段一段消失，周遭瞬成汪洋。杨保华不知道，他们进入的恰恰是帮滇河、帕底河与户育河的汇水地带，且车队停靠的路段正巧处在距离户育河河床不到五米的地段，这条泥沙浅浅的小河突然变脸，只半个小时，成为汹汹巨川！有的车辆即刻倾侧，杨保华想到的首先是抢救危险车辆，多车牵引，将陷入泥沙中的车辆拖出，17辆车尽量密排，前后衔接，以阻挡洪水，转头来看，半没半沉的车队已然成为“孤岛”，四面汪洋，浑不见出路了。这里距离芒市尚有27千米，且无法渡过不见边际的洪水去求援。

若被困在了深山中，机工出车一般会带三天左右的粮食，可是三天之后，路既没有抢通，也没有救济车赶到，队友们只有挖野菜、竹笋充饥。但遭遇洪水围困，这是第一遭。这时恰是瘴气流行的季节，杨保华和其他七八人同时染疾，一路“打摆子”，已经严重不支。疟疾的间歇性反应，彻骨寒冷，接踵而来是40°高烧。他嘴唇皸裂，无法站立，加之抢救车辆时，每个机工浑身泥水，而车辆却半没于水中，他不得不让机工战友尽量集中在稍稍干燥的驾驶室里簇拥取暖。有人报告，搜集来的奎宁已经没有了，连饮水都困难。把所有能抓到的被子、衣物都裹在病友身上也无济于事，他们个个上下颌骨死死咬合，浑身仍冷战不止。倘若在干燥的路途上，机工中很多人遭遇这样的恶疾，他们会用最后的清醒将车找地方停住，交代队友们先走，然后开始任凭地狱和病魔的折磨。有时，甚至会推开车门，滚下车来，在地上打滚……等到“摆子”过去，人已经精疲力竭、奄奄一息。通常运输途中无法停留，这会遭遇敌机发现目标后集中轰炸，故机工不能因个人的掉队而影响团队的运输，他们必须全凭意志振作起来，重新发动汽车上路，赶上队伍。很多人就是这样死在路上的，他们说：“死神就趴在车窗上。”

然而，这是洪水的鬼蜮。进退不能。

第一个夜晚过去，第二个夜晚又过去了，第三天，洪水依然未退，没有任何救援信息——这一点，杨保华有清醒的预测，这样大的洪水，即使芒市的队部感觉异常，也无从判断车队行踪；即使有大略判断，救援车如何涉水来救？整个车队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第四天，车队所积蓄的干粮全部告罄。为疟疾所苦的队友有两人昏迷，似乎又有三人出现病状。有人在车窗上刻画日历，这是第四个横划，组成一个“中”字，中国？还是围困之“中”，无助地被隔离于绝望的“中”，他上去将后面可能续写的笔画画成草书的“国”，“國”——一个圆圈，内里旋绕简化，不过一笔写成——他的心理预期只有五天！因为“断粮断水”的十七辆车近二十二人，半数虚脱，已经迈到死神门槛上了！

第六天，车队取用浑浊的河水，用衣布过滤，再用河边的仙人掌捣浆沉淀，先分配给危重的病人。

直到第七天，雨林里传来叮咚叮咚的声响，是几个放牧的傣族孩子。声响来自几头黄牛脖子上挂的“栲栳”（牛铃）！涉水而来的牛群走上了路坎，只有牲畜知道“水”正在退去，哪里是觅食的去处。杨保华感到获救的希望迫近了，此前七天，除了掩天袭来的滚滚洪水，杳无人烟！他刚想招呼这孩子，那个傣家男孩却一溜烟跑了，但牛还在，叮咚声还在，孩子又回来了，这次，不止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手执砍刀的成人，渐渐地竟有两个妇女出现，慢慢向他们靠拢。他们相互比画，似乎在交流一个信息，即他们早早发现了这支车队，前来隐蔽地探查了好几次，看到一群人竟奄奄待毙，这一次，他们放大了胆子过来探问。

其中一个孩子走近，对着杨保华说：“车人为什么不吃饭？”无力支撑，歪倒在车轮旁的杨保华一下振作起来，他在马来西亚时学过一些傣语，其中在孩子口中反反复复的几个词，如“金毫”（吃饭）、“崽弄”（男人通称）与傣语略通，只是“车”用的是汉语。他明白了，鼻子酸酸的——车人，在人前面缀以“车”，以表明特指之人的最大特点，表明他们知道滇缅公路上这个最大的靠车轮往返的群体，孩子的思维多么直观可爱，“车人”，多美

好的名字！他试着打起傣语：“孩子，过来，别怕！我们是‘好车人’！”孩子惊讶地说：“大哥是傣族？”杨保华说：“我们是广东傣族。”他们像小鸟一样一阵欢笑，不再害怕他们了。

两个妇女和那个男人的话语则复杂得多，甚至他们即刻就察觉到车队是因洪水陷车而遭遇围困。他们似乎有了什么需要决断的事情，竟然原路迅速返回。孩子不走，对“泥车”兴味盎然。

“为什么不吃饭？”孩子们在丛林里已秘密探查到了他们的情况。

杨保华摊开手：“米没有，菜没有，肚子很饿！”

孩子们相对叽叽喳喳了一通，其中一个说，“等一下”，便一群地飞跑走了。

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又回来了，跑得气喘吁吁，每个人都背了一个小篾箩，里面是白白的米饭。机工们围过来，每个人享用了几小口，就光了。孩子们有些不安：“还饿吗？”

杨保华说：“还饿，能跟爸爸妈妈说说，车人想买些吃的？”还没等孩子回答，寨子里成群的大人就赶来了，男人扛来炊具，女人背来粮食和菜、肉，还带来了治疗疟疾的草药。孩子们欢快极了，车上车下，东看看，西摸摸。“你们为啥不进寨子？只有几里路。”一位傣族中年发出正式邀请。杨保华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扰民，只能等待救援。”当他把钱塞到傣族男子手中时，傣族汉子坚决拒绝，杨保华握住他的手说：“我们是朋友，谢谢你们！这是我们的纪律，请一定收下！”

“我们是朋友！”傣族汉子握住了杨保华的手。送给他傣族织锦的筒帕（挎包），这是傣族对朋友的礼节。

杨保华有一个“系列动作”，遥指芒市方向，滚动的手臂和无奈地撒手，表示目前陷车的困境。

傣族汉子完全明白，连连喊道：“户育！户育！”

我们这里叫户育寨！认同了地域，就认同了你们的家人，陷车！不怕！我们来了，就什么都“统统有！”

夹杂汉语的表达为“缅甸好在！”

已经有几十个男女用锄头使劲掏车轮下的泥石。

转眼，更大的水牛群来了，傣族男人用“弯档”套上牛脖子，十头水牛一组，吆喝一声，水牛齐力奋蹄，陷车几个挣扎，车轮咬上了路坎，杨保华亲自发动，呼隆一声，卡车爬上路面，傣族群众欢呼起来：“南！南！南！”（傣语原义：水。也通“好了！”）

近晚，芒市队部的救济车终于赶到。开始清障，抢修塌方、支砌水毁桥梁。几位病重的队友留在村寨休养。当车队离开时，男女老幼都来送行，孩子们用傣语喊着：“车人！车人！”

从此，当经过这一路段时，路边经常会有玩耍的孩子，能开动房子一样大的卡车的“车人”带给他们无穷的幻想。南洋机工和傣族人民，也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

只有人民，滇缅公路周边的各族人民，傣族、景颇族等各族人民给予南侨机工如海般的温爱。70年过去了，当年营救机工车队的户育乡傣族，大凡彼时成年的都去世了，而当年的孩子却依稀记得“那地方有棵多依果树！站岗样的100岁了啵？”——这里，又旁生出一个他们从未揭开的谜题：机工被困的那里，河岸边，确有一棵茁壮的野生多依果树，“他们挨饿了，怎么不会摘吃多依果呢？八九月的多依果酸酸甜甜”。事实上孩子们最后与机工告别时，几乎每人手里都有孩子的赠物，不是别的，正是一枚、两枚金红色如同玛瑙般的多依果。小手摁在大手里，捎带孩子的温暖。岁月老去，至今那棵树还在，成为历史的坐标，人呢，走的走了，后来与德宏结缘而定居于此地的南侨机工当然知道，因为这段传奇，至今“多依果汁”声名了得，且有一个与世界嫁接的名字“德宏可乐”！

第五章

“罕丽！罕丽！”

1

机工蔡文兴在一次运输中被毒蚊咬伤，开到芒市附近的一个傣族村寨时开始恶性发作，他实在难以坚持，把车靠到路边，推开车门，在路坎下挨着一棵大青树，浑身颤颤发抖。一群傣族姑娘恰好经过这里，她们发现了蔡文兴。南侨机工她们很熟悉，虽然来自不同地域，语言又不完全相通，但他们身上天真烂漫、热情自由的气质与傣族十分相近。傣族尤喜欢他们的干净，傣族是“亲水”的民族，水的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或许南洋机工身上有着另一种广大深厚的“水”的气质吧。傣族妇女有经营小生意的传统，不在乎找到多少钱，而是村寨之间的物易是增进人际交流不可少的，尤在“赶摆”（赶集）天，自芒市南侨机工大队部驻地的“三棵树”沿路傣族村寨：风平、帕底、户育、遮放、弄西、等戛都是繁盛的大集市。都有数以千百计的傣族卜哨（少女）、毕朗（已婚妇女）出来摆小摊，卖点热食冷饮、水果、干货、土产一类。她们总是对开着重卡的南侨司机投以多情的目光。南侨司机多是英俊年少的小伙，傣族少女美好纯洁，妙曼多姿，即便工作再沉重，他们都愿意下车来买点东西，跟女孩们聊上几句，让他们劳顿的身心忽然焕发的是：不管机工们说什么，女孩们总是三五成群、腰肢袅娜地笑倒，呢依软语中，几双眼睛顾盼有情，神采各异。近在咫尺的战争竟丝毫没有向这些花儿一样的生命投下阴影。她们总是能瞬间驱散年轻的机工们心头郁积的一切，生命的阳光原来如此单纯。

机工车队从缅甸腊戍奔驰 120 千米左右，在道路顺畅时也要一个整天，遇到路毁和敌机轰炸，则时日俱废。无论怎样，穿越异国更加不堪的道路，活着回到祖国土地，那番幸运与释放欢快的欲望完全不可抑制。即使在抢运抗战物资分秒必争的时刻，他们也要在这里舒伸筋骨，吐纳芳香的空气。

从畹町到芒市，经停遮放物资站，有部分车辆要重新装卸，翻越三台山

而后进入芒市坝子，路程在90~100千米，中途要加水，他们往往选择在傣族街子上停靠，这样可以略事喘息，这时车队刚刚减速往大青树下的阴凉靠拢，他们满耳便是傣族姑娘的热浪般扑来的呼喊声：“崽弄！来歇——嘎！”（小伙子！来休息！）他们会对姑娘报以赞扬的应答：“罕丽！卜哨！”（漂亮的姑娘！）他们已经学会简单的傣语，足够表明他们的友善。在大青树下，他们围坐在竹篾圆桌前，喝一杯柠檬水，买一包香烟、一盒火柴，或吃上一碗加少许“米辣”的牛肉汤锅“毫甩”（细饵丝），酸酸甜甜辣辣，极尽爽快！

他们只有短暂的停留时间，但这一刻在一来二往后竟成旅途中的期盼。熟了，面熟了，眉目约定在战争烟火中相遇，比任何敌人射来的子弹更精准，比炸弹热力更炽烈！后来的“告别”，傣族姑娘会说：“来串嘎！来串——”（来玩！）

傣语中的“串”，一般为“来玩，来家玩”的意思，但从姑娘口里细语呢喃，则暗含两个人恋爱式走动、交往。年轻的机工有些面红耳热，但仍慷慨应答。此后，那个承接了这份情谊的姑娘一定会在大青树下，在你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等着你！

2

1939年9月末至1942年5月（敌占怒西），整整18个月，战火硝烟、车轮滚滚，无论如何困厄艰难，这种爱情传递，究竟有多织密？我们无从知道。它能抵挡死神的魔爪？不能。但有一点可以比任何钢铁都坚硬的信念是，除了下文如蔡君者如此果决地找到自己所爱，在机工被阻隔怒西，面临绝境时，他们很快寻求到了庇护，在德宏土地上潜隐，部分男青年理所当然地与傣族姑娘结为连理，成了她们的一员，且生死永恒。

太阳下一切的生灵同享此快乐！战争！究竟为什么呢？战争的杀戮，在生命绽放时，必然显得苍白。

《南洋商报》当年的报道这样写道：“华侨机工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

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有一张棕色的健康的脸。摆夷女郎，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那些未出嫁的‘菩抬’，有一条梳得发亮的辫子盘在头上，最高兴和华侨机工眉来眼去，在那公开调情的泼水节，有若干机工被泼了水——被泼了水，说明你已被爱。”

“被爱”，在战争中多么奢侈。我们不知道，对于多少年轻的机工，这可能是最后的“被爱”——即便只是被泼洒了吉祥的水。这些“赴死”的年轻人，或许稍稍旁顾生命的多姿都是奢侈的，更何况“被爱”。只有傣族，这个天生沐浴在阳光下的民族，即便万物宵禁，也会大胆地撒播阳光和爱。傣族女性，天生会爱，母性的光彩取之万物、还之万物。滇缅公路，也是一条爱的走廊，尽管在战争中成为“生死一线”的焦点，被争夺、蹂躏、践踏、涂炭、毁灭，但硝烟散尽，我们还是能依稀听到那些萌动着爱的、泉水叮咚般的笑语，萦绕回荡。滇缅公路，是母性的，载育历史，爱化育永恒。

当我们哀婉那些早早逝去的机工时，或有一份安慰，他们曾经在短暂的生命中沐浴在一个母性的民族爱的光芒中。

蔡文兴就有着金棕色的健康皮肤。此刻他正蜷缩在树下发抖，傣族姑娘们急忙回家取来草药让他服下，其中一位从家里搬来一床崭新的花棉被把他严严实实裹住。等他从半昏迷中醒来，一双眼睛正与他睁开的眼睛相遇，四目相对，一瞬，一万年。他从未见过如此纯净的眼睛，透过它，他看到天空中铺满大青树的树叶，阳光在树顶上漫射成千百万金色的星星……那双无底的眼睛，可以一直往里面走，他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在海边嬉戏，看到正向着自己走来的自己……原来，这个姑娘一直在旁边守护着他，看到他醒来，那双眼睛突然化成活泼的溪流，欢快地打着漩子。

“你病得很重……还不能上路，到我家休息几天吧！”姑娘用半傣半汉的话说。蔡文兴立刻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姑娘上前搀扶他，他轻轻推开了。他把花被子扑打干净，腼腆地说：“谢谢你，我已经掉队了，我得赶上去。”姑娘忙把药递上，嘱咐他吃药的方法，并要他把棉被带走：“你现在用得上它，等转回来的时候，再还给我吧。”蔡文兴连忙拒绝：“我们有纪律，有公

约，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的，谢谢你们了！”他把棉被塞到姑娘怀里，姑娘似乎听懂了他说的“你们”，小溪一样流动的眼神凝固了，她默默地跟随蔡文兴来到他的卡车旁，跳上卡车的蔡文兴不知为什么竟不忍关上车门，他能洞察她的心思：“你回吧，我转回来……一定来谢你！”他特地强调了“你”，她的眼睛又像小溪一样流动了。当他发动卡车，开出很远后，后视镜里，姑娘仍然站在大青树下，没有离去，怀中抱着那床花棉被。

一路上，熟悉的风景似乎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像映现在活泼的小溪中。自从回国抗战，蔡文兴全部的生活是路与车，起点与终点。现在，在他的路上，似乎又多了一站，他，会停留吗？

在“转回来”的时候，蔡文兴买好礼物，打算登门致谢，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他并不知道姑娘的名字。好在傣族村寨，家家户户亲密无间，容易打听，当他两手提着礼物登门拜访时，村子里的姑娘都冲着他抿嘴笑，似乎破解了他的什么重大秘密一般。他并没有见到姑娘本人，而是姑娘的父母“隆重”地接待了他，当他喝下米酒，姑娘的父亲郑重地宣布，他们的婚事可以定下来了。原来，按照傣族的礼节，带礼物登门拜访就意味着提亲。傣族信任和喜爱南侨机工，又颇宠爱家中的女孩，既然自家孩子喜欢，那父母绝无反对的理由。

蔡文兴感到十分突然，他本想解释，但不愿当众泼冷水，他想事后再找姑娘说明白。当他离开傣家，再次经过那棵大青树时，姑娘正站在那里等他。她羞涩地塞给他一个包袱，告诉他里面有毯子、衣服和药品，嘱咐着他冷暖与饮食。她的眼睛变成了深深的潭水，他，似乎永远也走不出……蔡文兴，竟什么也没说……他想起了南洋的家，他弃小家而万里归国，拯救“大家”。战争，粉碎着人间一切朴实美好的愿望，他真的能奢望在战争中建立一个暖巢吗？它会倾覆、破碎、毁灭吗？可是她，是那么温暖，像一朵注定开放的花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究竟谁更勇敢呢？如果，如果苦难没有尽头，生命为什么不去开放呢？生命之花，本来就开放在苦难的大地上。

一个月后，蔡文兴与傣族姑娘玉罕结为连理，机工战友、他所属队部齐聚一堂，为他们举行了“傣式”婚礼。他们的结婚证书珍藏至今。上面印制

着这样的文字：“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它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

一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对于蔡文兴来说，他的“起点”与“终点”变成了大青树旁的傣寨，与凤尾竹依依相伴的小竹楼。

3

第八批回国服务的机工陈团圆，在芒市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傣族姑娘，她的家其实不在芒市，但离机工大队部的“三棵树”并不远。“三棵树”也并非真有三棵树，而是一株大青树生发了两棵特别茁壮的气根，以至气根越长越粗，与母树无异，它们还在不知多么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繁衍子孙，更多的气根垂直落地，支撑着子树，反哺它水分和营养，年久，独树蔚然成林。这很像陈团圆与他一见钟情的傣族姑娘的诗意爱情。

法帕距离队部三千米，陈团圆送这个叫朗玉宝的姑娘回过家，接过她的小挑担，一悠一悠地就走到了。身材健硕的陈团圆宁肯路更远些，像他想倾诉的话一样长。但法帕寨子就在眼前了。这个临近芒市的傣寨以盛产芒果而远近闻名，姑娘就是挑着芒果来街上卖的。最初，陈团圆和队友们特别爱吃芒果，时间长了，他们吃出了“经验”，这个面容娇好的姑娘的芒果有些偏生，不是“熟透”了的那种芒果。结果围着她，队友争论起来。陈团圆的解释最令人信服，“傣族自己吃芒果，是嗜好偏生的那种，你们不知道他们有用盐巴、辣子腌吃的习惯？生即脆，有咬头，很耐品味，太熟了滑腻，汁水滥出，来不及吃就淌光了……”队友哈哈大笑，几乎异口同声：“陈兄说的是她——罕丽！卜哨！”傣族姑娘朗玉宝的脸一下就红起来了。

其实大家心有灵犀，陈团圆近来没少往法帕跑。自然也没少吃姑娘家的芒果。

陈团圆是个表面腼腆、做事踏实、内心忠耿的人，一个劲强辩：“你们知不知道，芒果不是随便哪一家的就好，一个法帕寨，味道最美的就那么几

棵树……”

队友笑得前仰后合，“不打自招！”

姑娘暗暗拉了他一把——她是略通汉话的。

事实真是这样，姑娘的妈妈特别喜欢陈团圆，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才，机工服的两片小翻领总是熨得平平的，他的头发上过凡士林，光洁闪亮。这般的模样，傣家村寨的“卜冒”（小伙子）百千人里可没有。陈团圆像所有机工一样，手上能出活计，搭个棚架，扯根晒晾的铁线，找来废铁皮修补漏屋，竟然在屋檐上接上窝铅椀槽，小院不惧雨水了。铁农具斗榘、卯个撮箕，这些活计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更使姑娘妈妈惊讶不已的是他还会干农活，傣家惜薪，平日烧的大多是树疙瘩，陈团圆居然可以用“打楔法”将死树疙瘩劈开、一下就堆起一大排烧柴，担水、浇菜……样样在行。他说，我在南洋家乡，自家的橡胶园里要干的活计多了，这些事从小就跟大人做，不算本事，明年开春，我们园子里再种几十棵芒果如何？

这家人天上掉下个“勤快”又通文化的“女婿”，羡慕了周边邻里。1940年新春，机工和傣家联合一撮，陈团圆与朗玉宝就按傣家习俗成婚了。到1942年5月，怒西被日军占据，大量机工阻隔在江外德宏，日寇开始疯狂搜查捕杀南侨机工，为了即时疏散，陈团圆将自己的身份证借给了一名决意北上的战友，自己则改了名字，潜留下来——他舍不得妻子和和美温馨的家庭。1944年中，他已经是一个近三岁女儿和不满一岁儿子的父亲。日军占领军恨透了曾维持抗日运输线达三年之久的南侨机工，秘密搜捕从未停止，在中国及盟军“大反攻”前夕，陈团圆与另两名隐蔽敌后的机工不幸落入敌手，随即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详后叙）。

南侨机工与傣族似乎“天生相亲”，结为姻缘的不在少数。滇缅公路所经的这个民族众多、风情各异的地区，天然接纳“热情单纯”的南侨机工，南侨机工能很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在昆明、下关、保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都有南侨机工建立家庭。路，真的成了他们的家。当他们在滇缅公路上千里驱驰时，可以系念于一个小小巢垒的温情，而不惮苦寒风雨、战火狼烟。

直到战后，机工本可以携家属返归南洋，但不少人因为妻子难离故土而选择留下。他们将海浪声永存在记忆中，而让红土地融入自己的血液。直到现在，机工二代，甚至三代还不时相聚，口传分享着父辈、祖辈的历史记忆。

第六章

腊戍抢运·搏杀大轰炸

1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这在南洋华侨史上是一件大事，五十余名侨领代表南洋一千万侨民在抗日极艰困之时，不顾烽火阻拦，毅然回到祖国，对抗日形势、祖国风貌、战时政治经济进行了全盘考察，并将情况源源发回南洋，使南洋与祖国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南洋沦陷后，避难爪哇的陈嘉庚所撰《南侨回忆录》对慰劳团的回国考察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视角重现了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原貌，其中，关于国共关系、战时国内政治与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忠实记录填补了历史的空白，陈嘉庚对产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直敏睿智表现出一种“南洋精神”：务实、笃信、至诚，这些孙中山时代所倡导的“民国精神”在那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却早已丧失殆尽。外患虽重，内忧更甚。

“民国二十八年冬，余想祖国抗战二年余，沿海重要出入口概失守，华侨回国甚形困难，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虽逐月输汇义捐，及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海外华侨于义实有未尽。故发起组织回国慰劳视察团。”^{【1】}其实，对于回国服务的机工和滇缅公路始终未能改善的运输才是陈嘉庚最沉重的心结，他，必须亲自踏上南洋英俊子弟献出生命的那条路，把“实情实景”带回南洋，机工家属和侨民们等待的是无欺的历史，如果历史是无欺的，本来选择承载历史的人会依旧选择承载。

慰劳团成员均全程自费，报名简章中规定：

（三）每人备费新加坡银一千二百元，有剩找还……

（五）如意外丧身，需供其家属新加坡币三千元……

【1】陈嘉庚：《组织回国慰问团》，引自《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慰劳团一行乘飞机经由仰光、腊戍、昆明，飞抵重庆，各界来到机场隆重欢迎，陈嘉庚致辞表明慰劳团目的与行程：“盖念祖国抗战三年，军民遭受痛苦，华侨未能参加，只有派机工三千余人，在各路服务而已，故应向军政界及民众致慰问之意，此其一。抗战必须金钱，海外华侨负外汇重要责任，慰劳团……将诸良好成绩材料，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侨众增加爱国热心，俾私人汇款及救济义捐，月月增进……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从陈嘉庚在各种重要场合的发言来看，我们可以再次确定一个已较为明确的史实：三千两百名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是南洋在抗战期间组织最为有序、规模最大、牺牲最大的一次以直接参战的形式对祖国的支援。但这段史实却被后来浪浪相逐的历史掩盖了：战后的国内战争和国民党的败亡；史料的丧失；抗战时国民党当局未尽关抚之责，其后则有意淡化，甚至抹杀南侨机工的贡献；加之后来南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狭隘民族主义被煽动利用，而导致的“排华”……重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完整地回视民族演进中一个不可缺失的环链。

陈嘉庚一行会见了重庆党政军界的几乎所有要员。国民党自诩继承孙中山遗愿，将华侨视为重要建国力量的传统，将陈嘉庚代表的南洋各界视为一方政治力量，更不要说在经济上的倚重。从蒋介石夫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事政治部长陈诚，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冯玉祥将军等都设宴或专门会见了陈嘉庚一行。当时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参政员共产党员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也前来访问。“送羊皮衣三件谓可御寒防雨，系陕北出产云。座谈数点钟，均系国共两党摩擦事。”

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时，蒋问有何观感。陈嘉庚答：“政治原门外汉，愧不能言，工厂尚无暇参观……唯人力车及汽车不甚整洁……观瞻所系，且影响卫生，故甚重要。”蒋介石登记于手册，“更十余天，诸人力车改良甚多，而汽车则仍旧”。

陈嘉庚与蒋介石晤谈，原本在行程中已有安排。蒋出于南洋华侨对抗战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图为慰劳团到达重庆时和欢迎者合影。前排右四为陈嘉庚，右三为庄西言

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影响巨大，更出于在1939年末，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发生的生活待遇恶劣，而引发的刘牡丹视察，呈报《建议》案，被蒋介石以贯有之虚伪推脱得一干二净。陈嘉庚在“不胜浩叹”之余，已经对国民政府绝望至极。故在晤谈时，不再提及故往，但却“点”了一笔“人力车”与“汽车”的比较，其意本在提醒蒋不要忘记滇缅公路上担任抗战物资运输的数千辆机车，在《建议》案和陈嘉庚本人的书函往来中，关于南洋华侨捐赠和依法案购买之运输卡车，多失修失养，他最最心疼的当然是机工病难，但多次敦促对车辆要爱惜养护，其最不可解的是何以一到两年的新车，竟然机件脱落、破损不堪？这不仅丝毫不顾及南洋华侨输血捐赠的不易，于维持抢运效率、提高可运行汽车保有量实非小事！但蒋本人记在本子上的却是重庆市面上的“人力车”，“更十余天”——果不其然，十天之后，重庆的人力车漂亮、干净多了，“而汽车则仍旧”——着实为笑话一则，蒋环顾左右而言他，儿戏焉。

位于嘉陵江边的西南运输处重庆办事处邀请慰劳团参观，时主任为龚学遂。“到者数百人，华侨机工约半数”，陈嘉庚在致辞中说道：“……至于机工等待遇，照国币核算薪水，不及南洋半数。然因热诚回国，均甘愿牺牲，不但舍去优厚薪水，尚须离开家室，绝非游手失业不得已而来者。余为南侨总会主席，知之最稔，望国内同胞及诸同业工友，明白原谅。（余有此言，为国内司机，误会华侨司机实业而归）至华侨司机，务必恪守初志、吃苦耐劳，以达到抗战胜利为目的，万万不可有始无终、半途废弃，不但无颜可对侨众，亦无颜可对家乡。若论工作与薪水，比较在战线同胞及士兵，何可以道理计也。”

陈嘉庚心下首选的是一条与一年前刘牡丹考察重叠的路线，即滇缅公路下段，最后他势必要到达芒市、遮放、畹町，“南旋”出境。这个行动表明，“故事未完”，他要“亲往考察，以明真相”。

西南运输处安排了机工代表与陈嘉庚等慰劳团成员座谈，如同亲人久别，泪下语欢。蔡汉良等向陈嘉庚汇报了很多情况：如南侨总会发给机工的物品被贪污，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在芒市与第五军发生群殴事件的原因等。第五军在驻扎地横行无忌，欺压百姓。抢掠百姓鸡鸭瓜菜，在市场随意压价买肉，南侨机工不服第五军的张狂气焰，遂相约“教训”了他们。第五军酝酿报复，事态升级（详后叙）。

此事，在陈嘉庚的努力下得以平息。^{【1】}

慰劳团于1940年5月按计划分三团进行考察。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为一路线，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为一路线，甘肃、青海、绥远、四川为一路线。基本遍及了战争中能够涉足的全部区域，有的考察路线紧贴敌占区。陈嘉庚执意要往延安考察，蒋介石警告其：“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在国民党的沿途阻拦和破坏下，陈嘉庚、侯西反仍来到延安，见到了

【1】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毛泽东。“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象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时，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将日间工作，身体或可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

陈嘉庚对延安的“平等无阶级”印象深刻，与毛泽东晤谈间，有南洋和集美学生来访，皆“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约束。近晚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座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这与会见南侨机工时，机工因受训而逢长官必起立行礼大相径庭。

陈嘉庚对延安的民主政治、土地改革、田赋税制、行政管理、兴办教育、文化建设等进行了全面考察。“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盖是民选，正式集中大多数民众公选，非同有名乏实私弊。至各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公务员每日工作七点钟，并读两点钟党义，共九点钟。公务员薪水每月五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五元零用。”对毛泽东的“虚怀若谷”，陈嘉庚更赞叹由衷。

风清气正，朴素健康，这与在重庆的见闻岂止天渊之隔。“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清代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这只是社会情态，尤其使陈嘉庚不解的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人，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陈嘉庚此时已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销，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此一节“忧虑”，当然不止于陈君。

至陈嘉庚一路踏遍祖国半壁河山归来重庆，恰 1940 年 7 月 18 日。7 月 17 日，英国与日本签订《英日关于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决定从 7 月 18 日到 10 月 18 日的三个月，封锁滇缅公路，暂停通过缅甸向中国输送武器、弹药、汽油、卡车以及铁路器材。同时，香港也实施禁运。

3

让陈嘉庚尤感欣慰的是，在 3200 多名南侨机工中，有十几位一直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从重庆到延安的物资运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是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重庆的军事机构，同时兼作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编第四军重庆办事处，位于机房街 70 号的重庆办事处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办公地点，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在中国南部广大地区和港澳等海外地区的工作。早在南侨机工于新加坡报名之时，就确定了程龙庆、李振华、方川如（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同志的堂兄）等十几人分配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李振华为领队。

程龙庆一行 17 人随第五批回国机工团抵达安南西贡，属西南运输处的机工乘火车直达昆明，而程龙庆一行却继续驶往香港。在香港等待上船的还有“海员工会”的 40 余名志愿回国抗日的华侨，多数为机工，还有准备赴延安求学的华侨青年。他们中一位年仅 17 岁的学生王唯真，后来成了著名的新华社记者。当船行至海南岛，海南已经沦陷，途中遭遇日本军舰，机工和学生们的急忙脱下中山装，藏在煤堆里，以备日本军人强行“检查”，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并没有上船。他们顺利地来到安南海防，程龙庆一行转乘火车



进入广西凭祥。

在树林里，早有二十多辆汽车在等待机工们的到来，这些汽车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华侨支援延安的，一辆德国造漆着红十字的救护车，车身上标有“宋庆龄送”的字样。南侨机工接下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把汽车直接开到重庆。由广西凭祥到重庆的公路是战时的咽喉通道，每天都遭到日军的轰炸。在车队接近南宁时，一辆汽车驶入了国民党军的高射炮基地，蛮不讲理的士兵将司机拖下车，硬说南侨司机是刺探军情的汉奸，然后将司机五花大绑，扬言要押到广西“杀头”。紧急时刻，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龙飞虎同志赶到，经过一番交涉，才救出了人和车。

车队终于在1939年10月抵达重庆。南侨机工相约在傍晚时登上一座山头，虽然此时重庆时常被轰炸，但夜幕降临，仍有一派“万家灯火”的景象——这是南

◀陈嘉庚（中）、李铁民（左）、侯西反（右）一行于1940年5月31日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代表热烈的欢迎

➡归侨青年欢迎陈嘉庚等慰劳团成员到延安

洋所看不到的。每一星灯火点亮之处，就有一个危难中仍坚守的“家”，一星又一星光亮，将夜海补缀得迷离斑斓。南侨机工手拉着手，高兴得笑出声来——他们为祖国之大、生民之众深深震撼。

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位于重庆机房街，办事处的同志们都亲切、热情，男女清一色着军服，自己挖地种菜，十分节俭。南侨机工车队驻扎于办事处近旁的农村，四周都是农田，宿舍和车库是竹子和篾席搭建起来的，修理间是茅草房。一应的用水都从水田里取。炎夏酷暑之时，田里的水干涸，喝水就十分困难。但南侨机工没有人叫苦抱怨，大家为抗日而来，对于中国共产党“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主张，机工们十分认同，很多人更开始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车队的任务主要是运输国民党政府调拨给十八集团军的给养，及各界人士捐赠的物资、药品等。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运送前往延安的地下党员、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并秘密运送党组织从港澳及各地转来的材料、文件、电台等。此时，重庆到延安的公路是我边区与国统区联系的唯一地面交通线，十八集团军重庆、西安办事处的车队是这条运输线上十分引人瞩目的共产党车队。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行车安全总是难以保障。因此，每次出车至延安，总是由周恩来亲自与当局交涉、办理手续，出发前，他总要点一一清点人数、物资，并再三叮嘱南侨机工应注意的事项。他的一丝不苟、亲力亲为、和蔼可亲深深打动了机工。

从重庆到延安，国民党层层设卡布哨，每道关卡都配有军、警、宪、特人员。从西安到延安，更是密不透风，每一处县城和大镇，都要停车检查，连汽油桶都不放过，检查人员总要用一根细棍伸进油桶搅一搅。但即便如此，车队还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把秘密物品带进延安——办事处的同志将重要文件和拆散的电台部件固定在大油桶的下端，如果要进行检查，除非将油桶卸下来，装满汽油的油桶难以拆卸，再加上机工总是沉着冷静，严查人员虽不甘心，但也只能放行了。

当历尽险阻，车队进入延安地界时，机工们总是大松一口气，车内沉重的空气一扫而光，如果车上有进延安的同志，马上就开始谈笑风生，延安宝

塔在望，一种让人精神振奋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车队每次达到延安，总是受到边区军民的热情接待，饭菜里甚至有鸡蛋。车队常在宝塔北面的兵站里休整一二十天。冬天时，延安滴水成冰，办事处给每个南侨机工都送来了羊皮袄。在延安，程龙庆等人还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他把道理讲得那么亲切明白、饶有趣味，台下的民众时而点头欢笑，时而举手发问，全无束缚。程龙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重庆与延安恍若两个世界，延安虽清寒，却总让人舒畅、光明。毛主席乘坐的车是一辆老式的黑色雪佛兰轿车，是美国洗衣馆的华侨工人捐赠的，司机也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

对于程龙庆和很多南侨机工而言，在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岁月中，最难忘的就是能亲睹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的风采。

一次，程龙庆和几位机工正在处长办公室谈论物价上涨，海外汇款中断的情况，恰好周恩来总理走进办公室，他静静地听完大家的谈话，然后对司机们说：“现在生活是困难，华侨同志每月工资30元，我们处长每月工资才5元钱，有困难就要提出来，生活上的问题大家要想办法共同解决！”

当时重庆时常遭到日机轰炸，程龙庆在一次轰炸中右脚被弹片划伤。重庆办事处得知后，立即找来了医生，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派来另一位南侨机工照料。半个多月后，伤口痊愈，程龙庆到办事处看球赛，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人群中一下就认出了他，向他招手问候道：“小鬼，伤好了吗？”程龙庆没想到这点小事周恩来都记着，连连应声道：“好了好了，感谢领导关心。”周恩来和邓大姐又嘱咐他要好好休息，并问南洋家中可否有新消息。

一位南侨机工在重庆时为周恩来开车，一次汽车中途熄火，周恩来下车和司机一起推车，司机有些不安，周恩来说：“没关系，我们共产党讲平等，办事处的同志们都是一家人。”

周恩来常在办事处为大家做国内外形势报告，南侨机工只要得空都会去听。他神采奕奕、条分缕析、平正中肯，听者总受益良多。程龙庆常带了小本子去听，却总被周恩来的讲演魅力深深吸引，来不及记笔记，报告结束了，本子上竟一字未落，但心中又觉得充实无比。

新中国成立后，程龙庆留在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重庆办事处工作的两年多，华侨机工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对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的关爱和鼓励，让华侨青年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和博大，让我们这些海外赤子真正回归了祖国。周恩来总理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

4

就在陈嘉庚考察慰问期间，滇缅公路“封锁令”已由英国当局下达。驻仰光的国民党当局外交代办及西南运输处仰光分理机构毫无协调能力。只能“照准执行”。但在腊戍，这个“封锁令”却是凌空投下来的一颗炸弹。其时，日军已经将空袭目标重点转向八莫、腊戍各港口和中国进口物资集散地，以空中威慑来逼迫“封锁令”执行，并永期摧毁这条抗战运输线。

对于先锋大队的杨保华车队而言，这是一次从虎狼口中夺回生命的决死战斗。

7月15日，他的车队近20辆车，已经奉命到达腊戍，但奇怪的是货场、港口弥漫着十分诡异的空气。次日清晨，突然来了30名先锋二队的“赤手”司机，他们是连夜赶来的，此时，方才明白在48小时后，即7月18日凌晨1点，腊戍口岸将“关闸”，而关外还有100辆散装的从美国经海路运来的“道奇”卡车。这批战友是赶来接车的。他们已经接到“封锁令”，先锋大队自主决定“虎口夺食”！

关外的装配厂有一个负责汽车散件组装的美国工程师，技术工两人。通常还有三五个临顾。杨保华当即出面交涉，要美国工程师答应由中国机工一齐来组装，三五人一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多装出一辆车，中国就多一分运力！

这时，日本飞机来了。低空盘旋。这是一个信号，随即而来的将是轰炸机群！美国工程师惊恐万分，要立即疏散隐蔽，他大声喊：“一天只能装一辆车！上帝不在这里！天哪，你们要干什么？”

杨保华大吼：“我要问：你要干什么？要躲？回你的加利福尼亚！这是中国人的车，你只是个（他伸出中指）——你要与我们一起干，就是这个！（他伸出拥抱的臂膀）。”

由于回忆、记录文字和口述的简约，我们无法确认美国工程师当时是如何反应的。总之，五十余名机工在这场对话之前，已经排开缅甸管理人员，全部扑向汽车装配线和散件堆场——一小时，仅仅一小时，第一辆道奇车“下线”“过验”。通关人员和美方的技术检验人员同时向美国主管工程师竖起大拇指，表示：“验过，可以通行！”——啪嗒的钢印声，机工一轰油门，新车下线，飞快地驶向停车场。

杨保华大喊：“快开走！快快快！”

“一小时一辆”，这是在案记录。美国工程师连连叹息“了不起！了不起！”这也是回忆中确凿的文字。

日机来了，炸弹也来了！

较之于其他机工，先锋大队的机工们已经有了躲避轰炸的经验，但还是有两位机工被工场上储油罐爆炸所伤，一人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48小时，他们记不清敌机来了多少回，扔下了多少炸弹，他们只死死盯着那些渐次减少的成箱散件和准确地计数有多少辆车驶向祖国那方。

港口的一艘驳船起火了，另一艘散货船爆炸，隐约可见一个人影如一团火球抛在空中，接着，落在码头的硬地上，有一个缅甸人的喇叭在喊，此时也咽哑了……

杨保华看见身旁的两个机工同时在掏耳朵，他们被炸聋了，但借着凌晨码头的火光，他看了看手表，“零点”！看了看空空的工场，他们——中国机工胜利了！

5

中国唯一的战时国际运输线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变化，英国对

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而被“封锁”。中国的命脉，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世界的另一边，希特勒的野心正空前膨胀。

1940年4月9日，德军侵占丹麦，丹麦投降。同日，德军入侵挪威。德军的闪电战在北欧取胜。

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军调集136个师，其中包括10个坦克师和7个摩托化师，2580辆坦克，3824架飞机，向西欧国家发动进攻。德军进攻西欧宣告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英国张伯伦政府立即垮台，丘吉尔出任首相。

在德军闪电战面前，英、法等国联军不堪一击。同年5月14日，荷兰军队停止抵抗，女王流亡英国。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5月27日—6月4日，英、法海军利用德军数日停止进攻时机，集中各类舰船850余艘，将被困在敦刻尔克狭小三角地带的英、法联军33.8万余人运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史称“敦刻尔克撤退”，在这次撤退中，英国远征军几乎丧失全部武器装备，243艘大小舰船沉没。

1940年6月6日，德军在横贯法国北部的643千米战线上发动总攻。法军总司令魏刚集结100多万军队在索姆河和安纳河一线构筑的魏刚防线不到3天即告崩溃。德军进逼巴黎，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17日，法国贝当政府宣布“停止战斗”。22日晚7时，在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森林同一节车厢里，法国政府代表在纳粹德国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该协定规定，德国占领法国总面积3/5的北部和西部工业发达地区，非占领地区建立以维希为首都的贝当傀儡政府。

此时的英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日不落帝国”在远东的利益，采取了出卖中国利益、绥靖日本而“自保”的策略。而这样的政策并未能够满足日本的胃口，此后，日本更不把这个老牌帝国放在眼里，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都被日本划入了“大东亚共荣圈”。三个月禁运，使日本获得有利时机，进一步完成“南进”以占领东南亚各国，与轴心国在印度“握手”。而对中国的包围和侵略，则首要须全力以赴实施切断中国供给线。

在中国的抗议、美国的施压下，10月8日，英国通知日本，三个月封锁

期满后，滇缅公路将重新开发。而恰在当日，日军已占领越南河内，组成了“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从河内起飞的日机，可大大延伸轰炸扇面，以摧毁中国西南一隅及滇缅公路。日军短时间内调集 100 架飞机，准备实行对滇缅公路进行规模空前的大轰炸。^{〔1〕}

陈嘉庚得知滇缅公路被禁，“无限焦灼”，但他料定根据国际形势，三个月一过，必当解禁。如果此时能对滇缅公路路政管理有所作为，解禁后公路将能发挥更大作用，与日军抗衡。他开始计划对滇缅公路重新考察。

他于 7 月 30 日在复返重庆后来到昆明，国民党派玉泉笙陪同。“恐余到西南各省说共产党好话，故蒋公派玉泉笙来随行监督。”次日，陈嘉庚与西南运输处主任龚学遂会面，谈话内容涉及一些重要史料，均为龚学遂亲口所言，作为战时运输的第一当事人，应较确实。如日军侵占安南海防，我国损失军火物资 7 万吨左右；滇缅公路当时在我国界内各站囤积物资五六万吨等待转运；禁路之前，从缅甸抢运两万多吨回国（多数为南侨机工抢运）；未禁前逐月可运 4000 吨左右；西南运输处共有汽车 3000 辆，当时可用者 1000 辆，两三百辆尚在修理，其余均损坏等等。

这个数字从龚学遂口中说出来，居然不合算式，3000 辆汽车，可用 1000 辆，待修两三百，那么，还有一千七八百辆呢？全部“损坏”？其损失废弃竟然占到总量近 2/3！这是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常态？

如按西南运输处共有汽车 3000 辆来算，南侨机工长时间内基本上是单人单车行驶，那么在滇缅公路实现的运力应还远多于“一半以上”。

陈嘉庚再次询问关于南侨总会提出的在公路各站增建货车停宿栈、机工宿舍膳所等问题，并提出按比较充裕的预算 100 多万元可建成，南侨总会可全资捐助。龚学遂言：“当时计划预算需 300 多万元。财政部不准，故尚搁置。”陈嘉庚云：“如此误事，实出我意料之外。”

如果所有筹措皆属“意料之外”，那么，抗战前景真是不可“意料”了！

下关是滇缅公路中枢一站，陈嘉庚一行前往考察时，对下关之“腐败主任”记忆深刻。下关“李主任”曾多次设宴款待考察团，“李主任设筵三席，

〔1〕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滇西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物味丰盛，食至1点余钟，余甚不耐，亦不满其丰而多筵……余乃不客气直陈衷曲，言‘余此次代表南侨回国，系有工作职责，在抗战困难之际，凡可节省一分便当节省，勿作不必要应酬’”。不想李主任置若罔闻，仍复设宴，且呼朋唤友，完全无视考察团此行的考察目的。陈嘉庚怒而起坐，“不向筵中诸人辞别，即戴帽执手杖先行”，告随行杨君：“运输安能有成绩！以下关站之重要，而委此腐败主任。……有意如此开销，彼必呈报昆明机关，欢迎某某费去至少千元。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回昆明可向龚君言之。”杨君言：“均是一丘之貉，如昆明机工互助社，专为华侨而设，理应任华侨司机妥人为主任，他则不然，委用其私人，月薪至三百余元，社内职员三十余人，每月费款八千余元，无裨华侨司机实益，其腐败如是，所云欲继设分社，不外增委私人已耳。”

“近晚到下关，参观交通部及西南运输处等停车场，及修理厂，尚有其他如中国红十字会、经济部、银行及别机关，统计货车客车等，有六七部分，各自立门户，如添油站、办事所、停车场、修机厂，各独立创设，若货车少者，则未有修机厂。均为政府公用车辆，而机关林立，不特多占地方，多用许多人员，多加费用，且各部分人员互生意见，如某部分缺何物品或汽油，别厂虽存许多，亦不肯借用。甚至医院亦如是，除西南运输车多人众设有医院，其他均未有。西南运输处货车有一千余辆，交通部货客车数百辆，其他百余辆或数十辆。机关愈多，设备愈简，损坏及停修者愈多。运输成绩当然减少。此概为不统一所误，若能统一主持机关，运输必有成绩也。”

在下关，陈嘉庚与百余司机见面恳谈，司机对封路愤愤不平，并向陈嘉庚报告了封路前大抢运的实绩和机工的人员伤亡。陈嘉庚默然泪下，请同行人员记录安排善后及南洋家属的优抚。他与机工们一一握手，他看到这些他亲自送别的南洋青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初的热情经过洗练而变为冷静、坚定，战友的死让他们必踏着这条血路继续走下去。陈嘉庚深感欣慰的是，南洋有这样的青年子弟，南洋无愧！三千两百名机工代表、千万侨众万里赴死，酬情于祖国，此情殷殷，山河可鉴！个人有此志，报此志，舍命捐躯，在所不辞，天地之大，成仁即成人！此人将独立于天地之间也！而民族，泱泱大

众，浑浑噩噩也，政昏治乱，腐败甚剧。大危机当前，竟无振作自新，仍朝不虑夕、醉生梦死，民族，何期有“成”也？自思，辛亥至今，不但“三民主义”流于空谈，民族启蒙，也似无半点实绩，“天下为公”复而为“四家天下”，民族，究竟如何才能立于天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诚可痛叹！然愈是如此，个人愈无塞责之由，更当克勤克谨、点滴以成，以微躯微命，尽人道天责。

陈嘉庚安慰机工们三月之后滇缅公路必重新开通，大家应“努力服务，敌人气力已衰退，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也”。

陈嘉庚一行来到滇缅公路最高点“天子庙坡”时，这位年近古稀，不轻易流露感情的老人也不禁感慨万端，胸襟顿时大开，脚下，群山来朝，千峰堆翠，白云涌集，磅礴激荡。“时虽初秋，见不远之高山上白雪如云，满罩半山之上。沿路石山虽不少，然能生产之土山亦甚多，水田、农园到处多有，远胜西北及贵州诸省。若日后政府能改良农业及人利，则云南此一部分之生产，定可获益数倍。……且气候温和，不甚寒亦不甚暑，雨水颇足，在西南诸省中，实不多得之乐土也。”

到达楚雄，考察团寄宿中国旅行社。次日本准备清早6点出发，车竟为数十辆后来停放的车辆所阻塞，无法开出。需等到最后一架货车的司机挪车，其他车方可移动，而司机不知借宿何处。“待至8点余钟，各车夫来始将货车驶出，乃得起行。车站陋习如此，西南运输安有成绩可言。当次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如此，可胜叹哉。”

回到昆明，陈嘉庚即将此行见闻、路政之弊端告与龚学遂，“龚君答伊虽负责主持，然重要机关人员，多是宋子良君委派，逢有不法当革辞者，虽屡告亦无效。……然余不得不再进忠告，冀可挽救多少：（一）货车到站栈，须排列有秩序，留空路使各车可自由出入。（二）货车到站栈排列后，须雇定工人洗净泥污。（三）货车到站后，若机器稍有不顺，应即报告修机司，立即修妥，明早方可出发，如此可免途中停顿失。以上简单三件事，普通管理人都晓得，只在当局命令监督实行而已，非挟泰山超北海做不到之大事”。

云南省主席龙云宴请了陈嘉庚一行，何应钦在座陪同。“是宴酒菜均特殊，菜中有象鼻一味，为生平未尝食。”

12月4日，陈嘉庚与两名中央特派委员同行，再次考察滇缅公路。此时，滇缅公路已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陈嘉庚发电蒋介石：“余明早将同委员沿路考察，从此出国敬辞。”

敌机对开通后的滇缅公路实施大轰炸，功果桥、惠通桥成为主要目标，惠通桥被炸断几根钢索，威胁运输。陈嘉庚亲往考察。功果桥“桥长二百余尺，系用钢索吊造，其江水颇浅。自敌机来炸，已在上流距离半公里，江水更浅，江面更窄之处，再造一新桥，将竣工，以做预备。此桥免用钢索吊造，系用桥柱，工程极容易，故不惧轰炸也”。惠通桥“桥之两端，近处俱是高山，高可五六百尺，敌机来炸许多次，因山高不便低飞，所下炸弹不下千百个。桥边屋舍尽行倒坏，山下各处炸弹痕无数，桥中虽有炸坏，然非要害修理一两日便竣。……自敌机来炸之后，交通部经鸠工从两桥头开斜路至水面，拟用渡船运货车。若有渡船可通，该惠通桥纵或被敌机炸坏，亦无关紧要。……所可怪者，西南运输处两要人，但知桥坏有运输不通之危险，竟不知虽炸坏，绝不至阻碍交通。……而身负抗战军运之重任，不曾到地履勘，昆缅往来只坐飞机从天上过，安能知晓实际情况乎”。

“昆明龚主任，前次对余应承，改良运输三件事，准在一个月內各站实行。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

12月12日，陈嘉庚到达仰光，发电蒋介石不厌其烦备述滇缅公路诸多问题，再次提出改善建议，并留侯西反、庄明理在各站三个月，“帮助改妥，以尽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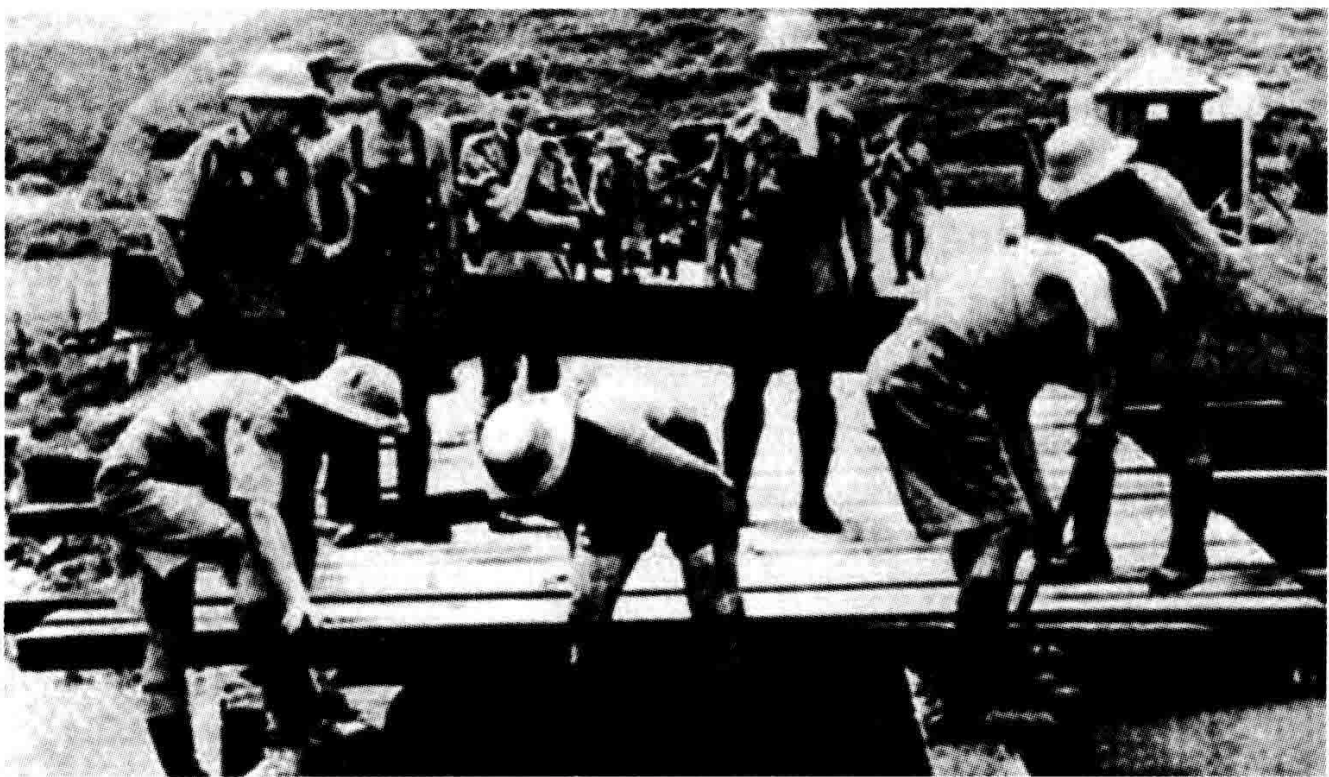
至此，南侨总会慰劳团和滇缅公路考察团全部活动结束。至今，陈嘉庚所撰《南侨回忆录》仍是研究滇缅公路和机工状况的最重要一手材料。

其中，陈嘉庚对惠通桥“虽炸坏，绝不致阻碍交通”，可在上游制备渡船，以援渡车辆的建议，可谓卓杰见识、化解良策。此后，战局变化也证实了这是一个对付敌机轰炸保持交通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万般不解，乃至忧愤指斥的是主事当局的“不视事”，在滇缅公路上空飞来飞去，双脚不肯落地。

故所有对于滇缅公路维持的指令，皆在“空中”，无稽无据遂动辄称“无法”，此种官僚行事，焉能救国于水火？

6

在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中“华侨机工非罪禁暗房”一节所记录的史实无法不被提及。“有一华侨车夫，非其罪而被西南运输处拘禁暗房已三天。侯君闻之往交涉，始放出来见。乃潮州青年人，系新加坡华侨，为爱国而来。时天气寒冷五十余度，余重裘尚觉冷。该车夫似非劳动界，身上只穿一领单布衣，余问‘你衣何如此单薄？’答‘前在南宁服务，衣服一切均在南宁，失陷时适赶运军需在外，致所有衣服尽行失陷，当局言要补偿，迄未见赐，



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暂时中断滇缅公路三个月。图为英军在缅甸境内（畹町附近）拆除滇缅公里桥梁上的木板

数月来衣服甚贵，无钱可买。’又问‘禁在暗房，有被席给你否？’答‘无有。’余伤感之余几为下泪。因余在南洋多方鼓励诸机工三千余人回国服务，今亲见此景况，并忆其他类是者，不知凡几，故不免自咎，且代为悲伤。乃送他五十元为买衣服费。又问‘被禁因何罪？’答‘有某司机是余朋友，余因暂停未有工作，帮助该友驾车，该友犯罪逃走，故当局捕余往禁耳。’”

同样的事情还见诸现存的机工采访资料中。

郑文通，祖籍福建莆田，新加坡华侨。他曾化名“黄亚涛”报名回国。当时大哥为阻拦他回国，曾向筹赈会捐款五百元，并劝告他：“华侨的责任主要是有钱出钱，每次捐款我们都不后人，已尽了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但郑文通执意要走，剃了光头，穿上军装，大哥无奈，只得泪别，临行前摩挲了一下他的光头，嘱咐他：“照顾好自己，战胜就回来。”

当他正全力奋战在滇缅公路的时候，因搭载熟人被龙陵站检查组查出。郑文通被押往昆明五华山拘留所，判两年半徒刑。幸得一位同乡华侨的全力帮助，郑文通只蹲了半年牢，剩下的两年以每天一元钱折算的高昂代价才得赎出。

出狱后的郑文通初心不改，他绝无抱怨，只觉得要抓紧时间投入战斗，把因自己的疏忽耽误的半年时间找补回来。一次运军火通过惠通桥时，遭遇敌机轰炸，刚过桥，前面战友的车头正中炮弹，机工陈天生当场牺牲。郑文通的右腿也被弹片击中，流血不止。但他不愿战友的尸体被烧尽，冒着弹火，不顾一切将尸体转移到安全处，又将自己的车子开到隐蔽点，通知后车随行人员处理中弹车辆和牺牲机工。此时，他早已忘记自己受伤的右腿。等到敌机飞走，再次上路时，开到“老鲁田”，他才抽出时间包扎伤口。坚持开到“七〇七”时，右腿终于动不了了。分队长坚持让郑文通下车，将他送到昆明治疗。

在昆明金碧路陆军医院，医生知道郑文通是华侨，想从他那里索取钱财，就告诉他伤情很严重，需要锯腿，如果想要保腿，需要很多钱。这时，正好陈嘉庚率领考察团考察滇缅公路，侯西反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南侨机工。后来，在侯西反的疏通下，郑文通才得到及时治疗。但出院后，留下了跛脚

的终身残疾。郑文通在战后（1946年）回到南洋，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的华侨政策的鼓励下，又重新回到云南定居。虽然有些微跛，但不影响驾驶。他在玉溪汽车站工作直至80年代退休。每当谈到他留下的伤残，他总淡然一笑，“留个纪念嘛！好的坏的都是纪念”。

李山河，原名“李成业”，祖籍海南，曾在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参加“儿童团”，革命失败后，13岁的李成业流亡新加坡，留守家乡的父亲被反动派杀害。“七七”事变后，李成业为表达“还我河山”的壮志改名“李山河”，临时学习开车，参加机工回国服务团。他参加过南宁战役，后一直服务于滇缅公路运输。正当他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时候，没想到因一个小小疏忽而含冤入狱。1941年4月，李山河与保山姑娘小王相爱订婚。一天，姑娘的哥哥想搭李山河的车去下关参观大理花会。这在当地，是一年一度的盛会。李山河虽知不符合规定，但实难推拒，只得答应。没想到车刚开到保山大板桥就被稽查站扣留。西南运输处军法处不详加审查，就以贪污罪论处，竟判两年零六个月徒刑，送入昆明钱局街第一监狱。李山河无处陈冤，悲愤至极，他没想到，自己为报国而来，壮志未酬，竟因小小差错而获重刑。国难日迫，战争形势并不乐观，为何在这时要对“自己人”如此残酷，自己日夜火线奔驰，难道“功”就不可稍稍抵“罪”？

当他被戴上冰冷的脚铐，“银铛”入狱时，竟发现狱中还有几十位南侨机工，有的甚至刚回国没服务几天就获刑入狱至今。原因，大致与李山河相差无多。他们有九队的陈家标，十二大队的吴国栋、符和明、林宏英、戴新菊等。他们统统都被带上脚铐，^[1]与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犯人同居一处，受尽狱中“四大金刚”“八大天王”的欺凌。“这些人在狱中横行霸道，当局从不过问。一间牢房只有十平方米左右，要关十多个人，只能挤在地板上睡，又脏又臭，桥工原来每月有三十元国币补贴，入狱后就没有了，更受欺负。每天只有两餐，每餐两小碗掺沙的糙米饭。”南侨机工为了生存，向看守要求工作，在狱中纳起了鞋底，每双一角钱，每天可纳两双，这样才可以得到“加菜”。日本飞机频频轰炸昆明，一遇警报，看守就全跑了。铁窗内

【1】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天子廟頂
本路最高點
拔海2600公尺
270公里



1944年，兩位美國戰地記者在滇緬公路最高點——天子廟頂留影

的南侨机工只能听天由命。每到此时，机工最感悲凉绝望：死，并不可怕，可死于此种情境，死，千死亦不甘！李山河曾想，如果此时死了，生时不能申诉，死时上天入地，也要申诉，含冤而死鬼大，他要申诉到底，看看天上天下，究竟有无公理！

暗无天日的铁窗生涯，摧垮了很多南侨机工，能熬到出狱的只是少数。1942年，狱中曾发生一次霍乱，无医无药，任凭病魔肆虐，五天内一百多犯人死亡，狱中三个房间堆满尸体。年仅二十多岁的南侨机工陈家标亦在其中。“有的机工今天还被派去抬死人，明天则由别人抬出去埋了。”

1943年李山河出狱时，惠通桥已被炸断，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峙怒江两岸，滇缅公路断绝，南侨机工也被当局“遣散”了。他两手空空，漫无目的地来到翠湖边踱步，此时正值昆明的盛夏，杨柳依依，莺飞鸟啼，恍如隔世。他站在太阳地里，对着湖水，似乎太阳的多少暖也不足以融化他积在心中的寒冷，他不想用记忆再牵住过去，他也不想去想该向哪里去。他只想就此融化在阳光下、融进湖心里……

后来，李山河找到过去的机工战友帮忙介绍了工作，在昆明同仁街友联荣店帮工，靠微薄的报酬勉强生活。他亲眼所见，不少被遣散的南侨机工流落街头、冻馁而死。直到抗战胜利，经介绍到国民党后勤总部汽车连当驾驶员。当他再次坐进驾驶室，手摸方向盘，禁不住泪如雨下，他想起当年为报名回国，临时学习驾驶，七天学成的往事。他也像这样，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前的景物，只是那时觉得自己可以驶向任何心中所指的目的地。

李山河1949年在四川参加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汽车总站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汽车，也许，他最终到达了他年轻时代心中的目的地。

在接受采访时，他要求采访者记录下他能够证明的几位为国捐躯的南侨机工战友的事迹。

符平，运送军火途中因病死于龙陵站，年仅26岁。

颜振生，运输途中因病死于永平站。

黎锡宽，海南籍。被国民党第五军开枪打死在云南马龙。当时，他开车

在第五军的军马后面跟了几千米，马队全无让路之意。他实在按捺不住，按了一下喇叭，军马惊跳，他及时刹车，头刚伸出车窗，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正好击中他的头部，黎锡宽当场死亡，年仅26岁。战友们将他埋葬在马龙。

这，仅仅是零星可寻的点滴事实，他们的名字或遭遇被记录下来，诉诸上述文字，是侥幸或偶然间出于“口传”“自证”和多年后的考察追踪而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3200名南侨机工，“因公殉职”者几何？“战场牺牲”（如前文所载，往往被“条例”排除）者几何？战后“复员”（加眷属，是一个“扩大”了的数据），却有将近1000名机工生死无由！而这其中如前述遭遇“罚禁械押”，乃至狱中冤死或遭国军“毙杀”之不测者几何？自无任何官方记录！其实，最不幸者是当局者如何视南侨机工为抗战子弟！口是心非，以“自残”为特长或“国粹”，才是不解之解！

舍此，即何有别一善解，也一样，没有“证据”！

7

1940年10月18日，滇缅公路解禁后重新开放。此前，日本已成立了“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以河内机场为基地，重点轰炸滇缅公路。据不完全统计，10月18日至日军入侵缅甸前，日机共出动60批639架次，还有29批架数不详，对云南各交通要道进行狂轰滥炸。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和功果桥就各遭炸坏20次以上。^{【1】}

“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身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便彻底丧失了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不得不向日本政府让步，允许其于9月底向红河以北地区派驻了日本帝国陆军第5师团（利用其轻型轰炸机对同往云南的滇缅公路实行封锁），并最终将中国国民政府的这条经由河内的供给线切断。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的行动，通常被看作日本实施亚洲扩张战略的先兆，

【1】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无疑忽视了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正企图从‘中国事变’的深深泥潭中脱身，攻占印度支那的举动只不过是為了结束其在中国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的又一步棋而已。”^{〔1〕}

日本参谋本部作战科科长，陆军大佐服部卓四郎在其回忆录中称：“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是为了促进‘中国事变’的早日解决。”

由此看来，一举切断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从“中国事变”的困局中尽快“脱困”，进而实施“亚洲战略”是那时日本战略重点。日本已无法忍受因滇缅公路而起到的对战争的“延迟”作用，滇缅公路，必须切断！

但，日军情报部门感到不可解的是，无论投入多少空中火力，滇缅公路总是“炸不断”，物资仍然从缅甸源源运进。滇缅路所经路段山高险峻，敌机轰炸低飞定位困难，轰炸准确度难以保证。滇缅路沿路民工训练有素，在与路的生死扭结中已成为“准工兵”的专业队伍，全路段随时待命整修炸毁的路段、桥梁，随炸随修，昼夜不停。更重要的是，滇缅路有一支忠诚的机工队伍，誓与路共存亡，只要路在，运输，绝不会因轰炸而中断。

因轰炸而牺牲的南侨机工数量，以现存残损的史料已无法统计。但我們知道南侨机工在长期的轰炸中，总结了很多躲避和与敌机周旋的方法，他们把日本飞机当成“飞贼”。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二尺碳人”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所有人。一次，一辆运汽油的汽车被炮弹击中，爆炸燃烧，当人们来到现场时，只剩车架的卡车中，年轻的南侨机工已被烧成二尺高的碳人。他仍然呈端坐的姿势，没有倒下，似乎，向着前方……

王亚六一次正驾驶卡车前往腊戍火车站抢运物资，装货完毕刚待启动，突然遇到日本飞机空袭，才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炮弹已一排排落下，他连忙跳出车外，冲到路边的田坎趴下。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爆炸的巨响让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只感觉土石碎块噼里啪啦从天而降，砸到身上，直到耳朵恢复听觉，他才知道自己还活着。飞机远去，他试着站起来抖掉泥土，居然无恙。他想起刚才的正确应急反应是在接受军事训练时专门练习过的。那时

〔1〕〔美〕约翰·D.普雷廷：《驼峰空运》张兵一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在潘家湾司机培训所中觉得枯燥无聊的训练还是派上了用场。教官曾说过，遇到敌机空袭投弹时，应立即卧倒，两手曲臂放在胸前，支撑胸部离开地面，同时张口。这样可以防止被弹片杀伤，防止地面震伤心脏，还可以避免耳膜震破。

功果桥和惠通桥是敌机轰炸的重点。一次，王亚六所在分队的15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从保山前往下关，行驶到功果桥桥头时，看到桥头已挂起两个红灯笼。原来红灯笼是守桥宪兵所发的警报，一个灯笼表明敌机将要来空袭，两个表明敌机已飞临上空，三个则表示敌机正在空袭。王亚六是排头第一辆车，他跳下车，示意后面的队友，然后猫腰钻进石崖下凿好的防空洞，几秒钟过后，从江岸那边由远而近，敌机轰鸣而来，爆炸声地动山摇，对面山壁上的山石被炸开花，江面溅起丈高的水柱，水中被炸死的大鱼翻起白肚皮，两岸来不及隐蔽的卡车不少中弹，有的整车燃烧起来。短暂间歇后，第二批敌机又飞临上空，仰头看去，飞机肚子里落下的一排排炮弹呈斜线正落在澜沧江深深的峡谷中。峡谷中的雾气尚未完全散尽，一个个火红的爆炸点像大山愤怒燃烧的眼睛，爆炸的巨响沿着深谷向纵深传递，整条山谷似乎都被撕裂了。这一次，日方共派出敌机27架分三批轮番轰炸。虽然炸桥难度极大，但在密集的轰炸中，功果桥这次没能幸免于难。几枚炮弹正中桥身一边的铁索，钢索结构的吊桥炸断了，桥面吊板开始坠入江水。

敌机似乎侦测到功果桥已被炸断的情报，投下最后的炸弹，呼啸而去。此时，澜沧江两岸公路上已堵塞了几百辆车子，南侨机工们聚集到桥头，看着滚滚江水，切齿痛恨。他们决心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桥断了，但运输要继续。他们找来空汽油桶，和桥工们共同将汽油桶扎成长方形的大浮筏，上面铺设木板，再将浮筏两头用钢丝绳拉到两岸的滑轮上，由两岸汽车轮流对拉钢丝绳牵引浮筏。这样，就可以将汽车开上浮筏，然后牵引浮筏渡江。在实验成功后，机工们精神振奋，保山汽车运输分处也派来一个伙食团支援。不久，机工和桥工们就从附近仓库找到了几百个空油桶和木板，他们把扎成的大浮筏再连接起来，就成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汽车可以直接从上面开到对岸。凝滞的车流终于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就又开始移动了。机工设计的浮桥

可以在敌机轰炸时拆开隐蔽，等轰炸结束，又可以迅速恢复通车。而在公路已经通车之后，日本人的电台还在欢呼：“功果桥被炸断，滇缅公路三个月内绝无通车希望！”

据回忆，虽然在不远处的江段正在紧急修建新桥，但机工们抢修的浮桥仍然支撑了桥断之后的运输。正如陈嘉庚在实地考察后所言，功果桥和惠通桥其实可以预先准备渡船或浮桥，以备桥炸断时使用，而非桥断则运输线必断。机工们也并非“急中生智”，这其实只是一个“常识”（陈嘉庚言）范围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路政当局长期无视事实、无所作为、全无准备。出现问题只知层层上报、层层塞责，而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对事”全权负责的主事者。国人此一种“只对人不对事”的“风范”实造成历史中多少“不因事坏，只因人坏”的悲叹！

惠通桥，横跨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峡谷。它位于龙陵县腊勐村怒江古驿道渡口。早在清代就因其重要的“咽喉”地位，光绪帝特赐桥名为“惠通”。1933年，惠通桥重修，耗资8万银圆，缅甸华侨领袖梁金山捐资2/3。竣工后，有人建议改名为



从空中拍摄的惠通桥

“金山”桥，被梁金山谢绝。1938年抢通滇缅公路时，改造为公路桥，每次可通过10吨车一辆。为保护惠通桥，当时在惠通桥桥头布防了高射炮阵地。

日本飞贼并不惧怕惠通桥两岸的绝壁陡崖，他们降低飞行高度，穿行于峡谷中，不炸断惠通桥誓不罢休。自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6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狂轰滥炸。蒋介石遂下令上午9时至下午3时，惠通桥禁止通行。陈嘉庚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此禁令“一举两失”。“该桥长仅八十公尺，运货车瞬息即过，何致在桥上被炸。禁止该时间内通行，未免致使两端货车连接许多辆在路上等候。如敌机来炸，岂不更觉危险，无乃安危倒置乎。况该段路路程甚崎岖，夜间不便通行，日间又减少半日，阻碍军运不少，真乃一举两失。我国人常识浅陋，而负责人亦如是，妄报上峰下此禁令，可胜叹哉。”

黄友镐一次在距离惠通桥两千米处遭遇空袭，此时，两岸公路上正拥挤着长长的车队。他将汽车尽可能地隐蔽好，就跳出车外躲在大树下，心中一直默念汽车千万不要中弹，因为装运的是满车弹药，一旦中弹将引爆路上的一连串汽车。

9架敌机对大桥和两侧公路轮番轰炸，桥面的木板已经起火，桥头两侧无法隐蔽的汽车中弹无数。对岸公路上一辆运载汽油的车被炮弹击中，一长串车像火龙一样燃烧起来。直到敌机远去，黄友镐回到公路，才得知，前面路段一名南侨机工因为在车流中无法躲避，只得躲在汽车下，弹片引爆了汽车油箱，司机身亡。惠通桥两岸，长达几千米的车队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又无人疏通、无人救济，大拥堵在几天后才得到疏散。黄友镐和工友们被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只得采野果充饥。

邓丁元和张光旺在大抢运中从腊戍运输汽油前往保山，通过惠通桥时正值夜间。只见两岸的盘山公路从江底到山巅，运输车辆的车灯所形成的一团团光晕沿着公路在缓缓移动，像一条时隐时现的火蛇游动向深不可测的夜空。在惠通桥畔一处危险路段，由于夜间行车无法看清道路和刹车失灵，车滚下悬崖……

等到张光旺从医院的急救中醒来，才得知驾驶员邓丁元因翻车脖子被玻

璃割伤，流血过多牺牲。而他在被送入医院时，颅骨破裂，右眼爆出，只剩一口气。类似的事情在大抢运期间发生无数。

一天，孙其文和王亚能运输炮弹经过江边，远远听见轰炸机呼啸飞来，孙其文早有了躲避飞机的各种经验，他想加足马力开到不远处一个比较隐蔽的山洼里。忽然，一阵凄厉的划破空气的声音伴随着巨大的炸响——一颗炸弹在右前方靠路的山壁上爆炸了。孙其文急忙刹车，滚烫的气浪几乎要把车掀翻，迎面飞来的砂石扑击到挡风玻璃上，身边副驾驶位上的王亚能“啊”的大叫一声，双手捧住脸。孙其文见他满脸是血，慌忙掰开他的手查看，一大片鲜血淋漓的皮肉敷在王亚能脸上，一开始，孙其文也以为他的脸被炸坏了，当把皮肉揭开，发现王亚能的脸并没有受伤，此时才看到，挡风玻璃和车身右侧，满溅血肉——刚才，路右前方正在清理土石方的民工被炸死了，他，几乎没有留下成形的残肢。

他们下车在方才这位殉难民工劳动的地方站定，这或许是人间唯一的，对这在瞬间化为乌有的生命的致哀。王亚能满脸的血在阳光下燃烧，一个血肉生命最后的温热归向了太阳，或，传递给另一个热血的灵肉者。

第七章 抢运抢运！真正的“殿军”

1

1941年12月7日凌晨，珍珠港事件爆发。

这是一个星期天，太平洋中心深沉的黑暗忽然被火光点燃，梯次密集的日本轰炸机穿过海岬上空云层，突然飞临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军事基地上空。全无防备的美军甚至不知道飞机从何处飞来，360架飞机投下骤雨般密集的炸弹，整个太平洋都被血腥的风暴掀动了。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突袭中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有3艘被炸沉，1艘倾覆，其余均遭严重损坏。3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以及其他一些舰只被击沉或击伤。在岛上机场停着的231架飞机，只有166架保持完好或者可以修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250架飞机中只有54架得以保存。3000多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在袭击中身亡。

虽然战后解密的军事情报称，美军实际上事前已截获日军将发动偷袭的密电。但最高指挥部门对当时日本战略意图判断有较大偏差——美国以为日本的打击将放在马来亚和菲律宾，没有想到日本会直接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基地。

11月25日，日本第一航空母舰——南云舰队在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下从千岛群岛起航，同时，另一座电台在日本国内模仿着这支舰队的信号，美国情报部门严密的监控网被欺骗了。这个“隐身”于黑暗的舰队一直向东行驶，按照秘密计划前去袭击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

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带有一定报复色彩。

1940年9月26日，美国对日本实行钢铁禁运。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从美国装运废钢铁到日本，日本宣称这是“不友好的行为”（10月8日）。

1940年9月27日，“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建立。

1940年10月18日，滇缅公路重新开放。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将援华

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源源运往中国。

1941年7月26日，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这是美国对日本继续扩大占领印度支那的惩罚。英国立刻做出了同样反应。

1941年8月17日，罗斯福总统警告日本：如果日本试图进一步奴役亚洲，美国将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步骤来捍卫美国人的利益。就在日本故意以“障眼法”派驻美大使在华盛顿就两国紧张关系进行斡旋谈判的同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美国举国震惊，认为珍珠港遭偷袭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的奇耻大辱，舆情沸腾，终于，在舆情的助推下，美国正式驶入战争轨道。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12月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12月11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几乎覆盖全球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

蒋介石对于战局的突变暗自窃喜，只要美国被拉进战争，中国将不再孤立，为了保障中国战场能够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美英势必一改摇摆的态度，正面支持中国的抗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不出蒋介石所料，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国继续抗战。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这令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7日致电蒋介石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获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珍珠港奇袭发生以后，接下来的事情更出乎美英当时的判断。日本在同一时间，发动了对东南亚的全面进攻。1941年10月，日本组成东条英机内阁，法西斯体制实现了军政一统，日本这部战争机器空前疯狂。1941年11月5日，日本帝国统帅部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对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

洋舰队、英属马来亚、美属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发动突袭，以求据有整个南方资源区。他们计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采取突然袭击，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东太平洋地区主要的敌对力量，同时夺取南部资源区和用来构成环形防卫圈的战略要冲；第二步，巩固和加强环形防卫圈以阻止任何盟国的进攻；第三步，挫败盟国任何渗透防线的尝试。日本人相信：鉴于盟国交通线既漫长又脆弱，日军的防卫力量将足以保证其攻略成功。借此，以缅甸作为战略要点，切断滇缅公路，实现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逼迫蒋介石投降，促使“中国事变”快速解决。

日本在发动珍珠港袭击的同时，竟然精确有力地调动了事前已进行精心布置的一切海陆军事力量，从1941年12月7日起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发动全面进攻。与之相应的却是英美军队在殖民地的丢盔弃甲，节节败退。

12月7、8日，日军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和泰国的宋卡、北大年等地空降或登陆。10日占领关岛。此时，日本已取得东南亚海域的海空控制权。22日占领威克岛。25日攻占香港。1942年1月11日，日军占领吉隆坡，31日攻占马来亚全境。2月15日新加坡陷落。

日军还从印支南部进攻泰国，1941年12月9日侵占曼谷，21日日本将同盟条约强加给泰国政府。1942年1月2日进入马尼拉。4月9日，驻守美军与菲军约七万人投降。5月7日，美军司令下令余部投降。

1942年2月14日，日军出动320架飞机在苏门答腊的油田区巴邻旁空降。3月1日，日军在爪哇登陆，5日占领巴达维亚（雅加达）。3月12日，荷兰总督投降。3月15日，日军占领整个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

短短三个月，日本完全按计划实现了战略意图。再加上希特勒在欧洲、北非、苏德战场的胜利。轴心国统治全球的胜利会师似乎真的会成为现实。

反法西斯国家空前紧迫，通过一系列紧急的双边和多边会谈，1942年1月，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宣言》，标志着以美、英、苏、中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为日后建立联合国组织，重建战后秩序奠定了基础。

2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的沦陷。这个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远东堡垒”的小小半岛的沦陷，宣告了大英帝国残梦的破灭。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

对于日本来说，占领新加坡有几重战略意义，除去它是日本实现对太平洋和印度洋军事控制的据点之外，占领新加坡可以从心理上大大打击英国对于整个东南亚殖民地的信心。同时，对于新加坡的主体居民——数十万华人，日本早就怀恨在心，因为他们一直热情支援祖国抗日，陈嘉庚号召回国的三千两百多名南侨机工成为滇缅公路运输的主力。滇缅公路在日本人看来，是“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最终变成三年都难以跳出的“泥潭”的主要原因。日本人，对星岛华人早就欲除之而后快。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国的抵抗迟滞而无力，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林江石率领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迫于英国此时已无力东顾，总司令部决定投降。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在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厂亲自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这一天，正是农历新年。约十三万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当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伪满洲国修造铁路。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将领“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

1942年2月17日，日军对华人展开“肃清”活动。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日军在二战中发动的十万人以上的大屠杀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三次大屠杀中，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

和指挥下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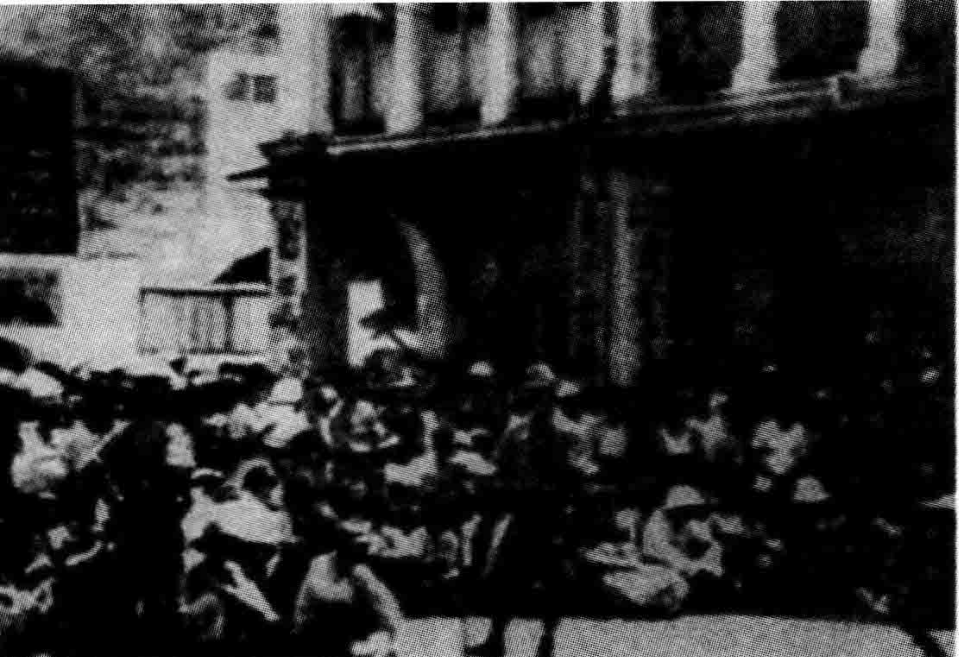
日军的“肃清”对象重点是几类华人：①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②曾经慷慨捐输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③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④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等。

陈嘉庚被定为“头号通缉犯”，在全南洋范围内悬赏缉拿。他乘坐小船来到爪哇朗玛避难，时刻身揣砒霜以求被捕时自尽。掩护过他的侨领庄西言不幸被捕，日本宪兵队长严刑逼供，庄西言被打落四颗牙齿，始终咬定对陈嘉庚下落“不知道”。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身陷囹圄三年零四个月的庄西言才重见天日，陈嘉庚也从避难处来到巴城，两位生死与共的挚友相拥而泣。

2月18日，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对于已经明确授意的屠杀，“甄别”只不过是过场和作戏。2月22日，作战处主任参谋辻政信在巡视“肃清”工作时，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70人后，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之后，大西觉分队一口气抓捕几千人，塞满几十辆汽车，屠杀于樟宜海滨。

《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据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这些地点都有大量遗骸被发掘。



↑日军对新加坡华人进行“肃清”
↓在新加坡大屠杀中遇难的华人骨骸

南洋和新加坡沦陷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大陆，听说日本人专杀回国参战华侨的家属，南侨机工撕心裂肺。他们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打听南洋的消息。但敌占区封锁严密，很多人都与南洋亲人失去联系直至战后。

马来西亚华侨陈介文曾在怡保有一个温暖的家，当他告知家人他已报名回国时，四个儿女将他团团围住，已经懂事的姐姐哥哥抱着父亲哭道：“爸爸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们！”是贤惠的妻子拨开儿女的手对孩子们说道：“爸爸是去打日本鬼子！等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中国爸爸就回来！”陈介文还记得临走时，两岁的小女儿一直抓住他不放，被妻子硬拽开时，孩子放声大哭。陈介文最后看了一眼站台上的母子五人，扭头走了。

战后，陈介文才得知妻子在大屠杀中被日本人杀害，抛尸荒野。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得以掩埋。十四岁的姐姐带着弟妹艰难求生。1946年听说南侨机工得到批准返回南洋了，四个孩子天天在码头上流浪，祈盼着父亲的归来。

在新加坡沦陷后的大“肃清”中，日本人逼问机工韩利丰的妻子周亚妹道：“你丈夫干什么去了？”周亚妹镇静地说：“几年前出去做生意，病死在外边了。”没想到，竟逃过一劫。周亚妹在沦陷区带着女儿苦苦支撑到战后，她始终坚信丈夫还活着。

韩利丰在新加坡沦陷后一直想尽办法寻求妻女的消息，几年都杳无音讯。他最终希望破灭，估计家人已被害身亡。在机工战友的撮合下，他与云南姑娘李瑞萱结合，战后定居云南。韩利丰曾任云南一平浪矿山车队的队长，培养了大批驾驶员和修理工，李瑞萱在当地任小学老师，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和美。

直至“文革”风暴袭来，韩利丰因“华侨”背景被打为“走资派”，必须“靠边站”。李瑞萱也因出身旧军人家庭，被打为“军阀”。韩利丰走投无路只得携妻子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海南老家谋生。不想竟从一位老乡口中得知周亚妹还活着。韩利丰不知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想立刻去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但是又觉得这样对李瑞萱不公平。他选择了将“秘密”和痛苦沉埋心中。

他们一家后来再次回到昆明，日子平静如水地过去了许多年，但在韩利丰心中永远隐隐作痛。终于，李瑞萱还是知道了韩利丰过去在新加坡的妻子还在人世的消息。她开始难以接受，后来又怪罪老韩没有把实情一开始就告诉她。终于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对韩利丰说：“你这个死老头，怎么就忍心抛下她们母女几十年不管不问，人家为你守了五十多年的活寡呀！想必现在她也是老人家的了，不知她生活得怎么样？还不快写信去联系，要不把她接过来一起过晚年吧！”

韩利丰的泪水如滚珠般落下，他记得在战争年代，在他年轻时，眼泪总是硬硬地含在眼中，不轻易落下。可是这一次，眼泪像冰释的小河，从心底

涌流而出，流过他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流向他多年前出发的那个地方——原来，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心中的某一点出发的。他感激李瑞萱，他感到有这样的妻子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她包容了他和全部的历史。

终于，在1991年9月，八十高龄的韩利丰回到新加坡，他见到了白发成霜的周亚妹。两位老人相对而泣，久久无言。周亚妹把韩利丰带到多年前已去世的女儿坟前，韩利丰抱住墓碑失声痛哭：“女儿，阿爸来晚了，原谅阿爸吧，现在阿爸来看你了，再叫我一声阿爸吧！”在韩利丰心中，女儿还是那个牵着他的手，仰脸看他的小女孩，她，未曾长大。

周亚妹除了有个外孙之外，并无亲人。韩利丰向她提出共同回国生活：“跟我回国吧，瑞萱希望我能接你回去，我们都七老八十了，不图别的，让我们相依为命吧！”周亚妹欣然答应。

回到昆明，一进家门，一大家子人已等待多时，李瑞萱迎上去，拉住周亚妹的手说道：“老姐姐，你终于来了，欢迎你呀！这是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他们都很孝顺，会照顾你安享晚年的！”周亚妹双唇颤动，叫到：“瑞萱，阿妹哟……”三位老人相拥而泣，儿女们无不下泪。

从此，三位老人相扶相助生活在一起。李瑞萱和周亚妹像亲姐妹一般。周亚妹逢人就说：“我有福气，和瑞萱妹妹有缘呀！”这个战争所造就的特别的家庭温暖着周围所有的人，在存世的南侨机工和他们的儿女中传为美谈。

王云峰，海南琼海人。在新加坡报名参加机工团回国服务。他在海南家乡与当地姑娘阿莲结为夫妻，育有



韩利丰(右)与周亚妹(左)、李瑞萱(中)的合影(1993年)

一子，幸福美满。后到新加坡谋生，海南岛沦陷的消息传来，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王云峰猜想家人恐已遭敌人杀害，满腔仇恨，和几个琼籍好友临时租车学习驾驶，报名回国。

国恨家仇，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在抗日运输线上的服务。1942年5月，滇缅公路怒江以西为日军占领之后，他报名来到印度，服务于中印航线运输，后又调往贵阳等地服务正面战场。抗战结束后，国内战争爆发，他和几位机工战友在淮海战役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参加解放金堂岛的战斗中，王云峰火线入党，从爱国华侨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正当他跟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解放海南岛时，突然接到命令北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和至今下落不明的家人曾已经近在咫尺，忽而又远隔天涯——命运就像故意捉弄他一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云峰在炮兵团担任副排长职务，负责运输。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敌机炸伤，1952年回国治疗，6月正式复员。此时，他终于可以回到离别近二十年的家乡了。近二十年，他没有得到关于家的一丝信息。家，还在吗？家人，还在世上吗？还能找到吗？假若都不在了，坟墓会有吗？连坟墓都没有的话，他，该在哪里造一座新坟去召唤久已无主的亡魂呢？战争，打断了一切，为什么就是打不断回家的路？人的双脚就像生着根，一朝能自由走了，便会朝记忆中的家走去。他感到害怕，他不怕流血牺牲，但是害怕去面对那个他已经在心中面对过无数次的“事实”。

椰林，还是那片椰林吗？是，似又不是。这条椰林间的小道，就通向他的家。海风吹过，树顶发出特有的噼啪快响，他放轻了脚步……家，就在前面——房子还在，但已年久失修，断垣残瓦，一面的土基墙倾倒了，门紧闭着。他试着敲了敲门，再敲……突然，门打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探头出来，她“呀！”地一声，惊呆了。是母亲！她还在人世！老太眼中滚动着浑浊的泪光，浑身微颤，说道：“你，是人是鬼？”王云峰扑通一声跪下，抱住母亲的腿哭道：“妈，是我，你认不出了？”他只感觉到母亲的眼泪噼啪落在他的头顶，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已长出白发的头。

原来，惠通桥以西被日军占领之后，滞留在敌占区的南侨机工多被日本

人杀害。同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猜测他已被害，回乡时将消息带回了家中。所以，家里早以为他已经死了。母亲拉着他来到家中为他所设的“灵位”前，将灵牌打碎在地。

问起阿莲，母亲哭诉道：“日本鬼子来的时候（1939年），阿莲要去新加坡找你，总是打听不到你的消息，她就带着孩子乘船去了新加坡，从此再没了消息……”王云峰心中升起一线期望，也许，她和孩子还在世上。他开始四下寻找有可能知情的人，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忽有一天，一位从新加坡回来探亲的乡侨听说王云峰“复活”了，特来拜访。他带来了重大消息：阿莲和孩子还在新加坡，只是，已有了新的丈夫。

她当年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新加坡，此时，王云峰已经报名回国了，她到处打听，都没有丈夫的消息。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一位好心的乡侨收留了她，让她做些杂工糊口。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本人把很多无依靠的女人拉去做慰安妇，她在这时嫁给了收留他的乡侨以躲过劫难。这位乡侨亦是一位笃实忠诚的汉子。日占时期，他一直保护母子二人渡过难关。此后他们又生下一男一女，现一家人在新加坡安居。

王云峰悲喜交集：阿莲和孩子还活着！在离乱痛苦中，老天怎么给了他王云峰这么多幸运！但当他想起他与阿莲情深意笃、美满同心的岁月，他又悲从中来：战争还是夺走了他的家。但他已经知足，只要他们母子过得好，他就放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正在家中干活。小路上走来了前后四个人，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出现在他面前：她没有正眼看他，只是将身后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推到他面前，说道：“叫爹！”那小伙子讷讷地喊了声：“爹！”王云峰愣住了，过了许久，他开始用手抚摸着孩子宽大的身板，就像摸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当他离开家到新加坡谋生时，孩子还不满周岁，而今，已经是“大人”了。他拉住那位中年女人的手，不管她们变得多么苍老，他都能认出——这是阿莲的手。阿莲依旧不看他，悲泣不止。他又拉过躲在母亲身后的两个孩子，他们长得都像阿莲，他，将他们拢抱在一起……

在新加坡的阿莲听说王云峰还活着，而且孤身一人，心潮难平。她陷入

两难，和后任丈夫已生活多年，又生下一双儿女，并非没有感情。但是，内心难以抑制的情感在呼唤她回到王云峰身边。阿莲的第二任丈夫早已察觉妻子的心念，在华侨心目中，南侨机工都是英雄，是华侨的骄傲，他由衷钦佩。最后，他主动提出，让阿莲回到王云峰身边。于是，阿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海南，站在了他的面前。

此后，破镜重圆的王云峰一家和谐幸福。他对阿莲带回的两个孩子视如己出。所谓“悲欢离合”，对于王云峰来说，每一味都醇厚深长。

3

缅甸对于日本的“南进”战略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东拒英国势力最为深入的殖民地印度，更重要的是，占领缅甸可以直接切断滇缅公路，并据有缅甸的若干机场快速取得空中优势。

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各路攻势的同时，其第十五集团军静悄悄地入侵了泰国。当日军主力正为全面入侵缅甸做准备时，一支分遣队夺取了缅甸最南端的维多利亚空军基地，切断了印度到马来亚的英军空运线（12月23日）。

1942年1月12~29日，日本陆军中将坂田祥二郎的第十五集团军（辖两个师团，配有大量飞机）从泰国向西开始进攻毛淡棉和土瓦，随同日军进攻的还有一小队缅甸革命者，他们得到了日本让缅甸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的允诺。次月，昂山和他的“三十同志”组织已成功地煽动了小规模的反英暴动，并在英军防线后进行破坏活动。

1942年1月30~31日，托马斯·哈顿中将的驻缅英军遭到突袭，随即被赶出毛淡棉，死伤惨重，被追击后撤过萨尔温江。

1942年2月18~23日，日军渡过未设桥的萨尔温江，包围了英军的左翼，在日军的追击中，英军退至锡唐河西岸，丢弃了几乎所有重型装

备。

1942年3月5日，陆军中将亚历山大爵士到达仰光，接替了哈顿的指挥权，虽然从印度调来的少许援兵使英军地面部队恢复到两个小型师，但亚历山大仍认识到他士气低落的部队现在不能挡住攻势正旺的日军。于是，他主动放弃了仰光，日军随后占领了这座都城（3月7日）。此刻，缅甸局势已十分不利，除了滇缅公路与中国相通之外，已与外面的世界割断了联系。

直到日本直指仰光，英国才感到大事不妙，仓皇要求已集结在中缅边境多时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

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

1942年2月末，在日军疯狂进逼下，驻守缅甸的英军丢失大部分战略要地，败退弃守，已成必然。在此种危情下，英方方才同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而此时战机已丧失殆尽。3月1日，远征军再次下达动员令，进入缅甸。中国远征军以卫立煌（后为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名义上远征军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共三个军九个师：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共十万兵力，应该说，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从1942年1月开始，远征军经滇缅公路，到达中缅边境，等待入缅。这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开赴境外支援盟军的行动，主战部队，士气高昂，意气风发。戴安澜感奋吟诗：“远征功业迈秦皇……先挽长弓射斜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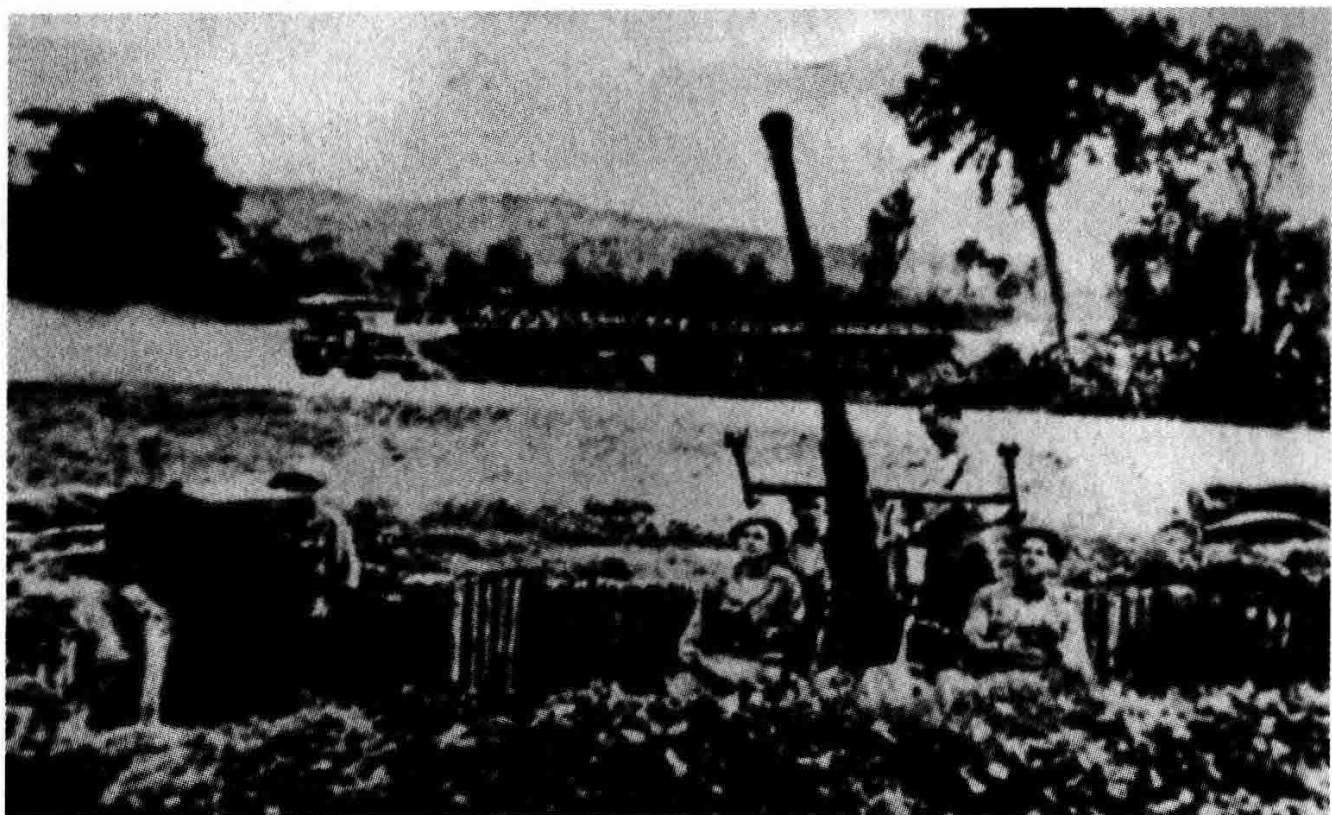
滇缅公路上，运送远征军的运兵车和拖拉大炮的牵引车首尾相接，绵延百里，喧嚣嘈杂。

南侨机工各运输大队，肃整内部，重申初志，配备优质管理及技术资源，鉴于与军队关系的重要，特别强调协调隐忍。于是，车队上路，承担了



↑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车队

↓滇缅公路上的运兵车



大量运送远征军及后勤物资的任务。

国内舆论对远征军入缅作战欢欣鼓舞。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我军此次入缅，定能扭转缅甸局势。”《中央日报》号外：“国军远征缅甸，定能扬威异域。”《云南日报》通讯：“省主席龙云昨日慰问入缅军，捐赠滇币五万。”《扫荡报》通讯：“我省民众踊跃劳军，滇缅路各县场面感人。”滇缅公路沿线的群众纷纷来到路边欢送远征军，摆满劳军的果品和茶水。

中国远征军，义师英发，震动中国，震动世界。中国军队将第一次加入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国人无比振奋。昆明倾城欢送，泪洒衢巷。但各路征调的部队，开发两千里，却最终在中缅边境中国一侧滇缅公路沿线奉命待留。进不能，退亦不能，十万大军全无所向，军心浮动，乱象频生。

保护滇缅公路运输的
美军高炮基地

此时的西南运输处为适应战局需要已经调整机构，由滇缅运输局统制，正处于战前运输的又一高峰。但机工队伍遭受巨大压力疲于奔命，却与滇缅公路蚁集，无战令而意志涣散的军队形成强烈反差。军队任意征调车辆，强载强搭，其矛盾日比一日尖锐。

机工每忆及此，愤怒而心存忌惮。国民党制下的军队，系统复杂，强征拉丁为多，这些军队往往无统一意志，侵害民利成风，军阀戾气嚣张。机工何纪良、王亚文回忆：“最怕是拉当兵的上路。”一次，因路况恶劣，颠簸太大，车上的军官即用枪托猛烈地砸驾驶棚顶，何以为出了事，连忙停车，不想却被一军官扯下车来，一顿毒打：“你开的什么车！祖宗是去送死！不到死时是祖宗！你当是炒豆拿我播着玩？”——这是最轻的，重则士兵围殴，用皮带抽打，动辄以“枪毙”威胁。几乎每一机工都遭受过毒打凌辱。

终于，2月的一天，酿成芒市机工大队与驻留军队的剧烈冲突。据何纪良等回忆，那天是一个“赶摆天”，三棵树附近聚集的傣族商摊很多，适逢机工卸载轮休，也结伴上街闲逛。忽然街市上啸声四起，一队士兵抢夺傣族食品烟酒，几个士兵竟然撕扯两个姑娘当街猥亵。机工在德宏地面已经三年多，与傣族联姻者有之，全视傣家为戚属。加之怨怒郁积，瞬间爆发，一声呼喊，机工十数人上前呵斥、排解，进而与士兵扭打成一团。附近先锋大队队部的机工闻讯赶来，越聚越多，遂对阵开战，赤手的机工抄来汽车摇柄扳手，越战越狠。何纪良等看士兵出枪，拉栓声一片，本能的反应是抢夺枪支。此时，留驻军队的军官带大批荷枪实弹队伍赶到，对空鸣枪，将机工团团“缴械”包围，强令站成一排，要以“违犯战时管制令、侵犯军队、抢夺枪支罪”执行枪决。他们竟然在机工的汽车里搜到了一支步枪。机工无所畏惧，声明先是军队欺负百姓，“路见不平”而已！何纪良则挺身而出，坦言，那支枪是他从一个士兵手下夺过来的，否则他开枪，死的就是我！正因为不欲酿成流血，夺枪之后，甩在了车兜里！他指指胸前的机工佩章，道：“你们抗日，我们也抗日，同此受命，同为国人，你们为什么要恃强凌弱？要论死，我们三年来死多少回了！况我们是归国华侨，受滇缅运输总局所辖，不是你们敢轻易处置的！”

军官果受震慑，将“搜”来的枪拿来查验，枪真是上了膛的，只毫厘差池，极有可能酿成惨祸。遂稍缓。但此事震动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副司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他颇感棘手，只得再呈上峰。

这只是较为突出的一例，自远征军麇集待发，“两个多月期间，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反反复复，捉摸不定”，“指挥多次变动，系统紊乱，权限不明，各有所私”，受战局晦暗不利影响，怨怒丛生，加之军纪松弛，部分军人恶习使然，与机工冲突不时发生，并未完结。以整体而论，对出国作战，中国军人均视为荣耀，但“国军”是以“训令”压制部下的，其普通士兵来源，大多为强征民夫，思想意志的高度统一无从谈起。而南侨机工均有纯粹报国意志，文化礼仪，自觉约束，尤其不能忍受无端侮辱和对百姓的欺压——故从本质上言，不幸为一种人本的文明的冲突。关于滇缅公路运输，作为战场主官，杜聿明日后有一个概略的评价：“蒋介石坚决站在反共反苏的立场，断然拒绝苏联援助，他集中全力经营滇缅公路，任命宋子良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设立许多汽车保养站，集中主要车辆担任运输。由于宋子良搞得一塌糊涂，以后改由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亲自任总局长，后来并有美国人参加整顿，也都不见起色。”杜所指蒋“全力经营”滇缅公路，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足见其关系全局。后续各节并不隐讳宋子良、俞飞鹏等的无为无能，应当说是基本客观公正的。

“全民抗战”，在某种意义上，是血乳交杂，将这混混沌沌的一团砸向灭我之寇仇，以求生存。羸弱的民族一旦鼓动聚合，是不能将这原始的每一丝血肉加以“理智”细解的。

翁家贵在运兵时曾与一位排长闲谈，这位坐在副驾位置上的年轻的排长，对机工渡洋来国，钦佩不已，互报年庚，竟是同岁。借汽车加水的机会，把自己的手枪递到他手里让他打，翁家贵只摆摆手说：“不会！”排长便笑道：“你也算咱当兵的了，连枪也不会使怎么行？”翁家贵指指方向盘：“我们是操方向盘的兵！”脸上毛茸茸未脱稚气的排长说：“兄弟，明天就上战场了。我带一个排，四十人，号令一出，我必当先！知道啵？我会死在第一

排敌人的子弹里，我怕，并非贪生，就怕连日本鬼子的脸没看清就死了，冤哪。你，好兄弟，你会打枪，你接着我，有机会，为我中国人亮个胆！”出境前，军队下车改变行军路线，排长和他的士兵在一遍喝令声中回首一眼，似是告别。从此，翁家贵再没见过这个忘了问其姓名的排长。

一次，孙其文的车队受命运送第六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团一团入缅作战，中缅运输局的命令是将一团送至遮放，再从遮放抢运弹药回昆明。1941年11月，西南运输处撤销，已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简称“中缅运输总局”，由交通部长兼军委会后勤总部部长俞飞鹏兼任总局长。

一团羊团长突然指令待发的车队留下，他粗鲁蛮横地用四川话对孙其文喊：“老子的队伍今早就要出发，你快去集合你的车夫！不规规矩矩，老子要你们的命！”孙其文心中虽十分不快，但此前有训诫，要忍辱负重，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不能逞个人意气。遂集合车队用两天半时间将一团送抵遮放。谁知一到遮放，全体司机就被武装看押起来，不准他们去运弹药。孙其文、王亚能、黎锡宽去找羊团长交涉：“中缅运输总局命令车队要运弹药返回昆明，我们违令也是罚死，你们还是快放人吧！”

羊团长笑道：“中缅运输局是个屎！老子们奉军命要去前线，你们必须把我们送进缅甸！这是军令！”

王亚能辩解道：“我们车队只能听从总局命令。”

“放屁！再啰唆老子毙了你！老子到前线送死，不能走着去！”

当晚，车队司机被集体关押在一座竹楼中过夜。

车队对日机轰炸规律十分了然，运输总局所以要车队放下部队就趁夜抢运积压在遮放的军火，一是遮放仓库基地已成为日机轰炸重点目标，且多在清晨来袭；从军队安全计，在此改为徒步行军，亦为便于躲避空袭。但一团长丝毫不加理会。

抗命是死，抗羊团长的命更是速死。孙其文、王亚能、黎锡宽秘密商量着怎么脱身。孙其文说：“我们三个必须先逃出去，到保山向总局汇报，让他们跟军队交涉，才能解救其他人。”黎锡宽说：“就趁天亮前，说我们要



南侨机工车队驶过遮放

小解，躲到车后，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摸进驾驶室，开车就跑！”三人又细细商议了一阵，怕引起卫兵注意，就分头睡觉了。

天未亮，孙其文三人便假装刚睡醒的样子，下了竹楼，卫兵正倚着楼梯打盹，猛一惊醒，举枪问道：“干什么？”

孙其文说：“憋了一夜，要撒尿！”

卫兵努嘴道：“那边！不准跑远！”

三人挨到车边，故意对着汽车油箱撒尿，发出很大的声音，卫兵只得扭过头去……机会来了，三人迅速跑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闪进驾驶室，发动了卡车……卫兵察觉了，吆喝道：“跑啦！跑啦！”只听连续几声枪响，几个哨兵赶了过来。此时，孙其文和王亚能的车已经发动了。又是一阵枪响，黎锡宽因为车停得较远，就在他关上车门的一刹那，中弹了，他的车没能启动……孙其文、王亚能猫着腰，避免被子弹射中，快速冲过哨岗，把一片混乱声甩在了身后。

黎锡宽当场牺牲，此时，他还不满 20 岁，他参加机工团回国时，还是一个学生。孙其文、王亚能满腔悲愤，径直回到昆明向总局汇报了车队被强行扣押和黎锡宽被枪杀的情况，但无果而终。车队其余的机工和车辆被羊团长胁迫去往缅甸前线，战非战，一片混乱，不数日，腊戍溃退，车队不是遭炸毁坏，就是为溃军阻断冲散，机工有的逃回，有的牺牲，而那些华侨捐赠

的车辆多沦落敌手。孙其文等返回遮放时，溃军如潮，在黎锡宽泊车处，一只轮胎在燃烧，不见血迹……

中国远征军自1942年3月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千米。英国军队屡战屡退，望风溃逃。致使中国远征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远征军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的胜利。

日军在占领仰光后直扑同古。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防守同古，与3倍于己的敌人激战12天。这是远征军入缅作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斗，歼敌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戴安澜后在东枝战斗中再建奇功，中弹受伤，在翻越野人山撤退中牺牲。周恩来曾致挽辞：“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仁安羌是缅甸最大的油田。日军第33师1万多兵力很快攻占了油田，并包围了7000多英军，俘获500多士兵、传教士和美国记者。4月14日，丧失斗志的英军请求中国远征军解围。

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急令113团1300多人火速驰援，亲临前线指挥。113团团长刘放吾率部4月17日赶到宾河北岸。远征军虚张声势，用80辆汽车拖着树跑，造成黄尘飞扬，又泼洒汽油烧得火光冲天，日军一时被迷惑，退至宾河以南。远征军渡河向日军发起猛攻，使日军防线拉开一个大口子，英缅军得以脱困。当他们撤退至113团阵地时，高呼：“中国万岁！”远征军和孙立人以少胜多，一战名扬天下。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孙立人“帝国司令”勋章。

尽管远征军将士浴血奋战，但由于战机延误、英军溃逃和高层指挥不统一，最后仍兵败缅甸。最令人痛惜的是，远征军在撤退中，由于中路线阻断，撤退路线多歧，且指挥失灵。相当多的部队走入缅北野人山原始森林，大部分部队深陷绝境。而孙立人所率领的新38师则选择了缅印边境的山林地带撤退进入印度，较完整地保存了部队建制（7000人）和装备。

远征军10万军队入缅作战，最后生还的仅4万余人。实际上，缅甸作

战牺牲的为一万余人，四万多非战斗减员是被野人山的莽莽林海所吞没，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国军后勤部汽车第三十一团第八连连长梁志坚是南洋华侨，早年回国后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他所带领的汽车连几乎全由华侨组成。第七批机工团回国整训后整批加入八连，驻扎贵州唐家山。黄迎风就是其中的一员。八连曾为收复南宁建立功勋，不少华侨司机牺牲，军队曾给予特殊嘉奖。后八连又承担了运送包括新三十八师在内的远征军入缅，听到孙立人的部队取得仁安羌大捷，兴奋不已。黄迎风在垂老之时提到当年远征军的胜利，仍如数家珍，感怀不已。

4

随着英缅军的大溃退和中国远征军的撤退，缅甸重要的军事据点和城市快速落入敌手。

1942年4月18~23日，日军第五十六师沿萨尔温江向北进攻铁路的终点、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五集团军的剩余部分则继续保持对曼德勒以南的英军和中国军队的压力。在此的英军和中国军队因其左后翼受威胁也开始后撤。

1942年4月29日，腊戍失守。腊戍是滇缅公路缅甸境内的终点站，腊戍失陷，意味着滇缅公路中断。抢占腊戍之后，日军第五十六师转向西南方进攻眉谿和曼德勒。亚历山大决定放弃曼德勒，匆忙撤过伊洛瓦底江。

1942年4月30日~5月1日，曼德勒陷落。经过一夜阻击，盟军余部全部撤过埃瓦铁路大桥，该桥随即被炸毁。

北部和东部的中国军队也被打散，第六集团军残部撤回云南，第五集团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溃散的部队由于路线错误，进入野人山。史迪威同司令部成员乘坐吉普车或步行，经过六百多千米的艰苦跋涉，穿过深山莽林到达英帕尔。

日军以惊人的速度逼近中国境内。1942年5月3日，占领缅甸之后的日军第56师团的装甲车和汽车部队攻占我国滇西边疆重镇畹町。尔后，沿滇缅公路北上，连陷遮放、芒市、龙陵，直扑惠通桥。日军的战略目标十分明显：拿下惠通桥，跨过怒江天堑，攻占保山，直趋昆明，威胁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形势此时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在整个缅甸战役中，南侨机工一直受命抢运沿线军火、汽油等物资——“抢运！抢运！抢运！”——只有这样一道指令！除此而外，各运输大队、队部基地、仓库、修理厂、医院，所属各机构——总数约为1800人在一线，南侨机工没有接到过任何撤退的命令！

这在任何一场“大战”，关乎民族国家生死存灭的战役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然而，1942年4~5月初，中国应战机枢完全失灵！它随着炮火腾起的烟尘突然蒸发，随着杂沓混乱的向后溃散的车辙、一路血迹被碾碎，随着无数在惊愕以至绝望喘息中呼出的惺惺气息而衰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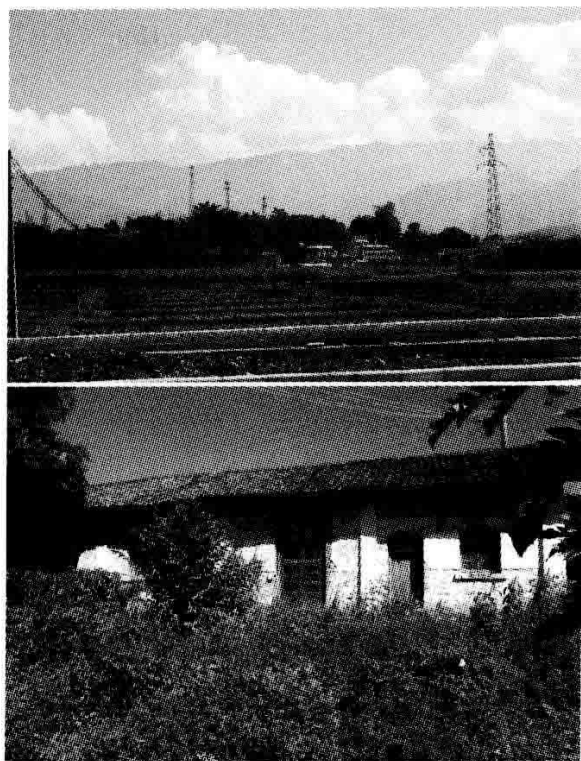
没有“命令”即是命令！

南侨机工还在“愚拙”顽韧地执行那道也许是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的“命令”——抢回属于祖国，用华侨、国内人民血汗代偿而购进的战争物资，他们早与这些物资：车辆、机械、汽油、武器、弹药血肉模糊地粘连在了一起。因为他们为之付出过多少战友的血肉生命。他们是在抢回自己的灵肉、自己的希望。

5月3日，日军已经进占畹町，离遮放基地仅60余千米，在毫无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敌人可能在数小时后进占出现在眼前，这里尚有数万吨的物资待运！

作为一个整体，运输大队已经被战争的闪电撕碎。军队溃散或早已撤离，使滇缅公路国门对当面之敌完全敞开。也使与公路生死一体的机工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不预之间，机工完全成了真正的“殿军”，最后一只手无寸铁的“军队”。

但机工没有奔散。他们在战线的底部，或“人自为战”，或仨俩为伍，离虎狼之敌只在咫尺——当时，滇缅公路下段，即怒江以西，至少还有近



↑德宏境内滇缅公路最大物资集散地遮放基地所在地

↓原南侨机工遮放基地住房旧址

500 辆汽车，机工只有一个意志：尽量抢运，满载乃至超载的卡车迅速上路，突过江桥就是胜利！

当车辆发送完毕时，再抢修战损机车上路，但从遮放防空瞭望塔上报来紧急信号，畹町唯一要塞黑山门已升起黑色烟尘，嘎中渡口，甚至弄西方向已经传来枪炮声……

5 月 2 日、3 日，他们开始有效地破坏基地设施，烧毁一切不能带走的装备，末了，引爆炸药，将数以千万吨计的汽油、军火全部销毁……

这是一支唯一有序抵挡敌军，却只有血肉之躯的军队，他们给自己的命令是“不让一吨物资落入敌手”。他们的阵线是公路。这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罗开瑚所在的车队奉命到仰光进行大抢运，在日军占领仰光之前，已有敌机对仰光进行反复轰炸。罗开瑚和战友常在一座政府办公大楼中躲警报和过夜。罗开瑚随身所带的物品只有一床毛毯，就是 1939 年南侨总会赠给机工的。它灰色黑格，质地上乘，非常暖和。不管到哪里罗开瑚都带着它，裹上就可以睡觉。

一天，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天已经黑了，大家刚准备就在办公楼里歇夜，忽听有人喊：“日本人来啦！已经到郊区了，快撤！”罗开瑚连忙和一位战友跳上军用卡车撤离，新公路已断，只能走老路。行进中，卡车在过桥时翻车，战友负重伤住进医院。罗开瑚翻车时，脑袋正

好撞在毛毯上，居然毫发无损。他好不容易搭上另一辆战友的车脱险。而那位重伤的战友在敌军占领仰光时被杀害。日军所到之处，只要看到皮肤黝黑（风吹日晒所致），额头上因为戴船型军帽留下黑白分明的三角印记的，就知道是南侨机工，格杀勿论。

罗开瑚一直珍藏着这床毛毯，直到20世纪80年代将它捐赠给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老人说：“它陪伴我五十多年了，很多战友牺牲了，我看到它，就像看到他们。我总归要走的，它进了博物馆，我们俩各得其所了。”

4月23日上午，中缅运输局局长余飞鹏在腊戍一座英国人的别墅里，直接向南侨机工几个中队长下达紧急抢运缅甸各处物资的命令。廖光武是华侨大队第五中队分队长，他们中队负责抢运曼德勒缅甸石油公司（BOC）汽油的任务。共70余南侨机工，60多辆卡车，按计划要在日本人到达前将汽车装满，运回国内。配合他们完成任务的还有一个美国顾问——汤姆斯中尉。

当车队进入曼德勒时，曼德勒在日军的轰炸下早已成为一片焦土，居民已经全部撤离，中国远征军第28师在曼德勒近郊布防。师长刘伯龙告知车队：“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要跟部队保持联系。”

油站在曼德勒郊区，伊洛瓦底江边。南侨机工将车辆在树林中分散隐蔽，由于油站狭窄，每次只容两辆卡车入内，加油时先将空油桶装上车，再用输油管注油。只有两根输油管，油量很小，装满一个53加仑的油桶要10分钟以上，如果以这种速度输油，是无法在敌人到来之前完成任务的。南侨机工十分焦急，叫来美国汤姆斯中尉去与管事的英国上尉交涉，英国上尉说：“你们下油池去检查检查。”汤姆斯中尉和南侨机工一起爬下油池，设法打开了六个放油龙头，这样，输油速度加快了很多。直到4月26日，车队中已有40多辆卡车满载汽油运回国内。为躲避敌机轰炸，车队全部在夜间行驶。

26日中午，防空监视台发出空袭警报，廖光武和同伴们忙离开油站，分散卧倒。只听炮弹落下的声音离油站很近，连续的爆炸巨响后，日本飞机离开了。这次轰炸的重点是离油站不远的轮船码头。日本人似乎还没有发现油

站所在地。

27日凌晨，只剩三辆卡车没有装油了，眼看就要完成任务，头晚开出的第三批十二辆油车中有五辆在夜色中疾驰而回。一位南侨机工跳下车道：“眉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去腊戍的路断了，前面的车辆遭到日军机枪扫射，一辆油车着火了，死伤情况不明！”此时，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剩下的运输任务已经无法完成，车队未配备任何武器装备，没有自卫力量，中队长已随第二批车队回国。任分队长的廖光武必须负责应对眼前的情况。廖光武和汤姆斯中尉连夜发电中缅运输总局请求指示，直到27日中午才得到电令，命令廖光武代理中队长职务，带领全曼德勒的机工和招募来做工的华侨工人（多为云南籍），烧毁曼德勒所有存油和车辆，撤出曼德勒，取道卡萨、八莫回国。

此时，敌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廖光武和汤姆斯带领机工们冒着狂轰滥炸，烧毁了机场油库和几处存油仓库，最后来到缅甸石油公司的油池。英国上尉对他们说：“虽然没有得到烧毁油池的命令，但你和我都知道，不能把一滴汽油留给日本人。我命令，全部烧毁！”

大火顷刻间飞腾起来，火光蔽日，热浪滔天，油池周围掩蔽的树木在火舌中翻卷起来，发出噼啪的爆响。

汤姆斯中尉和英国上尉准备乘吉普车通过曼德勒大桥，撤往卡萨。南侨机工准备乘船，经由曼德勒、卡萨，再取道八莫南坎公路回国。

临别时，汤姆斯中尉把一支冲锋枪和一支中国政府赠给他的20响驳壳枪送给了廖光武，并写了一封给盟军总部的介绍信，以备廖光武联络使用。他握住廖光武的手说：“兄弟，我唯一遗憾就是，没有在你们的国家共同开一次‘派对’，香槟留待将来，祝你们好运！再见！”机工们向他挥手告别：“再会！来日再会！”吉普车很快消失在已被炸得残破不堪的曼德勒大桥对岸。

廖光武定了定神，现在，他必须负责将剩下的人在战火中带领回国。伊洛瓦底江上运送难民的船只还没有停载，廖光武带领大家乘船来到对岸，一路跟随逃难的人流来到卡萨，卡萨已成空城，遍地狼藉，逃难的人流又涌向

八莫，人流中，一个缅甸汉子问廖光武道：“如果日军已经到了八莫，该往哪里逃呢？”廖光武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对于南侨机工，路线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国，回到滇缅公路，未知归期而知道归向，在此时，似乎也已经成为幸运！

直到5月3日晚，廖光武等人才来到八莫近郊，他们不知道，此时，连中缅边境的畹町也已陷落敌手，八莫已经被日军控制。他们落在了盟军和中国军队之后。他们发现四辆损坏的雪佛兰卡车，就把零件拼凑起来发动了两辆，开往八莫办事处。办事处早已人去楼空，遍地狼藉。机工们就决心上南坎公路回国。

汽车刚驶入八莫大街，车灯正扫到一个头戴钢盔、身穿雨衣的日本兵，他反被惊了一跳，“呀！”的一声闪进黑暗处。廖光武只得带领后车从另一路口上南坎公路。路口处的掩蔽体后面，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廖光武迅速关掉车灯。快速冲出敌人的火力点，他再打开车灯吸引敌人火力，一面向大家喊道：“下车快跑！”机工纷纷跳车，四散逃走。廖光武拿出冲锋枪和驳壳枪，埋伏在碎石滩下面观察，月光下，几个日本兵正围着一挺轻机枪对着两辆卡车扫射，廖光武向机枪周围连发打去，弹夹打空时，敌人枪口的火焰熄灭了。此次遭遇日军，有多名机工牺牲，但大家来不及悲伤，为躲避敌人密集的哨所和警犬的追捕，廖光武带领剩下的人潜入南色里河河岸的深草。在几乎无望中，忽然发现了一间小茅屋，一个缅甸青年不久回到茅屋中，看到他们是中国人，就说：“这是我看玉米的小屋，你们可以跟我回村，我给你们衣服和小船，你们划船到卡萨去，那里还有你们的军队，不要过浮桥，桥头有日本兵。”

机工们泅水来到约打村，这时已是5月6日午夜，他们把岸边的独木船解开撑走，顺着伊洛瓦底江漂流了三天三夜，才又重新回到卡萨，此时的中国驻军掩蔽在丛林中。廖光武见到了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向他汇报了机工撤退和八莫日军的情况。杜聿明当场写下手令，任命廖光武在军部驾驶连任排长。他跟随部队翻越野人山，来到印度，加入中国驻印军。

当他再次来到缅甸，来到南坎公路，已是远征军胜利反攻后。他采了很

多路边的野花，将它们编成花环，挂在路口的一棵树上——这是一个造型独特的花环，横插一个用小刀削成的“箭头”以指示方向，除了悼念在那次撤退中牺牲的机工战友，他竟相信，在茫茫雨林中，定有游散的，知路与不知路的亡魂，从这里上路，就会回到祖国，回到滇缅公路。

1942年5月3日下午，八莫陷落之前，华侨第三大队接到命令炸毁八莫军火库的所有军火，以防来不及抢运回国的大量物资落入敌手。此时，腊戍已于4月29日陷落，滇缅公路中断，八莫的物资已丧失抢运时机。

华侨第三大队组织了几百名机工分批完成这项异常艰巨的任务。陈邦兴是其中的一员，当他随最后一批机工完成炸毁任务后，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八莫。按照事前部署，机工只能步行撤回国内。从缅甸八莫到中国下关，他们沿途穿越怒江和高黎贡山，全程约1500华里山路，历时20余天。他们忍受着饥饿寒冷、蚊叮虫咬和敌机轰炸，达到下关时，几百人的队伍只剩下144人生还。此时，滇西已经沦陷，华侨第三大队的机工遂回到昆明编入华侨第二大队，在昆明石塘山接受步兵和煤炭车驾驶训练。^{【1】}

5

畹町沦陷前，孙其文、王亚能曾同20余位机工战友奉命到八莫运送汽油回国。车队先是奉命从昆明装运桐油至八莫，到达畹町，突然得到命令：缅甸战事变化很快，桐油不再运往缅甸，以免被日军缴获。在畹町卸货后，空车抵八莫运汽油回国。到达八莫，油库的工作人员已大半撤离，留下来守油库的是一些爱尔兰军人，见是华侨机工，态度很热情，一边把53加仑的油桶吊上车，一边笑着说：“别买英格兰人的账，你们的车是新车，每车可以拉个七吨八吨，尽量多拉点走，不要把油留给日本人！”按照盟军规定，原来一车只可拉走四吨油。

这时，来了几位英国飞行员，用英语叽里呱啦了一阵。王亚能听懂了，

【1】陈达娅。陈勇编著：《南洋1939》，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

他们说，日本人绕道丛林，直插腊戍，滇缅公路可能很快就要中断了。

二十几位机工此时满载着汽油，开足马力，向着祖国飞驰。一路上，难民如潮，拖家带口，沿路都是丢弃的包裹。接近国门畹町口岸处，车队早排出数公里，商车、军车、运输车拥挤不动，畹町口岸前，包围着一重重等待办理入关手续的人。到处是疲惫不堪倒地休息的老人和哭喊的孩子。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此时就在畹町，他下令：“所有归国汽车、人员一律放行，手续以后昆明补办。”畹町口岸插上绿旗，国门大开，人潮呼啦一下涌过关口，很多人直接从畹町河涉水进入国门，滇缅公路上，望不到头的难民、车辆。人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只有沿着滇缅公路向前赶，才有生路。机工队伍的车辆早被人流切断，走走停停。当孙其文经过车队卸桐油的地点时，发现几个工人正在倾倒桐油，一桶桶的桐油被就地推倒，油哗哗的流入畹町河中。桐油亦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中缅运输局此时已发出命令：滇缅公路沿线所有的军火库、油库、仓库不能转运走的，全部销毁，不能留给敌人任何有价值的物资。

不时有老弱的难民要求搭车，孙其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有一人上车，几十人就会攀爬上来。有人干脆弃车步行，沿途都是丢弃的汽车。在特别拥堵的路段，所有的车和人流堵死不能动弹，人们就合力把路边的车推下山崖，疏通道路，不管车主愿不愿意。到处都是走失者的呼喊声，找不到亲人的孩子的哭声，骂声，争吵声，汽车喇叭声……途径遮放、芒市，大小仓库都燃起大火，据史料表明，由于日本推进速度极快，中国远征军在撤退时部署混乱，没有完成保护难民和破坏据点、设施、仓库等职责。滇缅公路沿线的仓库在最后时刻主要是南侨机工得到命令后烧毁和自行销毁的。

原本在5月3日前后，机工各大队，含芒市站点机关车辆，不会少于500辆，他们拥有完全的最为优越的机动性。甚至可以在危局酿成前，以最快速度，连同家眷全员撤离。至少，稍后于那些“一走了之”的大小官吏撤往江东。但没有。“没有”就是除了与路共存，不存其他一闪之念！抢运抢运再抢运！这样的结果，使500辆车，近千余机工——那是南侨机工一半生力一半躯体成为“路祭”的牺牲——大量机工在惠通桥被炸之后滞留于敌占

区，日军对南侨机工格杀勿论。

滇缅公路，此时已成为一条茫然求生的道路，巨大的人流势不可阻地缓慢无望地向前涌动。前方，可能是生的机会，后面，死亡正在逼来。孙其文镇定地坐在驾驶室中，随着人流移动，没到最后关头，他绝不能弃车，车在人在，如果日军临近，他还有最后的使命，就是点燃满车的汽油。

不知为什么，他流下了眼泪，不为自己，只为这全然无力把握命运的哭号连天的人流，他和服务抗战而来，他从来都知道前方是什么，目的地在哪里，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已迷失在炽热的如熔铅一样流动的人群中……

据时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回忆：“畹町、遮放、芒市、龙陵，一路都是车子，芒市前后有十多公里走不通，龙陵前后有二十多公里走不通，满满都是车子。三路纵队、四路纵队，谁也不肯让谁，一个顶住一个。走一公里，不定要等多少时候，好多人只有摊开被褥在车子底下睡觉……总的一句话，就是拥挤和混乱。

“敌人东进的威胁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原来贮放在畹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仓库的大批物资是来不及运走了，有的就自动焚毁，黑烟滚滚，直冲云霄；有的仓库的看守人员早就逃跑了，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处置，变成了敌人的战利品。我国人民用血汗所换来的大批物资，在国民党军队溃败和后勤人员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丧失净尽，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愤慨的事！”

“入缅军的核心指挥机构——参谋团，五天内由腊戍退到保山，行程达一千多华里。而自腊戍到惠通桥丢弃的物资简直无法计数。原来入缅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甸卢比）购买布匹、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到第三年，物价就开始急剧上涨。到1942年，许多东西都是涨了几百倍，大家都在叫苦，军队中绝大部分官兵的生活尤为艰苦。但蒋介石那时却拿出大批的外汇发给入缅部队。部队原来就有很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到战争失败，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

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越多，对他们就越有利。无数士兵的鲜血和人民的血汗填满了他们的私囊。”

作为战场总司令官，他的回忆如同一个战争难民。

5月3日下午，遮放、芒市陷落。

5月4日，“五四”青年节这一天，保山各中学校在公园举行“誓死抗战暨纪念‘五四’大会”。身着校服的男女学生手捧红色的山樱花，以悼念丧亡国师。默哀一刻，突然从云层中窜出54架日军轰炸机，接着炸弹、燃烧弹倾泻而下——平均年龄不到14岁的1000多名中学生血肉横飞——日机对保山城持续轰炸，使这个“南方丝绸之路”上繁荣了千年的“永昌府”成为一片焦土，80%的房屋被毁，日军继后使用了细菌弹——鼠疫、霍乱等“陶瓷弹”，保山城在一个月内死亡人口超过5万。

5月4日，“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曾在进行空中侦察后将军情上报蒋介石：滇缅公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本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敌人大约十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此时，日机空中动向已十分明显，配合地面进攻，摧毁怒江东岸卫戍部队，日军在占领龙陵后，迅速在松山高地部署远程大炮集群，对东岸进行“有效并毁灭”打击，成为日后日军炫耀的“战例”。

“飞虎队”战机竭尽全力实施空中反击，但无奈，东西两岸滇缅公路上麋集上万难民和流散军队，无以下手，“飞虎队”只得在惠通桥上空、峡谷偏西俯冲扫射轰炸，意图拦阻日军，赢得过桥时间。

5月5日，日军先头部队已挺进到惠通桥西岸。清晨，从怒江西岸的松山山头发出的炮击，已经能覆盖东岸老鲁田，公路上的汽车不时被击中，起火燃烧。此时，经过伪装的日军先头部队乘坐卡车混迹在撤退的人潮中，已抵达惠通桥西岸。整个惠通桥桥面和两岸公路挤满了各式车辆。一辆商人的

卡车横挡在桥头，阻塞了交通，守桥卫兵欲将卡车推下江去，商人阻拦争吵。情急中，士兵开枪。伪装在卡车里的日军以为已被中国军队发现，跳下车开火，遂发生桥头交战。

情况十万火急。守在惠通桥东岸桥头的中国前线工兵总指挥马崇六果断下令：炸桥！一声巨响，预埋在桥下的炸药引爆了。硝烟弥漫中，大桥钢梁坠入江水，炸断的钢索悬空晃动。桥面上的车和人坠入江中，怒江西岸未能过桥的人群发出绝望的哭喊。人潮四散向山野中奔逃。

日军早有准备，旋即组织了一个大队的兵力，乘橡皮艇强渡怒江，同时西岸重炮轰击东岸公路。很快，日军已成功抢占滩头，依托江边礁石，迅疾进行仰攻。

这时，远征军第36师106团两个连乘车赶到怒江东岸老鲁田，在师长李志鹏的指挥下快速投入战斗，居高临下阻击敌人。但日军仍有500人上了东岸并凭借路边山头构筑临时工事，顽强仰攻。阻击战不仅十分艰辛，且以敌军在长驱直入中国境内150千米而毫无战损的优势看，东岸区两连部队苦守而后方空虚，能持几时？东岸失拒，似乎已成定局。

5月3日，畹町失守，敌军直驱遮放、芒市、龙陵。此时，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宋希濂，这个刚从野人山爬回来的战区最高首长，却手下无兵可驱。仓皇后撤，致使指挥系统破坏，与重庆失联。撤退时，一个士兵苦苦哀求战友放下重伤的他，草丛中，他却拼尽全力挺身向擦身而过的司令官敬礼，无论听见与否，他嘶声喊道：“长官……在下最最不甘……没有正面……独对一个日本鬼子……杀杀杀！”

屈辱山重。而此时，他脚下的怒东群山似在愤怒抖动，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援兵以阻敌”，但他一个败兵之将如何有“授兵虎符”？他赶到了下关，找不到一个驻军机关，他只得赶往电报局，砰砰砰地擂着半掩的窗口，那位没有下班的电报员半睁眼，自顾手头事务，他大喊：“我是宋希濂！快给我接通参谋团！火速！十万火速！”电话摇了半天：只有嗡嗡声，在前线负责调遣部队的以林蔚为首的参谋团“失联”——如果他知道林蔚等人早在五天内“火速”撤到下关了，又做何感想？

混乱！指挥系统瘫痪！他想到的是只有上达重庆军委“老头子”，舍弃所有线路他直奔昆明找龙云，但重庆方面仍杳无音讯，一个中国，蒸（真）空了！一种虚妄将世界染得漆黑！实实在在的是陈纳德“飞虎队”空中侦察：这天（5月5日），日军已在炸毁的惠通桥附近滩头登陆，不用十天，可直指昆明！呼号！呼号！直连电话摇得疯转——直至夜里，蒋介石的回声听到了。宋希濂需要在最初一分钟得到授权，而不是咿咿呀呀“确认”战情——在得到他需要的“虎符”后，他急速回赶，他要立即联系已经驻扎在祥云的36师，这是离战线最近的部队！但他最需要的是运兵的汽车！黑林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也“失联”了，但有人，也有机工为主的车队，他们“集体取消各路战令”，立即承诺2小时内，调集550辆卡车，所有在行车辆停运，全部集中应战！

6日下午，36师乘车已经赶到保山！宋尾追来到祥云，急需了解师长李云鹏部署。但电话局电话占线，通话双方在谈生意。里的电报局职员或许根本看不清他颈前泥污一片的三星上将领花，抑或根本不知道这位长官是谁？随从拔出手枪，一下抵近他的脑袋，将军大吼：“我是战区司令长官！前线火急！三分钟你接不通，贻误战机，一枪崩了你！”里面嗫嚅一阵，终于瑟瑟应声：“长官要接……”宋希濂眼看有望，平服一刻，一字一句口秘密代码，重复一遍：“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蒋、介、石！先头部队已达保山……再接保山36师……由保至惠75公里，一刻千钧……”

一路急驰，他拼命搜索似乎荒失了一百年的记忆。身边参谋翻着早期密电、战讯。似乎有了一点希望，从西昌调来的一个师，曾是他的属下，此刻应当全编制驻扎滇境，如果按原先部署，其主力应当在大理、下关附近——否则，配属36师的106团两个连何以能赶到桥边投入战斗呢？他的判断没有错。天不灭我华夏也！与其说重庆终于复电，不如说这位黄埔系的将军终其一生布下了虽不称“收官”，却唯一险胜的一局。他要求授命指挥这支确实存在的部队，重庆“慨然允准”。但接下，他如何将一个师两个团近万人的部队火速运到300里外的惠通桥边呢？仿佛石火一刹，他想到了南侨机工！他们应当有近半数已经过江，如果与他同步，那么此时不在下关，也应相对

集中于昆明——这才发生了前面黑林铺“求助得助”的一节。他真该跪谢这些南侨机工啊！他放下那个沉重的电话——二等上将并不知道，在重庆，并非对一败涂地的战局毫不知晓，早期布防已经暴露蒋介石对战局过度的“乐观”，乃至“无知”，怒江以东没有后备部队。战略上的愚蠢又加应对无力，致使今日陡现危情。而重庆一班人正在散布，即使丢了云南也无碍，还有长江呢！况自来战场失利，自有代罪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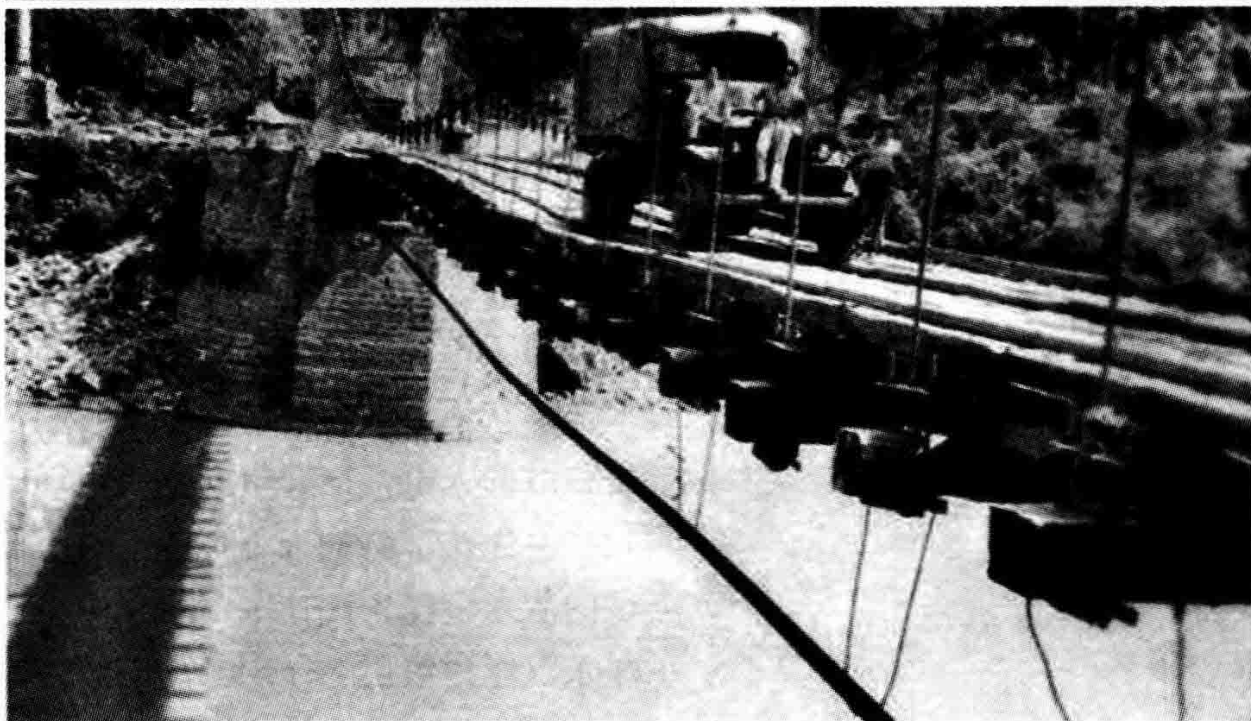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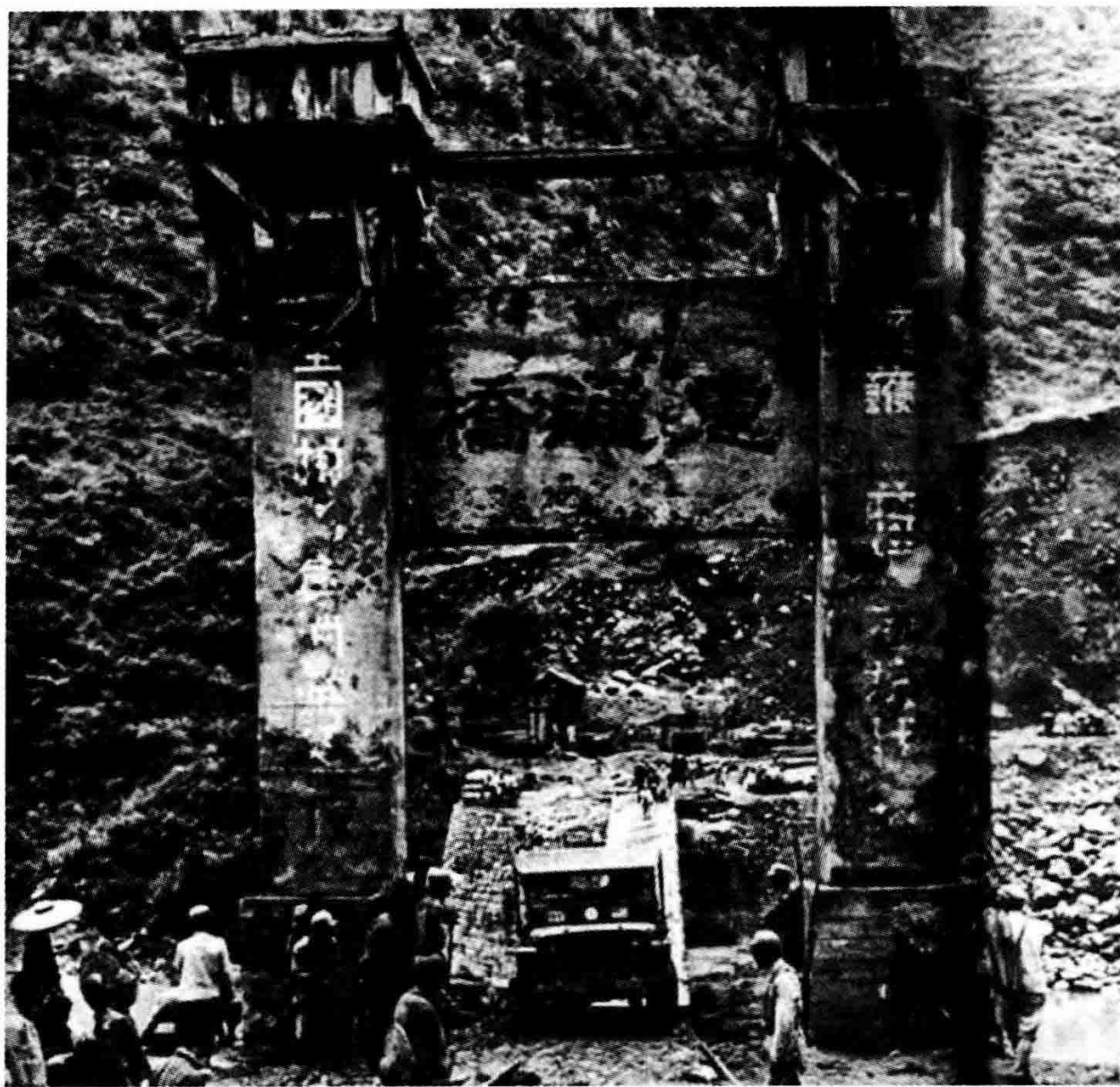
设立在昆明的滇缅运输总局“留守”人员对待危情态度截然不同，临时管事的挺身而出，550辆卡车和南侨司机可在两小时内，召集到位！这是何等的果决！机敏！还是南侨机工！脊梁啊！

已经过江的南侨机工正悲情如潮，听说要“返回去”阻敌，个个奋勇当先。受伤的扯了绷带，有的问：发不发枪。回应是不！那好，我们的武器仍旧是方向盘！走啊！快！

5月6日——仅一日之隔，36师107、108团火速赶到指定位置。36师以复仇为指向，宁死拒敌！106团两个连的兄弟已在前方坚持48小时！快啊！我们来啦！惠通桥，残断的江东防线大多溃圯，以不足三百人阻击当面十倍百倍的日军，他们仅剩最后一息了。日军从怒江南北中分三路以皮艇渡江，甚至将战车开进江里做桥基，搭建栈桥、浮桥，已经成功据有多处高地。36师气势如虹，铺天盖地掩杀而来，有的部队直接进入白刃格斗，将爬上滩头、岩垒的日军掀下江去，战场上杀声震天。106团两个残存连队，全部跃出掩体，与当面敌人扭成一团，至一齐落江……

战斗至翌日黄昏，歼灭日军200多人。7日下午，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赶到惠通桥东岸36师指挥所，他调整部署，果断决定趁敌军辎重未抵，次日上午发起再反攻，务求全歼东岸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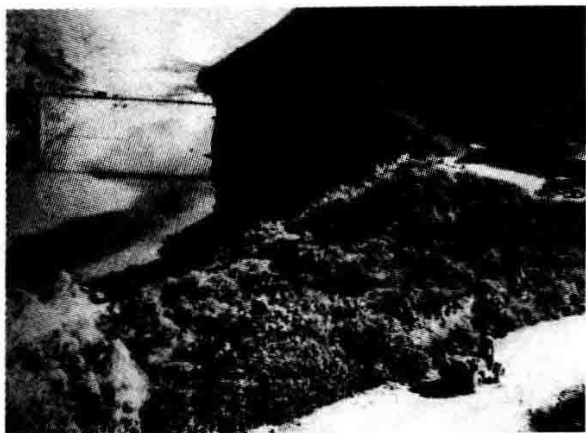
5月8日上午，36师集中所有重炮及重机枪以强大火力对敌开火，尔后发起冲锋，最后展开白刃战，日军400多人被全部歼灭。至此，直到1944年5月发动滇西反攻，中国军队凭借怒江天险拒敌于怒西整整两年，敌人未能跨过大江前进一步。滇缅公路，因为惠通桥被炸断，桥西已成为沦陷区，为防备战局不测，桥东的路面、桥隧大段破坏。滇缅公路，暂时结束了它悲怆



↑运输车队通过惠通桥
↓南侨机工驾驶的卡车通过惠通桥

的历史使命。

6



运输车队穿梭于怒江边的公路和惠通桥

畹町陷落前，郑天赐、陈文芳、王亚十结成车队从缅甸撤离，敌人飞机频繁来轰炸，陈文芳不幸被炸身亡。他们随着撤退的车流人流缓慢移动。在人流中不时出现一队神色严肃，不言不语的“中国军人”，他们是日军化妆成中国军人的“先遣部队”，混杂在人流中，向着目标地潜进。

5月5日上午，郑天赐从腊勐垭口盘旋下山，临近惠通桥。此时，西岸已传闻要炸桥了，人们争先恐后，相互超车，更加混乱。在桥西几百米处，完全走不动了，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中国士兵正在安装桥板上的炸药，守桥部队在桥东挥舞着旗子，人们惶恐地奔过惠通桥，车辆则只能一辆一辆通过。郑天赐有种预感，可能过不了桥了。果然，接近中午时，一阵枪响之后，惠通桥上一声巨响，桥身被炸断，“轰隆”一声坠入江中，桥面上来不及疏散的人群和车辆一齐坠入江中。西岸的人们顿时陷入绝望，江岸上拥满了等待过江的人，有人失声痛哭，有人捶胸顿足，有人瘫倒在地，人们本能地四处奔逃，满山坡上都是跑散的人群，拖儿带女，哭声震天。很多人跑入日军先头部队的火力范围，被击毙倒地。有人试图泅水过江，被日军射杀在水中，鲜血染红了江水，浮尸很快随江水漂向下游。郑天赐和王



惠通桥的守桥士兵

亚十早有预料，他们冷静地离开驾驶室，躲进树林隐蔽。

天黑了，夜色如水，四下无声。郑天赐和王亚十潜出树林，摸向公路上被遗弃的汽车，他们悄悄撬下一支轮胎，用嘴将气吹足，扛着这只轮胎来到江边。两人下水，合抱着这只“救生圈”横渡怒江。虽然是5月，但夜间的江水仍然冰冷刺骨，江水流速很快，水面下到处是暗流漩涡，礁石密布，很难把握方向。上游不时漂过难民的尸体，不知是日本人杀害弃尸的，还是泅渡溺水的。一具尸体紧挨郑天赐漂来，郑天赐下意识地抓住了他，无须判断，他已经死了，他的肢体保持着死时僵直的畸态，脸朝上，将一种死人才有的厄白对着天空，郑天赐放开手……

大约漂流了一个小时，两人才爬上对岸的沙滩。他们浑身冰冷，颤抖着倒在沙滩上。滩上的碎石竟感觉是微温的。郑天赐努力地用全身吸取着这一点温暖，紧紧攥住的心微微舒张开了。他仰脸看着天上的一轮孤月，现在，同一轮月亮之下，一江之隔，生死殊途。也许，他们因此躲过一劫，但郑天赐并未感到幸运和高兴。只觉得身下的石滩是如此坚实，足以在天地间支撑他浮游的灵肉。

他们爬上公路，走到老鲁田，对岸腊勐山头的敌人据点突然打炮过来。原来，从惠通桥到老鲁田是一个长“U”形路段，敌人封锁了西侧路口，只要有车一露头，阵地上就打炮，使东岸公路弯内的车无法通过封锁。郑天赐和王亚十只得走山路绕过这一路段，前面路边有一辆军车，郑天赐打开车门一看，驾驶兵已经中弹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被弹片击中了侧胸，满驾驶室都是血污。他们发现车还能发动，就把死者拖下车，靠在一棵树下，郑天赐顺手摘了一片阔大的树叶，将死者年轻的脸盖住，又压上一颗小小的石头。他们开动了汽车，他此时的目标是昆明。天，似乎微亮了。

1942年5月初，吴璋访随车队一行九人奉命到芒市运送汽油回昆明。车队满载汽油回程途中，道路已经被大批涌入的难民拥堵，直到5月5日上午才到达惠通桥边，不及过桥，桥就被炸断了。机工们跳下卡车，为了不让物资落入敌手，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暴露目标，还是将汽油和卡车点燃了。熊熊

大火果然很快引来了一小队日本兵，他们迅速包围了机工，把他们抓到营房的一间破竹篱屋中，等待处置。他们九个人被捆在一起，几个日本兵脱掉上衣，裸露上身，操起棍子就打，一边打，一边用日语骂。棍子一下下落在吴璋访身上、腿上，他躲闪着劈头而下的棍棒，把牙关死死咬住。切齿的仇恨甚至让他忘掉了疼痛。等日本兵打累了，他们把棍子一丢，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点酒，几个人就聚在一起喝酒，不时发出狂笑。

机工们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吴璋访想，他们一定都会被处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想办法逃走。他秘密地与其他机工商议如何逃走。第二天，他们并没有被马上处决，而是被分配去干苦力：砍柴，挑水，修造工事、营房。夜晚降临，他们九个人又被拴在了一起。半夜，守在门口抱枪的日本兵睡着了。九人互相解套，挣脱了绳索，他们猫着腰，从睡着的日本兵身边跨过。突然，“哐啷”一声，不知哪位机工碰翻了地上的东西，日本兵醒了，他大叫着跳起来，举枪就射击。九名机工按照事前约定好的分散跳跑计划，朝不同的路线飞跑而去。吴璋访和李五安跑进营房边的灌丛，只听几个日本兵跑出营房，对着机工跳跑的方向开枪，子弹嗖嗖地从吴璋访耳边飞过。他们快速穿过灌木，向树林跑去。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半夜，他们终于没有迷路，来到了怒江边，江水在月光下粼粼发光，像一条巨大的光带流向远方。吴璋访和李五安将机工驾驶证含在口中，跳下刺骨的江水。不一会儿，两人就被湍急的江水冲散了。吴璋访在海边长大，水性很好，但在到处是险怪漩涡的水中也无能为力，只得随水漂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到达对岸，却没能找到李五安。吴璋访浑身冷得打战，他借着微明的天光，判断着方位，准备回到公路上。突然，耳后有人喊道：“站住！”原来是沿江巡查的士兵，吴璋访将湿漉漉的驾驶证交给士兵看，士兵将他带到了中国军队驻点。驻军工作人员确认身份后，指着一条山路告诉他，前面有一座古庙，里面有难民。吴璋访浑身是伤，又冷又饿，受了冷水的刺激，他一路咳嗽，好不容易挨到古庙。

古庙里已住满了逃难的缅甸华侨，多是福建、广东人，吴璋访用闽南话与他们交谈，当大家得知他是南侨机工时，纷纷拿出仅有的干粮给他吃，一

位老华侨从包袱里拿出一身半新的西装，叫他换下湿透的衣服。吴璋访流下了眼泪，虽然浑身冰冷，但泪是温热的。他没有想到，华侨并没有忘记南侨机工，他们在家乡人的心中一直是英雄。

第二天，他和几位华侨结伴同行，一路无食无水，又患上痢疾，一边走，一边拉清水。来到保山时，几乎站不住了，保山城已成一片废墟，电线杆上，断壁残垣上，还挂着被炸死的同胞的血肉。成堆的尸体来不及掩埋，已开始发出尸臭。吴璋访穿过这些曾经熟悉的街巷，向机工车队的方向走去，忽然看到断墙下压着一具没被发现的尸体，她已被瓦砾完全埋住，当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她的蓝头帕露出鲜艳的一角，苍蝇叮满了她露出的半侧脸，但头顶的那一角蓝色却洁净无染，它向着天空招展着，不管曾否有过天空下人间的苦难，它——一角旌蓝，指天，而无问。

吴璋访加快了脚步，机工车队建筑已被毁，油库也烧毁了。他找到一些毁弃的车辆，拼凑了零件，发动一辆车，载着结伴逃难的几位华侨，向昆明开去。

除了李五安，同时从日军营地逃亡的其余七人从此没有下落。

直到1942年4月，谢川周所在的车队一直在八莫到畹町、芒市之间抢运物资。4月底的一天，谢川周从八莫出发，刚翻过一个山头，前面的路就堵塞了。难民潮水般呼天抢地从前面涌来，勐汝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勐汝是通往八莫和曼德勒的岔路口，地理位置很重要，此时，道路已断，开回中国不可能了。谢川周和车队其他机工将货车开到悬崖边，合力将所有的车辆推下了山谷。他们此时只能随难民取山道回中国。

这是一段艰难的路程，三天之后，随身带的粮食耗尽了。路边所有能吃的野果野菜都被路过的难民吃光了，沿途的村寨早已空落无人，能找到的粮食颗颗粒粒都被饥饿的人群扫荡一空。路边到处是人们丢弃的包袱，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一开始由亲人拖着、架着走，实在走不动了，只得靠在路边听天由命。走了大约一星期，路边开始有饿死倒毙的人。谢川周此时已饿了三四天，他进到一个村寨想找些吃的，在一个磨坊的石磨里，他



运输车队进入还未被日机轰炸的保山城

从缝隙中竟然扫出了一小把碎米渣。他又找到一个空罐头筒，生起一小堆火，把这一小把碎米渣煮成了“稀饭”，一滴不漏地全吃了下去，当时肚子里暖暖的感觉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觉得浑身又有了力气，他出发了。忽然，他听到草丛中传来婴儿的哭声，是被难民丢弃的。或许是对孩子被别人捡走还存着希望，丢弃孩子的人常会选择路边的显眼处。在一棵麻栗树下，一个婴儿被襁褓包得严严实实，显然，丢弃他的人为他尽其所能地精心安置了：把周围的草踩平垫厚，又拉来几根树枝支撑着襁褓。因为饥饿，他正发出已经微弱的声音，朝空中扭动着小手，抗议着这活的坟墓。谢川周不忍再看，他不可能拯救他。他两手空空，除了衣兜里的驾驶证什么都没有，还有十几天的路程，他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向中国。他一扭身疾步走了，但婴儿的哭声似乎一直留在他的耳际。

十八天之后，他才随难民到达腾冲。每一个人都几乎已经在死亡的边缘，谢川周晕厥过很多次，醒来，又接着走，耳朵里不时发出鸣响，看不清

道路，只有一个还清晰的意念，就是，走下去。进入腾冲城，路边，竟摆放着几大锅米汤，还冒着一丝热气，真是难以想象的意外之喜，难民们用最后的力气一拥而上。一个中年女子在维持秩序，一人一碗发放，她神情自若地舀着米汤，仿佛已在眼前的战争并不存在。谢川周站在抢食米汤的人群外围，没有挤进去。那女子看他并不往里挤，反倒越过人群，送了一碗米汤到他面前。他郑重地端着碗，慢慢喝了下去，似乎已经黏合在一起的肠胃被这一碗米汤舒开了……后来，腾冲沦陷，饱受日军蹂躏。谢川周回到昆明后再次参加中国驻印军，他发誓要战斗到日本投降，要光复敌占区，光复腾冲，解放腾冲人民，以报“米汤”之恩。

保山是滇缅公路运输的大站，不少南侨机工亲历保山轰炸。一些机工在轰炸中身亡，但数字无法统计。5月4日上午，蔡汉良和钟少伟从队部一起上街。钟少伟在保山成了家，妻子三天前刚生下一个女孩，钟少伟第一次当父亲喜不自胜，要到集市上买只鸡炖给妻子吃，蔡汉良去取车队的蓄电池。两人在街口分手，钟少伟还约蔡汉良晚上来喝点鸡汤。

正午12点，全无预兆的轰炸开始了，蔡汉良和另一名机工恰好驱车在城郊，两人跳下车，躲进田沟里。只听敌机排阵飞来，密集的炸弹雨点一样落进保山城，瞬时浓烟滚滚，房屋成排倒塌。这么大规模的空袭蔡汉良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心中发紧，为还在队部的战友担心。

轰炸结束了，出奇地安静。城中渐起哭喊声。蔡汉良驾车驶入城中，保山城已成一片废墟，爆炸的灼热还没有散去，活着的人开始哭喊着寻找失散的亲人，无数炸伤的人在废墟中拖着残躯呼救，随处可见面目模糊的尸体和残肢。一辆被炸毁的车子里，驾驶位上坐着一个无头的死者，头被炸掉了，身体还端坐着……

后来才知道，这天保山各所学校都在庆祝“五四”青年节，公园内也有很多青年学生在活动，这次轰炸，很多学生被炸死。至今，易罗池畔还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罹难同学之墓”。

钟少伟在集市中被炸身亡，另还有多名机工遇难，但数字无法统计。蔡汉良随后接到命令，负责将队部疏散至大理，后又奉命回到保山掩埋死者。

此时，成堆的和散落的尸体已开始腐烂，臭气熏天。直到四十年之后，蔡汉良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忍不住泪下，这是他“有生以来遭遇的最大惨剧”，他也忘不了钟少伟邀约他到家里“喝鸡汤”时的一笑，他的当时只有三天大的女儿究竟怎样了——老人觉得，当时忙于执行命令而没有能够关照钟少伟的家人，是令他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

7

日军渡江失败后，迅速占领怒江以西全部国土，在占领区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42年5月中旬，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6预备第2师进入怒江以西的腾冲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预2师和腾冲县抗日政府组成军政



爱国侨胞李竹瞻（右二）、梁金山（右三）、胡春玉（左三）捐资修建的“1942年5月4日敌机轰炸保山遇难侨胞纪念碑”。南侨机工在此次轰炸中有多人遇难



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滇西游击战士

联席会议，在腾冲人民的支援下，不断袭扰敌军，在黄草坝、芒东等地与敌人多次交战。1943年5月，远征军又派出第36师接替预2师继续展开敌后斗争。

日军的暴行激起滇西人民的反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腾冲、龙陵、潞西、南甸（今梁河）、干崖、陇川、瑞丽等县的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佤族和汉族人民组织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战争。

日军对未能渡江的南侨机工一律处死。未被抓捕的南侨机工多潜入民间，隐名埋姓。此前，日军在缅甸以“大东亚共荣”的谎言培植亲日势力，进而募集、训练了大批秘密特务组织，向“占领区”渗透。这些奸细原本大多混迹于滇缅公路两厢，通晓缅、傣、汉语，谙熟机工活动规律及当地戚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搜捕滞留在怒西的机工，以图彻底消灭这支最为忠勇的抗日力量。战后陆续揭露的事实证明，被捕机工往往不加审讯，酷刑虐待后就地处置，且大多活埋。被捕牺牲，死于敌后的南侨机工人数究竟有多

少，他们的姓名、服务单位等已无法查证。

许志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仅他所在的中队，就有十几辆卡车滞留敌后的龙陵，机工下落不明，再无音讯。

前文所叙及的与傣族姑娘结为连理的蔡文兴，奉命在敌人到达之前烧毁畹町、芒市一带军火库，惠通桥被炸时，他所驾驶的汽车被阻于龙陵。此时，芒市已陷落，家中情况不明，蔡文兴不愿渡江潜逃，他想先探明家中的情况。但敌人正在肃清，此时回家只会连累家人，他只得潜入深山，徘徊于龙陵、平达、象达、景坎一带。他托人打听得家中未受波及才稍稍安心。几个月之后，日军贴出“安民告示”，让所有在“外洋人员”回来“安居乐业”，蔡文兴开始不敢露面，只在夜间潜回家中与妻儿团聚，天不亮又躲回山中。数月后，日本人似乎真的放松了戒备，蔡文兴才探头出来做点小生意维持家中的生计，直到抗战胜利。

机工陈团圆所属车队直到5月5日桥毁路断时还是“幸运”的。车队越过惠通桥，在老鲁田遭到敌机轰炸，除三人受伤，多车炸毁，其余尚能行驶。到达下关时，接到命令，就地报到。

一路奔驰，陈团圆的心却向相反的方向飞，他无法不顾惜一寸寸在车轮下抛离的土地：在芒市，他已经有妻儿老小，傣族妻子与他十分恩爱，他们的女儿近两岁，妻子又怀孕了，这个家是他的一切，他无法想象，在日军占领后，处于芒市边缘的法帕寨子将遭受怎样的蹂躏。他已打定主意，即使爬，他也要爬回去。这时，一名机工因在撤退中遭受轰炸，丢失了驾驶证这唯一的身份证明而无法报到，陈团圆将自己的证件给了他，让他顶替自己。战友说，“我成了你，你成了我，如果眼前有敌人，我们又都上前拼个死，两人终归合一。天堂不用过验，是好人就行，是吗？”

陈团圆一笑说：“我只一念，团圆！要改名，就叫团圆！”——这是他第二次易名。南洋归国，为避免亲情扰动，他改了名，偷偷上了轮船。这次，为了成全战友，为了冒死回到亲人身边团圆，他再次易名——这或许是最后一次，紧紧拥抱，两臂环绕，成一团的圆的铁围，与血亲永不分离。

他就这样与战友分别，从下关逆向而下，在 707 千米处，他得到滞留在这里的战友的资助和仅够三天的干粮，然后舍弃公路，窜入丛林，整整十三天，他泅过无数河流，躲过敌军岗哨，绕道龙陵平达河谷，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8

陈团圆的意外出现，令一家人悲喜交集。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人躲在邻居的柴棚里，查看了周遭动静，又在夜里爬上一棵酸枣树，眺望滇缅公路一方，以他的经验，日军用“涡托机”发电，势必有较大响声，也有成团成簇的灯火，但出乎意料，发电机声响虽远，但大团灯火却几乎在他脚下，那是法帕龙潭，一个很大的积水塘，傣语称“弄磨”，这里地势略高，大约是日军指挥机关！离他的家不足三里——他把自己送到虎口里来了！

孩子先哭起来了，妻子去捂住出生不久的婴孩的嘴，最为惊恐的是岳母，她一把将陈团圆推进屋里，转身拿一身傣族衣服叫他换上，说，狗叫处是



日军在缅甸屠杀我爱国华侨

日本司令部！机枪对着大路口，巡查兵一夜转三回……这下他明白了。

陈团圆很快策划了自己行动，虽身已在家，暖和而温馨，但却难以久留。在妻子口中，他得知“潜”回德宏芒市家中的机工远非他一人，仅法帕附近村寨就有“阿顾”“阿杰”，拢共不下几十人，都是过不了江或过去了又爬回来的……日军已经张贴布告，要机工自动投案，“举凡有讯，邻人速报，否则连坐”。但傣族却将他们的机工家人，包括那些炸桥后滞留的机工、“新女婿”（有的不久与傣族姑娘结婚）“藏得像河底的石头，只要大水不发，管它青蛙叫不叫，水蛇游不游！”

据德宏州相关部门2014年统计，直至是时，除战后因各种原因迁移的外，仍有30位南侨机工定居芒市、遮放、畹町，合眷属475人。有的机工则选择在边境缅甸一侧的九谷（帮赛）、南坎、木姐等临近小镇定居，他们的解释是“离祖国近一点总是好”。估计在日军占领的怒西滞留机工不下300人。他们受到了傣族、景颇族、回族、汉族、彝族等各族人民的保护。与傣族结亲现存后人就有301人。

接近半数的机工选择了以各种路径寻找滇西各路抗日游击队，投身情报、翻译工作，有的则寻觅至印度，参加驻印军整训，等待反攻的到来。总之，这支看似被战争巨碾轧碎的队伍，即使被抛弃、被勾销、被遗弃，却以坚韧的质地闪闪发光，如同被他们用生命打磨的铺路石子！

1944年4月，中印缅战区的大围网将日军团团围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滇西大反攻在即。

日军颇感焦虑的是，怒西沦陷区的抗日游击队策应反攻的活动日趋活跃。驻芒市日军司令部随即开始对抗日军民，尤对潜伏于民间的南侨机工进行大搜捕大剿杀。5月24日，日军在特务奸细的侦测中发现了芒市土司代办方克胜的踪迹，遂行兜捕。方不幸被执。这个曾经为修筑滇缅公路动员呼号的傣族土司，为日军切齿痛恨，等待他的是酷刑复诱惑，但方坚不吐实。被打上镣铐抛入牢房。与方克胜同牢的，是一个南洋貌相的年轻人，他受刑太多，但牙关紧闭，大约怀疑方是一个诱饵，并不吐露身份。7日，两人同时被拖出去，日军行刑队挖了一个坑，将年轻人推入坑中即行“软

埋”——这是日本人发明的一种“缓死刑法”，即一锹一锹将泥土自胸口填埋，被处死的人并非瞬时毙命，当泥土填实至胸口以上，眼见死者一腔血液猛烈上冲，颈部脉管狂张，双眼暴突，面色转青转紫转黑，七窍同时喷涌血沫，吸纳有如呼雷而渐次衰微……行刑者则无限欣赏这个死亡的长记录。日军军官告诉年已四十三岁的方克胜：如果不供“自属系统”，下场就是这样。他方知自己是“陪杀”的，陪那个年轻的南洋人。有一刻，他想推开守卫来一次狂奔，让日军从背后开枪，至少，“尸首之置街头，可借以转示家人”。但夜晚，他发现镣铐有一半是松动的，遂“一念横生”——关押他的禁室是木樨板房，对于一个傣族人言，拆解这些樨头并非难事。此时，大雨滂沱，雷电交织，方克胜以一根小椽翘动大椽，再以大椽翘动更大的窗棂，终于越窗脱逃，冒雨狂奔20余里，翻过陇川山，来到了郑坡、董仲簏两将军的游击队部。

但陈团圆就没有那样幸运。

在情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他已经联络了阿顾和阿杰。三人暂避在蛮牛寨西北的山林里，这里密灌丛生，却没有更好的隐蔽处，更令人不安的是，次日，他们发现这里有孩子在放牛，似乎是个季节性牧场，这就更难避人耳目了。他们勉强搭建了一个窝棚，聊可栖身而已。这年，雨季早临，漏无干处，加之从家里带出来的粮食将尽，三人商量乘雨大天黑，回家取粮。当陈团圆回家，与妻儿相处不过半小时，突然，一队日军和特务闯入，将他死死摁住。

阿顾、阿杰也同时被捕。

阿杰当时正在柴房抱柴，顺手抄起斧子与日军拼杀，眼看不敌，他穿越篱墙向旷野跑，被日军从身后连发六枪击中，当场牺牲。

原来，陈团圆等人在蛮牛后山隐蔽，早被日军奸细侦知，他们随后举动，无出其右，不过是等待一个合适时机而已。

陈团圆、阿顾相视，轻轻叹息。他们或许有计划要奔向更远方，但三人有同时心结不解，他们舍不得家人啊。此时，又都明白，终归要“别”了。

日军已有前期试验，举凡抓到机工，即行处死。他们是不会吐一句实

话的，他们甚至用马拉语、南洋琼语、粤语、闽语相互打趣，唾骂岛国浪人，还集体唱小调，唱《再见吧！南洋！》《义勇军进行曲》……

次日清晨，邻居先得到消息，他们被羁押在宪兵部，陈团圆的岳母，一个善良得绝不会想到灾难临头的傣族妇女，即刻催促女儿“带上好好的饭包去，姑爷赶怕饿伤了！”但一路跑到“司令部”，被一队日军横枪拦阻，此前50米，大水塘南岸空地即是刑场，再往前，日军的枪栓拉响了，同去的板小安等妇女死死拽住陈团圆妻子：“别！再过去就是死……”

50米外，大塘子沙岸上，泥沙已经填埋到丈夫的颈部，他的脸是黑色的，像一段“铁力木”，唯有两眼圆圆睁着，是干白闪亮的，他的嘴唇在翕动，每一贲张，那些麇集的苍蝇就嗡地射开，但他使劲地在扭动，他要留下怎样的话语……

同时活埋的还有阿顾，未留下全名。

法帕“弄磨”大水塘，日据



▲陈团圆唯一的生前遗物：一件傣式上衣

↓德宏州芒市法帕大水塘，曾是日军司令部驻地，日军曾在此大量屠杀远征军战俘，这里也是陈团圆的遇难处

时期是日军“司令部”，大水塘即是他们就近屠杀抗日军民和机工的刑场。包括远征军战俘、当地抗战人士和被捕机工，“软埋”之外，全部捆绑抛入深潭。据查，在芒市并不止一处大屠杀现场。在蛮蚌寨附近，也有一处大屠杀现场，直至20世纪70年代，农田扩种，泥土里累现层层白骨和“铜质纽扣”。傣家往往在此时停耕歇犁，焚香以祭……

但有多少荒原生长记忆？

第八章 流浪再归·西进反攻

1

当郑天赐、王亚十（前文曾叙及）驱车回到昆明时，昆明一派惶惶乱的景象，滇西的失陷、惠通桥的紧张对峙使昆明瞬间由大后方变成了前方。然而这个洒满阳光的高原城市似乎“天生乐观”，并没有为逼近的战争阴霾压垮。大街上驾驶着吉普车招摇过市的“美国大兵”成了此时昆明特殊的风景，金碧路、正义路、南屏街等繁华地带开设了大大小小供美国人消费的歌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西餐馆。商店里充斥着各种美国货：化妆品、玻璃丝袜、尼龙手提包、香烟盒、牙膏、牙刷、巧克力糖、口香糖、香烟、白兰地……应有尽有。

当然，必不可少的是也要“同等”地为美国大兵开辟他们走私的黑市。在南屏街北侧的高山铺——一条斜坡上的大巷子，美军将他们的军需品，甚至有“飞虎”标志的飞行夹克拿到这里来换取国币和根本不值钱的假古董，还有成箱的“可口可乐”、肉食罐头、“十八开”瑞士军刀。乃至钢盔、尼龙武装带、军用水壶……一应俱全。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大兵特嗜昆明甜食，高山铺的“油炸年糕”成了俏销品，法式面包和冰咖啡也将就。

战时警局无非增派几个警察配合国军宪兵在此地巡游，但他们对“走私”决然闭眼，况且整个国府官圈都在发“战争财”呢？

这座古朴城市的苦难之上，竟装饰着美国式的一整个“花花世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美、中三国结成同盟，为确保中国战场能实现盟军的战略意图，大批美军、英军工作人员、工程队、参谋人员等进驻昆明。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昆明成为一个战时最“西化”和时髦的城市。

据时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回忆：“自1941年美国陈纳德组织一个自称为‘飞虎队’的志愿空军驻在昆明起……1942年史迪威的司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也来到昆明。到1943年，美国人来得更多了，有办理后勤的大批工作人员，有修路的工程队，有派到各集团军担任联络的参谋人员，有派到昆明干训团担任教学的大批教官，有派到各军师野战医院工作的大批医务人员，还有美国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电影拍摄者……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官僚买办阶级却很快和这些美国人勾结起来，利用美国空运援华物资的便利，把大量外国货用飞机走私运进来。在史迪威司令部有一个后勤司令，竟利用职权专干这些勾当。他不仅拉货，而且大做其黄金买卖，经常用子弹箱装上印度的金币——‘拖拉’，运到昆明来谋取私利。”^{【1】}

大约美国与中国总有相同一脉：“驼峰航线”开通，战死的战死了，该运来的汽油运来了。利用这条航线“夹带”走私的开始走私“竞赛”了。宋希濂所言不过冰山一角。按国际通例《租借法案》，中国人用来打仗的每一粒子弹都是“借”即日后要偿还的——所谓“美援”并非无偿“馅饼”，“借”已属附会了“正义”的无上恩惠。美国与重庆签订条约：以云南“十四府矿产”抵偿战争债务，这相较于法殖时期云南须以“七府矿产”抵押债务翻了一番，差不多涵盖云南全部矿产，尤其是钨、锡等战略资源——对此，重庆“资源委员会”秘而不宣。战争似乎在两个世界开打：一个以生命承受苦难，一个以苦难承接财富。而从战线退回来的南侨机工则属于前一个，也就是最广大的世界。

郑天赐无心领略这个“花花世界”。此时，昆明已聚集了数百死里逃生的南侨机工，他们劳顿疲惫、形容枯槁，每天来到中缅运输总局门前等待通知。此时“总局”徒有招牌，已无正常办公：滇缅公路中断，中缅运输总局不久将撤销（1942年8月，中缅运输总局撤销，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滇缅公路运输局”，实际上，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于是，一纸“遣

【1】杜聿明、宋希濂等著：《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散令”简单地宣告了南侨机工的命运。当初应征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就这样“失业”了。

此时，物价飞涨，本来微薄的薪水使机工们并无结余，南洋沦陷后，回归已不能，亲人失去联系，生死未卜，侨汇中断。瞬间，机工沦为流离失所、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难民”。国府抛弃、家园沦丧，他们成了无所归去的真正的流浪者！

当郑天赐得知自己“失业”了，他踱步来到南屏街电影院，此时正在放映《米老鼠和唐老鸭》，他摸出自己口袋里仅有的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和一瓶可口可乐，走进电影院。放映厅里尽是些时髦男女，几个美国佬搂着他们妖艳的中国女友，放肆地取闹，这里，俨然另一个天地。

郑天赐浑身褴褛、状如乞丐，衣服的破漏处露出伤痕。他全然不理睬别人的侧目，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把汽水瓶盖故意夸张地在扶手上磕开，可乐的泡沫喷溅出来。他安然地靠在椅背上，就像离开南洋前在马来西亚看电影时一样。人们很快进入了电影的幻影世界，在强权的世界中弱小但不屈的米老鼠在荧幕上跳动，郑天赐无心领略电影故事，他只想借着电影的“不真实”将自己所经历的那些“真实”的时空拼接一下，它们的转换如此之剧烈，以至于似乎一切均可虚幻。那些血、火、敌人阵地的炮声、尸体、战死者、机车翻覆、轰炸中战友的残肢，在车轮一侧的饿殍，是真的吗？若是，为什么会消解在米老鼠的跳动中，消解在不断扔进爆米花的红唇中？若不是，自己的一颗心何以隐隐作痛、绵长不绝。除了守着这颗长痛的心，自己似乎无处可依、无所可归。这，足矣！幸甚！郑天赐毅然起坐，离开沉醉在幻影中的人们，走进冷白如刀的月光中。

绝大部分流落昆明的机工先后进入国民政府交通运输部门设在昆明郊区石塘山等处的“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收容所”，机工们住的是破烂的库房，睡的是草垫地铺，吃的是三餐不见油水的“老妈妈”汤。整训所不发给薪水，只管食宿，每天早晨要集队跑步，下午还要列队操练，教官苛刻无情。很多机工受不了这样的非人待遇，陆续离开了整训所，

自谋生路。

《新华日报》曾持续关注了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贡献又受到极其不公待遇的群体的命运。《新华日报》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记述：“迨瓦城被占，腊戍失守，敌骑侵入滇西后，华侨机工尤多随军撤至后方。但因运输停顿，交通机关实行裁员，数千自愿放弃享乐生活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复遭家亡亲离之侨工，于此多被遣散，半年以后，除滇缅运输处留用五六百人外，昆明及滇缅沿线禄丰、楚雄、下关、保山等城镇，皆可见此辈失业无靠之机工。其中有积蓄者，三五人集资开小饭店、茶店或小货摊（香烟、花生、火柴类），但生意冷清，收入不能维持生活，其生计无法维持。无亲友可投靠者，则将身上仅有之衣服典当，或沿街摆摊兜售。昆明文林街小西门一带出售货摊中，多为彼辈所设。所售货品多为自来水笔、衣服、手表、鞋子，标价甚低。此外，失业机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沿街乞食。有关方面，对于失业侨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救侨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

这是保留在黑色铅字中的黑白写实！

1942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又再次向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呼吁，“救济回国华侨机工”。文章中写道：“直到现在漂泊在云南等省的华侨机工，也还有不少，他们始而倾囊以食，继而典卖衣服，以求一饱。现在已是手持侨胞登记证而沿门乞食了！他们不愿为而不得不为乞食时，感受了最深切的苦痛。他们说从前热心回国，今日却要累及同胞，实在不安。同时，却也觉得一向被誉为‘革命之母’的华侨，今日竟弄到谋一饱而不可得，且将遭少数不明大义者的呵斥恶声，实在难受，也不甘受。大家听到归国侨胞的这种凄惨悲愤的景象，除了同情，除了呼吁解决，还有什么可说呢？”

他们不愿麻烦国家，不甘于沿门乞食。他们说得好：我们有的是精力，有的是本领，我们要自食其力，为国服务，所以我们的要求很合理，也很简单。他们要求什么呢？

归国机工和司机们，恳切要求工作，使他们发挥专长，这是他们唯一的要求。

乞讨等同“累及同胞”——这是真正的南侨话语。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乞讨”者同此一心！

南侨等同“难侨”，却是任何一个国度不可理喻的惨烈怪诞的事实！

在当时的昆明云津市场，常可见华侨机工骨瘦如柴，沦为下体只围着麻袋的乞丐。此时已是昆明的隆冬时节，每天都有机工被冻死街头，扫街的人只用草席一裹，便弃尸荒野，荒野中到处是啃尸的野狗。

杨保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有的机工就睡在祥云街道路边的烤炉旁取暖过夜，有的睡在南强街青年会的门口，还有黄土坡和小西门，这些地方，常可见冻饿而死的机工，无人收尸。清晨，这些尸体就被拉到郊区的郭家凹山上，并不掩埋，随意丢弃而已。”

杨保华所指“青年会”为“基督教昆明爱国青年会”，四层教堂建筑，尖顶穿空。宽敞的礼拜堂里，往昔烛光照耀，耶稣基督圣像以受难形象昭示无尽末日。教堂原本为教友聚会所设，抗战初期，从杭州辗转桂西最终逃亡昆明的杭州美术学院师生曾频频在此展出他们极富个性的抗战画展，和粘贴抗战戏剧海报，一时，此地成为抗战文化宣传的中心。而这个严冬，战局寒冷，两相合一，亡命的亡走，存命的蜷缩，栅门紧闭了——也许，绝境中的机工仍旧依念“上帝”的眷顾，以最后一息完成祈祷。但纷纷扬扬的大雪太过苍白，只来得及覆盖一层层僵冷的尸身——这里冻毙的机工最多，以至70年过去，每每惹动生者苦水，他们都伸出曲曲一指，喊道：“在基督青年会……那里……死人最多。”

机工邝振声到下关卸货回到昆明后就失了业。口袋里的钱不够维持一个月。虽然到处托熟人介绍工作，但百业萧条的战时，哪怕一个半饱的饭碗都不易得。开始是两顿饭变一顿饭，最后钱用完了，只得典当冬衣。白天仍旧出去找工作，有时有几天零工可做，更多时候则一无所获。夜间只得蜷缩在昆明小西门城脚的防空洞里过夜。每个防空洞有一米宽，可勉强容纳两个人，席地铺的和盖的都是麻袋和稻草。有的机工已疾病缠身、意志消沉，无力再去打工，白天就到金碧路和祥云街讨钱，有时遇到熟人能讨到一两角，稍稍可聊当日之饥，可所遇侨工也大多是失业者。有人连天讨不到钱的，就饿死



在街头。

与邝振声同住一个防空洞的，恰是第九批同期回国的雪兰莪机工邝松登。此时昆明已近深冬，夜间气温常近零度，早晨的瓦檐上挂着一挂挂冰凌。邝振声又冷又饿，无法入睡，他想清早赶到砖瓦厂去搬砖，就小声招呼着身边的同伴，可是那一头一点回应也没有。他将头天晚上用于遮挡防空洞的破木板移开一角，惨白的清晨的微光照进防空洞，正射在同伴邝松登的脸上。他微翕着双眼，脸上是一种僵硬的白，邝振声连忙推了推他，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他就这样在夜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邝振声跪在稻草铺上，不知该怎么做，按理他们是战友，又是难友，他就死在他的身边，他应该为他收尸，可是，他身上仅有的几角钱仅够今天的半餐饭而已……

他想将邝松登半睁的双眼闭下——这似乎是他唯一

失业机工被迫进入收容所



失业机工与家眷席地就餐的情景

能为他做的，可是无论怎么向下顺，他都还是半睁着眼睛——他已经僵硬了。邝振声觉得心中有泪在往上涌，可是没有热力的助推，连泪也涌不到眼底——原来，在人生的极困处，连眼泪都是奢侈的。他，推开木板，让同伴的尸体全无保留地暴露在惨白的阳光下，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照着人世间这用不着掩藏的悲剧的人证，他摸了摸死者藏在上衣兜中的华侨证和驾驶证——南侨机工永远随身携带证件，证明他们的身份与来由，尽管“历史”总是“健忘”而短视的。他将同伴的两本证件露出上衣口袋，希望这至少能在阳光下证明一个死者曾有的一生——他曾在阳光下无欺于自心，那么，阳光应是无欺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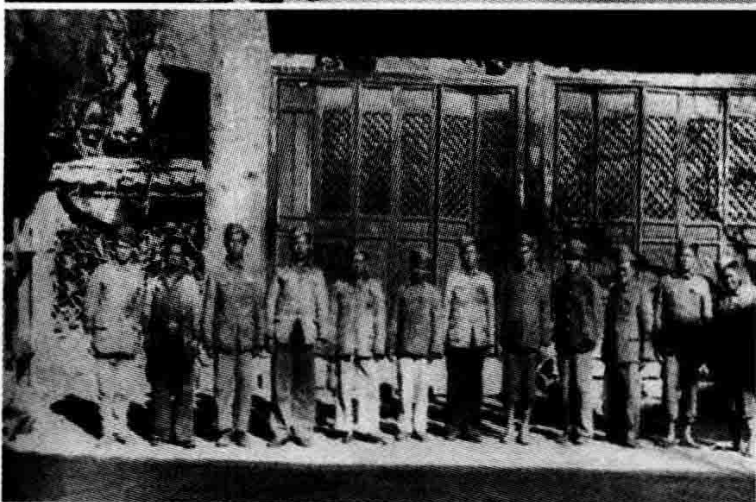
做完了这些，邝振声扭身就跑，他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气，他想跑，跑出自己的命运，跑出这个似乎天理周章、光天化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边际在哪？何以无穷广大，却不容一个赤裸裸的人遁身？

他来到黄土坡，找到过去机工大队的负责人王建存、胡凯军、白清泉相助——他感到他必须活下去！他必须抓住自己！最后，在白清泉的帮助下，他顶了一个开小差离开的人的名留了下来，得到了“工作”，这个人就叫“邝振声”。原来，邝振声的原名叫“邝天祥”，自此，邝天祥隐去真名，“邝振声”这个名字就用了一辈子。

机工“易名”之繁杂，成为日后史学考证的一大难题。一群人有心抗战，却无权存名，或不得已抹掉自己，“祖国”无“祖”。这也许是民族不忍撕开的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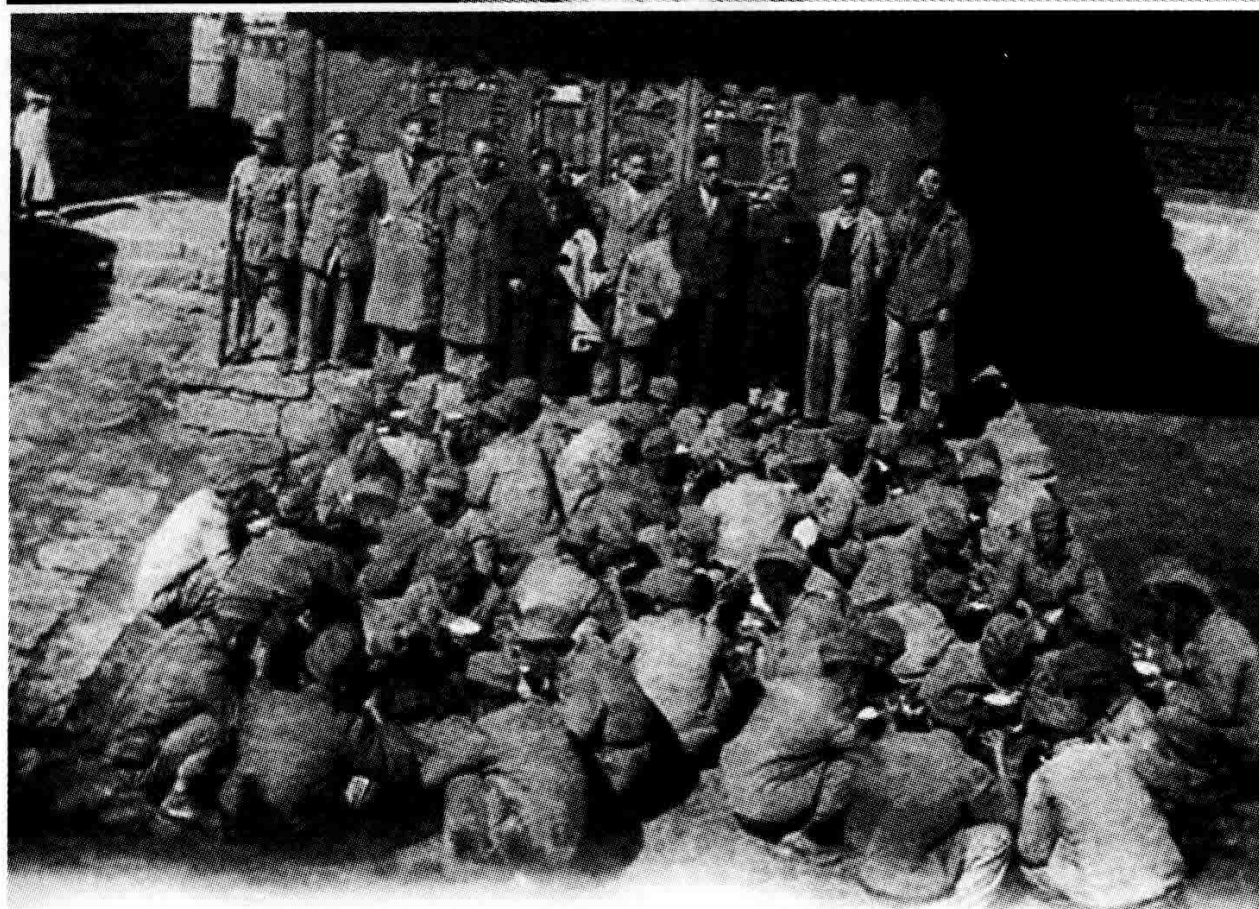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期，邝振声协助另一位南侨机工朱胜松跑小西门到黑林铺的运输。此时，汽油短缺，运输车辆都改装成了木炭车。朱胜松负责驾驶，邝振声负责摇炭炉。后来，又与黄和平合作开昆明至下关的客车，亦是木炭车。

1944年底，曾有部分失业南侨机工被调集到晋宁盘龙山集训，集训所所长为葛丰，邝振声是其中一员。几个月后，邝振声被分到昆明巫家坝滇缅运输局空运站驳运飞机运来的物资。在一次敌机轰炸中，



↑失业机工

↓失业机工被迫进入收容所



↑机工在收容所的寝室
↓机工在收容所吃饭的情景

又一位新加坡南侨机工遇难。在这里，邝振声和其他机工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蔡光美失业后，四处飘零。在侨友的资助下，他只身来到柳州，考取了驾驶执照，于1943年进入捷和钢铁厂开车。后来，日军进攻湘桂，柳州紧急疏散，许多工厂迁至河池、独山，一时无法复工。蔡光美再度失业，此时，怀孕的妻子已在柳州生下孩子，一家人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蔡光美只得拖家带口随着难民又流浪到昆明。1944年，经泰国同乡介绍，也同样顶着别人的名字进入川滇公路运输局陆良机场驳运队开车，负责将美国飞机从加尔各答运进的物资转运至仓库。微薄的薪水只够维持半饥的生活，蔡光美在这里工作到抗战结束。

2

尽管新闻与社会各界都对南侨机工的悲惨处境向政府发出呼吁，但国民党当局仍置若罔闻、



- ↑ 为收容所机工分发救济物资
- ➡ 机工在收容所进行体育锻炼
- ↓ 机工在巫家坝机场负责地面军火运输

不闻不问。被战争撕碎又拼接的昆明侨界意识到，要救助南侨机工，使这样一个怀着赤子之情归来，又在抗战中做出巨大牺牲贡献的特殊群体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怀，必须要依靠华侨自己。滞留在昆明的侨领侯西反第一个行动起来。1943年9月，他与白清泉开始发起救济难侨的活动。他们向窘困的侨界呼吁集资，以为失业无靠的侨工济施医药，并开始在下关、大理收容难侨。

侯西反是著名的南洋爱国侨领。他1883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二十多岁时来到新加坡，商业有成，热心公益。他曾任新加坡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追随陈嘉庚抗日助捐。曾在南洋筹赈会中负责向闽侨募捐，成绩最好，被誉为筹赈会“四大金刚”之一。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有关于侯西反的记述，当时新加坡工厂罢工活动不时兴起，侯西反生怕劳资矛盾为英殖当局利用，对华侨不利（当时共产党在新加坡已有活动，英殖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往往热心斡旋。“侯君西反身健口利，忠勇勤劳，排难解纷，为其特长，凡有请托努力斡旋，多能平息，所有工潮劳资两方，都愿服从侯君调解。……侯君虽为调解，前是多未相识，且自备车费，有时自己或向友捐资垫付了事。……七七抗战后，闽侨方面为侯君领导，成绩最佳，组织三十余分会，每分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集大众听演说，均在夜时。侯君逐次参加，往往至午夜后返家，常一夜赴两三会。其发言不倦、精神饱满，同侨莫出其右，加以忠勇热诚，熟悉诸侨商吝啬慷慨，殷裕困穷，视力劝募，应付咸宜。余认侯君品性对于服务社会，如调解纠纷、劝募捐款，确为特殊才干，他侨实难企及。新加坡闽侨捐款成绩，可影响他帮，并可以模范全马，以及南洋各属华侨，所以余重视侯君，为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至侯君对财物之慷慨，尤为可取，有裘马与共之风焉。……彼任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自己置有住家洋楼及橡胶园，按月入息足抵家费有余。抗战后亚洲保险公司事务托同伴负责，专心致力筹赈会工作，数年如一日。”

1939年12月22日，英殖当局因“反英嫌疑”和“暗助非法团体有关治安”两项罪名驱逐侯西反出境。遂加迫害，侯西反12月28日才获知被驱逐，30日便被迫离境，但送行华侨竟达数千人。《南侨回忆录》记录了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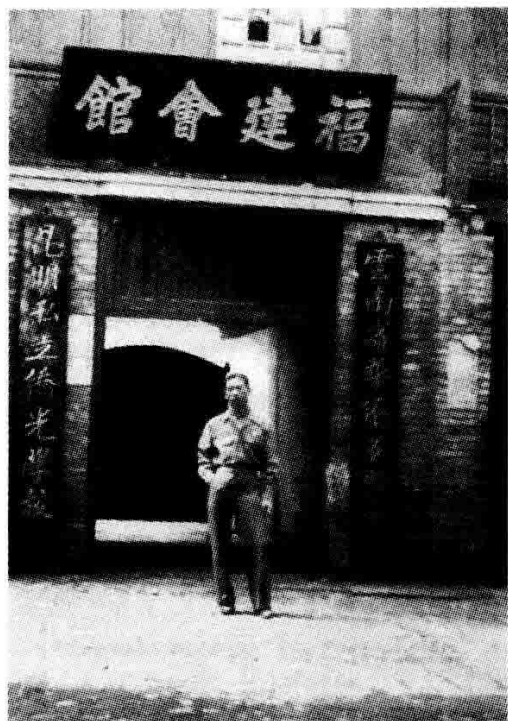
的实情：“诸送行工友等数千人，坐运货车数十辆，直冲入机场自由行动，含愠不听警察阻止。……越早火车到槟城，华侨及印人两三千人，到车站迎接。”

1940年3月，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并视察滇缅公路，侯西反全程陪同，并跟随陈嘉庚来到延安。

1943年12月，侯西反在昆明“福建旅滇同乡会”的茶会上，向旅滇侨胞呼吁共同关心南侨机工的处境，与会者在他的号召下无不赞同。大家共同商议如何集中力量对散落各地的侨工资助救济，并决定组织“云南省华侨互助会”。1944年1月20日，“云南省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正式成立，推举侯西反为理事长，白清泉、刘绍虞、胡春玉为理事。理事会下设总务、文书、救济、交际、教育、设计、调查、编辑等八个组。经侯西反努力呼吁，互助会获得各界捐助的50万元用以救济难侨。

华侨互助会成立后，立即开展救济难侨的工作。于黄土坡观音寺成立收容所，当时，失业侨工及眷属七八百人的食宿都需互助会承担。侯西反积极活动，向滇缅运输局、财政部、红十字会、云南社会处等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发出救援请求，在他的努力下，南侨机工的处境开始得到改善。

一份发往滇缅运输局的文书留下侯西反



↑建于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内的云南省华侨互助会

→华侨互助会所开办的南侨机工招待所

↓华侨互助会的几名干事（车上字标为：云南省华侨互助会）

的墨迹：

交通部滇缅运输局：

1. 侨工滞留滇缅路沿线具颇，再以缺乏交通工具召集困难，拟请贵局对于此等侨工予以免费运送。

2. 侨工以生活困苦、疾病重生，本站均无医药设备，所有患病侨工请贵局医院免费治疗。

3. 时届隆冬，侨工被服缺乏、御寒无所，拟请贵局拨发旧军毯以资应用。

以上诸请协办，各项相应派员持函驱洽为敬。

华侨互助会理事长 侯西反



侯西反遗像

侯西反为人数日渐增多的南侨机工收容所制订了训练概要：①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②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③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④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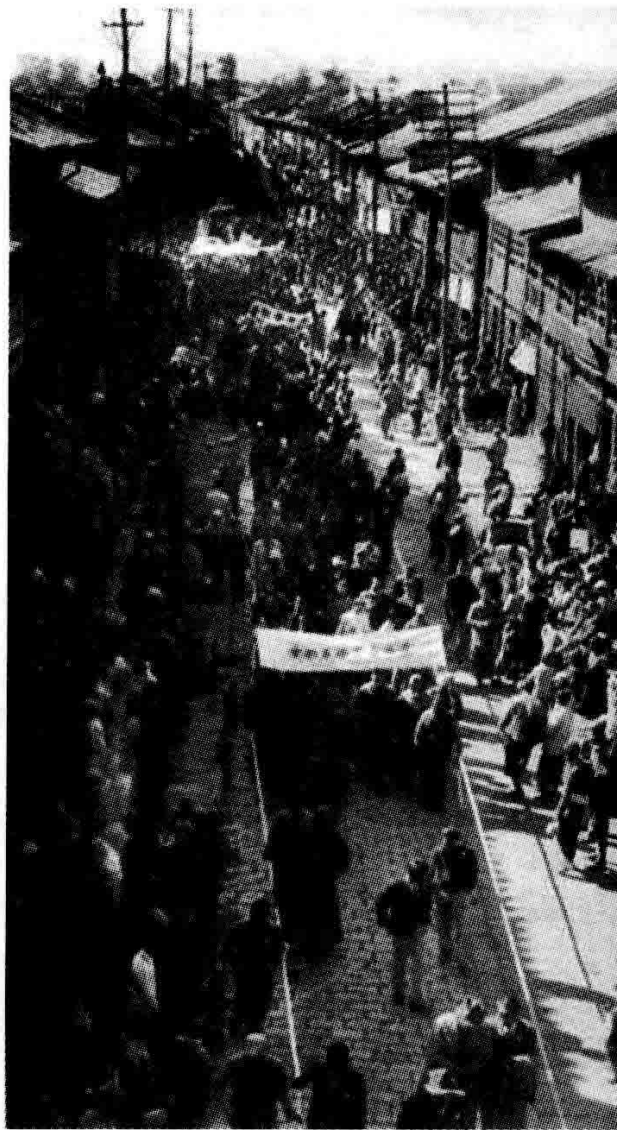
华侨互助会使长期失业流离的南侨机工得到了治疗和照顾，身体逐渐康复，精神也重新焕发。有的侨工染上吸毒的恶习，华侨互助会还帮助他们戒毒。同时设有“机工招待所”，让途经昆明或暂无居所的机工得以栖身。由于失学侨童甚多，华侨互助会又发动募捐，扶持开办了“昆明侨光小学”，解决了在昆华侨子女的读书问题。至今昆明侨光小

学仍然秉持当年爱国华侨所定立的校训：“团结、友爱、勇敢、进取、真诚生活”。侨光小学开办后，南侨机工的很多活动就在学校中开展。

虽然工作经费紧张，华侨互助会还创办了《南风》半月刊，目的是：“了解未曾获得的，希求沟通不了解的；让这微弱的和风，能扇起及时的芬风给嘉禾早日成熟。”著名爱国华侨潘国渠曾为《南风》题词：“南风之薰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成为南侨机工的精神家园，《缅北归来》《复员声中话当年》《献给回国服务的机工们》等栏目专门刊载关于南侨机工的文章。

在1944年华侨互助会的上半年工作总结中，侯西反写道：“本会旨在于为华侨和侨工解决困难。热心侨胞，展开侨工之收容训练。吾侨应自力更生，以侨救侨。”^{【1】}

1944年11月9日，侯西反为救济南侨机工事，往重庆办理筹款，返程回昆途中，不幸在昆明东郊九门里坠机罹难。南侨机工和昆明各界为侯西反举行了隆重的殡送仪式，机工们举着白色的挽联，上面题写着：“侨胞失母”“侨工保姆”。殡送队伍穿过昆明的大街小巷，机工一路悲泣，哭声抢天，两旁路人虽不尽知亡者何人，但受这支悲切至真的队伍感染，无不脱帽肃然，侧立致哀。



1944年12月，昆明各界送别侯西反

【1】陈达娅、陈勇编著：《南洋1939》，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



◀昆明各界悼念侯西反
 ▶侯西反之墓
 ↓侯西反与机工眷属合影

南风之薰熏兮，远客离人梦寒兮；

南风之来兮，春归万里无返兮。

2014年清明节，侯西反之墓移至昆明金陵公墓。

3

滇缅公路中断，机工失业后不久，很多南侨机工已开始继续战斗在其他战线，他们中很多人一刻都没有停止为抗日做出贡献，此时，他们已融入整个抗日战争，哪里有服务于战争的运输，哪里就有南侨机工。

1942年1月30日，日军攻陷缅甸毛淡棉，滇缅公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当天，罗斯福在美国内阁会议上就提出，要在中、印、缅间“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听说这一消息，立刻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称：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地势最高的萨地亚到中国昆明可以作为航线的选择。此前，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已经探索了这条航线，并试飞成功。

1942年5月5日，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为了抗战生命线的继续，中美正式开通中印航线，保证了盟国和海外侨胞的抗日物资能运抵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驼峰航线，被誉为世界上最艰险的航线，成为滇缅公路生命的延续。

驼峰航线所经地区在当时被称为飞行禁区：航线所经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5000米以上，群峰危立，稍一不慎，就会发生撞机；航线气候恶劣，气流变化无常，常会遭遇强气流突袭，险象环生，有时遇上时速200千米的大风，逆向飞行飞机不能前进，空耗燃料，如果遇上大范围“冰幕”（云层结冰），飞机则难以脱困；航线导航保障设施简陋，特别是中缅边境野人山，没有无线电定向台和明显地标；日本战斗机经常出没在航线上，进行截击。东条英机曾明确指令：“缅甸航空部队的最大任务就是切断中印空运航线。”



正在训练使用美式装备的中国驻印军

日军的截击使驼峰航线的海拔提升至 6000 多米，这样，更增加了飞行的危险性。驼峰航线下面的山谷中，到处都有罹难坠毁的飞机残骸。人们称这些山谷为“铝谷”。天气晴朗时，飞机残骸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竟成了导航的标记。

据统计，中美两国总共在驼峰航线上投入 2000 多架飞机，运送 80 余万吨军用物资，运送人员 4.3 万多人（赴美受训的空军人员和赴印的中国远征军两个师）。此外，还有千余架作战飞机经驼峰航线投入中国战场。在三年多的飞行中，中美两国共牺牲飞行员 1500 多人，损失飞机 609 架（其中中国 46 架，美国 563 架）。^{【1】}

为了与驼峰航线的空中运输相配套，云南各地大兴机场建设，云南民工用数百人工拉动巨石碾子的方法“碾”出了飞机跑道和机场。昆明巫家坝机场、腾冲机场、寻甸羊街机场等都长期投入使用。

大批抗战物资由空中航线落地，需要地面运输再转运，输送到情势紧急的前线，如同动脉须与无数毛细血管相连，始能周体运动。

南侨机工的命运势必与这条伟大的航线相结合，驼峰航线与滇缅公路就像是孪生兄弟，精神气节是如此之相似，它们同为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迹。南侨机工在这时成了印度阿萨姆邦空军基地和云南各机场驳运工作的先锋。如

【1】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滇西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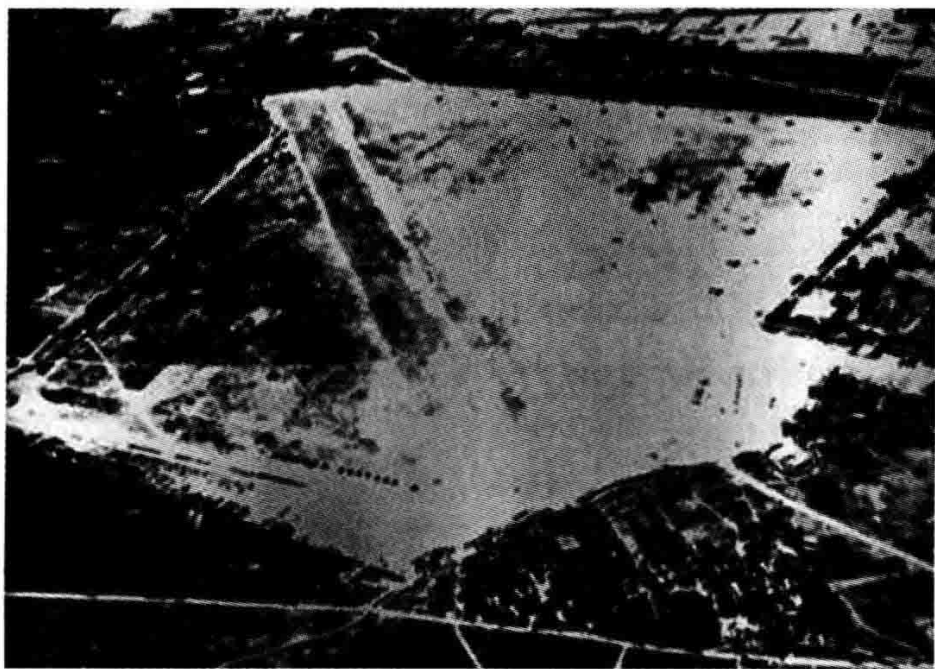
前文所叙及的失业机工邝振声和蔡光美都曾长期服务于昆明巫家坝机场和陆良机场，直至抗战胜利。在所存机工自述回忆中，有类似经历者甚众，难以尽述。所以，滇缅公路中断后，南侨机工仍然奉献于战时运输。只是此时期机工的服务方向、人数较为分散，无人统计，史料遗失而无法完整复现历史真实而已。

前往印度阿萨姆邦服务的机工则线索较为明朗，有具实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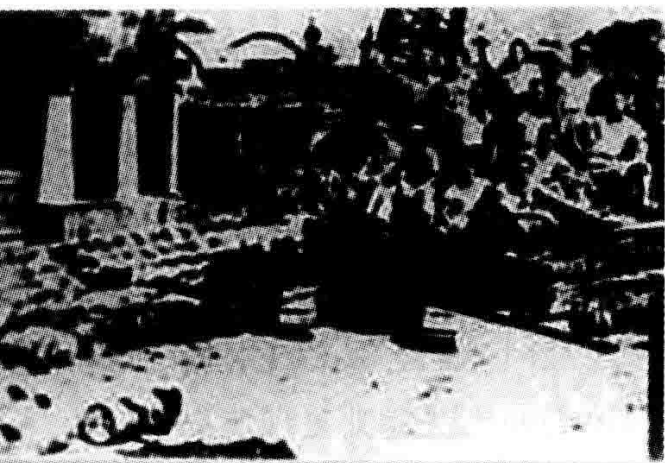
1942年8月，盟军在昆明招收第一批南侨机工50人，赴印度机场从事军事运输，李卫民任领队。

1943年初，南侨机工200人奉盟军派遣，参加远征军赴印度从事抗日军事运输工作。

早在1943年初，中、英、美三国已决定尽早在缅甸和滇西发动反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掌握的中国远征军，这支新的远征军总共16万余人。在印度，史迪威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军总司令，他首先在兰姆伽训练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的两个师（新38师和新22师），将其组编为中国驻印军。全新的技战术训练，全副美式装备，加上中国军人的吃苦耐劳精神，驻印军的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一支装备精良、素质很高的现代化部



昆明巫家坝机场



南侨机工在印度机场装卸物资的情景（1942年）

队。后来，在缅北反攻进程中，中国军队又经驼峰航线陆续空运3个整编师（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和大批补充兵员充实驻印军。至1944年8月，驻印军扩编为新1军和新6军，下辖5个师。新1军军长孙立人，新6军军长廖耀湘。

有不少南侨机工跟随派往印度的军队来到兰姆伽、加尔各答等地，继续从事运输工作。

杨保华应盟军招募第一批于1942年8月前往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当他们乘坐美国飞机穿越喜马拉雅时，机工们无法平复内心的激动。飞机已飞行在云层之上，然而在这座伟大的山脉脚下，可以看到，雪白的群峰拱卫着不可视见的珠穆朗玛，阳光下，山顶终年的积雪洁白无尘，一座山峰就像一尊默然含笑的神。发动机发出的轰鸣似乎投入了无边无际的空冥，飞机就像一粒尘埃飘游在广大无垠的众神的世界中。

杨保华的心境从未像现在这样安宁，往事像残断的电影胶片从脑际逝去，就算是此刻，也如梦如幻。他努力寻思着自己所走过的路，报名回国时，家中苦留，为了不让他走，特地为他订了婚。出发的那一天，未婚妻到码头来送行。虽然他几乎还不认识她，但这位温良的年轻女子似乎于他已“心有所属”。这让他莫名感动，在回国后无数的凄风苦雨中，她那向着他挥别的手，总让他驱驰突进的心能重新依系于他的“来处”——那一碧晴波的海之深处。

南洋沦陷后，家中音讯杳然，那个“她”竟渐成渺茫。他除了不改初衷，继续战斗下去之外，无可他顾。印度，是这光明长征中的又一站，他觉得从天顶直透而下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心，新的使命在召唤他，陌生的土地会接纳他，看，飞机下方莽莽的林海在涌动，一座座云山推排而来……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坚毅沉勇的心在隐侧处却还存一根若断若续的细弦，由那个渐远的“她”轻轻拨动。

阿萨姆邦是一片滚烫的土地，8月，灼人的热浪令人窒息。毒蚊成阵，无处可避。50名机工的任务是在汀江机场跑短途运输。一开始，美国的运输兵看不起中国人，但机工过硬的技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快折服了美国人。这时的汀江机场经常遭遇从缅甸起飞的日本飞机的空袭。一次，当警报拉响时，轰炸机已经出现在机场上空，美国运输兵纷纷弃车跑进防空洞。一辆南侨机工驾驶的卡车正驶进飞机场，由于所载的是易爆品，如果此时卡车遭遇空袭，将对机场造成较大破坏。正当大家为他悬心时，没想到这位机工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掉头冲出机场，日本飞机随即尾随扫射，原来，他是想把敌机引开。卡车在土路上飞驰，尘土卷扬而起，如同一条舞动的黄龙，日机紧随“黄龙”疯狂扫射，以为已经将“黄龙”下的卡车扫个稀巴烂了，没想到，扬起的黄尘还在



↑为配合驼峰航线的运输，云南各地大兴机场建设，图为民工用大石碾子碾压机场
↓一边是民工在赶建机场，一边是繁忙的驼峰空运

向前腾起的时候，这位机工又一个飞快的 180 度飘逸，把车掩蔽到树下了。飞贼兜了个大圈子回来找不到汽车的踪影，只得快快飞走。这位机工将毫发无损的车辆重新开回机场时，防空洞里的美国战友纷纷出来与他握手。杨保华身边的一位美国大兵，递给杨保华一支骆驼牌香烟，做了一个跷起大拇指的手势，表示：中国人，好样的！

谢川周在失业后，来到驻曲靖的一个辐重兵团寻找工作，但一无所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从广东调来的石城炮兵总队队长云昌贵，云昌贵是他的海南同乡。谢川周便要求跟随他的部队前往印度，云昌贵爽快地同意了。谢川周遂乘坐运送部队的运输机穿越喜马拉雅来到兰姆伽。兰姆伽一派新气象，中国驻印军的士兵们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和休整，衣着整齐，精神焕发。他们在美国教官的指挥下学习使用各种美国装备和新型武器，顶着骄阳酷热进行体能和技战术训练，很多人的皮肤都晒裂了，露出鲜红的新鲜皮肉，但没有人喊苦喊累，打回祖国、收复滇西是中国驻印军所有官兵的心愿。

谢川周大感振奋，此时中国军队的精神士气都大不同于第一次远征。他也急迫地想重新操起方向盘，开始战斗。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把他分配去做驾驶兵，而是让他补了个逃兵的缺到“骡马团”负责养马。每到长官点名“李成贵”时，他还得乖乖大声回答：“到！”他向长官几次反映情况，说明自己是机工，可是长官根本不予理睬。谢川周觉得只有回到机工的本行，自己才可以发挥作用，就“开小差”离开了。他



谢川周（左）1944 年

来到炮兵五团寻找机会，炮兵五团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演习，阵地上炮声连天，黄尘飞扬。中国驻印军总司令史迪威希望中国士兵能迅速投入战斗，所以采取实弹训练的速成方法。谢川周虽觉得过瘾，但在这里仍没有找到驾驶员的工作。他听说加尔各答有大量抗日物资等待转运，需要熟练驾驶人员，便设法来到了加尔各答。在这里，他参加了英缅政府军运输队，终于如愿以偿地重新当上了驾驶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一直在加尔各答服务于转运抗日物资。

抗战胜利了，谢川周心潮澎湃，他急于想回到离别三年的祖国。此时，加尔各答的中国领事馆正在招募驾驶员，打算组成车队，运送一批“GMC”卡车回国。谢川周应征参加了车队。这一次，他们所走的路线是“中印公路”，当进入中国境内，到达与滇缅公路相接的龙陵时，谢川周泪下如雨。他在心中呼喊：“滇缅公路，我又回来了！”他一路用目光抚触着再熟悉不过的风景，山水原来如此有情，它们也一样注视着归来的谢川周。他一路告慰着牺牲在滇缅公路的战友的阴灵，南侨机工，永远是一个整体。此时，谢川周回来了，南侨机工就回来了，南侨机工坚守到了胜利的最后时刻，不负初志、不辱使命。历史，可以忘掉某一个葬身山谷的机工的名字，但“南侨机工”必然成为一个光辉的“历史名词”永载史册。

他一直把车送到了昆明黑林铺，这里有西南运输处的旧址，也是机工们踏上滇缅公路的起点。尽管他在先前战友口中得知，“你一交车，人家就不认人了，叫你开步走”。——即他将再次面临“失业”。正是这样，谢川周在驾驶室里停留了一刻，摩挲着方向盘，左半圈、右回放，拉紧手刹又放开，试了各挡位。驾驶室顶上有电线连接的小灯泡，灯泡是他从毁弃的日本军车上拆下来的，灯珠很小却有8瓦亮度，他用它来读战报……然后走下车，郑重地关上车门。向滇缅公路致礼，他的右手五指并拢，在帽檐上足足摆正六分钟，他是第八批回国的（1939—1945年），六年了，一分钟代表一年！过往车辆缓行，目视这个活的“雕塑”……

4

史迪威在兰姆伽整训中国驻印军的同时“设立了庞大的后勤供给部，成立第二十六航空队（空军），调来机械化筑路部队和铺设油管的工程兵部队”^{【1】}。由于驼峰航线代价高昂，早在1942年12月，中、美、英三国初步商定反攻缅甸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中就包含了开辟一条新供给线的计划。具体方案是中国军队以雷多为基地，从胡康河谷向前推进，美、英双方同意“美国应负责修筑一条公路，从雷多下经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滇缅公路衔接起来”。——中印公路开通是对日反攻的军事战略的一环。

在史迪威的组织下，中印公路1942年12月10日从雷多破土动工，但一开始工程进展很慢。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发动滇西反攻，中国政府决定配合反攻抢修中印公路北线。8月5日，中美联军收复了密支那，中印公路也顺利通车到密支那。9月14日，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工程进度进一步加快。1945年1月4日，简易的毛路开始通车。1月28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会师芒友，当天中美联军在畹町举行了隆重的“中印公路通车典礼”。为了表彰史迪威对中印公路的贡献，国民政府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中印公路的建成粉碎了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从而切断中国对外供给线的战略计划。到抗战胜利，中印公路共运营了半年多。其间共运进汽车一万多辆，军用物资五万多吨，为中、美、英三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上的胜利反攻提供了物质保障。大体沿着中印公路铺设的中印输油管道起于印度第一大港口加尔各答，止于中国昆明。工程从1943年12月开始，1945年4月完工，全长3218千米，比当时的美国大油管还长900多千米，堪称世界第一。1945年6月开始通油，当年11月输油停止，共运输各种油料10余万吨，支持了抗日

【1】杜聿明、宋希濂等著：《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战争的能源供给。

不少南侨机工参与了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工程建设，由于中印公路铺设与缅北反攻是结为一体的，所以有的机工直接参与了驻印军和联军的缅北反攻。在中印公路通车后，又参与了繁忙的公路运输。

前文所叙及的后勤部汽车第三十一团第八连是由华侨司机组成的汽车连，连长梁志坚也是南洋华侨，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八连在正面战场、运送远征军等军事任务中屡建功勋。1942年，八连又被调入中国驻印军汽车六团。

从1943年开始，中国驻印军开始与美国的两个机械化工兵团和后勤部队协同开辟中印公路，并同时铺设油管。八连的华侨机工全程参与了工程，机工黄迎风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开辟中印公路是项艰苦而伟大的工程，既要预防敌人的袭击，又要与蚊蝇、蚂蟥、毒蛇、猛兽做斗争。由于环境恶劣，



由中印公路进入昆明的第一支车队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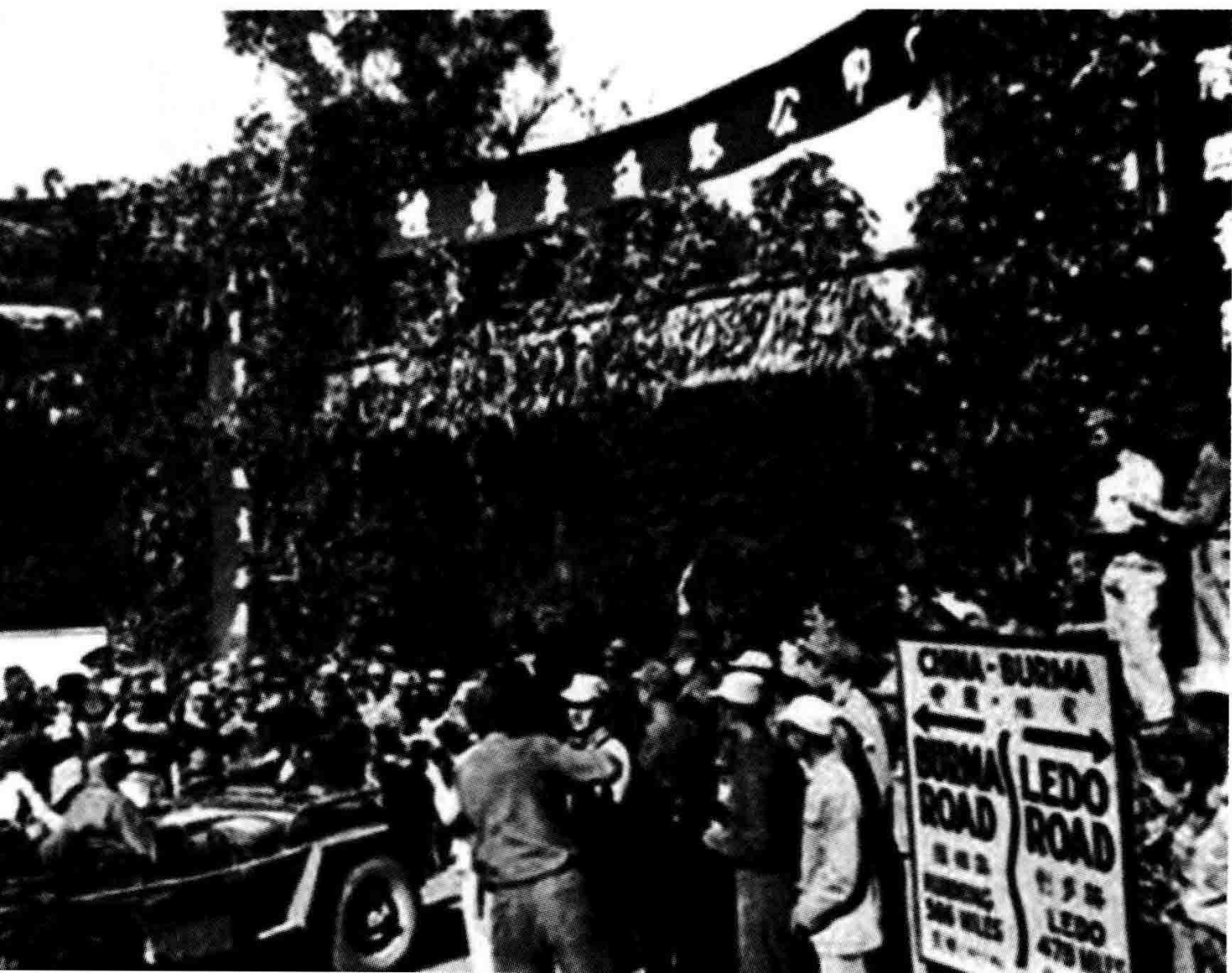
许多人因霍乱、伤风等疾病失去生命。尽管如此，官兵们仍日夜施工，沿着公路还要铺设一条油管，隔一段距离就设一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

因为汽车部队的工作灵活机动，如装运和卸载物资少不了要跟美军后勤部队打交道，修车、加油需要与美军管理的油站、修理厂沟通。黄迎风曾在马来西亚一家罐头厂工作，经常与欧美的客户打交道，学得一口地道的英语。没想到在战争中派上用场，黄迎风成了“三级英语翻译员”，从一个普通的运输兵提升为校官，并可以领取校官在印度服务的特别津贴。

1943 年底，当公路修至野人山进入缅甸境内时，被日军封锁，无法前进。为突破封锁线，美军派来飞机进行轰炸，驻印军在阵地上向敌军开炮，密密层层森林被炸秃了一大块，敌人的据点暴露出来。这时，我军士兵就勇猛地冲进敌阵，手持冲锋枪、喷火器把据点一个个夺下来。此时，身后的筑路部队就可以跟进铺路。

时任新编第 1 军新编第 38 师炮兵第 1 营营长王及人回忆：“在原始森林

1945 年 1 月 28 日，中印公路南线通车，在中国边境畹町举行通车典礼



中作战是一种特殊的战斗，看不到人烟、村落，茫茫林海中寸步难行，全靠每人一把砍刀开路，靠特制的指北针修正方向，一天走不到五英里路程。如果遇不到林空，一个星期见不到太阳也是常事。敌人的防御阵地，都设在道路两侧的密林中，既不扫清射界，也无须设副防御。阵地构筑成一个圆圈形，内中交通壕四通八达。在古老的大树上，还用沙包筑成一些小碉堡。这样的防御阵地是很难攻击的。我军凭借优势火力，先用各种火炮进行广泛射击，把敌阵周围的森林炸得枝叶尽秃，只剩下一根根枯焦的树桩，如同大火烧过一样，使敌人阵地完全暴露出来。在炮击的同时，步兵掘壕前进，围绕敌阵构筑包围工事。将敌阵围住后，再用迫击炮、火箭筒、喷火器、机枪及手榴弹等，一齐向敌阵猛烈发射。这种打法，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取得攻击的胜利。美国人也认为这是丛林战的创举。”

“在缅北战场上，美国筑路部队和油管敷设工程队，紧紧在驻印军后尾随跟进，日进数英里，几乎是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孟绥战役中，坦克能适时参加攻击，大出日寇意料之外。修筑这条公路，虽然是高度的机械化施工，但许多地方要从原始森林中通过，单是扫清施工的地面，就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1】}

1945年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胜利会师。以驻印军将士血肉做路基的中印公路通车。中印油管也开始源源将汽油输送到中国。从中印公路到滇缅公路上，又开始运行着川流不息的车队，后方的很多南侨机工应征，重新战斗在此时的运输线上。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仍然奋战在印度的汽车六团，全团官兵昼夜狂欢。美国人带来了香槟，把泡沫喷向空中，黄迎风满脸香槟的泡沫，和着泪水流进嘴里。美国大兵把这个能讲地道英语的中国人抛向空中，机工们在一旁唱起了他们很久没有唱过的马来情歌。

1946年春，汽车六团五百五十辆十轮大卡车和二十多辆吉普排成几千米长的纵队，浩浩荡荡由他们亲手铺设的中印公路回国。八连的机工们早就将

【1】杜聿明、宋希濂等著：《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车辆整修一新，又用清水反复清洗，直到车身光可鉴人。当他们重新开入滇缅公路时，机工们采来鲜花，插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采来柏枝，绑在后视镜上，表示对重回滇缅路的庆祝和对死难战友的缅怀。沿途村镇的老百姓们夹道欢迎，送来茶水和果品，每一张脸都透着从心底涌出的快乐。黄迎风想起了远在南洋的老母亲和弟弟，他们都还在人世吗？是否在同庆这伟大的时刻呢？

机工何纪良是驻印运输队的骨干之一。他在机工群体中是有名的“拳王”，这得益他从小跟从叔父习武，但自回国担任一名司机，对“中国功夫”他深藏不露。在印度集训，生活较前优裕许多，但这个训练地，由于与难民杂处，环境卫生十分恶劣，美国教官为此恼怒异常，责令驾驶兵整日推运、填埋垃圾，消毒、清扫，建盖卫生设施，无休无止。虽然机工们知道，这是必要的，但训练常常荒废却令机工暗自焦灼。一天，基地通过验收，美国主教官十分得意，竟自下令要搭建擂台，美、印、中各国驾驶兵各选若干人进行拳赛，打下“擂台”即获“拳王金腰带”——这是美国娱乐传统，在军队里竟也流行。擂台上有一个美国教官，身材魁伟，“波克西”（西式拳路）十分了得。何纪良开初远远站在圈外，抱手看热闹，台上台下大呼小叫，已经有几个印度人滚落下来了，一个美国机械师被打得从围绳里飞出来。又一个美国推土机手在第六个回合里被打倒不起。已经三十余回合，胜利者骂了一声：“中国人呢？你们不从我拳头下钻过去，就别想离开阿萨姆去打日本人！”中国机工无人应战，何纪良理解，他们刚刚奉命将成百吨木材运到工地，多数人返回基地连饭都没吃，但擂主这句话惹恼了他和所有在场的机工，他们突然异口同声喊：“何纪良！何纪良！”何纪良甩了上衣，赤膊上台。异常英俊的何纪良，眉宇清秀，不像是为武之人，美国拳手甚至盯着他看了足足几秒，刚宣布合手，美国人甚至暴露上身，双臂交叉，意思是暴露位置让对方取得先机。何纪良对这样傲慢的态度不予理会，方才台下观察，他已经成竹在胸，对方摆拳凶狠，但空挡较大。他做了几个出刺拳的动作，这个连贯动作的最后一拳却是真动作，直刺美国拳手眉心，他挨了一下，恼怒了，终于连续摆拳，这正中何的计策，他一个直勾，正中对方下颏，打得他摇摇



沿中印公路铺设的中印油管



何纪良

晃晃。接下来两个回合，对方进逼甚猛，何躲闪多于进攻，正当对方嚣张至极时，何连续三拳命中对方左右颞和下颞，轰隆一声，150 磅体重的拳手倒地不起……

美军主教官将“金腰带”挂在了何纪良腰上，他的“奖品”则是一台半新的美式吉普车。现在，他可以开着吉普车邀约伙伴去兜风了，这时，他接到辗转万里来到基地的祖母的一封信，顿时令他泪如雨下。原来，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华侨已经四散逃亡，但祖母仍希望他能回来，有朝一日继承祖父遗留的产业：一个橡胶厂和一个鱼罐头厂。当年，为返回祖国，刚满 18 岁的他，是瞒过家人在轮船上藏了起来的，祖母曾找到码头上来呼唤他，当汽笛声响起时，一切淹没，他为幸运和悲伤纠结，却没有眼泪——他解下金腰带，对身旁的南丹同乡谢耀南说：“大战在即，我太想上阵杀敌了。你若活着，就把这个腰带带回去给我的祖母……只要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丢脸就行了。”

不久，缅北反击战开始。在深入缅甸不久，联军总部为破袭日军“黑风”部队，抽调他和叶检等人组成敌前侦察小组，任务是摸清敌人驻地水陆道路。机工叶检年龄稍长，武功更胜。他们在丛林中隐蔽、摸索数日，完成任务返回后突然被日军发现，狼狗与追兵迅速形成包围，在一个狭小的半岛上无路可遁，两人只得潜入水中，敌军疯狂扫射，何纪良股部、大腿中弹，血flow染红了大片水域，但他仍憋气在水中，不时以空水壶口伸出水面少许，再吸壶中的气，仅凭这个办法，在水下汲气养息，半个小时过去，敌军始退……

5

1943年5月，中英两国政府商定成立敌后工作队，由南洋华侨林谋盛、庄惠泉负责，隶属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统辖的一三六部队，在马来西亚敌后进行情报、游击活动。部分南侨机工参加了一三六部队。后林谋盛在马来西亚被日军逮捕，壮烈牺牲。

还有部分南侨机工被盟军总部昆明分部选调进行特种训练，潜往东南亚缅甸、泰国等敌占区做侦察工作。蔡汉良就是其中一位。

蔡汉良报名回国前侨居泰国，熟悉当地情况，因此被盟军选中。1944年5月，经过严格训练后，他得到侦察日军拉温军事基地的任务。他先乘专机来到南宁，步行由东兴进入安南境内，经芒街、海防、河内等地，再经过老挝湄公河到达沙湾拿吉，雇小船渡到泰国边境穆达汉，他必须在这里办理入境手续。在入境手续办理处，蔡汉良被一名华裔官员严加盘问，对他的身份十分怀疑，他用泰语对另一名泰国官员说：“这个人很可疑，应当扣留调查。”可泰国官员却满无所谓地说：“他不过是个乡巴佬，你看，他连进门要脱鞋的礼节都不懂，也不会鞠躬，显然没受过教育，不要自找麻烦了，让他入境吧！”（此时蔡汉良化名蔡坤）蔡汉良终于顺利入境。

他坐上由乌汶至曼谷的火车，火车上有不少特务沿途盘查。一个华裔特务看他是中国人，便问道：“你去曼谷做什么？”蔡汉良故意用口音浓重的闽南话达到：“回吉兴矿务公司工作。”（吉兴矿务公司是蔡汉良叔父所开的公司，回国前蔡汉良就在这里工作。）特务又问：“你回国去做什么了？”蔡汉良答道：“回南安务农，现在兵荒马乱，还是回来做工挣得多。”特务看他回答得并无漏洞才离去。

到达曼谷，他当夜便住进耀华力大街“大华百货商店”楼上的“东亚旅社”。曼谷市内并无多大变化，但到处是日本宪兵在巡逻。第二天，当他在街上寻求到达拉温的办法时，忽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角，蔡汉良马上警觉起来，跟随这个人来到一个小咖啡店，那人一语不发，将他自己的“大白笠”留在柜台上，而将蔡汉良的“大白笠”戴走了。蔡汉良戴

上那人留下的斗笠，来到僻静处，翻开帽檐，里面果然有一张小小的字条，告诉他“东亚旅社”有三个日本特务：负责登记的、卖眼镜的和按摩师。蔡汉良立即毁掉纸条，离开了东亚旅社。

他辗转来到距离侦察目标拉温还有150千米的春蓬，这里戒备森严，开车出入的全是日本人，每5千米设立一个检查站，难以接近。蔡汉良只得住到附近一个堂兄那里慢慢找机会。这位堂兄告诉他，他当年不辞而别，伯父拄着拐杖一直追到马来西亚槟城，可是载着第九批回国机工的轮船已经开走了。蔡汉良幼年丧父，在泰国经商的伯父、叔父收养了他。抗战前夕，叔父蔡铁民已成为南安县的大富侨。在泰国，伯父蔡兴普一手将他拉扯成人，情同父子。虽得知伯父和婶婶都还健在，但此时的蔡汉良身负特殊使命，只能“过家门而不入”，他正在急切地寻找接近拉温军事基地的办法。

过去了快一个月，一个绝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从前同在叔父工厂做工的泰国侨生郑阿隆在拉温基地当杂货采购员，蔡汉良便求他介绍工作。看在他们“老相识”的份上，郑阿隆为他找到一份在日本人餐馆做杂役的差事。这样，蔡汉良坐着日本人的卡车进到了拉温军事基地。每天，在菜馆里，都可以收集大量的情报。蔡汉良很快就摸熟了情况：军事基地的主体建在一片原始丛林中，大量的弹药堆垒得有三四层楼高，用巨幅的篷布加以遮盖。日军驻扎在地下工事里，几千名被抓来的华工及土著正在紧张地挖掘庞大的地下工事。等到混熟了，蔡汉良就趁日本宪兵巡逻的间隙混入禁区与做工的民工聊天，一边闲聊他一边用脚丈量着军事基地的精确大小。他对一名闽籍老乡说：“我们在这里做工，哪天盟军的飞机来了，不就炸死了吗？”那工人笑道：“不用担心，你刚来不知道，这里和对面山上都有高射炮基地，死不了的。”就这样，很快，蔡汉良就得到了足够的关于拉温的情报，他用日文旧报纸绘制了一张拉温军事基地的精确图纸。他现在，必须要设法脱身，将情报送出去。

他将图纸混在用于包杂物的报纸中，对饭店老板说，蚊子太多，想回去拿蚊帐和衣服。日本老板并不放心，让他快去快回，并派了一个人陪同监视。晚上，他们住进春蓬的一家旅店，这个监视蔡汉良的槟城土生华人坚持两人

必须睡一间屋子。清晨4点，蔡汉良假装起来解手，那人遂警觉醒来，问道：“天还没亮，你干什么？”蔡汉良捂着肚子说：“肠胃不好，拉肚子了。”他故意不拿箱子，只取了手纸。那人看他两手空空，就没有跟出去。蔡汉良出了旅馆，一阵疾跑，雇了一辆三轮车赶到火车站，坐上了抵达万伦的长途火车。为了保险，还差两站，他就下车了。

当到达越南海防时，因为盟军炸毁了滇越铁路的桥梁，日军正在进行大搜捕。只要有生人一律逮捕。蔡汉良在一家海南华侨开设的“大同旅馆”也被捕了。他事前已经将“军事地图”藏在旅馆房间的铺位下。他会说海南话，央求老板看在同乡面分上要救他出来，没想到，这位海南人的确没有爽约，向日本人保释了他。蔡汉良怀揣地图，握了握“老乡”的手，又上路了。

在海防轮渡码头，日本宪兵对所有上船的人都要一一严格搜身。蔡汉良将地图混在旧报纸中，裹着一双皮鞋塞入箱底，日本兵并没介意包鞋的旧报纸。搜身之后，蔡汉良又顺利过关了。

终于，看到中国的国境线了，蔡汉良按捺住心中的喜悦，希望能顺利通关。没想到还是被中国边境的边防军扣押了——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蔡汉良被送到了东兴镇公所，当他向镇长说明情况，镇长马上为他松绑，款待了他简单的晚饭。

此时，南宁已第三次失守，无法再乘坐飞机了。蔡汉良已身无分文，只得在东兴向总部发电求援。不久，总部汇来了安南币1000元，指定在芒街（安南境内）办事处领取。东兴镇公所派出几个工作人员掩护，蔡汉良最终在芒街办事处一位“五道杠”的法国军官手中领到了盟军的汇款。这期间，有七八位执行不同侦察任务的南侨机工也先后从东兴回国。他们虽不能交换各自的侦察任务，但相逢一笑，甘苦都在其中了。最后，执行特殊使命的七八位机工结伴同行，他们穿越十万大山，又步行16天后到达广西百色，然后经贵阳回到昆明。此时，已是1945年5月了。

蔡汉良在昆明向盟军详细汇报了侦察到的情报，当他拿出那张绘制在日文报纸上，斑斑驳驳，但笔迹仍十分清晰的“拉温基地军事地图”。负责联络的美国上尉露出赞叹的神情，他由衷地握住蔡汉良的手，深表敬意地点点头。

当蔡汉良离开盟军总部，5月的昆明是那样温暖和煦，天空碧蓝无云。他感到周身的松快，根据当前的战情，和平可能就快要到来了，他等待着。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军位于泰国拉温的军事基地受到了盟军的精确打击，所有目标：军事仓库、高炮阵地、电台、火车站、港口、停港战舰全部被摧毁，大火燃烧了六七天之久。这对于日本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布局构成严重打击。总部特地召见蔡汉良，向他出示了两张空军拍摄的拉温基地照片，一张是轰炸之前的，一张是轰炸之后已荡然无存的。

完成了特殊任务后，蔡汉良一直服务于战时运输局，直到抗战胜利。

蔡汉良和很多幸存机工都获得了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颁发的奖状。上面题写着：“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给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兹证明：蔡汉良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此外，南侨机工还获得了两枚纪念章：一枚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所赠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一枚是云南各界欢送大会赠送的“南侨机工复原纪念章”。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时，蔡汉良把这些宝贵的实物赠给了华侨大学的“陈嘉庚纪念堂”。虽然，这些徽章和奖状远不足以讲述每一个获得者的故事，但历史不可能否认创造者们的功勋——因为，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历史走到了今天。今天，就是昨天最好的证明。

6

1943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须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于1944年发起了豫湘桂会战。

汤恩伯虽打击了日军，予局部其创伤，但日本华北方面军气势汹汹，仍以优势兵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势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切，虽叹息如以衡阳能抵抗三旬，各战场何至溃败若此？但国军指挥系统失灵、意志亏衄，仍溃如泄水。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

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这场战争尽管达到了日军的作战的企图，可是，日本人无力去维护“大陆交通线”的畅通，并且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部分南侨机工参加了豫湘桂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其处境在前

文已部分涉及不赘。被调往前线从事战斗运输的机工多牺牲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社会开始关注“南侨机工”的历史时已不在人世，所以因史料缺失我们已失去复现历史的可能。

林广怀失业后经原西南运输处第三分处熟人介绍，来到兵工署汽车运输处工作，往返于昆明、贵阳、湖南等地转运物资。1944 年，日军占领广西、进攻贵阳时，林广怀奉命参加了战斗运输。他夜以继日运送第 9 军和第 13 军战士到独山前线。一次，车队被日军包围，车队隐蔽起来等待救援，林广怀两天两夜没有离车。两天后，终于解围，车队得到命令掉头运送独山前线伤兵返回贵阳。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开始复原南返，林广怀因执行运输任务到湖南长沙而错过南返机会。他只领到了一枚“南侨机工复原纪念章”和复原奖金。他把这枚小小的纪念章寄回了南洋家中。当年，报名回国时，老祖母赶到筹振会阻拦。林广怀原名林江海，出身南洋富商家庭，父亲早逝，江海是长子，下面八九个弟妹需要扶持。老祖母认为江海应当留下支撑家庭。但自幼就是“孩子王”的江海领着一帮“兄弟”执意回国。老祖母只得垂泪应允，反告诫他既然决心已下，必得竭诚尽力，不能半途而废。末了，老祖母抚着她最疼惜的长孙的头说：“战争胜利马上回家，我要看到你才合眼！”

刘源访是前文所叙及南洋华侨梁志坚带领的“华侨连”——汽车六团三营八连的成员，滇缅公路中断后，八连的部分成员仍坚持在广西、贵阳、湖南一带进行军事运输（其余调往印度）。1944 年，日军直逼贵阳，机工们仍穿梭于枪林弹雨中向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再将伤员送往后方。到最后，汽油已经耗尽，车队改用木炭车继续战斗。木炭车动力不足，行驶缓慢，遇到险情，很难脱身。多名南侨机工战友在前线牺牲。后来，盟军开始配合反攻，美国飞机经驼峰航线运送汽油至云南沾益和陆良机场，华侨机工奉命将汽油转运至广西、贵阳，甚至湖南前线，直到抗战胜利。

王新春在广西战场的运输中失去了左腿。一天，他运送军用物资穿越敌人封锁线，一排子弹从驾驶室左门射进，正打中他的左小腿，顿时，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整个脚踏板。他的左脚此时完全失去力量，就用车内的一块木板绑在小腿上，大腿用力，使木板抵住脚踏板，坚持把物资穿越敌人封锁

线送达了目的地。但因为左小腿腿骨完全被打断，留下了终身残疾。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阿摆”。

7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从雷多开始发动缅北反攻战，如猛虎出山，取得一系列胜利。日军在遭受沉重打击后承认：“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在取得密支那战役的胜利之后，世界舆论欢欣鼓舞，认为盟军已取得缅甸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史迪威评价：“中国军队是极好的。”他也由中将晋升为上将。1944年12月，驻印军先后收复八莫、南坎。

1944年3月，日军曾为了挽回缅北战场的失败，以凌厉的攻势发动了进攻印度英帕尔的战役，以图攻击中、美、英联军的印度后方基地。为使英帕尔英军脱险，并策应中国驻印军的缅北攻势，收复滇西失地，并打通陆上通道，中、美、英三国经过反复协商，决定中国远征军发动滇西反攻战。

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为卫立煌，军队主要由第1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组成。当时，日本第56师团在怒江以西的腾冲、龙陵和松山三个地方驻扎重兵。

1944年5月11日傍晚，远征军强渡怒江，滇西反攻战次第在松山、腾冲、龙陵打响。经过艰苦异常、牺牲巨大的阵地战，远征军攻克松山，收复了腾冲、龙陵。日军遂沿滇缅公路撤退，11月20日，远征军收复芒市。1945年1月19日，收复畹町。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芒友会师。

至此，云南怒江以西沦陷两年半的国土完全光复。全中国“收复失地，实滇省最早”。滇西、缅北反攻的胜利，使中印公路、中印油管开始向国内战场输送军事装备和汽油，滇缅公路也重新可通，这有力支援了即将开始的全国大反攻。滇西缅北的胜利是二战东亚和东南亚战场的重大胜利，大大提



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天险

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后的谈判能力。美国《皇冠》杂志评论：“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很多南侨机工参与了滇西反攻。早在1943年年中，为滇西反攻做准备，很多南侨机工被调往远征军运输或工程部队服务运输。

机工谢金标曾从敌人枪口下由沦陷的怒江以西偷渡回怒江以东。此后，就编入守军部队运输处。此时，我军与日军隔江对峙，部队调动频繁，不断发生小规模战斗，谢金标穿梭于敌人的炮火下，不断把物资运往前线。

从1944年开始，怒江以东已经开始为即将打响的反攻做准备。谢金标开始奉命将部队、工兵团和大量渡江器材不断从保山等地运送到强渡点。据时任中国远征军工兵集训处教育组副组长的周鑫回忆：“怒江是一道天然屏障，河面不太宽，平时宽约两百米。但两岸陡峻，水深流急，除原有少数渡口外，其他地段无法渡河。加之怒江对岸的高黎贡山为日军盘踞，火力可以控制我军的行动。要实行反攻，首先必须强渡怒江。因此，在反攻之前，渡河器材

的准备，就成了当务之急。……以独立工兵第三十五营为基干，并雇佣民工，专门负责制造渡河器材。到1944年5月反攻前，制造好载一排人用的大木船和载一班人用的竹筏数百只……”^{〔1〕}

在怒江东岸的隐蔽点，工兵部队就地驻扎，士兵和民工日以继夜忙于修造渡江浮桥和扎制竹筏。对岸敌军似乎察觉到了我方的意图，不断炮击。谢金标经常在夜间运输，有时就宿营在工兵团营地。一位姓李的排长是谢金标的广东同乡，两人甚为投缘，得知谢金标是南侨机工后，李排长对他更增加了敬意。一次，李排长对他说：“此次强渡怒江，难度很大，一定会有很大牺牲，我们工兵团要随部队渡江，然后抢修被敌人破坏的滇缅公路和惠通桥，听说机工曾经在功果桥被炸后扎浮桥让汽车通过？”谢金标便向李排长绘声绘色地说起当年机工用汽油桶扎浮桥的事迹。李排长连连点头。

一天，谢金标正运输物资到达工兵营地。对岸又传来炮击声，炮弹不断落在营地附近，显然，工兵营已被日军侦测到了具体位置。谢金标急忙隐蔽，一枚炮弹正中一间营房，营房周围的竹筏被炸上了天，十几位官兵被炸死，其中就有谢金标熟知的李排长。

正如李排长所料，强渡怒江牺牲巨大，我军几乎暴露在敌人火力点下。但将士异常沉勇，积蓄两年多的士气骤然而发，几百艘木船、竹筏同时在激流漩涡中进发，敌人密集的炮弹形成火网，先头部队伤亡惨重，有的竹筏到岸时，士兵已伤亡殆尽，上岸部队进行艰难的仰攻。一时江水为牺牲将士的尸体所塞，一江碧血在最后的天光下沸腾，染红了夜空……

强渡成功后，我军即刻发动了对松山火力点的强攻，最终压制住了敌人的炮火，收复了桥西阵地。此时，抢修惠通桥已具备条件。6月18日至20日，工兵抢修队“迅速将38毫米粗的三根承重钢缆牵引过江，用绞盘将其绷紧并固定，然后在上面铺设木板。便桥桥面宽度达到3.3米。”^{〔2〕}此后，远征军大部队就从这座浮桥上开往前线。

部队向哪里推进，谢金标就跟随部队一直运送物资到阵地。当他第一次

〔1〕杜聿明、宋希濂等著：《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2〕龚启英：《龚继成——滇缅交通史上的英雄》，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年版。

开着卡车通过这座崭新的浮桥时，禁不住看了看流向远方的怒江，这条江，总是激荡怒吼而来、悲怆哀婉而去。惠通桥，这座连接着滇缅公路和南侨机工生与死的桥，又一次横锁怒江，将历史与生死紧紧扣合。

余汉洲等南侨机工曾参与松山战役的战地运输。松山雄踞怒江西岸，日军占领松山之后，在大小松山、阴登山、黄土坡、大垭口等地精心构筑了复杂坚固的防御工事，地堡密布，暗道相通。日军第56师团113连队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率3500人驻守松山。日军吹嘘松山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扬言不丢下10万具尸体，中国军队休想跨越松山。

远征军强渡怒江成功后，1944年6月4日，松山战役开始。远征军第71军和第8军先后激战两月，发起进攻无数，伤亡惨重，但只扫清通向主峰高地核心阵地的道路。

此时，滇西反攻得到美国的大量军援，弹药和美式军械供应充足，余汉洲等南侨机工组成的车队归入11集团军统一领导，负责运送兵员、武器到达前线。松山久攻不下，后勤运输十分紧张。余汉洲曾连续10多天日夜抢运，几乎没有离开过卡车，只是在短暂的工作间歇中在驾驶室打了个盹而已。与日军抢夺阵地时常白刃相接，前方抢回来的伤员，个个血肉模糊，只一息尚存。余汉洲曾运送过一个在白刃格斗中重伤的“娃娃兵”到后方临时医院，他是缅甸华侨，日本占领缅甸时逃难随远征军回到国内。他向余汉洲要了一支烟，余汉洲告诉他，南侨机工戒烟戒酒，他竟很欣慰地一笑：“我知道南侨机工，我的一位表哥那时也报名回国了。将来，我也要当驾驶兵，要开10吨的重卡。”

到达后方医院时，这个不过十五六岁的远征军小战士已经牺牲了，他向其他伤员要到了一支烟，但没有点火，只是像一个老兵那样把他卡在耳朵上。

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九一八”国耻日前拿下松山，否则军、师、团长一律军法从事。远征军将士急中生智，决定对松山主峰子高地进行坑道作业，实施大爆破。从8月3日起，工兵营在敌人阵地下方约150米处开挖坑道，至18日，掘至敌地堡下方，填装TNT炸药3吨。20日上午起爆。此时，余汉洲运送一车军火正开至怒江东岸，只



听一声闷响，对面松山阵地，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砂石瓦砾腾向高空，随之而来的是我军向着敌军阵地的密集炮火。敌军仍负隅顽抗，经过近 20 天的苦战，直至 9 月 7 日，远征军才最终克服松山。松山战役历时 95 天，全歼敌军 1280 人，远征军投入兵力 6 万人，伤亡 6763 人。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余汉洲在松山战役中曾翻车受伤，在短暂治疗后，他又回到运输部队，坚持战斗到战役结束。

机工殷华生 1943 年参加了“美国陆军炮兵游动修理队”，在昆明干海子修理各种大炮。他很快就将汽车修理技术熟练地运用到大炮上，美国同事早耳闻南侨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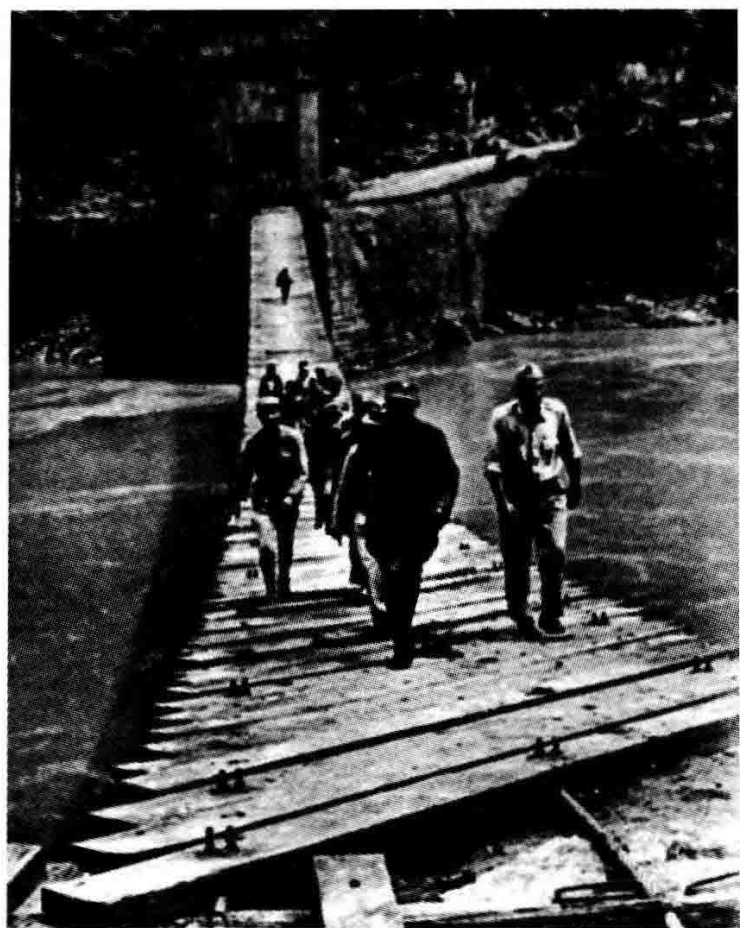
等待渡江的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中）和美国顾问弗兰克·宾恩将军（左二）

技术一流，此时，不得不发出啧啧的赞叹。几个月之后，“游动修理队”分成两个分队，每队十多人，赶赴滇西，为即将开始的滇西反攻做准备。殷华生编在第二分队，队长徐汉生，也是南洋归来的技师，负责修理炮瞄望远镜、野战罗盘。殷华生负责修理大炮：更换炮筒、修理撞针、调解炮身弹簧、调试瞄准器等。“游动修理队”先后到达下关、大理、凤仪、弥渡、巍山、云州、祥云等地，为第5军、第6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36师等整修各类火炮。

1944年5月滇西反攻打响之后，“游动修理队”跟随部队前往滇西战场。第二分队选派了五名美国技师和包括殷华生在内的四名中国技师组成小分队，他们配置了卡宾枪、子弹，带上全副美式的“野外行军装备”，由骡马拖着修理器械，就上路了。

此时，虽然远征军在前方推进，但敌军仍有残余部队和大量特务奸细在滇西各处活动。“游动修理队”单独行动，没有部队的保护，十分危险。小分队白天赶路，晚上挂起睡袋休息，日夜兼程终于赶到怒江边，大家把一只橡皮艇吹胀，顺利渡江。此时，远征军已克复腾冲、松山。此次任务是直接赶往龙陵象达前线阵地。象达为龙陵背靠群山之顶峰，下临万仞，要到达象达必须迂回蛇行，绕过几处日军阵地。白天可以听到前方传来的炮火声。经过几天几夜的行军，小分队疲惫难当，就地扎营休息，但不远处的山头即是日军的阵地。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分队的饮水早已耗光，大家干渴难耐，殷华生自告奋勇去为大家取水。在山脚下，有一条小溪缓缓流动。殷华生牵着骡马，不敢打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天晚上，恰好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越接近溪谷的地方，草越深。突然，殷华生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仔细一摸，发现是一具死尸，他摸到了军服的纽扣，是远征军士兵，胸前还插着一支钢笔。借着微弱的星光，殷华生模糊看到前方还有几具尸体，大约也是我方士兵的，因为在战斗中滚下山坡，无人收尸。他跨过这些尸体，来到小溪边，此时已是冬季，溪水流动十分缓慢。殷华生从骡马身上取下两只铁皮桶，用一只军用水壶往里盛水。当他取完水，正要往回走时，一束灯光扫射过来，紧接着，又一束灯光，殷华生连忙扑倒，屏住呼吸，山脊上走来

1944年7月8日，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走过惠通桥。怒江对峙两年后，中国的反攻大军终于夺回了这一滇缅公路的咽喉。此时惠通桥经过重新铺设后成为一架浮桥



一支日军夜巡队。他拉住骡马，生怕它叫出声音，半个小时后，日军才走远。殷华生松了口气，摸了摸这头懂得“默契”的骡马的脖子。

在象达红岩山阵地，敌军负隅顽抗，远征军发向敌军的炮火连日不绝。“游动修理队”直接到阵地修理大炮，殷华生此时终于实现了南侨机工在报名回国时的心愿——亲手杀敌。他一刻不停地抢修着大炮，在阵地上倾听炮弹发射时的“嗖嗖”声，只要听声音，他就能查知问题，在休战时进行修理。苦战三个月，红岩山阵地还是未能攻下，“飞虎队”派来轰炸机参与战斗，将红岩山阵地炸成焦土，冲锋部队手持喷火器、火箭炮冲上敌阵，直到喷火器将火焰喷入地堡，日军才被逼投降。

“游动修理队”一直跟随远征军一路克复龙陵、芒市、瑞丽、畹町。直到1945年8月15日，殷华生还在边境修理大炮和军械，一位战友跑进修理队欢呼道：“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他一下抱住殷华生，抢下他手里的工具，拉着他来到营房外，士兵们欢呼着簇拥到这里，把几台收音机聚拢到一起，调到最大音量，广播里正循环播放着这重大的喜讯。不知道美国士兵从哪里找来了啤酒、香槟、白兰地，人们按照中国习俗把肉桂和糖掺进酒中以示吉庆。殷华生平时滴酒不沾，此时，他将大杯的甜酒一仰脖倒进

喉咙里，这一杯酒似乎还未入肠，就早汇入那胸中涌起的悲与喜的巨流了。

他想起了当年唱着《再会吧，南洋》一起出发的战友，晴波万里的海面上，他们的歌声究竟被海风吹送到了何处，为什么此时会在他的耳边响起？他默默地在心底追随着那熟悉的旋律：“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当年那个大声唱向大海的年轻人，如今为何更愿意在心中无声地歌唱呢？这无声的歌唱是否在冥冥中聚合往来无间，同默默中的听者与和者呢，默默中的灵与魂呢？是否会流下微温的眼泪呢？一滴泪，是否就是过去无边的暖洋呢……

他走到一棵多依果树前，将第二杯甜酒洒到树下的泥土中，也许来年，酸甜的多依果会有别样的酒香，抑或，天地间冥冥有泪的青涩……

第九章 抗战胜利·归去来兮

1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盟国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表示接受日军投降，冈村宁次拱手缴出象征指挥权的随身佩刀，表示了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仪式历时15分钟。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同时，在中国各战区，日军先后无条件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在越南河内，则由滇军将领——第一集团军司令卢汉为主官接受日军投降。这份异国受降的荣誉理所当然给予了“支援抗战全国最力”的云南。

此时的中国，正沉浸在得之不易的和平的欢欣中，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饱受蹂躏之后深深喘息，期待着新生。但，内战的阴影步步逼来，一触即发。

蒋介石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日军就地集中并待降，却又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就地待命不得受降，同时命令其他国民党军队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另一方面又接连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

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 43 天的谈判，于 10 月 10 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 12 个问题。这 12 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单方面公开撕毁，宣告第三次国共合作破灭，内战爆发。但中国共产党“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

抗战胜利，南侨机工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此时，南洋也已经光复，机工与南洋亲人已分别七载，甚至很多人在南洋沦陷后与亲人失去联络。他们急切地想要返回南洋、重建家园。

但此时国民党政府正一门心思忙于内战夺权掠地，于当年“应召”而来，对抗战做出重大贡献的机工的“南返”根本置之不理。本来“天经地义”的重返家园竟成了“求告无门”、无人理应的大难事。鉴于 1945 年滇缅公路一断，机工即遭“遣散”的教训，南侨机工知道虽然当年为爱国抗日而来，今番要想返回家园，也必得自己努力，“天理”虽存，但人若不力争反抗，天理是不会“主动”彰昭的。

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庄明理在抗战结束之始，便会同潘国渠、白仰峰等人多次向国民政府交涉机工复原之事，均了无结果。

随后，庄明理又向国民政府侨务部提出关于机工复原的八项要求：①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②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③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做复原工作之准备；④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⑤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⑥发给南返机工服装；⑦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作为奖励，另一方面作为南返生活费；⑧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在抗战期间，或行为有失检点，或因怨谤而被禁锢的机工，请政府从速提审，分别

轻重，迅速遣送回南洋。

1945年10月，侨务部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等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八项要求”“极为合理”，即席通过。但直至年底，仍未公布任何实施办法。1946年3月，庄明理再次到侨务部交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答应拨款国币100万元，交华侨互助会办理紧急救济。但两个月后，不仅救济款没有着落，机工南返之事更石沉大海。

华侨互助会则在白清泉等的领导下行动起来。由于国民政府的失责，原来有案可稽的机工名册尽行散失，现在要督促政府实现机工复原南返，首要之事就是对机工重新登记造册。本来这是政府的分内之事，但如果任由政府一拖再拖，损失的还是机工的权益。华侨互助会决定承担起重新登记造册的使命。

经过七年抗战，中间机工遭“遣散”而流落各地，登记工作复杂冗繁，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各报刊发出通告，又在滇缅公路沿线和贵阳、重庆、毕节等地都建立通讯站，派专人负责调查联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第一期总登记，机工人数共1203人，其中新、马共1061人。而后来获准复原，享有奖金及证书的仅为1144人。当南侨互助会得到这样的统计结果时，无人不感到震惊与哀痛：当年意气风发，扬帆归来的3200名机工，如今竟损失2000余名。他们绝大多数为抗日牺牲，也有部分因失业流离、不堪苦寒而病歿，牺牲者“无名”，病歿者更不知所终，只有一条死而复还魂的滇缅公路永系着他们留在人间的车辙与足迹。这，是否本来就是“舍生者”必然的宿命，即肯“舍生”，又怎会在意是否留迹于人间呢？人间，幻真真幻，车轮滚滚，熙来攘往，总有“日新又新”的“大事”与“小情”牵引世人“向前”的生活，而“舍生者”无往无来，定格于生死的一刹、一笑、一花了。

名册编订完成后，华侨互助会以理事长胡春玉的名义，将这份少了3/2的人名，却重比千钧的“名册”分别上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侨务委员会、外交部、社会部等。寄希望于这份“无言”的“申言”能唤起有识有情者的共鸣，以期促成剩余机工的南返。但，一无回应。

华侨互助会主办的《南风》刊载了机工向政府和社会的吁请：“我们回

来时，南洋各地热烈欢送，均寄予莫大的期望，假如我们回去，固然是去重整家业财产，事实上，就是去复命与慰励海外父老。可是这种宽慰责任，难道叫我们垂头丧气、像穷困乞丐般去宣示吗？

“我们的集体回国参战，可以说是南侨有史以来空前的第一次，可是我们并不是末了一次。如果政府聪明的话，应该善其后以励来，借资立信、立威、立德，不然，难道政府要放弃千万的国民吗？”

1946年3月，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二中全会，此时，“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队伍天天在会场外抗议。白清泉、邱新民等决定，干脆直闯会场请愿，“大不了坐牢”。他们来到二中全会会场，声明要向大会上呈请愿书，如果政府不予理睬，“机工请愿团”将上街游行。大会果然派秘书长雷震接见了他们，并表示可以将“机工南返”之事列入大会议程。

然过后除善后救济总署发给华侨互助会一纸公函外，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公函甚至推脱责任称：“查侨工热心爱护祖国，如果当地政府允许入境，本署自当予以优先遣送出国……”

2

此时，避难琅玛的陈嘉庚已返回新加坡。新加坡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他开始着手处理战后一系列影响华人的重大问题。1945年10月20日，中华总商会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他在会上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中国内战不可避免，战后中国将出现三股势力：国民党、共产党及由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傅作义及张发奎等军事将领组成的第三势力。如果国共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合作，那么第三势力绝无抬头机会，倘若国共分裂，则华侨社会当自判断谁是谁非。”

早在1940年率南侨慰劳团考察延安之后，陈嘉庚就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2月5日，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

份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全体参政员并转国民党中央，痛陈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主张“弭止内战，加强团结”。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斥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瑁、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同时，他向还在国内服务的南侨机工发出“绝不参加内战”的号召。

1947年，陈嘉庚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陈嘉庚的立场使蒋介石忌恨在心，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侨总会”也态度大变。而当年响应陈嘉庚号召而应征回国的南侨机工，国民政府既不肯正面评价其历史贡献，对“复原南返”更故意持不闻不问、故意拖延的态度。陈嘉庚对此心知肚明，他无时不系念于等待南返的机工。

1946年5月，陈嘉庚收到了机工陈龙庆等13人的来函：“嘉庚先生大鉴：抗战胜利，万民欢腾，遥悉先生安然返新之息，无任欢感。第以关山阻隔无以言达为憾耳。

“民等均系抗战初期受先生伟大爱国精神所感召，激于义愤热忱，不畏艰难困苦，毅然舍离妻儿，参加回国服务团回祖国服务，其时悲壮之情绪迄今仍映眼前。回国之后，民等莫不以秉忠竭诚之本志努力工作，周遭处境，虽不免有令人灰心之处，总以一忍度之，皆盼抗战早日胜利，俾使凯旋海外，度安谧和谐之日子。如是一日终于到来，诚足庆幸，奈胜利迄今，将届一载，国内复原工作殆已完成，独民等此回国服务机工仍滞留内地，度失业穷苦之生活。据民等所知，前次太平洋战事后归国难侨，政府尚且发给每人200美元之旅费，而民等回国服务者则闻无所闻，似此未免令人心灰。以数年来之努力献身祖国，而令在海外父母子女度凄苦之日子，其报答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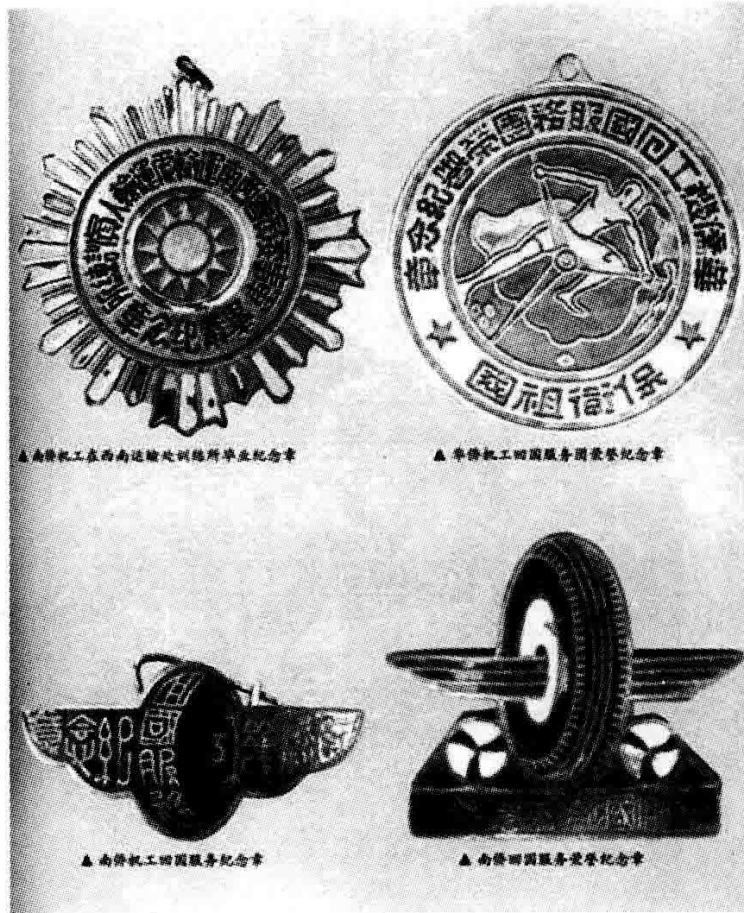
“以先生在国内之硕望，必能达成佳果，殷望之至，恳祈速予指示免再受痛苦，不胜铭感。……”

陈嘉庚反复思忖，此时他若再以南侨总会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机工复原

之事恐怕不但于事无补，更可能雪上加霜。他想说服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由他出面施压于国民政府再与新加坡当局交涉，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1946年6月16日，陈嘉庚在吉隆坡福建会馆主持召开马来西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①关于遣送机工南返事，交由驻新加坡伍伯胜总领事全部负责办理，并选出陈嘉庚、庄明理等五人18日“晋謁”伍总领事，以策进行；②遣送机工南返限期两个月办理完毕，另在昆明已登记失业的失业机工400人，应早日将他们遣送返回新马；③以全马华侨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名义，通电行政院，请速遣送机工南返；④一部分被扣机工，应请政府提早审讯，如无罪，立予释放；⑤如两个月内遣返工作未能完成，应请伍总领事返南京向中央请求力争。

6月19日，伍伯胜与陈嘉庚一行五人会晤并商讨机工南返事，他当场表示“赞同”，并表示会尽力促其实现。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机工南返仍无消息。陈嘉庚又连续两次致函伍伯胜，敦促其信守诺言。伍伯胜



上左：南侨机工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毕业纪念章

上右：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

下左：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纪念章

下右：南侨回国服务荣誉纪念章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实物存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



昆明各界欢送第一批复
原南侨机工南返

于8月24日和9月3日复函陈嘉庚，报告了与国内和新加坡政府交涉的结果。至此，稽延一年多的机工复原问题，终于有了结果。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华侨互助会提供的机工名册共1144人，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200美元，于1946年10月1日起发放。其实200美元的奖金仅够路费，很多携家眷的机工典当衣物才凑足回程费用。

侨务委员会为南侨机工颁发奖状：“南华侨机工×××，热心爱国，敌汽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给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月×日”。

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兹证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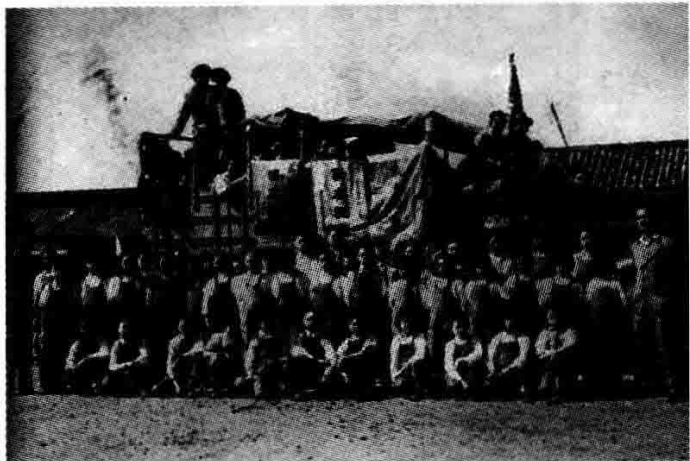
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月×日”。

以中国文字辞藻之浩瀚丰富，而给予机工的评价之简短吝啬，不能不让人对所谓历史的“证”与“状”心存疑惑。然而，山河可“状”，天地以“证”，机工仍然视若珍宝地收藏了这些能证明他们历史的“物证”，很多人甚至在“文革”期间冒死保存，后来又捐献到各地的历史博物馆。这，并不只是为了保存一段个人历史，更多的，是为了“南侨机工”这个历史名词的“可证”。

1946年10月26日，第一批复原机工启程南返，云南各界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机工们再次身着整洁的中山装、工作服、白色西服，将头发梳理得光亮有型，与来时不同的是，他们很多人的身边多了一位婉丽的“家眷”，怀中抱着“幼子”——家，是否是他们七年抗战最大的回报呢？

没有什么能禁锢生命的灿烂，即便在战争冰冷的刀锋上，生命也可以锥立而舞。高原的阳光会让一切灰死的心复萌。一个个小小的暖巢竟然在森林的火化之后，仍危系于树端。

机工，七年前，赤子归来；七年后，怀抱赤子归去。红土地，本来就是赤裸的土地，承诺大地上一切赤裸的种子开出血红的花。



↑复员南侨机工与昆明侨光小学师生合影

↓第一批复原南侨机工合影留念



↑复员机工和家眷在卡车前摄影留念

←复员机工家眷

↓复员机工乘坐的专车在列队等候

第一批复员机工 219 人，眷属 202 人由昆明西站南返。第二批机工 71 人，眷属 85 人；第三批机工 177 人，眷属 129 人，分别于 11 月 15 日和 29 日启程。登记造册的 1144 名机工中的部分人因种种原因错过了南返，也有很多人选择留在国内开始新的生活。

第一批机工经柳州乘船由珠江到达广州，再到香港，然后由海路抵达新加坡码头。从出发到 1946 年 12 月 3 日抵达，全程 39 天。机工张光旺在日记中记录了回程的情景。

十二月二日 第卅八天

今天天气好，风平浪静，机工同志与几天来被风浪吓坏的太太们，都起来看海景。早上七时许，得见新加坡海口。七时三刻抵港，停泊验关。

十二月三日 第卅九天

下午，船才泊丹絨百葛码头，天又下雨，前来码头迎接的有“华人机工工会”、“琼州会馆”、“三民主义青年团”、“男女服务队”等团体。总领队看见今天我们这些打不死的南侨机工回来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很少，就将我们由昆明出发一路各机关团体赠送的锦旗挂在

船上，忽然，观众越来越多，整个码头全满了……伍总领事亲身抵码头欢迎，脱帽向各位招手，登船慰问。然后，这批男女服务队帮助搬行李、带小孩，用罗里车送到后港五条石亚答厝暂住，天色已晚矣。自十月二十六日由昆明出发，到达新加坡为十二月三日，计三十九天。

我们终于胜利复员南返了……

与当年出发时人山人海的欢送相比，机工重返南洋时的情景冷清了许多。此时的南洋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开始发生巨变，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建立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当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由于殖民统治者长期挑拨土著民族和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的巨变使华人的处境更为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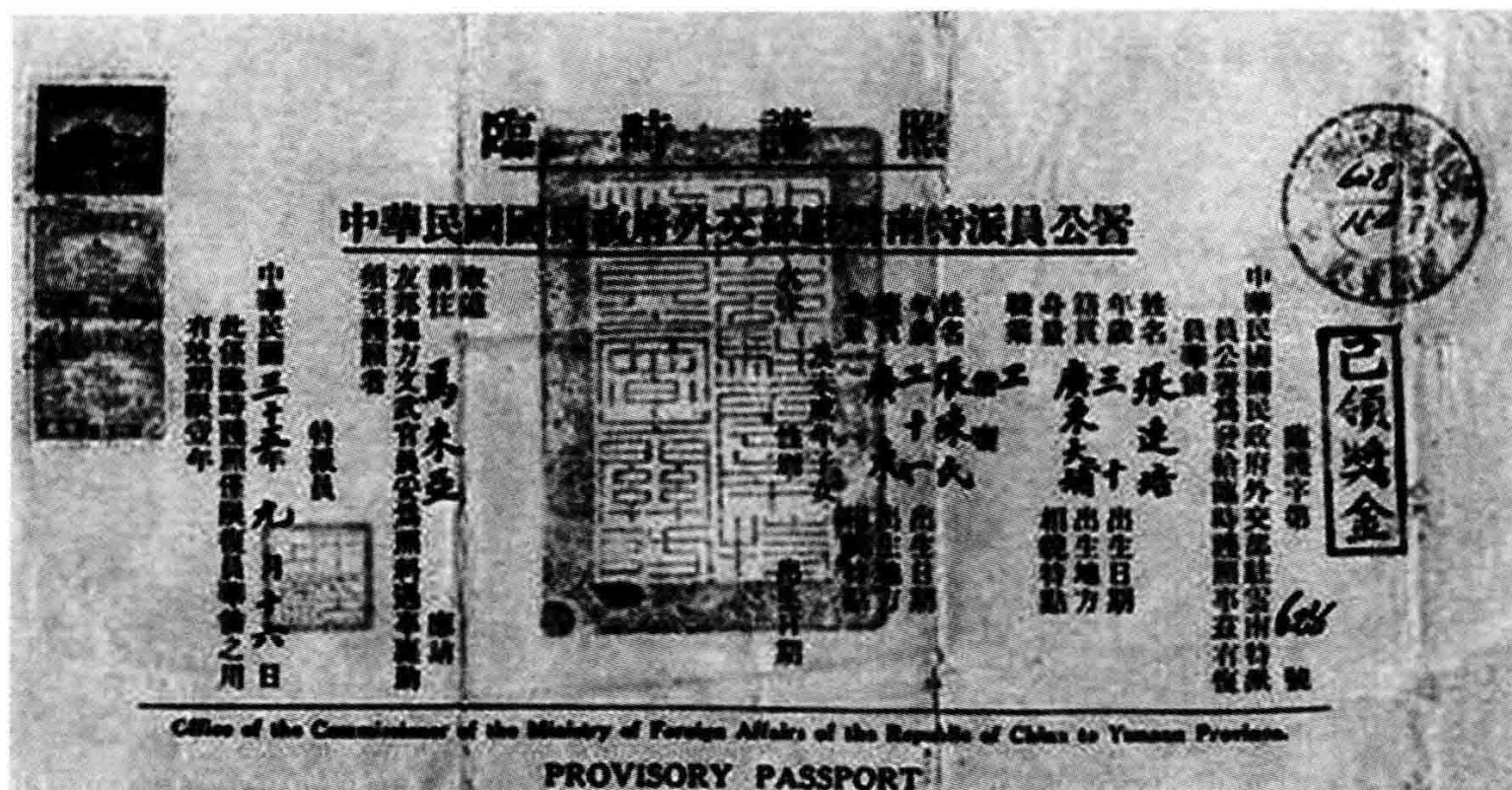
虽然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并没有“站起来”，国内战争的爆发，美国、苏联等国际势力的介入，使千万侨民的南洋华侨社会彷徨无措。不管是对辛亥革命的支援，还是南侨机工回国抗日，都为祖国能独立强大，而让侨民在海外有所依托。但，南侨机工归来了，祖国仍陷于战乱。南洋华侨社会



↑复员机工在卡车前摄影留念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授予南侨机工“第一公民”称号

→云南政府赠予复员南侨机工的题言和宣传导词



↑ 1946 年南侨机工复员南返时的临时护照
 ← 南侨机工复原临别之日敬献云南当地政府之锦旗
 ↓ 南侨机工复员登记表 (1946 年)



仍然无从把握自身的命运，这可能才是最大的痛与苦。

但南侨机工，不管是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自再次登岸的那一刻，都无愧于历史地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南侨机工”将成为一个光辉和意蕴丰富的“历史名词”永镌史册。它不仅记录了 3200 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也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可复现的“南侨”的历史。民族历史的河流是负载着全部的过去流向未来的。

而对于个人，一个“句号”的完成是生命的礼赞。余汉洲在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个清



晨，跳进了温暖的海水，此时，巨大的红日正从东方的海面升腾而起，赤色的海水拍击着他疲惫的身体，他用一颗心与浪浪海水相击：“我回来了，南洋！”——太阳将一束玫瑰色的阳光投向他的脸，顷刻间，一切劳顿与沧桑荡然无存，天地间，他，依旧是那个一无保留地向天仰着脸的赤子。

3

很多机工因各种原因错过南返，有的则选择在国内定居生活。新中国的成立，如春雷震天，留在国内的机工无不人心大振，他们终于实现了当初回国时的追求——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无比兴奋地体会着成为国家主人的滋

复员回到侨居国马来西亚怡宝的机工合影

味——这，对于来自南洋的他们无比珍贵——中国人终于以独立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中国人终于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真心地以主人的姿态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中。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留在西南和滇缅公路沿线的南侨机工有三百多人，其余则多数回到原籍闽粤家乡，也有小部分星散各地。

1946年10月，翁家贵办理好了一切回程手续，临行前的晚上，妻子辗转反侧，突然对他说：“我不想走了，我不能离开云南的亲人，你自己走吧，把孩子留下。”翁家贵并不意外，他了解妻子比自己更甚，他们在战争中结为伉俪。保山轰炸时，他们的伴娘——妻子罗春塘的同学，一个正值花季年华的少女被炸死了，他们夫妻曾为死者收尸殓葬。这一对“战争证婚”的夫妻恩爱无比，翁家贵早做好了妻子突然“变卦”的准备，他只轻轻叹了口气，然后抚摸了一下妻子的肩头，说：“放心吧，我不走。”

而南洋，在他轻轻的叹息中，永远变成了眼底闪动的泪光。

20世纪80年代，翁家贵在昆明交通机械厂光荣退休，他一直是单位的“生产标兵”和积极分子。在本书成书之时，翁家贵和妻子仍健在，翁家贵102岁，罗春芳92岁，他们结婚已73年，现在云南保山依旧继续着他们幸福平淡的生活。

1946年写信给陈嘉庚请求南返的程龙庆，在准备办理南返手续时，岳母病重，他只得留下来照顾，错过了南返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程龙庆被安排在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安全行车标兵。很多年轻同事并不清楚“南侨机工”的历史，总是问他：“陈师傅，你的车怎么会开得这么好？在哪里学的？”他总是笑笑：“我天生就是开车的。”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华侨被认为“海外关系复杂”，程龙庆1956年申请入党，1983年才被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与“延安”早在1940年就结下不解之缘。

陈介文同样错过了南返机会，他将全部人生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一直服务于云南的运输行业，红土地的山山水水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他在车队中以“爱车”著称，1961年的暑假，正在读书的女儿陈金莲到曲靖看望父亲，一位父亲的工友对陈金莲说：“在公路上总是一眼就能看见你父亲的车。”金莲问：“这么多的车，怎么认得出呢？”这位工友答道：“一起接的车，我们的都旧了，只有你父亲的还是新的。”

由于父亲总是在外出车，金莲很少有时间跟他相处上几天，这次在曲靖过暑假，金莲亲眼看到父亲总是最早出车、最晚收车。上下货的时间，他从不休息，总是忙着检查、保养车子。有水的地方，他一定会用橡皮管引水过来清洗车子。在车队中，他的车永远都闪闪发亮。路上不管遇到什么车辆抛锚，他都会停下车子，帮助修理。他的工具箱所有工具都齐备适手，摆放得整整齐齐。父亲对金莲说：“如果你能帮助别人，你就好，如果等着别人来帮你，那说明你生活得不好，帮助别人不要图回报，这是做人的本分。”跟父亲相处的日子给金莲深刻的印象，父亲平淡而快乐、充实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金莲。他每年都被评为运输战线的“先进生产者”“节油能手”“安全标兵”，行车几十年无安全事故。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陈介文患了水肿，远在南洋的大女儿给父亲寄来“营养品”。父亲叫来金莲写信给大姐，告诉她让大姐不要再寄了，要跟海外亲人多说社会主义祖国好的方面，“我们的国家刚从战争和贫困中走出来，暂时的困难是难免的，一个人要自强不息，不要让亲人牵挂惦念”。父亲一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话就是他留给儿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做事，正直做人。”话虽平凡，但是儿女们亲见老人是如何用人生的每一天去实践的。

杨保华直到战后才建立家庭，妻子韦碧茵是一名小学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为修建滇藏公路，云南资源委员会招聘了杨保华在内的四十余名南侨机工服务于筑路工程运输。运输队日夜奋战于工地，从洱源、剑川、石鼓到香格里拉，随公路向前推进。1952年，车队又奉调参加昆洛公路（昆明至西双版纳打洛）的修筑。苦战三年，都没有休假。每年春节，车队要送民工、石

匠回家过年，此时，南侨机工才顺便回一趟家。但机工们毫无怨言，看着一条条崭新的公路连接起祖国的山河，总是让他们由衷欣慰。

后来杨保华调往昆明总站八车队，司机都是华侨，队长是南侨机工林新李。林新李带领的小组与另一名南侨机工、省劳动模范黄步云的小组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后来黄步云被评为全国劳模，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得到周总理的接见。

杨保华长年出车在外，家中老人和七个子女全靠妻子照顾。1958年10月，妻子在带领学生修路时患上伤寒，但杨保华因为运输任务不能留下照顾。10月24日，岳母突然从医院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因为医治不当，妻子已经过世。杨保华不敢相信这样的现实，他一路赶到医院太平间，直到摸到妻子已经僵硬的尸体……

此时，7个儿女老大12岁，最小的才9个月。杨保华是一级驾驶员，每月工资90元，车队看到他家中实在苦难，长期补助他每月30元。他决心好好生活下去，把儿女养大成人。就在这时，南侨机工汤耀荣因长期奋战工作，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他留下3个儿女无人照管，杨保华毅然收留了3个孩子。他说：“我们南侨机工是一家人，汤耀荣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7+3=10$ ，大团圆，多好！一大家人热热闹闹！”于是，这个10个孩子的大家庭便开始了“热闹”的生活，杨保华成了一个“舵手”，他那双有力的大手开始把控着这个特别的家庭驶向未来，他带领着10名水手，一路乘风破浪、风雨无阻。这个大家庭虽无比清贫，却永远满载幸福。10个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总是带着感激回忆童年，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在别人的回忆中风雨如晦的日子，在他们看来都阳光灿烂；为什么父亲总像是一片晴暖的海，温煦和平静，似乎，没有边际……

直到他们各自有了人生的阅历，才知道——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他们曾携着永远的暖洋归来，他们曾将生命定格于蔚蓝。

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东西方对峙。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西方政治学者开始兜售“第五纵队”谬论，如詹姆斯·罗西瑙在《疆界与桥梁——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体制相互依存的报告》中称：“已成为东南亚商人阶层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在许多方面受歧视和盘剥，自然转向中国（或者台北或者北京）寻求保护。因此，在当地人眼里，华侨成了潜在的‘第五纵队’……”哈罗德·欣顿在《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中称：“从中共角度看，海外华人可以帮助中共与东南亚共产党保持联系，并资助、影响这些共产党。”

一时间，“第五纵队”论甚嚣尘上，东南亚国家纷纷视华侨、华人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声称华侨心向中国，时刻准备听从中国的召唤。认为中国政府企图通过华侨渗透、颠覆侨居国政府，建立“第三个或第四个中国”。

而二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而取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华侨仍没有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原住民政治家，视华侨经济为“殖民时代的残余”。

于是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一场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大规模反华、排华浪潮。东南亚国家纷纷以激进的立法形式，从经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华侨进行排斥、限制，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或以暴力迫害，大规模驱赶，断绝他们的生计；有的国家发生对华人的杀戮事件。“华人问题”愈演愈烈，千万华侨陷入被迫害的深渊，华侨社会和华侨经济的发展再次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华侨再次心向祖国。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秋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的条文写入《共同纲领》（临时宪法）。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以后，虽修宪多次，但护侨精神一直保持下来。1948年至1953年，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西亚掀起迫害华侨逆流，两万多名华侨被逐，新中

国马上派船赴马来西亚接运难侨归国。^{〔1〕}

鉴于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席就华侨问题说：“华侨问题也应当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2〕}

在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基本主张是：一个华侨不应当有双重国籍，要取得所在国国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如果愿意保留中国国籍，就不再是所在国公民。中国政府希望华侨自愿选择国籍。

1955年4月22日，中国与印尼外长在万隆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961年5月，两国正式开始办理选籍工作。中国在印尼华侨中深入宣传“三好”政策：华侨自愿参加所在国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很好；华侨如果愿意回国，也好。此后，中国政府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依据同一原则逐步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形势和东南亚政治都发生了转变，东南亚“华人问题”也因“双重国籍”的解决而逐步缓解。“华侨社会”开始转变为多元的“华人社会”，华人从“落叶归根”变为“入地生根”，华人文化别开生面，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更多地融汇了西方与当地文化。而“南洋”与“南侨”似乎随着时代的大变迁而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5

当年返回南洋的南侨机工并未对南洋社会的变化有充分的准备。新中国成立之后，亲尝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机工向往着新中国。此时，一批批华侨青年受新中国感召，冲破封锁，回到祖国，成为各行各业不可多得的人才。据统计，仅马来西亚一地，1949年6月到1952年4月就有四万名华侨奔赴祖国。而陈嘉庚的归国，更坚定了机工们的信心。不少南侨机工在20世纪50年代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方金英著：《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陆续返回祖国定居，融入新中国建设的洪流。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代表华侨共同见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时刻。

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此时他已年至耄耋，却不顾舟车劳顿，驰驱于祖国南北大地，席不暇暖，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每月300元人民币的工资，他只留下15元伙食费，其余全部捐赠给集美学校。

1955年11月，陈嘉庚在庄明理、张楚琨等的陪同下，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南侨机工，当看到他们已安居乐业，都在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时十分欣慰。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临终前，他留下四点遗嘱：

一、最紧要的是国家前途，呼吁亲友们竭尽全力，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

二、中国海岸线长，海洋事业一定要大力发展，航海学校一定要办下去。

三、遗体运返集美安葬，子孙切莫悲伤，臂缠黑纱即可。



陈嘉庚与毛泽东的合影

四、300 万元存款，全部献给国家，200 万元用于建筑校舍，50 万元充作集美福利基金，另 50 万元用于建造北京华侨博物馆。

“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备极哀荣。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辞。陈毅在吊唁时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8 月 15 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陈嘉庚在鳌园中长眠于世。

生前他曾令人在鳌园镌刻台湾地图，他说：“福建和台湾唇齿相依，全国人民都关心台湾的解放，闽南人尤甚，因为台湾同胞中，很多是他们的血亲。”或许，大海，永远是他跨越时空的深情瞩望。

余汉洲返回南洋后成为首批“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会员，“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在陈嘉庚的关心下组建，主要帮助机工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余汉洲开始驾驶着一辆小轿车为复员机工服务。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是机工按照新闻图片中的样子亲手缝制的，虽大小比例不十分准确，但却寄托着他们对于一个全新的中国的向往。

余汉洲开始萌发重新回国的想法。1955 年 3 月，他下定决心，启程回国，后定居于故乡福建莆田，在县政协负责侨务工作，当选为历届莆田县（现为莆田市）侨联委员，1978 年，于县干部招待所退休。回国后，他曾去拜见正在福建集美的陈嘉庚，陈嘉庚对他说：“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我们的国家需要诚心为社会工作的人。”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余汉洲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青春无悔。1955 年回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再寄人篱下，而可以堂堂正正做主人，是我最正确的选择。现在，在政府的关心下南侨机工享受 100% 退休金，是国家、社会对南侨机工历史的肯定，昆明西山建成了南侨机工纪念碑（1989 年 7 月 7 日建

成揭幕)，这里是滇缅公路的起点。我们还在世的人心满意足，可以告慰牺牲的战友了。”

当年一行7人，从泰国“自费”回国，参加机工团的蔡美光于1954年回国，一直在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当司机，1980年退休。在他工作的农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曾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只是觉得这个老人亲和、平易，言语简淡。他对来访者从不提及自己的“贡献”或经历的“风雨”，他更愿意讲战友的故事，当讲起自己，也如同那是一个久违的机工战友。

1939年，留下感动南洋的一封信，参加机工团回国的白雪樵（原名白雪娇），后来与其余三位女机工服务于滇缅运输的后勤和医疗。但白雪樵一心想上前线抗战，她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邓颖超大姐告诉她：“什么地方都可以抗日。”邓大姐身上共产党人的清新之风深深感染了她，她听从邓大姐的建议，转到成都就读于齐鲁大学，参加大学生宣传队，一路沿川北跋山涉水，每到一处就安营扎寨、宣传抗日。1943年，她从齐鲁大学毕业。

抗战胜利后，白雪樵回到马来西亚，在福建女校当教员，因为参加反殖民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到一家平民学校做校长。

1949年10月1日，白雪樵带着老师们在学校升起了槟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事先从报纸上看到了五星红旗的样子，请一位认识的裁缝偷偷做了一面。”她也因此被列进了殖民当局的“黑名单”，被指控为来自中国的“颠覆分子”，随后被捕关进一座深山监狱，每天提审。“他们问不出什么，两个月后我被送到怡保埠集中营。”白雪樵说，那时她已被视为顽固的“共产分子”。关押一年后，白雪樵被当作“牲口”押上一艘货轮驱逐出境。

船行7天7夜，抵达广州港。回国后，白雪樵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教于广东侨中、广东师院和广州师院。直到70岁，白雪樵老人才离开她热爱的讲台，退休在家。她说：“总有人问我，‘悔不悔？’他们不知道失去祖国或者祖国落后，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能是犹如流浪的孤儿。”

2014年清明节，白雪樵走完了她的一生。南侨机工中的存世者又少了一位。然而，有如她送给自己的名字：“雪樵”，白雪覆盖的深山中，似乎总传出空寂洞邈的“樵音”，雪，随之簌簌而下。

第十章

经历坎坷·碑指蓝天

1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南侨机工因“海外关系”和被曲解的回国抗战的历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文革”，“回国抗战”的历史竟被抹黑为“里通外国”“国民党残渣余孽”。很多机工都因此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特嫌分子”“反动机工”等“帽子”，受到极不公正对待。但机工们始终相信历史会回归其本来面貌，“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将重新得到公正评价和肯定。

抗战结束后，李月美和丈夫杨维铨及弟弟李锦荣复员回到槟城。母亲看到当年不辞而别的女儿如今携丈夫和孙子归来，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个“一家三机工”的光荣家庭终于在战后团圆。此后，李月美和杨维铨定居缅甸，他们开了家咖啡店，生育了10个孩子，过着和美“浓香”的生活。李月美不仅是“花木兰”，也是一位“英雄母亲”，她的爱与温情似乎足以温煦整个世界。她常教孩子们国语，背诵《木兰辞》和唐诗宋词。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受到总理的接见，当周总理听说这位就是当年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连声赞叹：“巾帼英雄！”他对李月美说：“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到祖国读书吧！”李月美深为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打动，她计划着要将孩子们培养成出色的翻译人才，为国家做贡献。

1965年，李月美的长子善国和六女玲美双双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此时，次女玲华和三女玲玉也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李月美欣喜万状。此后，她说服丈夫，由她带着所有孩子回国定居，以培养孩子们成才。

1967年，在她刚刚安置好在广州的生活之后，“文革”的漩涡就将他们一家卷入其中。李月美被下放到山区英德华侨农场。

在农场对归侨“重新划成分”时，李月美被划为“资本家”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她对突如其来的一切懵然无措：“小时候生活得好”就是“资本家”？“回国抗日”成为“国民党残渣余孽”？但如果祖国是需要她“劳动”，她却义无反顾。她抄起袖子，拼命出工干活，但无论她多么努力，只能得到别人的一半工分。接下来，国外亲人的汇款被当成“特务经费”扣留，孩子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力，也被迫下田劳动，每天挣正常工分的四分之一。海外经济来源断绝，挣工分所得根本填不饱肚子，李月美一家陷入困境，尤其是孩子不能正常读书，给她很大打击。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想起了周总理，她怀着一线希望写了一封信给总理，没想到真的得到总理的亲笔回复，指示要解决她的问题。捧着周总理的亲笔复信，李月美第一次在孩子们面前哭了。

但给总理写信竟成了她新的罪状，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李月美家，把所有海外信件、南侨机工的历史照片、何香凝所题的“巾帼英雄”的锦旗，甚至周总理的亲笔信全部抄走。

迫害一步步升级。李月美被带上“高帽”游街示众，每天被迫敲锣游斗，“小将们”揪住她的头发肆意羞辱……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李月美对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只一个——不认！她从不怀疑自己清白的历史，她，没有罪！但，羞辱与折磨仍然很快摧垮了她的身体，她在短时间内变得形容枯槁，时常昏倒过去。让她唯一欣慰的是，在她倒在家中的床上起不来时，孩子们总环绕着她端水送饭、悉心照料。她曾一把拉过最小的孩子，问道：“他们说妈妈是罪人，是坏蛋，但妈妈爱你们，你们懂吗？”孩子懵懂地点点头：“懂！”

1968年8月28日深夜，李月美悄悄从床上起来，她借着月色，挨个仔细地看了看八个孩子的脸，替他们一一掖好被角。然后，她走到隔壁房间的窗前，让月光洒在脸上，她轻轻舒了一口气，冷静地拿出一把锋利的镰刀，深深割开自己双手的动脉……

她微笑着坐在月光中，像一尊雕塑，她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血流尽……她以死，还自己一生的尊严。鲜血汨汨而流，她，不吝血！不吝血！她曾将



李月美一家在缅甸的全家福

这一腔血，付与春风，付与晓月，付与破碎灰飞的山河，如今，有何吝？有何吝？流去吧，这一腔碧血，本就该潜进深冬的大地，地狱之火，只有鲜血才能扑灭，流去吧，穿越那些鬼魅的丛林，只有鲜血纵舞，才能破解一万年的魔咒，那些死灭附体的幽灵，予它以血的激赏吧！再，一跃千尺，投身向那无底的渊谷，冥顽的空响在那里盘桓了一万世，击碎它吧！还世间一个清宁有应的太平！——或，大地回音，碧血回流，沃土复成绿原，冻殇复行春水，赤血碧水，长流无返，从冬流到春，从春流到秋夏……

第二天，孩子们醒来，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年龄小的吓得哭出声来，随即，八个孩子扑倒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痛哭。哭声引来了“专政队员”，他们勒令孩子要与母亲“划清界限”，不能掉泪。

几位“牛鬼蛇神”被唤来将李月美的尸体抬走埋葬，没有裹尸的东西，孩子们找来一挂从缅甸带回的尼龙蚊帐为母亲裹尸。李月美被草草埋葬于农场茶园的后山。

八个孩子走投无路，从墙角找到一封抄家时遗漏的信件，上面有老家的地址：海南岛琼海县福田公社埠头大队。于是，在一个深夜，八个孩子悄悄在母亲坟前磕了头，便连夜走山路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英德县城。因无钱乘车，又耐着饥饿，跋涉数天，来到广州车站。“老天有眼”，在火车站，孩子们竟遇到一位海南琼海的老乡，当得知是南侨机工李月美和杨维铨的孩子时，

这位同乡伸出援手，出车船费将八个孩子带回家乡。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孩子们回到英德农场寻找母亲的坟墓。在当年埋葬李月美的老同志帮助下，果然挖到了当年用来包裹遗体的那顶尼龙蚊帐。

1979年10月23日，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召开了为李月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

陈邦兴在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后加入中国远征军炮三旅赴印度，后调入兰姆伽汽车学校任教官。1944年缅北反攻时参加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战斗和八莫、新维、腊戍等战斗。1945年4月驻印军与滇西反攻远征军会师芒友后，陈邦兴回到昆明。内战爆发后，他又被调入国民党军队炮兵团，他和其他南侨机工坚决反对内战，在淮海战役时投诚解放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纵队汽车队战士，跟随部队渡过长江解放中国。1951年再次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四纵队，参加朝鲜战争，曾两次立功受奖。1954年复员转业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海南岛。1955年被分配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委工作。

从1939年离开南洋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日，到1954年复员转业，陈邦兴历经三次战争，十五年戎马生涯，为国奉献。回到家乡的他只想开始平静的生活。

但“文革”风浪一起，有着“曲折”历史的陈邦兴马上被卷入，他被打为“里通外国的国民党特务”，遭受轮番批斗。造反派抄家时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和美国盟军司令部颁发的奖状等历史资料全部拿走，作为“证据”要陈邦兴交代“特务任务”。陈邦兴自认一辈子磊落光明，受不了百般羞辱折磨，几次都想了断生命，但总念于孩子还小，无人寄托，才挺住活了下来。而陈邦兴妻子的哥哥——另一位南侨机工，却在1970年被关押期间自缢身亡。

风浪稍平，陈邦兴一次在家中检点旧物，所有历史证物荡然无存，唯留下一个他在兰姆伽时所用的美军水壶，他将水壶拿在手中摩挲再三，三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老人流下了眼泪。但他害怕新的政治风波到来，不仅这个不起眼的水壶难逃一劫，而他到时也要因为一个水壶又被抓住“特务证

据”。他将水壶拿给妻子，让她速速扔掉，不要保存。但妻子也有一番不凡的革命经历，抗战时期，年仅15岁的她就为共产党送情报，曾被日本人吊打、灌水，施以毒刑。她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美军水壶是丈夫抗日的纪念品，为什么要丢弃呢？她留了个心眼，叫来儿子陈勇，让他一定找个妥当地方藏起来。夜深人静之时，陈勇在屋后的香蕉林撅了一个深坑，用一块塑料布包裹着美军水壶，将它埋了进去。

直到“文革”结束，陈邦兴断定美军水壶不再会成为“罪证”了，才向妻子“索要”。妻子笑着叫来儿子，让他把当年所藏的水壶挖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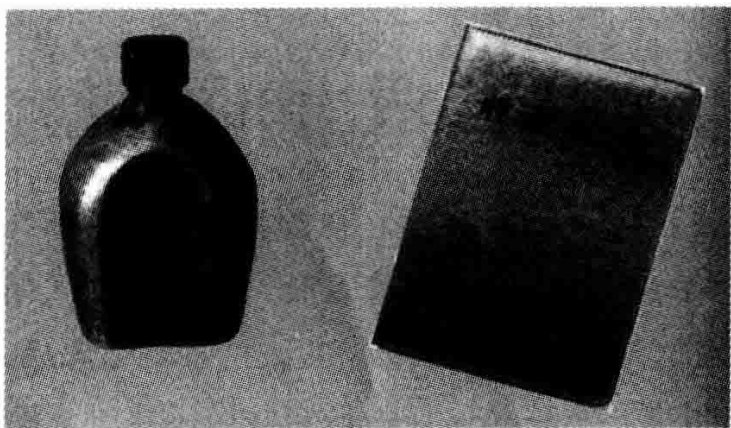
陈勇来到香蕉林，搜寻着若干年前那天深夜的记忆，他来到一丛香蕉树前面，老树早已枯死，周遭都是婆娑翠绿的小蕉树，几经辨认，他终于锁定一个地点，深掘下去，果然，不一会儿，当年包裹的塑料布露了出来——美军水壶，虽锈迹斑斑，但终于重见天日。

陈邦兴欣喜若狂，他将美军水壶打磨一新，从此，它就成了他形影相随的伙伴。这件能够证明他全部历史的唯一物证，却也是在劫难中他们一家亲情所系的见证。为什么人总要在离乱纷繁、难析难解的世相中留下“记忆”呢？“归去来兮”，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圆圈，是一石激于清泉的涟漪，来路即归路，不知来路，何复寻得归路？

在贫困的生活中，美军水壶却也算得陈邦兴家中一件像样的“家什”。母亲每天在水壶中灌满水让陈勇带到学校喝，放学时，陈勇又用水壶到市场上打最便宜的“甘蔗酒”带回家，母亲将酒倒入坛内，放进中药，帮父亲疗伤。

1983年，母亲离开人世。两年后，1985年，父亲陈邦兴也走完他的一生。陈勇只身一人，带着美军水壶来到北京“北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北京坚实立足，或许，那只美军水壶中蕴藏的深远沧桑的历史回响足以让他面对一切的困难。

2009年4月，陈勇将美军水壶捐赠给了北京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它在那里向世人见证“南侨机工”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不可失不可忘。



陪伴南侨机工陈邦兴一生的美军水壶

旷日持久的“文革”灾难也殃及在云南德宏州平静度日的复员机工。谢川周是一名全能型技术工人，但一个南侨机工的身份和经历，极有可能被误为“敌特分子”。他已经有了妻小，在芒市定居，却不可能为当时的国营工厂接纳。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肩挑小担，或委身于小巷深处，摆个小摊，为人家修理手电筒、雨伞、锅钵、自来水笔，任何日用家电或“小五金”，凡过他的手，转眼簇新。他最擅长的“修旧复新”技术，不过是机车修理技术之万一。他却以此维持了一个大家庭的生养。但内心总有那么点波浪起伏，在悠闲乃至“忘形”时，他会哼哼南洋、马来小调。没有人在意这个自得其乐的人。直到1970年后的一天，一个岁过中年的男人背抄手路过，忽又折返回来小心翼翼地问：“你哼的是马来小调？”谢川周打了个冷噤，看看此人面善，嗫嚅道：“……是啊是啊。”“你是马来——星洲人？机工？”仿佛对暗号，谢点点头。来人自我介绍：“我叫林清福，印度尼西亚华侨。在华侨农场工作。”谢川周放心了。姓林的又问：“你这样的南侨机工在此地的有多少人？”谢川周听口气，这个印尼华侨不像“一般人”，应道：“几百人呢！”——对方“哦呀”一声，若有所思地走了。

“文革”尚未结束，在德宏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定居的南侨机工虽略知彼此去向，但忌惮政治运动波及，并不敢贸然联络。但极其艰难时仍彼此照应，只是并不声张而已。蔡文兴，绰号“蔡大头”，是机工中颇有声名的“健将”，1976年忽然病倒，因怕盘问身份，却不敢去医院挂号看病，熬过

多日，眼见病势加重。这时，芒市、遮放的机工知情后，连忙搜索一切“关系”，不想竟有一个孩子十分肯定地说：“州医院开救护车的王伯伯也是机工！”——“王伯伯”来了，二话不说，用救护车将蔡文兴送到医院，以“家属”名义送诊，经抢救，挽回了蔡文兴性命。

何纪良的经历十分坎坷，在缅甸盘桓数年，他最终选择在与畹町仅一河之隔的缅甸帮赛镇落脚。“离祖国近一点总是好些。”这是他的理由，另外，他舍不得定居德宏的那群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还坚信，中国会好起来。1986年，“拳王”病势加重，他走得很安稳，他总是透过窗外，看着河对岸那些集群飞翔的白鹭，似乎它们会带来更多春的信息……

谢川周邂逅的那位林清福日后成为州政协副主席、州侨联主席。原来，当初路边一句问话时，他已然心中有底，在“拨乱反正”后，在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支持下，经他全力统筹运作，适时地成立了“云南省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德宏分会”，散处德宏各地的南侨机工被招拢，机工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

2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华侨政策得以拨乱反正和重新落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南侨机工冤案得以平反，名誉得到恢复。一段被歪曲的南侨机工历史重新得到肯定。

1986年9月，在杨保华、王亚六等热心老机工的组织下，云南七十多位老机工在昆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南侨机工团体——南侨机工联谊会。这个“机工之家”不仅为机工战友排忧解难，也常吸引“机工二代”甚至“机工三代”参加老人们的联谊活动。南侨机工精神在温暖的大家庭中潜移默化地传承。老人们的豁达、乐观、平淡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后人。当大家欢聚一堂，杨保华总是深情而不是高亢地，重新唱起当年离开南洋回国时喜欢的抗日歌曲《热心救国歌》。

热心救国是应该，做了汉奸臭三代。

有钱出钱寄国内，无钱出力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咱国的福气！

阿婶阿嫂啊姐妹，莫要日夜抹胭脂。

当今国难的时候，应当为国做大事。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咱国的福气！

每当这个大家庭中有老机工过世，大家总会集体寄托哀思。南侨机工的生命似乎永远都彼此融入，离世者坦荡而去，在世者守望共同的家园，守望永远水清秧黄的明天。

1986 年底，中国政府出台“南侨机工享受 100% 退休金待遇”的政策。在世的南侨机工视为在抗战期间参加工作人员，正式表明了党和国家对这段历史的充分肯定。

很多老机工在得到平反后，重新精神百倍地回到工作岗位奉献余力，为国家培养了很多熟练技工和司机。对于一个平凡的劳动者，没有什么比能够正当地用双手去劳动更加快乐的了。而一个能因此而真心快乐的人或许已经回归了生命的本原。

朱松胜在“文革”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国家恢复技术职称评定后，朱松胜被评为技师，主管汽车和筑路机械的技术检验鉴定，负责培养汽车、推土机、压路机、挖掘机等的驾驶员。但由于“文革”的摧残，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在儿女所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们的父亲：“在家他是个备受关照的重病人，在外他像个出征的小伙子，充满活力和笑容。在国家需要大量公路建设人才的时候，他毫无保留地投入培养人才的工作。一经他指导，那些年轻人总是很快就领悟了机械的原理，能迅速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他总让

家人不要到单位讲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他只要还能坚持，就要工作！”

1983年，在朱松胜弥留之际，他似乎深深陷入了回忆，他竟节拍准确地哼唱起《国际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清晰地对儿女们大声说：“人生快乐！人生快乐！”——一个生命如若完满，一个世界同声礼赞！——人生快乐！

3

人们曾为南侨机工修筑过五座纪念碑以纪念这些功勋卓著，又复归寂于大地的“赤子”。为什么人类总惯于去建造高于地平，突立于视野中的石碑去纪念应当被记住的历史与人物？或许在人类的洪荒记忆中，历史总以层层湮没的方式演进，为了尽可能长远地留存于历史断层中，人们选择了指向天空的构建。也许，历史的另一个维度是：对于独立于天地、继往而开来的“建树”者，总是以个体生命圆成的方式，以爱与暖挽扣往者与来者，弥合着时空的漏隙与断裂，将一个“飞逝”中的，并非完满的“流沙世界”抻成一个温暖的泥丸，再将它交给孩子——这，或许也是一种以大地名义指问天空的纪念。

1946年，华侨机工互助会曾在昆明近郊为殉国机工修建了“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此碑在“文革”中被毁，所幸留下了照片。

1946年7月7日，马来西亚槟榔屿筹賑会在



↑位于昆明近郊的“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

↓纪念碑背面题字：“全体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敬立”

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树立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以此作为对回国参战机工和不幸被日军杀害的同胞的永久纪念。

三角形的纪念碑正面为碑文，其他两面分别题写着：“浩气长存”“忠灵不朽”。

碑文如下：

慨自滔天涡水，起于芦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募机工，大收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竟树蜚邹挽粟之功。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而肃清文令，更颁炮烙之刑。公治被诬，同羁縲继；嬴秦旧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汤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三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茅飞扬日旗，虽远竖于东瀛，而内烁青磷，尚游离于南廓。客过回首，空怀堕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碣。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藉安英灵。奈经处处搜寻，始得一丘之萃。兹者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汗；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埋石无忧，庶几取义成仁，恒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厉万古而常昭。

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记录了南侨机工参加抗战的忠勇事迹。

碑文如下：

民国 26 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遭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乃运输孔道，以资接济，唯战区辽广，辘重运输，急如星火，

驾车人材，须足量搜罗，方可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8年，沐风栉雨，备尝艰苦，幸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

机工技术，驾轻就熟。机工勤勉，风尘仆仆。机工任务，滇缅往返。不畏天险，褒斜绾谷。为国牺牲，谁不敬服。自来殉国，必有纪录。勒诸丰碑，良忘芳躅。

1989年“七七”，正值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之际（1939—1989），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西郊眠山下竖立起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群像雕塑）。1989年5月举行了揭碑仪式。

而纪念碑“正碑”位于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华亭寺北面约200米处，高峣至西山公路右侧）的罗汉山山麓中，碑高12米，背靠西山，面向滇池的万顷碧波。在汉白玉制成的碑身上，题写着“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墨石汉白玉相间制成的底座，“赤子功勋”四个大字赫然在目。碑的正面上端刻有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四条横线和每方四块墨石的底座，象征着当年四万万同胞齐心抗日。碑前两层台阶均为七级，表示“七七”抗战纪念。

碑文如下：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

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1000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病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汀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1000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鼓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位于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1945—2005），云南省德宏州各

族、各界人民为纪念南侨机工的抗日功勋，在滇缅公路中国段之终点——畹町，修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纪念碑”，碑前竖起了一座陈嘉庚的铜像。至此，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和中国段的终点畹町都有了纪念机工的纪念碑，他们彼此相望，共同见证这一段有始有终，却又能够超越时空，永亘于寰天的历史。

碑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一时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神州危在旦夕，当时我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大多数被日军封锁，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滇西20余万民众自备干粮工具，风餐露宿，肩挑锄刨，劈山开路，过水架桥，日夜奋战，以血肉之躯于一九三八年筑就一条起自昆明，贯通滇西，连接缅甸，近千公里，被称为“道路史上的奇迹”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成为我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大批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沿此路运往国内抗日前线。随着战事的发展，滇缅公路运量陡增，一时驾驶、维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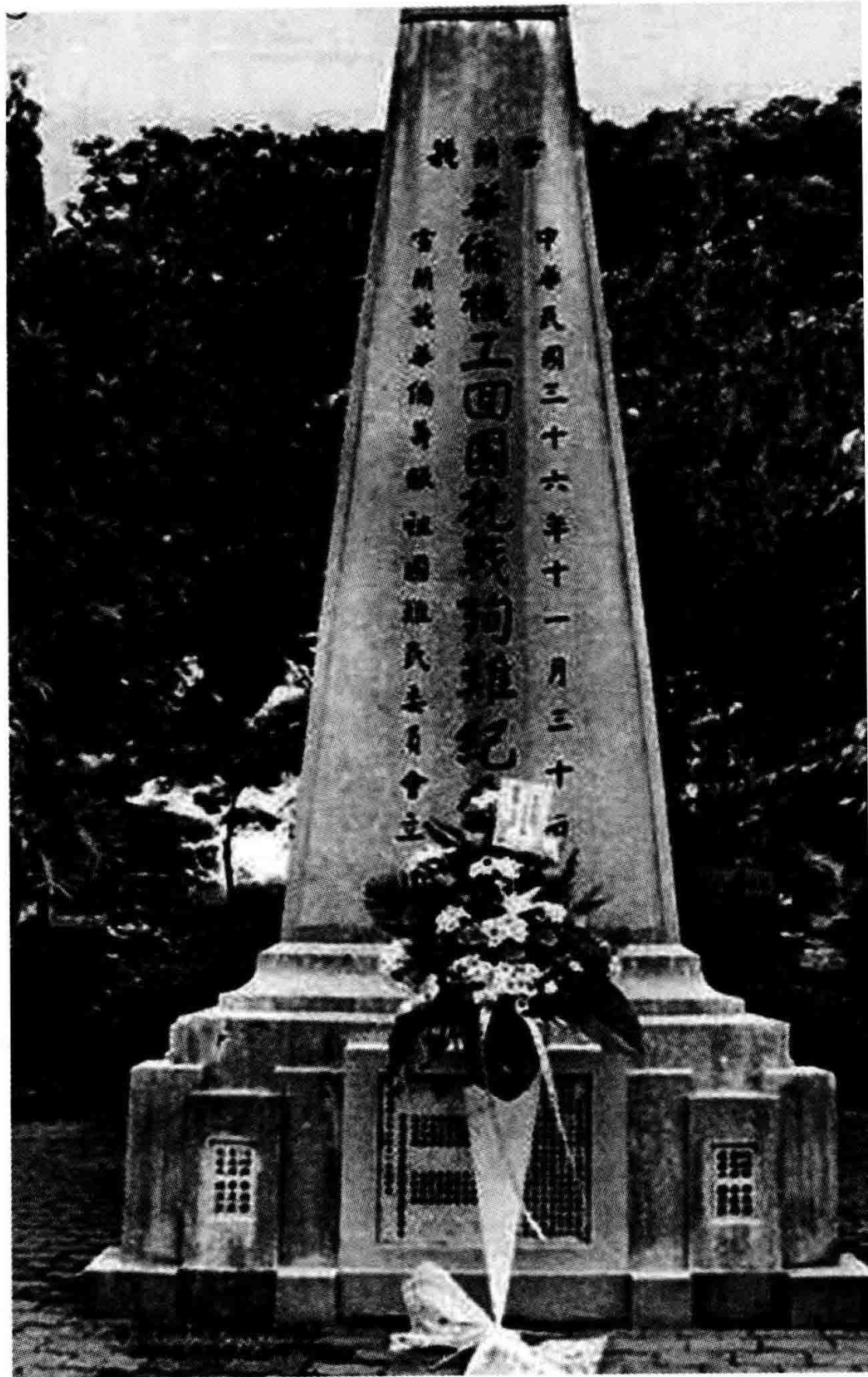


位于昆明西山公园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员奇缺，前线后方纷纷告急。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总会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三千两百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九批回国。他们辗转于滇、黔、川、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滇缅一线，地处边沿，经济落后，山高路险，环境十分艰苦，但机工们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夜以继日，风雨无阻，抢运军需，维护车辆，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抗战。其间，在日军战机的反复轰炸中，在热带疾病的肆虐中，在意外事故频繁发生中，南侨机工有一千余人为了祖国抗战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于备受战争蹂躏的祖国西南边陲的土地上；有一千余人抗战胜利后返回了侨居国；有一千余人留居祖国自谋生路。

斗转星移，岁月流转。海外侨胞爱国无悔、报国无怨、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报国情怀，感天地、泣鬼神，为我们民族精神之宝贵财富，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南侨机工后代，恒昌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晓昌先生为继承发扬爱国精神，捐资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修建此纪念碑，以表心志。德宏州人民政府特立此碑，以告慰先烈，昭示来者。今华夏崛起，边疆稳定、经济繁荣，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任重道远，海内外中华儿女尚须加倍努力。

关于畹町纪念碑的捐资兴建人林晓昌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林晓昌原名黄晓昌，他是在认了老机工——林福来为“义父”后才改姓“林”的。南侨机工林福来原是马来西亚华侨，祖居太平。林福来经历十分坎坷。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南洋华侨机工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抗战应募时，他原已准备娶妻，但祖国危难，他心如火焚，遂解除婚约，毅然从征。他第五批回国，培训后分配在先锋第十四大队担任驾驶员。这个大队的主要任务是运输燃油，既从缅甸腊戍、八莫将汽油、柴油输送至昆明乃至各战场，机工们戏谑地称这是“背着炸弹穿越炸弹”（轰炸战火），1140多千米，七天一单程，敌机



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畹町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

在前面布下烈火与爆炸的烟尘，死亡的幕墙每一秒都会坍塌，将你粉碎掩埋——整整三年，他满眼血污，但他却在脑子里深深刻画下那些断崖、深坑和草草理就的战友的坟冢。输送远征军、腊戍大抢运、“血线”在他脑海里漫漶成另一幅由丝丝血痕交织的“战争与机工”的“生死地图”——哪里埋了谁？哪里覆车机工罹难？哪里因为寻不到尸首，只掩埋了战友的一顶帽子……他闭上眼就能浮现。腊戍大抢运，他是最后撤离的一批人，不曾想这突然改变了他的一段人生轨迹。

日军已经逼近腊戍。这个集铁路、航运、公路于一体的交通枢纽城市，是日军攻略的重点，经历数年不间断轰炸，小城已如一座荒冢接连的鬼域。有逃处的缅甸人早早逃光了，没有逃走的恰恰是数万华侨华人，他们大多信赖国军能抵挡一阵，更多原因是舍不得世代辛苦挣下的那份产业。在火车站，麇集着手提肩担上万华侨老幼，当得知铁路已经毁坏，逃生的绝望顿时化成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林福来的车满载军用物资，却不能通过外围公路，人人争抢要爬上车来。一对老年华侨夫妇，拼命挤到

他跟前，要把自己的女儿——一个羸弱却容貌端丽的女孩托付于他，老人飞快地往他手里塞了三根金条。他拒绝了，如果承诺用车带人，那么瞬间他的车会被难民淹没，谁也走不了。他已经转身走出一截，但仰望天空战云滚滚，他知道一旦日军到来，那个面容凄苦的女孩将被兽兵撕碎——就在那一刻他动了恻隐之心。他用目光暗示他们往前头跑，在稍远的路口，他将与他们相机会合。就这样，他将这一家三口一气送到了楚雄。这时，江桥已断，他必须在楚雄安置营待命。老人一家对他舍命相救又拒收谢金千恩万谢，却提出，愿以小女相许——无论怎样，他们三口跟定了这个菩萨心肠的年轻人，哪里也不去了。命运就是这样，二老年至耄耋，弱女哀哀楚楚，他能说什么？

老人似乎为释去他心中负累，说他是一个有名的裁缝和制衣匠，凭手艺可以自食其力。其实，一切均不在于此：林福来一根心思要返回抗战前线！但解释却多余，滚滚的逃难人流，浮起人生，又淹没人生。他尚不明白自己的归途，他与他们结成血肉一团了。他与这个女孩“成婚”，说不上幸福，却也有许多温慰。仅半年，1942年末，听说印缅战区招募机工归队，他与杨保华等第一批报名，告别新妻及二老，毅然飞往印度。直至1944年5月大反攻，继后逐灭寇仇，抗战胜利。1946年，林福来将一家人接回缅甸，老人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制衣厂——至此，林福来的人生似乎进入了一种平波静水的境地。然而，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缅甸！他怦然心动——他要“回国”！二老和妻子决然反对，这个苦难中邂逅又拼接的家庭突然碎裂！

此后多年，林福来很难解释他的“死心决断”是为了什么？也许1940年冬天，那一次他和他的车队奉命将一批医疗物资运往西北延安，他见到了一大群纯然陌生的人，他们穿着灰色的略显臃肿的单棉制服，却把厚实的羊皮袄赠送给了机工驾驶员，他们喝小米汤，端来的却是白面馍……欢迎会上也有南洋子弟啊！他相信西北的黄土、云岭的红土，这样的交织是天然美丽的，这些都不会变。就像椰树蓝海的南洋风景不会变一样！但促使他决然回国的这个心结有几多沉重，唯心下自知，这才是使他“心秤”倾斜的根本原因：他不信任，甚至断然否定了以往命运的“操手”，国民政府当局对南侨

机工的冷漠和工役式的驱使，加之“帝国主义”的歧视，是伤心的刻痕，包括那些刻画在他脑际的“生死地图”，这张“地图”延伸到印度，也一样血肉模糊：在汀江、在阿萨姆，南侨机工自诩抗日是光荣的，光荣就应当收取自尊和平等，但英美联军，最多是“工区”的外籍主管却驱使机工有如奴役，在他们眼里，“没有祖国”的这群人就活该干最苦最累的活计，他们通常被无度地调动，昼以继夜奔驰，除了驾车运输物资还自负搬运，几十吨弹药和物资，必须上下搬运——他亲眼见三十余名战友被活活累死，有的连日腹泻，扛起炮弹箱走出几步就倒下，被砸死；有的稍稍“违规”被处罚禁闭，“解除”时已脱水死亡……他决然的死心是不愿做“没有祖国的人”！

1952年林福来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回国，在保山军管会主管的汽车驾驶学校担任教习，属部队编制。他优良的素质和技术受到充分的重视——那时，一切都那么美好，他也浑身是劲，事事当前打先锋。1967年，“文革”到来，突然，他被以“海外关系复杂”“里通外国”罪判刑，遣送保山湾甸农场“劳改”。直至1976“文革”结束，这个荒诞的“十年冤案”才得以平反纠正。组织上对他饱受冤屈似乎有意补偿，补发十年工资，可在昆明安置工作。他都拒绝了。对前一决定，他的答复是“现在国家还困难，我能自食其力”，也不到昆明，他选择畹町——这里是他“生死地图”上的“一颗挂钉”！

结果，林福来以“干部”退休，开始了他人近暮年与历史相守望的岁月。

林福来为人行侠仗义、疏财好友、见多识广、能谋善断，使他在机工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湾甸时重新成了家，妻子是一位抗战军人的遗属，贤良能干。这次，他携妻来到畹町安家，开了一家早点铺，以维持生计。但这个小店竟然没有找来钱，原因简单，那时，大多流落机工正处于落实政策的初期，有的生活很困难。他的小店开门接济他们，有时进餐免费。但这种孤独自守、清平简淡的生活并非林福来的终期目标。以他的智慧和见识，他已经看到了畹町在“边贸”中的区位优势，他以很少的节余，开始与缅甸帮赛、南坎、木姐等地商家沟通贸易，凭借人缘优势和他的信义，很快有了起色。也就是在此时他在棒赛结识了另一位华侨后代林晓昌，对这个心地善良、

为人笃实的青年，他一开始就有隐约的血亲之感。他听老机工诉说往事时，总是默默在听在记，竟至泪流满面。这里，还有一个小小插曲，在“创业”初期的1988年，德宏州侨联作为“扶贫项目”支持，给了林福来一批“长毛兔”去圈养繁衍，他却坚持打了个“借条”。种兔价值两千元，不想这个项目竟“先天不适”而早夭！林福来痛惜之余，对身边的林晓昌说：“我别无他人可求，看你做事踏实，就委托于你，将来我们有能力了，一定要将这笔种兔钱偿还给国家。”林晓昌心下明白：这就是林福来的为人。明明白白是“无偿项目”，他却以“绝不能占国家一分便宜”为绝不变易的“立身原则”：“食之粟米，报之琼瑶！”他点头承诺了，这意味着，他作为华侨后代承当了另一种责任。

林晓昌，原姓黄，祖籍福建晋江，1962年生于一个侨属家庭，幼年家境贫困。为生活所迫，他自小就远赴缅甸、泰国打工。改革开放后，他开始经营中缅边境贸易，事业有成。凭他年近而立的眼光，他感觉到林福来和这批老机工——他们决然不凡的人生经历仿佛给他衔接了一段血肉刚强丰沛的历史——这正是他久久寻觅的人生动力！他与林福来一碰即合，总是相谈甚欢，难解难离，遂开始了一段彼此坦诚、君子金兰的“忘年之交”。1983年7月，林福来得了一场病，突然间，他欠身于病榻，对林晓昌说：“你做我的儿子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啊……”——一语千钧！他明白，“很多事”的所指！他顺从他的意志，到帮赛观音寺燃一炷香，老少磕头，他改姓林，他们从此父子相称——无须谶语，袅袅蓝烟，直向南洋！

近年，老人日见衰弱了，最不忍的是，每年清明节前后数天，老人竟然闭户不出，甚至自绝食水，无论怎样呼唤，他总是仰躺着，目光如钩，如同要射穿黑暗中的穹隆，他不时进入昏迷，喃喃地呼唤谁谁谁——全是与他在战火道途中突然撒手的机工兄弟、战友——“你还在那里吗？那个松树脚……你呢？你还在崖子头？那里站不稳啊……你的水壶，还有一口水……你闭上眼睛吧，太平那边的老祖母我去磕头……”

林晓昌哽咽着，旦旦起誓：爸爸，儿一定完成您的心愿！1995年“九一八”，老人起而祭祀，伤悲过度，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1998年，即老人打下“欠条”接受“种兔”的第十年、去世的第三年，由林晓昌主事，将“种兔款”还给了国家，不是两千元，他“计息偿还”，是两万元！

林福来此情多深？

林晓昌责任就有多重。他为此改变人生，定居畹町，他开始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华侨抗战的历史，在历史的时空中，他总是壮怀激烈，感奋不已，这似乎成了他一遍遍洗练自己，砥砺精神的“功课”。1995年林福来病重垂危之际，他不离左右，精心照料，他记得老人对他最后所说的话是：“要让南侨机工的精神传下去。”而此后时势无论怎样变化，林晓昌遵照他的遗愿，初志不曾稍改！

他刻苦经营，节俭每一分钱，将那份守业创业当作碑石来堆垒、建造！

他先后捐赠五所希望小学。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林晓昌捐资三百五十万元修建了畹町南侨机工纪念碑，这座碑因这个故事似乎更增添了一种让人可以面向未来、寄望于来者的意义。

南侨机工陈团圆之子叶晓东此时是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博物馆的管理员。他曾用大量业余时间研究南侨机工历史，但在他竭尽所能搜集到的现存史料和机工名单中，他始终没有发现父亲“陈团圆”的名字，这可能是因为当年机工很多都隐去真名、谎报年龄报名回国，而在后来的日据时期，陈团圆又因被捕牺牲而丧失了一切的身份证明。叶晓东常为此耿耿于怀，直到父亲陈团圆的名字被赫然镌于畹町纪念碑刻有三千两百名机工姓名的石墙上。

叶晓东常在纪念碑前眺望国门，遥远的南天，似熹微有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守碑人，也是一个守门人，“守”与“望”似乎已昭示了永恒。当年父亲在就义之时，是否已永化为大地的“守望”？守望中，四季可清宁，花可常开，月可常明？是否有归来的远行之人，他是否依旧赤裸着一颗心，那行者，是否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他，在父亲的守望中守望——天地无名，无名大哉。

上架建议：纪实文学

ISBN 978-7-222-13599-4



9 787222 135994 >

定价：45.00元